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EMPIRE

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美] 麦克尔·哈特
[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 著
杨建国 范一亭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EMPIRE
帝国

一部包罗万象的对即将到来的世界秩序的新马克思主义阐释。作者指出，全球化并非对主权的侵蚀，而是将之改变为一个分散的国家和超国家机制的系统——换言之，一个新“帝国”……它包容现代生活的一切。

——《外交事务》

美国文学理论学者和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之间的合作导向了一部奇特、精彩的著作，它充满罕见的想象和旁征博引的内容。无论其结论多么标新立异，《帝国》都不失为一本宏大深邃的巨著。

——葛普尔·巴拉克里斯南(Gopul Balakrishnan)，《新左派评论》

四百余页的政治哲学论述——其内容从身体穿刺到马基雅维利，可谓无所不包——确实非常令人震撼。

——迈克·艾略特(Michael Elliott)，《时代》

《帝国》是一部包容了人文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的巨著，它得出了一个深邃的政治结论：我们是一个有创造力、受启蒙的物种，我们的历史也就是人类不断从那些篡夺权力的人手中夺回权力的进展史。

——埃德·瓦拉米(Ed Vulliamy)，《观察家》

上架建议：政治、历史

ISBN 978-7-214-04910-0

9 787214 049100 >

定价:32.00元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EMPIRE

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美] 麦克尔·哈特
[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 著
杨建国 范一亭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美)哈特,(意)奈格里著;
杨建国,范一亭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4910-0

Ⅰ.帝… Ⅱ.①哈…②奈…③杨…④范… Ⅲ.帝国—研究 Ⅳ.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9715 号

Empire
Copyright © 2000 by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2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0-068 号

书 名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著 者 [美]麦克尔·哈特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译 者 杨建国 范一亭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0mm×1 304mm 1/32
印 张 13 插页 4
字 数 30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910-0
定 价 3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译者的话

新旧千年交汇之时总值多事之秋，仅以我们亲身经历的这次为例，以千禧夜为中心点前后各延伸十年，前十年我们看到苏东巨变、柏林墙的拆除、冷战格局的瓦解、海湾战争，后十年我们又看到9·11的尘土扑天盖日，战火在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燃起又熄灭，熄灭又再燃起，星星点点，此起彼伏。其实，新旧时代的巨潮又岂只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才开始涌动，目光再向前，两次世界大战，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和红色左派思想席卷全球早已为新旧潮流的搏击储备好势能；更往后，巨潮翻涌搏击后世界将呈现何种地貌，谁又有先知的目光洞察未来？《帝国》的出现正处于新旧潮流搏击的核心，合应于人们意识中的千年历史拐点，这或许正是该书一经推出即获得全球知识界和一般读者的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

距离给人以智慧，然而面对《帝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恰恰缺少距离。“帝国”究竟为何物？谨慎的做法不妨先确定“帝国”不是何物。首先，“帝国”是“帝国主义”吗？作者的回答十分肯定：不是。在《帝国》的两位作者看来，帝国主义，无论打的是旧的还是新的招牌，其根基都是现代世界体系所奠定的民族国家体制，其实质是一个

主权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主权的凌越和侵犯，而“帝国”出现之契机恰恰是民族国家边界的日益模糊，昔日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正受到一种新的，全球性的支配力量的侵蚀。“帝国主义”体系以国与国之间的地理差异为基础，这既包括宗主国同殖民地之间的差异，也包括不同“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差异，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国界线、势力分割线、停火线、交战线构成“帝国主义”世界之经纬。“帝国”之目标则恰是擦去种种分隔世界的界线，把世界的不同地区融入到相同的进程中来，即使处在巅峰期的“日不落帝国”在如此“宏大”的目标面前恐怕也只有自叹不如，“帝国”所释放出的展望完全超出“帝国主义”者贫乏的想象。然而，擦除分解线却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世界融为一个“超级联邦”，那依旧落入旧式“帝国主义”思维的窠臼，只不过是旧式“帝国主义”思维更狂妄、更野蛮、更不切实际的翻版。“帝国”完全可以同民族国家共存，民族国家依旧可以在政治和民族认同上发挥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帝国”的巨手将不同民族国家的公民在经济、文化、心理各方面紧密捏合在一起，难以分离。那么“帝国”是美国吗？作者的回答依旧是否定的。虽然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最易被人误认为“帝国”，而它在外交、军事、贸易各方面的一些行为也确有妄想成为“帝国”之嫌，但作者认为，美国并不可能独力支撑起“帝国”之大厦。实际上，“帝国”是一个遍及全球的松散网络，无论美国，还是任何其他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只是网络上的一部分。虽然美国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影响到网络的运行，现阶段拥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影响力，但同时它也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依赖这一网络的正常运行，许多方面甚至比其他国家更脆弱。美国既不是“帝国”的全部，更决定不了“帝国”的一切，“帝国”有自己运行的逻辑。

“帝国”究竟为何物？按照两位作者的描述，“帝国”更接近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或者说在这种进程下业已出现和即将出

现的世界图景。国际贸易、生产转移、海外投资、文化输出，以及新资讯科技的迅猛发展，日益使全球各地的生活融为一体。从北京、上海、香港，到伦敦、巴黎、纽约，人们乘坐同样的交通工具，往返于同样的人造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间，摄入同样的食品，以同样的方式消遣工作以外的时间，同一事件已具备了在全球各地都掀起轩然大波的能力（最近，在石油价格飞涨之外，我们又熟悉了另一个名词——"次贷危机"）。然而，这种全球化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进程，在同质化和平整化的表面之下是日益扩大的北南差异，是发展中国家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是印尼耐克工厂和东莞玩具工厂里恶劣的工作条件，超长的工作时间和廉价的劳动报酬。"帝国"是个巨大的矛盾，它左手擦除国家、地区间的界线，右手却维持、制造、扩大国家、地区间的差异，从根本上说，它的左手还是服务于它的右手，最终维持其在全球的支配力量，"帝国"可以说是全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支配。然而，"帝国"的左手和右手并非配合得亲密无间，世界一体化的趋向同维持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性支配间存在着固有的张力，当张力的累积突破临界点，原有的支配体制将被崩解，新的世界由此诞生。这也正是《帝国》的两位作者写作的真正目的：既不是冷漠的描述，更不是为"帝国"张目，而是解剖"帝国"的运行机制，从而为最终超越"帝国"做理论上的前瞻，尽管这种超越在实际上还相当遥远。用作者的话说，"帝国"之幕才刚刚升起，而我们可能要穿越"帝国"的全境，才能到达它的彼端。

《帝国》的两位作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都不是纯书斋型的学者，都有着丰富的政治运动经历。哈特现任教于美国杜克大学文学院，他最初所学的专业却不是文学或政治学，而是工程学。大学毕业后，他做过工程师，参加过中美洲的政治运动，曾帮助

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执不同政见者逃往北美。奈格里是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原为帕多瓦大学教授，1979 年被意大利政府以武装反政府恐怖组织领导人之名逮捕入狱。1983 年，他当选激进派国会议员而被释放，但旋及又被剥夺议会豁免权，被迫流亡法国，长期任教于巴黎第八大学和国际哲学院。1997 年，他重返意大利，自愿入狱服刑，2003 年被释放。哈特和奈格里的合作或许也正合《帝国》的主题：在这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的时代，抵抗也正日益走向全球化，因为压制不再来自一个地方。

《帝国》译稿成于 2002 年，本无简介。今喜悉该书被列入“凤凰文库”，并要求为其加上简短介绍。以本人之力本不敢担此重任，但作为译者之一又感到有义务为之，遂草就此篇，疏漏之处，望各方专家指正。

杨建国

2008 年春　严寒之日

序　言

帝国正在我们的眼前物质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当殖民制度已被舍弃，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的障碍最终坍塌，我们已经见证了经济和文化方面交流的不可抗拒、不可扭转的全球化。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主体，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

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的全球化意味着经济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自主，脱离了政治的控制，结果是政治的权力正在衰落。一些人宣称，这一新的时代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解放，它摆脱了政治力量强加于其身上的限制和扭曲。另外一些人则哀悼这一时代，把它作为制度的途径的关闭，通过这一途径，工人、市民能够影响或质疑资本主义利润的冷酷逻辑。确实，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随，民族—国家的主权尽管依然是有效的，但已不断地衰落。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因素——金钱、技术、人力、商品——越来越容易地越过国界，因此，民族—国家越来越少有力量去制约以上因素的

流动，向经济施加它的权威。甚至最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在自身疆界的之内或之外，也不再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主权”已经衰落。① 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制已经在继续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我们基本的假设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

民族—国家正在衰落的主权和它们对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减弱的控制力，事实上是帝国主义正在降临的主要征兆之一。民族—国家的主权是帝国主义的奠基石，它由欧洲列强在整个现代当中树立。然而，依靠“帝国”这一概念，我们能理解某种与帝国主义完全不同的东西。民族—国家的现代体系所限定的国境对欧洲殖民主义和经济扩张来说是根本的。国家的边界确定了权力的中心，从那里，统治通过一系列渠道和界限，施加于外国的疆域。这些渠道和界限交替地方便和阻碍着产品的流动和货币的流通。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出它们自身疆域的扩张。事实上，几乎所有世界的领土可能都被分割过，整个世界地图可能都以欧洲的色彩标明过：红的表示英国；蓝的代表法国；绿的标识葡萄牙，等等。无论现代的主权在哪里生根，它都建立一个利维坦式的怪物，控制它的社会领域，强加等级制的边界以保护其自身特点的纯粹性，排除所有他者。

通往帝国之路出现在现代帝国主义的衰落之时。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

① 关于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和当代全球体系中主权的转型，请参见 Saskia Sassen 之专著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在其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这一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帝国通过指挥的调节网络管理着混合的身份、富有弹性的等级制和多元的交流。帝国主义的世界地图明显的民族—国家色彩，已经被合并、混合在帝国全球的彩虹中。

当代帝国主义全球地理的转变以及世界市场的实现标志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式当中有一条道路。最为明显的是，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世界的空间划分已显得过时，我们不断地发现，第一世界在第三世界当中，反之亦然。第二世界几乎无处不在。资本似乎面对着一个流畅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被新的、复杂的差异、同质、非疆界化、再疆界化的体制所限定的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过程的自身变化、流通渠道的建设和对新的全球流通的限定相伴随，结果是工业化的工厂的劳动在减少，其优先地位让位给交流性的、合作性的、富有情感的劳动。在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当中，财富的创造更倾向于我们将称为生态政治的生产，即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在其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不断增长地相互重叠，相互投资。

许多人将统治全球化进程和新世界秩序的最高权威安放在美国身上。支持者们赞美美国，把它作为世界的领袖和惟一的超级大国，诋毁者宣布它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压迫者。两种观点都基于这种假设：美国已经完全披上了欧洲国家现已脱下的全球权力的外衣。假如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么，20世纪就是美国的世纪；或者说，现代是英国的，后现代是美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者们能够提出的最致命的控告是：美国正在重复着昔日的欧洲帝国主义者们的所作所为；同时支持者们宣布美国是一个更为有能力的、更为仁慈的世界领袖，它对欧洲的错误予以了矫正。然而，我们的基本假设是一种新

的主权的帝国形式已经出现，这种假设与以上两种观点相矛盾。美国不能，而且确实一个民族—国家今天不能成为帝国主义者计划的中心。帝国主义已经过去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以欧洲的一些国家曾经有过的方式，成为世界的领袖。

美国确实在欧洲占据了优势的位置，但是，这种优势不是产生于同昔日的欧洲帝国主义者的相似，而是来源于它们的差异。这些差异通过集中于美国宪法适当的帝国（而非帝国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里，我们用“宪法”指称着形式上的宪法——它是伴随着各种修订和法律机构的书面文献——和实际的制度——它是社会力量构成的不断组合和再组合。《联邦党人》的作者托马斯·杰斐逊和美国意识形态的其他创始人受到古代帝国模式的激励。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创造开放的、扩展疆域的新帝国，在那里，权力有效地分散在网状系统中。这种帝国的思想在美国宪法的整个历史得以生存和成熟，并且现在正以全球的规模，以它充分实现的形式已经显现出来。

我们应该强调在这里我们不是用“帝国”来作为隐喻，因为这种隐喻会要求去证明今天的世界秩序同罗马、中国、美洲的帝国的相似性。进一步地说，帝国只是一个概念，它主要是要求一种理论研究。[①] 帝国的概念的基本特征是没有边境，它的规则是没有限定。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帝国的概念假定了一个体制，这一体制成功地包括了空间的整一性，或者说真正地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没有国界限定它的统治权。其次，帝国的概念表示它自身与其是一个发源于

① 关于帝国这一概念，请参见 Maurice Duverger 之文章“Le concept d'empire”，该文载于 Maurice Duverger 主编的论文集 *Le concept d'empire*（Paris：PUF，1980）。Duverger 将历史上的帝国划分为两种基本模式：一方面是罗马帝国，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其他一些帝国。我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罗马帝国上，因为正是这一模式激发了欧美传统，并引来当代的世界秩序。

征服的历史的政权，不如说它是一个成功地终止历史并因此永远固定正在存在的事态的秩序。从这种对帝国的观点出发，这就是事物将永远如此的方式，这就是事物过去一直意味着如此的方式。换句话说，帝国不是代表着历史的运动中转瞬即逝的规则，而是一种没有暂时的疆界，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位于历史之外，或位于历史终点的体制。第三，帝国的规则操纵着所有延伸到群体世界每个层面的社会秩序的登记注册。帝国不仅管理着疆域和人口，而且也创造了它安置自身的世界；它不仅统治着人类的相互交往，而且直接寻求统治人性。它统治的对象是完全的社会生活，因此，帝国代表着生命力量的典范形式。最后，尽管帝国的实践不断地沐浴在血中，但帝国的概念一直是用于和平的——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

我们所面对的帝国持有巨大的压迫和毁灭的力量，但是事实不应该使我们以任何形式为了旧有的统治形式感伤怀旧。通往帝国的道路和全球化的进程对自由的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非是单一的事情，我们把多种类型的进程理解为全球化，这些进程不是统一的、单一的。我们认为自己的政治任务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一进程，而是去重新组织它们，再次引导它们通往新的目标。维持着帝国的芸芸众生的创造力也能够自主地构造一个反帝国，一个可供替代的全球流动和交流的政治组织。反抗和颠覆帝国的斗争以及建立一个真正的替代物的斗争，将因此在帝国自身的区域发生。确实，这种新的斗争已经开始出现。通过这些斗争和许多酷似它们的斗争，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它总有一天将带领我们穿越和超越帝国。

在对从帝国主义到帝国的道路的分析中，我们所遵循的谱系学，将首先是欧洲人，然后是欧洲—美国人，这并非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地区是新思想和历史创造绝对或优先的源泉，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占据统

治地位的地理之路，正如我们将主张的，沿着此路，激励今日帝国的概念和实践，已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发展步伐而发展。[①] 鉴此，在这个意义上，帝国的谱系学是欧洲中心论的，然而，它现在的力量不限于任何地区。在某种意义上，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规则逻辑现在在全球进行着统治的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反抗帝国并卓有成效地预见可供选择的全球社会的力量，不会将自身限制在任何地域。这些可供选择的力量的地理学是一种新的地图绘制，它等待着被书写，或者它今天确实正通过抵抗、斗争和大众的期望被书写。

在写作此书时，我们已经试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运用一个大胆的跨学科的理论研究。[②] 我们探索的目标将保持哲学和历史、文化和经济、政治和人类学的同等地位。在特定程度上，我们研究的对象要求这样一个宽广的学科视野，因为在帝国当中，可能先前已经证明狭隘的学科研究的界线正在不断分崩离析。例如，在帝国的世界当中，经济学家需要有文化生产的基本知识去理解经济，同样，文化的批评家需要有基本的经济过程的知识去理解文化。这是我们的计划要求的必要条件。在本书中，我们希望已经提供的是总的理论框架，以及支持、反对帝国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行动的概念工具箱。[③]

像大多数皇皇巨著，本书可以以多种方式来阅读：从前至后，从后至前，拆成一篇篇，采用跳跃的方式，或者通过类似的方式。第一

---

① "现代性这一欧洲的现象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只不过欧洲处在这一系统的中心。"Enrique Dussel 这样写道。这段文字出自其文章"Beyond Eurocentrism: The World System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该文载于 Fredric Jameson 和 Masao Miyoshi 主编的论文集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在我们写作这本书的全过程中，我们始终以两部跨学科的著作为范本：Marx 的 *Capital* 和 Deleuze 和 Guattari 合著的 *A Thousand Plateaus*。

③ 在清理好场地，以分析和批判帝国方面，我们这本书当然不是惟一的一本。我们认为许多著作者的方向与我们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并没有用到"帝国"一词。在这里，我们只能列举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些名字：Fredric Jameson, David Harvey, Arjun Appadurai, Gayatri Spivak, Edward Said, Giovanni Arrighi Arit Dirlik。

部分介绍帝国主义的一般的错综复杂的状况。第二、第三部分是本书的中心，我们将讲述现代向后现代，或者说是帝国主义向帝国转变的过程。第二部分主要以现代早期到目前的思想和文化历史为立足点，叙述这一过程。贯穿这一部分的主线是主权概念的谱系学。第三部分以生产为立足点，叙述同样的历史过程。对此，可以在十分宽泛的意义上——从经济生产到主观生产上——去理解。这一叙述跨越了短暂的历史时期，主要集中于19世纪晚期到目前资本主义生产的诸种转变。第二、第三部分的内在结构因此是相呼应的：每部分的第一节都针对现代和帝国主义的阶段；中间一节涉及转变过程的诸种机制：最后一节分析我们的后现代、帝国的世界。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构架此书，是为了突出从思想的领域转入生产的王国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之间的间奏曲作为一个铰链连接一个立足点向另一个立足点的转移。正如马克思要求我们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自上而下地进入生产的潜在住所一样，我们打算使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发挥类似在《资本论》当中的这种转移的功能。生产的王国是社会不平等清晰的表现之所在，甚至是对帝国的力量最有效的抵抗和替代出现之所在。因此在第四部分，我们打算确定这些替代的性质，它们今天正探询着超越帝国的界限。

本书的写作开始于波斯湾战争结束不久，杀青于科索沃战争开始之前。因此，读者可以把这一论争放置在帝国建立的这两个标志性事件的中间来看待。

余江涛 译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言 1

第一部分 今日世界的政治构造

第一章 世界秩序 3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23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46

第二部分 主权的转变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73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96

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116

第七章 转变的迹象 138

第八章 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159

第九章 帝国主权 180

间奏——反帝国 201

第三部分 生产之道

第十章 帝国主义的局限 217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236

第十二章 抵抗、危机与改革 255

第十三章 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 274

第十四章 混合的政体 295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315

第四部分 帝国的衰落

第十六章 虚拟性 339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356

第十八章 反对帝国的民众 377

第一部分

今日世界的政治构造

第一章　世界秩序

资本主义只有同国家权力结为一体，并成为国家本身时，才能赢得胜利。

——费尔南·布罗代尔

他们制造杀戮，还称之为和平。

——塔西陀

从一开始，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决定了帝国的问题疆域。这个事实就是：存在着世界秩序，而这种秩序表现为一种司法构造。故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握今日正在成形的世界秩序之构造。不过，我们在工作之始就应该摆明道理，剔除两种现今流行的观念。这两种观念都有关今日的世界秩序，且分居于理论光谱的两极。观念之一：现今的世界秩序是极为异质的全球力量在互动中自发形成的，就犹如一场和谐的音乐会，而协调各种声音的是世界市场那只自然、中立、隐蔽的手。观念之二：世界秩序受控于一个单一的力量和理性中心。这种力量凌驾于各种全球力量之上，按照自身洞悉一切的计划有意识地引导着历史发展的不同阶

段;这有点儿像一种全球化共谋理论。①

联合国

在从法律角度探究帝国的构造之前,我们必须在某些细节上分析一下已对核心法律范畴进行了界定的立宪程序,尤其要仔细关注从民族国家的主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国际权力)到最初的后现代全球性实体的帝国权力之间的漫长转变过程。作为一种大致上初步的尝试,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一条各种司法形式发展的谱系,这条谱系导向了起着超国家作用的联合国及其各个分支机构,并且还将导向更远的地方。

人们广泛认为,至少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欧洲现代性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的国际秩序观念,现在已陷入重重危机。② 实际上,这种观念从来就没有走出危机,而危机却也正是推动帝国出现的动力源之一。或许,如某些学者宣称,这种国际秩序及其危机的观念可上溯至拿破仑战争时期;或许,其起源在于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的缔结。③ 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国际联盟成立之时,国际秩序及其危机的观念已明确建立了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联合国的成立再一次倡导了处在发展之中的国际法律秩序,并对其进行了巩固和延伸。这种国际法律秩序起初仅仅对欧洲有效,但随

---

① 早在 1974 年,Franz Schurmann 在其专著 *The Logic of World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Curren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 Pantheon, 1974)就着重指出世界正在走向一种全球秩序的趋势。

② 关于欧洲缔结的国际和平条约的变换,请参见 Leo Gross 之文章"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648-1948",该文载于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2, NO. 1(1948), 20 - 41。

③ 在其专著 *Cosmopolis: Prospects for World Government*(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中,Danilo Zolo 明确表示了这样一个假设:建立新世界秩序的工程应将其范式重新建立在《维也纳条约》的和平基础上。在许多方面,我们的分析同他的观点相吻合。关于这方面,也可参见 Richard Falk 之文章"The Interplay of Westphalia and Charter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该文载于 C. A. Blach 和 Richard Falk 合编的论文集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1: 32 - 70。

着它的不断扩展,最终席卷了全球。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联合国看成整个构造过程的顶点。处在顶点之上的联合国既暴露出国际秩序观的局限性,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更远处,引向一种全球秩序观。我们当然可以用否定性的言词分析联合国的法律构造,喋喋不休地谈论国际环境中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但我们也得承认,《联合国宪章》所界定的权利概念也指向一种新颖、积极的、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效用的立法源泉——一个新的、扮演拥有主权的法律角色的规范立法中心。在从国际法律结构到全球法律结构的谱系中,联合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联合国的全部概念性构造正是基于对各个独立国家的主权的承认和立法之上,因此联合国牢固地建立在由条约和协议所界定的旧式国际法权的框架之内。但另一方面,只有在将国家主权转移到一个真正的超国家中心时,这一立法程序才能够生效。在这里,我们并不想批评或惋惜在这一程序中存在的严重缺陷和不足(有时,这种缺陷和不足是悲剧性的);就联合国和国际秩序而言,我们的兴趣真正之所在是把它们视为促成向适当的全球体系转变的历史杠杆,而不是把它们自身视为目的。这样看来,恰恰是立法程序中的缺陷和不足使联合国发挥了作用。

如果要从法律角度上更仔细地考察这种转变,读一读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的著作会颇有裨益。在联合国形成的幕后,他是知识界的一位核心人物。早在 20 世纪头 20 年里,凯尔森就提出,国际司法体系应成为各国司法结构和组成的最终源泉。在分析了国家的特有秩序的形式变化之后,凯尔森得出了上述观点。他提出,民族国家的局限性给权利思想的实现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对凯尔森而言,民族国家的法律的地方性秩序必然会导向更具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国际秩序。后者的出现不仅符合逻辑,且更符合道义,因为它的出现将结束国力不均的国家间的冲突,确定各国间的平等,而平等才是真正的国际社会的原则。在凯尔森所描述的形式发展次序之后,存在着一种真实的、本质性的启蒙现代化驱动力。像康德那样,凯尔森追寻一种可成为"全人

类的组织原则,也(将)同最高道德理念合二为一"①的权利观。他希望突破国际关系中的力量逻辑,从而使"各个独立国家在法律上都被视为具有平等地位的实体",以便出现一个"世界性、普适性的国度",那将是一个"大同社会,它高于各个独立国家,将各个独立国家包容在自身之内"②。

如此说来,凯尔森后来得以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看到自己的理论假设成为现实也就再合适不过了。对他而言,在联合国之中集合了一种理性理念。③ 它使一种精神付诸实现;它为一种关于超越民族国家的合法权利的先验方案奠定了现实而有效的基础。现在,权利的合法性、有效性得以统一于一个最高法律根据之中,在这些条件下,凯尔森观念中的基本标准将最终实现。

凯尔森构想这一体系的形式性构造和合法性时,脱离了对组成它的物质结构的思考。但在现实中,物质结构必须存在,并且可在物质上加以组织。这样一种体系究竟怎样才能在现实中构建起来呢?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凯尔森的思想不能再为我们提供帮助:它始终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形式性概念将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置于一个超国家的源头之上,而这种概念在物质上的实现同概念本身存在着差距,我们希望研究的转变也恰恰存在于这一差距之中。自其成立之初直到冷战结束,联合国的历史也就是一部由各种思想、妥协、局限性经验构成的历史,而所有这些思想、妥协和经验都或多或少导向了这样一种超国家的秩序。这一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很明显,我们无须再对它们作细节性描述。无疑,在1945—1989年间,联合国在超国家工程的总体框架中起到了支配性作用,而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导致了一些十分反常的结果。然而,所

---

① 参见 Hans Kelsen, *Das Problem des Souveränität und die Theorie des Völkerrechts: Beitrag zu einer Reinen Rechtslehre* (Tübingen: Mohr, 1920), 205 页。亦可参见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Rinehart, 1952), 586 页。

② 参见 Kelsen, *Das Problem des Souveränität*, 319 页。

③ 参见 Kelsen 之专著 *The Law of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raeger, 1950)。

有那些尚还不足以阻挡我们对一个超国家权力组织的努力。[①] 在联合国难置可否的经历中，帝国的法律概念正在孕育成型。

然而，相对于这种超国家力量的形成，理论界的反应却显得很不足。绝大多数法理学者并未意识到这一超国家化进程中所包含的新内容，而仅仅重拾起各种过时、陈旧的模式，把它们用在新问题上。实际上，那些曾经促进、控制民族国家诞生的旧模式现在只是被掸了掸灰尘，便又被当作读解超国家力量机制的阐释性解释推了出来。如此一来，"由内推外"就成了分析国际和超国家力量形式的根本方法。[②]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两条思路显得尤为活跃。我们不妨将它们理解为对曾在另一时代支配了欧洲国家主权观念的两种思想——霍布斯式思想和洛克式思想的复活。

霍布斯式思想基本关注国家管理权的转移，认为超国家主权实体的构建是一种契约协定，其基础是各个已存在国家主体的融合兼并。[③] 按这一学派的构想，要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国际体系，克服许多主权国家所必然带来的混乱，惟一可行之路就是在军方手中集中起一种新的支配力量。[④] 而洛克式思想则与霍布斯式思想形成鲜明对照。根据洛克式思

---

① 关于联合国的法律史，请参阅 Alf Ross 之专著 *United Nations: Peace and Progess*（Totowa N.J.: Bedminster Press, 1966）；Benedetto Conforti 之专著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Richard Falk, Samuel S. Kim 与 Samuel H. Mendlovitz 合编之论文集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 Just World Order*（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② 要从谱系学和国际正义政治学两重立场上了解"由内及外"这一概念，请参阅 Hedley Bull 之专著 *The Anarchical Society*（London: Macmillan, 1977）。此外，无论如何读者也要读一读 Hidemi Suganami 的专著 *The Domestic Analogy and World Order Proposal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如果读者要了解对"由内及外"这一概念的现实主义批判观点，可参阅 James N. Rosenau 的专著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③ 参阅 Norberto Bobbio 之专著 *Il problema della guerra e le vie della pace*（Bologna: Il Mulino, 1984）。

④ 关于 Norberto Bobbio 在这些论争中的立场，请主要参阅 *Il terzo assente*（Turin: Edizioni Sonda, 1989）。不过总体而言，关于近年来国际主义思想的流变，以及国家主权论和国际主义两条线路之间的切换，可参阅 Zolo 的专著 *Cosmopolis*。

想,相同的过程(实现超国家主权实体)会以更分散权力、更多极化的方式进行。在这一框架中,在完成了向一个超国家中心的转移时,具有高效机制的地方反制力量网络便会崛起,去抗争并/或支持新的权力体。洛克式思想所提出的并不是全球安全,而是全球立宪。事实上,这一计划已达到构造统一的全球市民社会,从而根本消除国家存在的必要的高度。这些口号意图唤起全球主义价值观,从而引入新的国际秩序,实际上也就是新的跨国民主。① 霍布斯式思想强调契约的缔造过程,这一过程将造就一个新的单一的超国家力量;洛克式思想则聚焦于能够激活构建过程,支撑起超国家力量的反制力量。然而,两者都将新的全球力量仅仅展现为古典国家民族主权概念的类比,两种假设都未认识到帝国力量的新本质,仅仅强调了国家构造的旧有继承形式——对霍布斯式思想而言的君主制国家形式,对洛克式思想而言则是自由主义国家形式。

尽管有以上种种缺憾,考虑到这些理论成型的背景(它们都形成于冷战时期,其时联合国在最好的年景里也只是蹒跚而行),我们必须承认那些理论者们的远见卓识,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他们解释不了我们今天正在目睹的这一历史进程的新颖之处。② 在这一点上,上述的那些理论可能会产生危害,因为它们不能认识到新的帝国范式运行时加速的节奏以及展现出的动力和强迫力。帝国主权已造成了范式的转向,而这正是那些理论所无法理解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也许没有什么可讽刺之处),只有凯尔森在他的概念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尽管他的概念还仅仅限于形式性观点。他提问道:在现有的和可有的政治力量中,哪一

---

① 读者可参阅 Richard Falk 的著作,主要有:*A Study of Future Worlds*(New York:Free Press, 1975), *The Promise of World Order*(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7), *Explorations at the Edge of Time*(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Falk 的话语以及贯穿其中的理想主义、改良主义可追溯到早年 Grenville Clark 和 Louis B. Sohn 著名的提议。读者可参阅他们合作的专著 *World Peace through World Law*(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② 一些著作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从后现代的角度对传统的国际关系领域提出挑战。在本书第七章,我们将简要地讨论这些著作者的观点。

种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全球化？要有什么样的法律根源、基础规范和政令手段才能既支撑起新秩序，又避免坠入全球无序的岌岌之危？

帝国的构造

许多当代理论家不愿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新情况，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历史转向。比如说，持世界体系论观点的理论家们就提出，资本主义自其发端之日就一直在发挥着一种世界经济的功能，而当今那些叫嚷它的全球化的新颖性的人只不过误解了它的历史。[①] 当然，强调资本主义同世界市场之间绵延不断的本质联系（至少也是一种倾向）和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发展周期很重要。但对资本主义本质中的普遍性和普遍化维度的适当注意也不应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和全球权力关系中发生的转向或断裂视而不见。我们相信，这种转向已充分明确地使得今日之资本主义工程完全有可能将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结合为一体，换言之，也就是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秩序。就其构造机制而言，全球化进程已不再仅仅是一个事实，更成了进行法律定义，以助于推出一个单一超国家政治力量的根源和依据。

其他一些理论家不愿承认全球权力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向，因为他们认为主要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一直在以帝国主义方式支配着别的国家和地区。从这一视角观察，当今世界向帝国靠拢的倾向向我们展现出的并不是什么根本性的新现象，而仅仅是帝国主义的自我完善。[②] 我们不

---

① “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世界经济的事务……说资本主义只是到了 20 世纪才‘广及世界’，这种说法是对局势的误读。”在其专著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中（第 19 页），Immanuel Wallerstein 这样写道。在这一点上，最完整的论述是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三卷本巨著 *The Modern World System*（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1988）。读者也可参阅 Giovanni Arrighi 的专著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Verso, 1995）。

② 读者可参阅 Samir Amin 的专著 *Empire of Chaos*（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2）。

应低估这些真实、重要的脉络延续;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过去在帝国主义列强间存在着竞争和冲突,而今天,在许多重要的方面,竞争和冲突已为一种单一力量的思想所替代,这种思想控制、决定了它们的全部,赋予它们一致的结构,并以一种普遍的、后殖民和后帝国主义的权利观对待它们。在我们对帝国的研究中,这就是出发点:毫无疑问是一种全新的权力观,或者说一种对权威的全新刻画,一种保护契约、消除冲突的规范和法律强制工具的全新的生产方式。

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一开始就特别注重帝国机制在法律上的表现,这并非出于对法学这一特定学科的特别兴趣——仿佛权利或法律本身作为规范力量能够体现出社会的总体面貌——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法律提供了一项有关帝国机制进展程度的有用指数。帝国机制的新法律表现最先向我们显示出世界市场和全球权力关系向集权化和单一化靠拢的倾向,同时也暴露出这一工程所面临的所有困难。法律上的转变有效地指出在世界权力和秩序的物质构造中发生的转变。传统的国际法由各种契约和协定来界定,而今天我们所目睹的转变正在转向界定和构造一个新的具有主权地位的超国家世界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帝国权利观)。尽管这一转变还远未完善,但它为我们读解帝国社会总合化过程提供了框架。法律上的转变实际上是我们的社会正在调整、改变其物质性生态—政治机制的表象。这些改变不仅关系到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也关系到每一个国家的内部权力关系。这样,在研究和批判国际法和超国际法的新形式的同时,我们也被推到帝国政治理论的中心。在那里,超国家主权、它的合法性依据以及它的作用等问题又把我们的焦点引向政治、文化乃至最终的本体论问题上。

要看清帝国的法律概念,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这个概念的发展谱系,这将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一些预备性术语。帝国这个概念传到我们这里已有悠久的历史,这个传统基本上是欧洲的,它至少可上溯到古罗马帝国时期。那时,帝国的法律—政治形象同欧洲文明的基督教渊源紧密

交织在一起，在那时，帝国概念将法律范畴同普遍伦理价值糅合到一起，使它们共同发生作用，如一个有机整体。无论帝国历史是兴是衰，这种一体性一刻不停地生效于帝国概念之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法律体系都是一套特定价值观的结晶，因为伦理构成了法律的物质性基础的一部分。但帝国——尤其是古罗马的帝国权利传统——之特殊，在于它将伦理与法律的契合性和普遍性推到了极致：帝国境内天下太平，帝国保证所有民族得到公正。帝国概念被发展成一部在单一指挥指导下的全球交响乐，这个单一指挥也就是一种维持社会太平、产生伦理真理的统一力量。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在必要时这个单一力量被授予必要力量发动"正义战争"，在边境上打击野蛮民族，在境内镇压反叛。①

这样，帝国从一开始就发动起设于它的法律概念核心的伦理—政治机器。这一法律概念涉及两种基本倾向：(1) 一种以建立新秩序之名而得到认可的权力观，这种新秩序将包容它认定的文明世界的每一寸土地，包容一个无边无际、四海如一的空间；(2) 一种在它的伦理基础之内涵盖了所有时间的权力观。帝国竭尽了历史时间，悬置起历史，将过去与将来统统汇集于它的伦理秩序之中。换句话说，帝国将它的秩序展现为永久的、恒定的、必须的性质。

在日尔曼—罗马传统盛行的中世纪，上述两种权力观挽肩并行。②

---

① 我们对罗马帝国的分析借助了一些此方面的经典著作，比如说 Gaetano de Sanctis 的四卷本 *Storia dei Romani* (Turin: Bocca, 1907-1923)；Hermann Dessau 的两卷本 *Geschichte der rømanischen Keiserzeit* (Berlin: Weidmann, 1924-1930)，Michael Rostovzeff 的两卷本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Pietro de Francisci 的专著 *Genesi e struttura del principato augusteo* (Rome: Sampaolesi, 1940)以及 Santo Mazzarino 的专著 *Fra Oriente ed Occidente*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47)。

② 读者可参阅 Johannes Adam Hartung 的专著 *Die Lehre von der Weltherrschaft im Mittelalter* (Halle, 1909)，Heinrich Dannenbauer 主编的论文集 *Das Reich: Idee und Gestalt* (Stuttgart: Cotta, 1940)；Georges de Lagarde，"La conception médiéval de l'ordre en face de l'umanisme, de la Renaissance et de la Reforme，"见 Congresso internation-ale di studi umanistici 之 *umanesimo e scienza politica* (Milan: Marzorati, 1951)以及 Santo Mazzarino 的专著 *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Knopf, 1966)。

然而,从文艺复兴开始,随着世俗主义的大获全胜,两种权力观开始彼此分离,各自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在现代欧洲政治思想中出现了国际权利的概念,另一方面也发展出一种"永久和平"的乌托邦思想。前者在罗马帝国灭亡了许久之后再度找寻它曾许诺的秩序,它类同于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用于保障国内秩序的契约机制,试图通过条约机制在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建立起国际秩序。思想家如格劳修斯和普芬道夫(Puffendorf)都曾从形式上对这一过程进行过理论描述。而就后者而言,"永久和平"这一思想在现代欧洲历史上一再出现,其代表人物如伯纳坦·德·圣皮埃尔(Bernadin de Saint Pierre)和伊曼纽尔·康德。这种思想被展示为一种理念化的理性,它如一道"光辉",既对权利和伦理展开批判,又将两者结为一体;它又是一种超验性的法律体系,一种理性和伦理理念化的图示。整个欧洲现代性都是在这两个基本概念中或选此,或选彼。界定了现代性成熟期的两种伟大的意识形态亦是如此。这两种意识形态是:1) 建立在各种法律力量的和平谐音之上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在市场中的对应物;2)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关注凭借组织化的斗争和对权利的取消实现国际大联合。

那么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准确地说,这两种在现代性的数个世纪中始终并肩而存、共同发展的权力观,到了今日已趋向于融合,表现为同一范畴了呢?我们觉得事实也许确实如此,而且在后现代的时代,权利观又一次需要从帝国概念的角度加以把握。不过,既然我们的大部分探究都将围绕着这个问题,并把我们带向各种困惑和疑虑,所以我们也不要急于得出确定结论,哪怕我们的分析仅限于权利观。不过,我们已经可以确认出一些帝国概念复活的迹象——这些迹象在历史中作为逻辑性刺激物出现,不容理论忽视。

举例来说,迹象之一就是人们对于"正义战争"这一概念重新产生了兴趣,并且这一概念也因此重新获得了效力。这一概念同古代帝国的秩序有着有机联系,其丰富而复杂的发展谱系至少可上溯至《圣经》的传统

之中。近年来,它再一次作为各种政治讨论中的中心叙事而出现,这在海湾战争之后显得尤其明显。[①] 传统意义上的这一概念基本上基于这样一种思想之上:当一个国家发现它面临入侵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已危及它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时,它有权发动战争。[②] 在重又兴起的对"正义战争"概念(现代性,或者说现代世俗主义曾竭力把这一概念从中世纪的传统中除去)的关注中确实有些成分令人感到不安。传统的正义战争概念涉及对战争的庸俗化和把战争美化为一种伦理工具的做法,而这两点是现代政治思想和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所坚决拒绝的。然而在我们的后现代世界中,上述两个特点再次出现:一方面,战争的地位被弱化为一种警察行动;另一方面,能够合法地通过战争发挥伦理功能的新力量被神圣化。

然而,今日的正义战争概念远远超出了对古代和中世纪概念的简单重复。今日,这一概念的内容中已有了一些根本性的创新。从任何意义上讲,正义战争都已不再仅限于自卫或抵抗,虽然从圣奥古斯丁到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的经院派基督教传统曾那样界定它,把它视为"世俗之城"保障自身生存的需要。它已变成一种自己为自己提供合法性的活动。在正义战争这一概念中融入了两种鲜明的成分:首先,只要有伦理依据,军事设施就具有合法性;其次,以军事行动去取得欲求的秩序和和平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这两种成分的合成物确实可成为一个关键性要素,它将决定帝国的基础和新传统。在今天,敌手像战争一样,同时被庸俗化(被贬低为警察力量进行日常压制的对象)和绝对化(被视为普遍意义上的敌人,对伦理秩序的绝对威胁)。关于正义战争概念的这种新认

---

① 读者可参阅 Michael Walzer 的专著 *Just and Unjust Wars*(New York:Basic Books,1992)。"正义战争"概念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复苏在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体现,这些文章收录在 Jean Bethke Elshtain 主编的论文集 *Just War Theory*(Oxford:Basil Blackwell,1992)中。

② 在这里,读者应当正确区分"*jus ad bellum*"(发动战争的权利)和"*jus in bello*"(战争中的法律)两种概念。请参阅 Walzer 的专著 *Just and Unjust Wars*,第 61 ~ 63,90 页。

识,或许海湾战争已向我们提供了第一个明白无误的例证。[①] 正义战争概念的复活或许还只是帝国将要出现的一个迹象,可这个迹象本身影响是何等之巨大,含义又是何等之深刻!

帝国的权威模式

我们必须避免仅仅用排除法去界定向帝国的跃进,即仅仅说帝国不是什么,比如说,仅仅说帝国这一新的范式是由民族国家的衰落、国际市场摆脱管制、国家主体间抗争的终结等等来界定的。如果新范式的构成要件仅限于此,那么它的结局将是真正的混乱。权力既惧怕又鄙视真空,米歇尔·福柯并非指出此点的惟一之人。新的范式已经可以加以正面的定义——它也必须如此。

新的范式既是网络系统,又具有等级结构。它既以集权形式构造常规,又在广阔的区域内生产合法性。它四处伸展,包容世界。它的初始模型是一种具有动能和柔韧性的系统化结构,这种结构在水平方向上发展联结。在思想上走一点捷径,我们可把这种结构构想为尼克拉斯·拉赫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论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混成品。[②] 有人称这种状况为"没有政府的统治",以此来指明它的结构逻辑。它的效力有时不可察觉,但始终存在,而且与日俱增,最终将所有角色扮演者

---

① 关于海湾战争和它的正义性,读者可参阅 Norberto Bobbio 的专著 *Una guerra giusta? Sul conflitto del Golfo*(Venice:Marsilio,1991),Ramsey Clark 的专著 *The Fire This Time: US War Crimes in the Gulf*(New York:Thunder's Mouth Press,1992),Jürgen Habermas 的专著 *The Past as Future*(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4);以及 Jean Bethke Elshtain 主编的论文集 *But Was It Just? Reflections on the Morality of the Persian Gulf War*(New York:Doubleday,1992)。

② 关于 Niklas Luhmann 的系统论对国际法律理论的影响,读者可参阅 Gunther Teubner 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收录在 Gunther Teubner 和 Alberto Febbrajo 合编的论文集 *State, Law, and Economy as Autopoietic Systems*(Milan:Giuffrè,1992)。Charles R. Beitz 在他的专著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尝试对 John Rawls 的伦理—正义理论加以改进。

席卷入整体的秩序之中。[①] 在全球秩序中，系统总体性占据了支配性位置，它坚决地打破先前存在的一切辩证对立，发展出一种呈线性和自发的角色融合。与此同时，在这一秩序的最高权威下形成的共识显得越来越有效力，所有的危机、争端和分歧都有效地推进交融过程，也以同样的效力呼唤一个更集权的权威的出现。所有事物都导向和平、平衡和妥协冲突的价值观。全球系统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帝国权利的发展）就如一部机器的发展，这部机器一刻不停地把契约化程式施加到世界之上，最终引导世界达到系统的动态平衡——这是一部不断产生出对权威呼唤的机器。这部机器似乎早已预设了权威要发挥作用，行动要横跨整个社会空间。每个运动都是固定的，只有在系统之中以及在与系统相应的等级关系之中，它才能找到自己的预定位置。这种运动的预构性界定了新的范式——帝国世界秩序的构成过程的实质。

帝国范式在质上区别于过渡时期内各种各样界定国际秩序的尝试。[②] 先前的视角还处于移动之中，它的聚焦点在于能够导向新秩序的合法动力；而在新的范式下，一切就如新的秩序业已构成。从最初开始，就从概念上确立了力量的获取权与运用权不可分割，这一点被视为整个系统有效性的先决条件。尽管新的集权力量同它的各个规则应用领域的契合无法达到尽善尽美，或者更准确地说两者间始终存在着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断裂，但这并不会导致危机或瘫痪，仅仅会迫使系统把它们的影响最小化，并克服它们。简而言之，要实现向新范式的转向，就必须（至少在开始阶段）建立并确认一种超乎民族国家之上，相对摆脱民族国家主权限制的力量，这种力量要能够起到新世界秩序核心的功能，有效地向新世界秩序之上施加它的规则，必要时，向它施加强制。

---

① James Rosenau 在其论文"Governance,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介绍并表述了这一概念，该文收录在 James Rosenau 和 Ernst-Otto Czempiel 合编的论文集 *Governance with Governmen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中。

② 在一个极端，请看编入 V. Rittenberger 主编的论文集 *Beyond Anarch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m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中的一组文章。

这样的结果是:就如凯尔森所希望的那样,一种法律实证主义决定了新的法律秩序的形成。[①] 实际上,系统的实际形成过程已预设了它的形成能力。不仅如此,形成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行为主体都被预先扯向一个界定明确的中心,这种扯引力变得不可逆转,它不仅源自中心向四周施力的能力,更源自处于中心之中,构造、系统化总体的形式力量。在这儿我们又一次遇到了拉赫曼和罗尔斯的混合。但在这两位之前我们还能找到凯尔岑这位不由自主、自相矛盾地发现了帝国权力之魂的乌托邦思想家。

古代的帝国概念再次帮助我们更明晰地表述这一正在形成之中的世界秩序的本质。修昔底德、李维、塔西佗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包括马基雅维利对他们的著作的评述)教导我们,帝国形成的基础不仅包括武力本身,更包括将武力展现为服务于正义和和平的能力。帝国军队的一切干涉行动都是在卷入既有冲突中的一方或多方的诉求下才做出的。帝国并非自愿,而是应召唤而产生的,它解决冲突的能力就是构成它的基础。只有当解决既有冲突的国际共识已形成,且帝国已经嵌入这种共识之链中,帝国才会形成,才会在法律上获得合法性。回到马基雅维利,帝国的扩张扎根在它所要解决的冲突的内在运动轨迹之上。[②] 因此,帝国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支持它的力量的共识区域。

古代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第一幅帝国的近影,但如果我们要表述出今日正在运行之中的全球权威模式,我们尚需走得更远一些。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权论、契约论和制度实在论、形式主义和系统论分别能解释这个模式的某些方面:法律实证主义强调了在标准化过程的核心保存

---

① 参阅 Hans Kelsen 的专著 *Peace through Law*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4)。

② 关于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帝国的解读,读者可参阅 Antonio Negri 的专著 *Il potere costituente* (Milan: Sugarco, 1992)第 75 - 76 页。英文读本则有 Maurizia Boscagli 的著作 *Insurgencies: Constituent Power and the Modern Sta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强有力的力量的必要性；自然法权论凸显出帝国可提供的和平与平衡的价值；契约论将共识的形成请上前台；制度实在论阐明了适合于共识和权威的新维度的制度的形成过程；系统论提供依据和功能组织形式；而形式主义则为系统论提供逻辑上的支持，强调这一过程的总体化特征。然而，有哪种法律模式能够抓住所有这些新的超国家秩序的特征呢？

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跃进中，一系列新特点界定着国家内部秩序，而新的超国家秩序同那些特点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①] 在初次尝试对新的超国家秩序进行界定时，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错了。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对应关系（可以说它是凯尔岑式的，不过现实多了）并非“由内及外”，以内部秩序推演出国际体系，而是“由外及内”，以超国家秩序推演出国家内部的法律体系。两种体系的基本特点都包含着霸权，它体现在如司法程序、预防手段等法律行为中。规范、禁忌、压制由此而生，跟随着程序的发展而成形。国内法律和超国家法律的新功能之所以会有相对的（也是有效的）契合，其原因首先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都作用于一个相同的领域——危机。然而，正如卡尔·施密特所言，危机体现在法律应用之上时，我们应将关注聚焦到法律的产生时刻的“例外”行动之上。[②] 国内法或超国家法都由自身的例外而得到界定。

在此，“例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功能。为了控制和支配这样一种完全处于流动之中的情形，就必须赋予进行干预的权威以某些权力。首

---

① 关于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在法律上的转变，读者可参阅 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 的合著 *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的第六和第七章。

② 很奇怪，在这场国际主义的论争中，Carl Schmitt 被用到的惟一一部著作是 *Der Nomos der Erde im Vølkerrecht des Jus Publicum Europaeum* (Cologne: Greven, 1950)。实际上，他在这方面更为重要的著作是 *Verfassungslehre* (Berlin: Duncker&Humblot, 1993)。他首先试图界定什么才具有政治性，正义的生产又是什么，在此基础上他发展起自己的立场。

先,要使权威有能力在"例外"时界定对干预的需求;其次,使其有能力发动用于应付危机时期繁杂众多情况的军力和设施。因此,这里以干涉的例外性的名义,产生了一种实为警察权的权利。新权利是在以重建社会平衡为目的的对阻止、压制和修辞力量的运用中形成的,这一切正符合警察的行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警察的行动和警察创造、维持秩序的能力识别帝国权利的起源和固有来源。帝国秩序的合法性支持着警察权力的运用,而同时全球警察力量的活动证明了帝国秩序的真正效率。这样,控制"例外"的法律力量和运用警察力量的能力成为了两个定义帝国权威模式的初始坐标。

普遍价值观

到此时,我们或许会发问,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中,我们还应该用"权利"这个法律术语吗?权利已成了建立在永久性例外和警察武力基础之上的一系列技术手段,所谓权利和法律都已被简化为纯粹的效用问题。我们怎能把权利(尤其是帝国权利)称为这样一系列技术手段?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应当更仔细地审视帝国的构成过程(今日,我们正在目睹这一过程)。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强调它的实在性不仅仅体现在它所引起的国际法的改变上,同时也体现在它所造成的单个社会和民族国家内部,或者说全球社会的行政法令、法规的改变上。[①] 通过改变当代的超国家法律,帝国的构成过程趋于或直接,或间接地渗透、重构民族国家的内部法律,因此超国家法律有效地支配了国内法。

---

① 要很好地理解这一进程,读者只需读一读国际法学和国际经济学这两门学科中的一些经典书籍,并把它们的观察和诊断联系起来就足够了。尽管这些观察和诊断出自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结构,但它们都带着某种新现实主义。更确切地说,它们都带着一种霍布斯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读者如果需要这方面的例证,可参阅 Kenneth Neal Waltz 的专著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以及 Robert Gilpin 的专著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或许这种改变最显著的一个迹象就是所谓"干涉权"这一概念的发展。[①] 这种权力通常被视为在世界秩序中居支配地位的主体,为了防止或解决人道主义灾难,保障协调,施加和平,可进入到别的主体的领土内进行干涉。在《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以维持国际秩序的全套机制中,干涉权的地位十分突出,但当代对此种权力的重新塑造表现出一种质的飞跃。这种权力不再像处在旧的国际秩序下那样,仅仅被民族国家或超国家机构(联合国)用来确保或施加自行形成的国际协同。现在超国家机构可因任何紧急事态或以伦理价值之名展开干涉,这种行动的合法性不是受到法律权利的首肯,而是为国际共识所支持。在这种干涉行动之后不仅是永久的紧急事态和例外状态,而且这种紧急事态和例外状态更因对正义的诸种根本价值的诉求而得到合法化。换句话说,普遍价值观使警察权力合法化。[②]

既然这种新的干涉权的基本功能朝向解决各种紧急的人类问题这一目标,我们是否就应认为它建立的基础是普遍价值观呢?我们是否应把这种运动读解为一种过程,它的基础根植在构成历史框架的各种不断波动的因素之上?由于受到普遍正义观、和平观所具有的力量的驱动,这种过程开动起一部构造机器。这样,我们所处的境况是否很接近传统所界定的帝国,那个古罗马—基督教式的帝国构想呢?

鉴于我们的探寻工作还处在早期阶段,在此时就对上面提出的一系

---

① 要初步涉足就这一话题而产生的浩如烟海,又常常混乱繁杂的文献,读者可以参阅 Gene Lyons 和 Michael Mastanduno 合编的 *Beyond Westphalia? State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Arnold Kanter 和 Linton Brooks 合编的论文集 *U. S. Intervention Policy for the Post-Cold War World* (New York: Norton, 1994), Mario Bettati 的专著 Le droit d'ingérence (Paris: Odile Jacob, 1995);以及 Maurice Bernard 的专著 *La fin de l'ordre militair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litiques, 1995)。

②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伦理学,除了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过的 Michael Waltz 和 Charles Beitz 的著作,读者还可以参阅 Stanley Hoffmann 的专著 *Duties beyond Border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以及 Terry Nardin 和 David R. Mapel 合编的论文集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列问题作出肯定性答复有点操之过急。把正处于发展之中的帝国力量解释为一门以正义战争行为为基础,以解决各种不断出现的紧急事态为目的的警察制度科学,这种界定很可能是正确的,但也同样可能不是的。正如我们所见,新的世界秩序的各种现象的决定因素存在于一种不断波动的状态之中,如果从危机和战争的角度去表述它们的特点也同样正确。一方面,这种新秩序因其预防和警察功能而合法化;另一方面,危机和战争的事实又质疑这样一种正义观的根源和它的合法性。如何才能调和这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呢?正如我们已提过,这些和其他一些类似的技术性问题标志着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新全球秩序的物质构造过程,以及它的行政机器被强化和全球空间内的新统治阶梯被生产的过程。那么,谁能够在整个构成过程之中,横跨所有活动领域,决定如何界定正义和秩序呢?谁能去界定和平的概念呢?谁又能够既悬置起历史,又称这种悬置为正义呢?围绕这些疑问,帝国的问题领域是开放,而非封闭的。

此时,新的法律设施这一问题以其最贴近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它是一种全球秩序、一种正义、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还是虚的,但它已实实在在地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越来越受到压力,感受到我们参与了这一发展,被要求对这一发展的未来担负起责任。我们的公民地位及我们的伦理责任皆存在于这些新的维度之中——我们是有力或是无用也在此得到衡量。我们可以以康德式口吻说,当我们的内在道德品质和社会秩序面对并受到帝国检验时,它倾向于被它的伦理、政治、法律范畴所决定。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只有在帝国的框架之内,每个人、每个公民的外在道德表现才具有通约性。这一新框架迫使我们面对一系列爆炸性变化,因为在这个新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世界之中,我们所有关于正义的思想和行为以及我们获取希望的各条途径都面临疑问。对价值各种私下的、个人化的理解方式将统统消散;随着帝国的出现,我们将要面对的不再是普遍性在地方的中介,而是实实在在的普遍性本身。价值因国而

异，这曾是一道屏障，价值在它之后展现其道德实质；它也曾是一个限度，抵御着外部入侵。可现在，它消失了，我们都被推到各种绝对问题和极端抉择之前。在帝国之中，伦理、道德及正义都被投入到新的维度之中。

在我们研究的全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始终面对着一个政治哲学的经典题域：帝国的衰败与没落。[①] 在解决帝国的初始构成的同时，又去关心那样一个问题，未免有点纠缠不清。但各种条件使帝国的出现将成为现实，也还是那些条件将导致帝国走向衰败和没落。今天，帝国正作为一种中心出现于世界，它支撑起生产全球化之网，试图把所有权力关系都置于它的世界秩序之下。可同时，它又运用强有力的警察功能，压制威胁到它的秩序的新野蛮人和具有反抗意识的奴隶。帝国权力看来服从于地方权力的力学波动，同时也服从于法律秩序构造行为，这种行为不断变化，也缺乏全面公正，它试图凭借行政程序的例外性将一切引归常态，但这种努力永远不会全面奏效。恰恰是这些特点决定了古罗马帝国的衰败，也令启蒙时期众多古罗马帝国的仰慕者们感到痛心。我们不应期待在构建新的帝国权利关系的过程中，复杂性会得到解决。相反，各种过程仍互相矛盾，而且将一直如此。如何界定正义和和平这一问题不会得到真正的解答，新的帝国的宪法力量也不会构建在由大众所表达的共识之上。帝国的法律提案所使用的术语完全没有确定性，尽管它们仍是具体的。帝国在诞生之始就表现出了自身的危机。那么，我们是否应像孟德斯鸠和吉朋那样，把帝国描述成衰败呢？或者以古典的方式，把帝国理解成败坏，这样理解是否更恰当一些呢？

在此，我们应首先理解败坏不仅有其道德意义，也有其法律和政治意义。根据孟德斯鸠和吉朋，无论何种政府，只要它不是坚实地建立在

---

① 在这里，我们提到的是两部经典：Montesquieu 的 *Considerations on the Causes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Romans and Their Decline*（New York：Free Press，1965）；和 Edward Gibbon 的三卷本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ondon：Penguin，1994）。

共和制的基础之上，它就不可避免会走上败坏之途，共同社会也将被撕裂。[①] 其次，我们也要理解败坏的形而上意义：无论在哪里，只要实体、本质、效用和价值不能寻得共同认可，在那里所发展出的就不会是生成，而是败坏。[②] 后面，我们将回到这几条帝国的轴线上，作详细探讨。

作为结论，请允许我们提及基督教在欧洲的诞生，以及它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而得到的扩展。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具有强大潜力的主体得到建立、巩固，它预示了另一个世界的来临。这个新主体提供了一个完全另类于帝国权力精神的选择——一个全新的本体基础。从这一角度看，帝国被接受为"时代的成熟"，它是一切已知文明的整合，但它的一切在一个彻底不同于它的伦理和本体轴向上受到挑战。同样，即使今天所有对帝国权利的限制都被突破，一切关于帝国权利的不可解的难题都得到了解决，理论和实践依然可以超越它，再次寻找到抗争的本体基础。这一切会发生在帝国之内，但它仍会以不相上下的规模反抗帝国并超越它。

---

① 正如 Jean Ehrard 所显示，在整个启蒙时代，说罗马的衰败始于恺撒这一观点在历史地理学中被一再提出。读者可参阅 Jean Ehrard 的专著 *La politique de Montesquieu* (Paris: A. Colin, 1965)。

② 政治政权的腐败原则在成形于诡辩派时期(后来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整理成文)的政府形式理论中已经很明显。"政治"腐败原则后来被转译为一种历史进步理论，它强调了循环发展中的政府形式中的伦理模式。在对此做出贡献的各种理论努力中(其中诡辩派显然是鼻祖)，波利比奥斯是令之最终成形的人，他欢庆着腐败的创造功用。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 “警察”表现为同法庭、军队、国库一道统领国家的行政机关，这话不错。可实际上，它几乎包容一切。图尔凯(Turquet)如此说道：“它向外伸出触须，探入人们的一切生存状态中，探入人们正在做或承诺做的每一件事中。法庭、金融、军队，这些都被纳入它的力场之内。”警察包容一切。
>
> ——米歇尔·福柯

从法律的角度，我们已经能够发现帝国的观念起源中的一些成分。可单单从那一个角度，我们很难(即便并非完全不可能)理解帝国机器是如何被发动起来的。法律根据和法律体系总指向它们之外的一些东西。通过权利的演化和运用，它们指向在社会现实层面上界定了它们的交易的物质状况。我们的分析现在也必须深入到那个物质性层面，在那里探察统治范式的物质转型。我们需要找出生产社会现实的各种力量与途径，同时我们也要确定驱动这一生产的主体。

控制型社会中的生态权力

在许多方面，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为探察帝国统治的物质性职能划

定了区域。首先,福柯的著作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形态从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向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的历史过渡。① 在规训社会中,社会控制建立在一个由各种设施结成的庞大、复杂的网络体系之中,这一网络体系产生和规范了风俗、习惯及生产实践。通过各种规训机构(监狱、工厂、收容所、医院、大学、学校,等等),这种类型的社会的作用被启动,并确保人们服从于它的统治,服从于它的接纳和/或排斥机制,从而对社会领域进行建构,提出顺从规训"理性"的逻辑。实际上,规训力量的统治手段是建构思想和行为的参数与极限,它预设正常行为,禁止反常行为。福柯概括性地称古代的政体和法国文明的古典时期为规训社会,以它们来例示规训的出现。再高度概括一点,我们可以说整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在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处在这种权力范式之下。与之形成对照,我们应理解,在控制社会(这种社会类型发展于现代性的顶点,并开启了通向后现代的门户)中,控制机制变得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内存于社会领域之中,这种机制通过公民的大脑和身体传播,符合统治要求的社会融合和排斥行为因此也越来越内存于主体自身。现在,行使权力的机器直接组织人的大脑(通过通讯交往系统、信息网络等)和人的身体(通过社会福利系统、活动监控系统等),把人们驱入与生命感受和创造欲望的自动间离(alienation)之中。故而,控制社会的特点可表述为规训的规范化手段的强化和普遍化。这种社会内在地驱动我们的日常行为,但这种社会中,控制实现于灵活、多变的网络系统之中,从而使它的效力范围远超出由各种社会机构构成的构架严整的场所。正是在这一点上,控制与规训形成对比。

---

① 尽管 Foucault 并未明言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转变,这一观点始终隐藏在他的著作中。在对这一点的阐释上,我们遵从 Gilles Deleuze 所作的精彩评论。读者可参阅 Gilles Deleuze 的专著 *Foucault* (Paris: Minuit, 1986) 和他的文章"Post-scriptum sur les sociétés de contrôle",该文收录在论文集 *Pourparlers* (Paris: Minuit, 1990) 中。读者还可参阅 Michael Hardt 的文章"The Withering of Civil Society",该文载于 *Social Text*, no. 45 (Winter 1995),第 27 - 44 页。

第二，福柯的著作使我们认识到新权力范式的生态政治本质。[①] 生态权力(biopower)这种权力形式在内部规范社会生活，它追随社会生活，解释它、吸纳它，并把它重新表述。只有当权力成为一种内在的、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也只有当每个个体都接纳权力的这种职能作用，并按照他或她的意愿启动它时，权力才能达到对民众的全部生活的有效控制。如福柯所述："生活现在已变成……权力的目标。"[②]这种权力的最高职能是层层包裹生活，它的基本任务是指导、管理生活。因此，在生态权力所指向的生存状态中，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已成了权力追逐的猎物。

在福柯的作品中，这两条主线相互交错，指明只有控制社会才能采纳生态政治环境，作为其专有的指涉域。在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过渡中，新的权力范式得以实现，对它的界定由各种把社会确定为生态权力领域的权术完成。在规训社会中，生态政治权术的效果尚不全面，因为在那种社会中，规训行为是按照相对封闭的、地缘化的、量化的逻辑发展起来的。社会戒律将个人钉在各种制度之中，但并不能成功地将个人彻底编排入生产性实践和生产性社会化的韵律之中。它尚未达到饱和、浸彻个体的意识和肉体，处理、组织个体的总体生活的境界。这样，在规训社会中，权力与个体的关系就始终是静止不动的：它表现为权力戒律对个体的入侵以及与此相应所产生的个体的反抗。与此相反，当权力已

---

① 读者主要可参阅 Michel Foucault 的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New York: Vintage, 1978)。关于 Foucault 在其他地方对生态政治这一概念的论述，可参阅"The Politics of Healt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收录于 Colin Gordon 主编的 *Power/Knowledge*(New York: Pantheon, 1980)，166－182 页；"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收录于 *Dits et écrits*(Paris: Gallimard, 1994)第 3：207－228 页，特别是 210 页；和收录于同一部书中的"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3：818－825 页。关于 Foucault 之后的著作者在生态政治这一问题上的观点，读者可参阅 Hubert Dreyfus 和 Paul Rabinow 合编的 *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第 133－142 页；以及 Jacques Donzelot 的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New York: Pantheon, 1979)。

② 参阅 Michel Foucault 的文章"Les mailles du pouvoir"，收录在 *Dits et écrits* 中，4：182－201；引文在 194 页。

彻底生态政治化时，整个社会机体都由权力机器所构成，并已发展为虚拟状态。这种关系变得开放、量化、情感化。权力已伸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伸展到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社会已完全被纳入这种权力之中，如一个单一体对权力发生反应。权力已表现为一种控制，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①

在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转变中，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在发展全过程中始终孜孜以求的一切社会力量互为影射的关系得到全面实现，马克思曾确认某种类似的东西，他称之为资本对劳动力的形式吸纳到实在吸纳的过渡。② 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也分析了一个与之紧密相联的过程——文化(以及社会关系)被吸纳入集权国家，或更确切地说被吸纳入畸形的启蒙辩证法的过程。③ 然而，我们所提到的转变过程与上述过程有着根本区别。马克思的描述关注过程的单维性，法兰克福学派后来仅仅对马克思的描述进行了重述和扩充。与之不同，福柯论及的过程在根本上触及多元性和复杂性——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这种观察视角发展得更为明确。④ 当实在吸纳被理解为不仅包裹了社会的经济或文化维度，而且包裹了整个社会有机体，并且当对实在吸纳的分析关注到规训和/或控制的模态，那么这种分析就可打破资本主义发展那单向、整体的形象。市民社会被吸纳入国家之中，可结果却是，原先在市民社

① 许多思想家都追随 Foucault，并成功地对福利国家这一事物提出责难。读者主要可参阅 Jacuqes Donzelot 的专著 *L'invention du social*(Paris:Fayard,1984)和 FranÇois Ewald 的专著 *L'état providence*(Paris:Seuil,1986)。

② 读者可参阅马克思的一篇文章"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该文作为《资本论》的附录被出版。读者也可参阅 Antonio Negri 的专著 *Marx beyond Marx*(New York:Autonomedia,1991)。

③ 参阅 Marx Horkheimer 和 Theodor Adorno 的合著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72)。

④ 参阅 Gilles Deleuze 和 Félix Guattari 的合著 *A Thousand Plateau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2)。

会中得到协调和调解的各种因素将会爆发。反抗不再徘徊在边缘，而是活跃于在网络系统中处于开放的社会的核心。因此，福柯的建构隐隐指出权力的悖论(德勒兹和瓜塔里使这种隐含意义明晰化)：就在权力完成了大一统，将社会生活的一切成分都包容在自身之内的那一刻，它也使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得到显现。那是一个有着千差万别，由最大限度的多层性和不可被吸纳的单一性构成的复杂环境，这是每个单一事件都有自己独特性的环境。①

关于控制社会和生态权力的这些概念都描述了帝国概念的核心方面。帝国概念是一个框架，主体的多面性必须在这个框架中进行理解；它也是一个目标，是新的权力范式导向的目标。也就在此，一条实实在在的裂缝产生于各种旧的国际法理论框架和(无论它的形式是契约式的和/或是联合国式的)帝国法律的新现实之间。这一过程中，一切中介成分都被拔到一边，因此，国际秩序再也不能通过中间力量来建构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只能被最直接地把握。我们已从法律角度承认了这个现实。实际上，我们已看到当新的权力观从全球化的背景中显现出来，并显示自己有能力处理普遍性，将整个星球当作一个单一系统时，它必须取得一个最直接的前提(在例外状态下行动)和一套充分的、灵活的技术(警察制度中的各种手段)。

纵使例外状态和各种警察手段构成了新的帝国权力的坚实内核和它的核心成分，这也并不意味着新的政体同样就独裁与集权主义的各种

---

① 举例而言，读者可参阅 Peter Dews 的专著 *Logics of Disintegration: 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 and the Claims of Critical Theory*(London: Verso, 1987)的第六和第七章。一旦读者接受了对权力的如此定义，以及穿越权力的危机，Foucault 的话语就展现出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以批判福利国家(在这方面，Deleuze 和 Guattari 的话语更是如此)。如果读者要寻找与此多多少少相吻合的分析，可参阅 Claus Offe 的专著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Politics*(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Antonio Negri 的 *Revolution Retrieved: Selected Writings*(London: Red Notes, 1988)，以及 Antonio Negri 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都收录入他和 Michael Hardt 的合著 *Labor of Dionysu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第 23－213 页。

法律权术有任何关联。(在别的地方,后者已被如此彻底地描述,所用的语言是如此夸张,而描述它的作者又是如此之众多[简直太多了]。①)与之相反,在当代这个处于转折之中的环境中,法律的统治仍起到核心作用;权力依旧有效,而且(恰恰是凭借着例外状态和警察手段)成为程序。这是一场剧烈的转变,它既暴露出权力和主体之间未经中介的直接关系,也显示了既不可能存在任何"优先存在的"中间力量,也不可能抑制各个事件在时间中的多样与差异。② 无边无垠的全球空间,深不见底的生态政治世界,不可预见的时间之流,这些就是给新的超国家权力定界的维度。就在此处,帝国的概念要努力建立起自己;在此处,帝国概念要证明自己的效力;仍在此处,帝国机器将被启动。

从这个角度看,新范式的生态政治背景完完全全是我们分析的核心。正是它面对权力推出另类选择,它不仅是对顺从或反抗、政治参与或拒绝的选择,也是对全部生活领域中所有问题的选择,生存或死亡,富有或贫穷,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都在选择之列。想想新的权力观在表现帝国权力如此宽泛的维度时会遇到何等巨大的困难,再想想这种权力观无论如何也不能实在地触及到帝国权力的所有方方面面,就可看到帝国权力至多也只能不全面地表现潜藏在新的世界秩序结构之下的样式,而不能真正把握住令它运转的动力。我们的分析必

---

① "极权主义"——这一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概念——已证明是一件很有用的宣传工具。可作为分析的工具,它就完全不适合。它常常把人们引到恶毒的、迫害性的方法上,破坏了道德的争论。在我们的图书馆中,像这样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排满了书架。今天,我们应当把它们看作耻辱,应当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清除掉。要简略了解一下有关"极权主义"的文献(从最具连贯性的到最荒诞不经的),读者可以参阅 Hannah Arendt 的专著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1951)和 *Jeanne Kirkpatrick* 的专著 *Dictatorship and Double Standard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2)。在本书的第五章,我们将再回到"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对它做更详细的论述。

② 在这里,我们所指的是德语世界在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间发展起来的 *Mobilmachtung* 概念所涉及的题域,那个概念多多少少是通过 Ernst Jünger 和 Carl Schmitt 发展起来的。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同样的概念也出现在法国文化中,而且它所带有的战斗性即使到今天仍未消退。在与之有关的讨论中,Georges Bataille 是一个核心人物。

须聚集在生态权力的生产维度之上。①

生活的生产

生产和生态权力、控制社会的关系暴露出前文中提到的几位作者著作的薄弱之处，尽管我们正是借鉴了他们的一系列观念。故而，我们应该澄清福柯的著作中和生产力学相关的生态或生态政治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福柯在多部著作中讨论过，如果不考虑生态政治环境如何被日益用来服务于资本积累，就不能理解从古代政体的主权国家到现代的规训国家的跃进。他写道："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并非仅仅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来完成，它也完成在肉体之中，得到肉体的帮助。对资本主义而言，最重要的是生态政治，它是生物性质的，是属于肉体的。"②

这一时期，福柯的研究策略的核心目标是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表现，其中包括几种马克思主义的变体。那些理论都将权力与社会生产问题放在上层建筑的层面加以考虑，从而将它们同生产的低级、实在层面相剥离。因此，福柯试图带着社会再生产问题，以及所谓"上层建筑"的一切组成成分回归到基础物质结构中，试图不仅以经济术语，同时以文化的、物质的、主体性的术语来界定这一领域。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福柯稍后时期的著述中，当他描绘出正在显现的控制社会的轮廓，揭示了这一活跃于整个社会生态政治中的权力形象时，他关于社会整体的

---

① 读者可以追踪一条有趣的讨论线索，它从 Jacques Derrida 对 Walter Benjamin 的文章"Critique of Violence"（以及 Drucilla Cornell, Michel Rosenfeld 和 David Gray Carlson 编的 *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的解读一直发展到 Giorgio Agamben 在更近一些时候完成的更激励人心的著作 *Homo sacer: il potere sovrano e la nuda vita* (Turin: Einaudi, 1995)。这样一条线索有效地发展起了 Foucault 对生态政治的诠释。然而，我们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把所有这些讨论引归到"生命"的生产性维度这一问题上。换句话说，也就是要确定这一概念的物质性维度，从而超越任何纯自然主义的，或纯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

② 参阅 Michel Foucault 之文章"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

概念是如何得到了完善和实现的。但即使福柯强有力地把握住了社会的生态政治层面,并将之界定为内在性领域,这似乎也并不能表明福柯已成功地使他的思想摆脱了从他研究之始就指导着他工作的结构主义认识论。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结构主义认识论是指功能主义式的分析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再生。这种方法高效地割舍了系统的动态特征,系统在运动中体现出的具有创造力的时间流动性,以及文化与社会再生产的本体内容。① 实际上,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问福柯:是什么人,或什么样的力量在驱动系统,他的回答将艰涩难解,也可能他根本就不会作出任何回答。福柯最终未能抓住的正是生态政治社会中生产的真实动力。②

与福柯不同,德勒兹和瓜塔里则向我们展示了对生态权力的严格意义上的后结构主义式理解,这种理解更新了唯物主义思想,将自身坚实地建立在社会存在的生产这一问题上。他们的著述使得结构主义以及一切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概念不再神秘,这些概念使得认识论框架的稳定性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参照点。他们把我们的关注清晰地聚焦到社会生产的本体内容之上——机器生产。各种社会机器以各种各样的机构和各种各样的组合,一刻不停地完成它们的职能,生产出世界,同时也生产出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体与客体。然而,德勒兹和瓜塔里似乎只能肯定地构想出不停运动和绝对流动的趋向,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之中,社会生产的创造性成分和激进本体论依旧无足轻重、软弱无力。德勒兹和瓜塔里发现了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能力(创造性生产、价值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社会情感、社会未来发展的生产),但他们的表述仅仅触及了现象的表面,把这种能

---

① 参阅 Henri Lefebvre 的专著 *L'ideologie structuraliste*(Paris:Anthropos,1971),Gilles Deleuze 的文章"A quoi reconnait-on le structuralisme?",该文收录在 François Châtelet 主编的八卷本 *Historie de la philosophie*(Paris:Hachette,1972)中。读者也可参阅 Fredric Jameson 的专著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

② 1977 年,在一封私人信件中,Deleuze 正式阐述了他同 Foucault 的不同,而两人的根本分歧点最终也正是归结到这样一个生产问题上。Deleuze 更喜欢用"欲望"这个词,而不是 Foucault 所用的"快乐"。他解释说,因为"欲望"一词抓住了社会现实生产的实在的、主动的动力,而"快乐"则是惰性的、被动的。

力描绘成一个混乱的、充满不确定性，由不可把握的事件标出的疆界。①

在一群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作者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社会生产与生态权力的关系。这个群体从生产性劳动的新本质，以及它在社会中的鲜活发展的方向确认生态政治维度。他们使用诸如“大众智性”、“非物质劳动”等术语，他们也借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智力”概念。②这些分析来自两套步调协调的研究方案。第一套方案在于分析生产性劳动在近年发生的转化，以及它越来越向非物质化靠拢的趋向。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由在工厂中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组成的劳动力量原先起到了核心作用，可今天，这种作用已越来越被通讯交往领域智力化、非物质化的劳动力量所取代。因此就必须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价值理论，以把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价值积累问题推到剥削机制的核心（或许也因此把这个问题带入潜在的反抗核心）。这一学派发展出的第二个，也是由第一个方案导引出的方案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活生生的劳动力在社会和交往领域所占据的最直观维度，这样就执着地提出了主体性的新形象问题，它涉及他们遭受的剥削问题和他们的革命潜能问题。对活生生的，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的剥削，它的最直观的社会维度将劳动结合进一切界定着社会的关系因素中，同时这种维度也激发出批判因素，这种批判因素可在全体劳动实践活动中发展出不屈与反抗。因此，在建立起新的价值理论后，新的主体性理论必须随之形成，这一主体性主要在知识、交往和语言的领域内发挥作用。

这些分析重新确立了在社会构成的生态政治过程中生产的重要性，但在某些方面它们也把它离析了出来——凭借对它的纯粹形式的把握，

---

① 在其专著 *Chaosmosis*（Sydney：Power Publications，1995）中，Félix Guattari 小心翼翼地避开所谓反“宏大叙事”，可他也发展出这一类社会批判最为极端的产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上看，尼采的追随者 Massimo Cacciari 在他的专著 *DRAN：méridiens de la décision dans la pensée contemporaine*（Paris：L'clat，1991）中，也表达了大致类似的立场。

② 如果读者要查找与此相关的英语资料，请参阅 Paolo Virno 和 Michael Hardt 合编的 *Radical Thoughts in Ital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这些分析在理想层面上对它进行提炼。它们仿佛表示只要发现了新的生产力形式——非物质化劳动、批量化智力劳动、"一般智力"劳动——就能具体把握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动态的、创造性的相互关系。当它们把生产重新置入生态政治环境中时,它们几乎仅仅把它放到语言和交往的视野中加以展示。因此,这批作者最严重的缺陷之一就是在处理生态政治社会中的新生产实践时趋向于仅仅触及它在智力和非物质方面的表现。然而,肉体的生产力和情感的价值在这个环境中无论如何也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我们将详细阐述当代社会中非物质劳动在三个方面的表现:1) 近来因信息网络联络在一起的工业生产中的通讯交往劳动;2) 分析象征、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3) 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见第十三章)。其中第三个方面关注的焦点是物质的、肉体的生产力,它是当代生态政治生产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成分。毫无疑问,这一群体的工作以及它对"一般智力"的分析标志着一个进步,但它的概念框架仍过于纯净,几乎算得上单纯。在最终的分析之中,这些新概念只是挠了挠生态权力新理论框架所具有生产动力的表皮,难以深入其肌理。①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些已取得部分成功的努力的基础之上确认生态政治生产的潜能。正是依靠把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描述的生态政治背景的种种界定性特征合理、连贯地组合为一体,再把它们引入生产

① 建立起这样一条探索道路的框架既是它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同时又是它实实在在的局限。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形式这样的问题上,分析必须超越所谓的"工人主义"式分析的限制。举例而言,Gayatri Spivak 在其专著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中就着重指出了它的一个局限。他坚持一个事实:这一路马克思主义分析所持的价值观念在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中或许可以发挥作用,但一旦它处在那些居于从属地位的地区的环境中,它就完全失去其功效。毫无疑问,对于我们在本书中发展起来的问题域,Spivak 的质疑具有极度的重要性。实际上,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我们可以说,迄今以来,以批判生态政治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最深刻、最坚实的问题域正是出现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尤其是关注女性工作、情感劳动和生命权力的生产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中。或许,用它所展现出的框架来更新欧洲"工人主义"学派的方法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的本体，我们将确定集体生态政治体的新形象。尽管如此，这一机体中仍将充满矛盾与悖论。对这一机体的建构不是凭借否定激活这一机体的各种原初生产力，而是凭借对它们的确认。这一机体之所以可以成为语言（既包括科学语言，也包括社会语言），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各种独特的、确定的子体构成的复合体，子体在母体之中探寻彼此间的关联。因此，它既是生产，也是再生产；它既是基础结构，也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是最丰富的生活，最标准的政治。我们的分析必须深入到集体生态政治体造就的、由生产决定因素和冲突决定因素构成的丛林中。[①] 我们分析的语境必须能够做到揭示生活本身，揭示世界的构成过程，揭示历史。我们提出的分析决不能是任何一种理想化形式，它必须浸没在稠密、复杂的经验之原汤中。

社团和通讯交往

当我们问自己，帝国机器中的政治和主权部件是怎样构成之时，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把我们的分析限制在对已建立的超国家规范机构的分析之上，甚至大可不必以对它们的分析为重点。只有将联合国旗下的各种机构以及各种多国—跨国金融和贸易机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放入世界秩序的生态政治生产力学之中思考，它们才同超国家的法律构成建立起联系。我们要强调，现在赋予这些机构以合法

① 那些宣扬国际秩序的“扰动”，甚至那些宣扬新世界秩序的理论，在解释这种“扰动”时大都对资本主义关系的矛盾特性避而不谈。社会扰动被视为仅仅是各个国家动因之间力量碰撞的结果，以至于似乎在国际关系中设下严格的规训界限就可以把扰动正常化。这种分析方法实际上隐藏起了社会的和阶级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看，“具有生产力的生命”是无法理解的。世界体系论的立场多多少少也有着同样的弊端。这一理论主要关注系统本身的循环和系统的危机，他们所论述的世界（和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主体性的世界（和历史）。他们所遗漏的正是具有生产力的生命所发挥的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冲突性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一端，激励着这一关系的正是民众的生产性生活。

性的并非它们在旧的国际秩序中所起到的职能。现在赋予它们以合法性的是它们在帝国秩序的象征法中可能起到的职能。在新的框架之外，这些机构毫无作用。旧的制度框架至多也只是为形成和培养帝国机构的管理人员作出贡献，是帝国中新精英阶层的"培训场"。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庞大的跨国公司构成了生态政治世界的通讯组织。资本的组织确实始终面向全球，但也只是在20世纪下半段，多国和跨国的工业和金融公司才开始以生态政治方式建构它们的全球领地。有些人宣称这些多国和跨国公司只是占领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亦即在从19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到20世纪的福特主义阶段那段时间里被各种国家殖民者和帝国主义体系所占据的领地。① 部分意义上，这种说法也可成立，但那些领地本身也已被资本主义新现实所改造。公司行为内容的边界不再止于发出抽象的指令和组织起简单的劫掠和不平等交换。现在，它们直接构建和整合领土和人口。它们趋向于把民族国家变成简单的工具，其职能仅仅是记录、统计由它们驱动的商品、金钱、人口交流罢了。跨国公司直接把人力分配到不同的市场中，把各种资源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上，给世界生产的各个部分划分等级。选择投资方向，指导货币运动的复杂机构决定了世界市场的新地理，实际上也决定了世界的新生态政治结构。②

从货币角度，我们可看到这个世界最完整的一幅图景。从这里我们可看到满眼的价值观念，可看到一部分配的机器，一种积累的机制，一套流通的机制，可看到一种权力，一种话语。在这片被金钱大潮浸透的场地之外，什么也不能被排除在外，根本不存在什么"赤裸裸的生活"或外

① 举例而言，Giovanni Arrighi 在其专著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London：Verso，1995）中就称在资本主义公司所起到的作用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连续性。

② 如果读者要从政治分析的角度了解，可参阅 Paul Kennedy 的专著 *Preparing for th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m House，1993）；如果读者要从经济和社会批判的角度了解，可参阅 David Harvey 的专著 *The Conditions of Post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89）。

在的立足点。什么也不能避开金钱，生产和再生产都套着金钱的外衣。实际上，在全球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生态政治角色都身着金钱缝制的华服，“积累，再积累！摩西如是说。先知们如是说！”①

因此，巨大的工业和金融力量不仅生产出商品，也生产出主体。它们生产出生态政治环境中的行动主体。它们生产出需求、社会关系、肉体和心灵——也就是说，它们生产出生产者。② 在生态政治领域中，生命以生产为目的，生产也以生命为目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蜂房，蜂后安居其中，一刻不停地巡视着生产和再生产。分析进行得越深入，也就能越来越多地发现各种互动关系相互依赖的组合，其依赖的程度也呈现得越来越深重。③

我们应锁定的一处生态政治秩序生产场所是由通讯交往工业中发展起来的语言、交往、象征的生产结成的非物质结点。④ 通讯交往网络的发展同新世界秩序的出现有着有机的联系——换句话说，它们是因与果，产品与生产者。通讯交往不仅表现出，更组织起全球化的运动，其方式是通过网络繁殖、建构各种相互关联。它给予全球化的运动以表达，控制着充斥在所有交往关联中的想象的意义与向度；换而言之，想像力

---

① 参见《资本论》第一卷。

②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要列一张引用文献清单，这张清单会无休无止。实际上，有关广告和消费的理论业已融入生产的理论中，以至于今天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关注”被等同于经济价值！无论如何，在与此相关的众多著作中，读者可以读一读 Susan Strasser 的专著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Mass Market* (New York: Pantheon, 1989), Gary Cross 的专著 *Time and Money: The Making of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然而，生产者的生产不仅是消费者的生产，它同时也是等级的生产，是融入和排斥机制的生产，等等。最后，它涉及到危机的生产。关于这样的观点，读者可参阅 Jeremy Rifkin 的专著 *The End of Work: The Decline of Global Labor 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 Postmarket Era* (New York: Putnam, 1995)，以及 Stanley Aronowitz 和 William DiFazio 的合著 *The Jobless Fu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③ 我们得益于 Deleuze 和 Guattari，还有他们的合著 *A Thousand Plateaus*。在那本书中，两位作者对我们的工业—货币世界的本质作了最为详尽的现象描述，这种本质构成了世界秩序的第一个层面。

④ 参阅 Edward Comor 主编的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94)。

在通讯交往的机器中得到引领和疏导。那些在权力的现代性理论中不得不被构想为是超验的成分(也就是说它们存在于生产和社会关系之外),此时形成于内部,内在于生产和社会关系之中。中介被吸收入生产机器之中,社会空间的政治合成被固定在通讯交往的空间之中。也正因此,今日之通讯交往工业才占据了如此核心的位置。它们不仅在新的规模上组织生产,设定适应于全球空间的新结构,而且还从自身内部为自己提供合法依据。权力,在生产之同时,也在组织;在组织之同时,也在自我表述,宣称自己为权威。语言,在实现交流之同时,不仅在生产商品,更在创造主体,把他们固定在各种关系中,向他们发布命令。通讯交往工业把象征和想象一起织入生态政治之图景中,不仅使此两者为权力服务,而且实际上已把它们融入权力的职能。①

此刻,我们可以开始讨论新世界秩序的合法化问题了。新世界秩序的合法化并非诞生于原先存在的国际约定。它也不是原初的,尚处于胚胎期之中的超国家组织的职能产物,因为那些组织本身仍是通过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条约而产生的。帝国机器的合法化,至少在部分上,产生于通讯交往工业,也就是说,产生自把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变成一部机器的改造之中。这个主体创造出自己的权威形象。这种形式的合法化不需依赖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只要发展出它自己的自我生效语言,它就可被一再获得。

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之上,我们应更深入考虑一种后果。如果通讯交往是生产的霸权部门之一,而且其影响遍及整个生态政治领域,那我们就必须认为通讯交往与生态政治环境是共存的。这就把我们带出如于根·哈贝马斯这样的理论家曾描述过的域界。实际上,当哈贝马斯发展

---

① 参阅 Stephen Bradley 主编的 *Globalization, Technologies, and Competition: The Fusion of Comput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90s*(Cambridge, Ma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3),以及 Simon Serfaty 的专著 *The Media and Foreign Policy*(London: Macmillan, 1990)。

出他的交往行动概念，强有力地展现出通讯交往的生产形式以及由此而生的本体后果时，他所依赖的依旧是超然脱出全球化效应之外的一个立足点，一个由生活和真理所构成，能够抗击对存在的信息殖民的立足点。① 然而，帝国机器已显示这个外在的立足点已荡然无存。相反，通讯交往的生产和帝国合法性的建构携手并进，已密不可分。这部机器自行认证，也就是说，它已实现了系统化。它对社会构造进行整形，或者排散出矛盾，或者消除矛盾的影响。它制造出一种境遇，在这种境遇中，差别在被强制性中和之前，就已经被吸收入一场自我生成、自我调控、动态平衡、无足轻重的游戏之中。正如我们在别处已经争论过的，任何一种以后现代状况为对象的法律理论都必须考虑到这一从通讯交往方向对社会生产所做出的界定。② 帝国机器的持续仰仗于生产出动态平衡的背景以及/或者剪除复杂性。它做出虚假姿态，提出所谓普遍公民地位的方案，就在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同时强化干涉的作用，将其施加到通讯交往关系的每一要素中；与此同时，它以一种纯后现代的方式消解认同感与历史。③ 帝国机器不仅没有消除主宰叙事(master narrative)，而且实际在把这种主宰叙事(尤其是意识形态主宰叙事)不断地生产、再生产出来，以认证、欢庆它自己的权力。这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的论述正好背

---

① 参阅 Jürgen Habermas 之专著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在本书第 13 章，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交流和生产之间的关系。

② 参阅 Hardt 和 Negri 的合著 *Labor of Dionysus* 的第六和第七章。

③ 在 Martin Albrow 和 Elizabeth King 合编的论文集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1991)中，文章的作者们表现得有些极端。相对而言，Bryan S. Turner 的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和 Mike Featherstone 主编的论文集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1)就要温和一些。尽管如此，他们在许多立场上并没有大的差别。我们应始终记住，所谓"全球市民社会"不仅产生自某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心中，产生于 Habermas 的追随者中，它更产生于国际关系的洛克式传统中，而这后一点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后者所涉及到的重要理论家如 Richard Falk, David Held, Anthony Giddens, 在某些方面也包括 Danilo Zolo。关于全球化背景中的市民社会概念，读者可参阅 Michael Walzer 主编的 *Toward a Global Civil Society* (Providence: Berghahn Books, 1995)。

道而驰。[①] 在这场语言与生产的交往中,现实的语言生产和自我认证所使用的语言是我们理解帝国权力的效力、它的有效性和它的合法化的关键。

干涉

这一合法性的新框架包括新的形式和合法性力量运用的新整合方式。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新的力量必须展示出它的力量所具有的效力,而这种展示要与它的合法性基础的构建同时进行。实际上,新生力量的合法性在部分上就是建立在运用武力的基础之上。

新的力量展示其效力的方式同正在逐渐消亡的旧式国际秩序毫无关系。对于旧秩序遗留下的各种机构而言,它也没有什么用处。帝国机器作出的部署有一整套新特征,如活动范围不受地域限制,行动具有独特性和象征意义上的地方性等,此外,它的压制行为同社会的生态政治结构的各个方方面面都有联系。因为找不到更佳的表述方式,我们不妨继续称之为"干涉"。这仅仅是一个术语上,而非概念上的缺陷,因为我们所说的并非对在法律上独立自主的领土进行的干涉,而是在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中居统治地位的生产和通讯交往结构所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干涉已经被内向化、普遍化。在前一部分中,我们谈到了干涉的结构性手段,这涉及到在相互关联的、从事生产活动的政体组成的跨国场所中货币机制和金融机构的布置;我们也谈到了在通讯交往领域中的干涉,以及它们对于系统的合法化的功用。在这里,我们希望考察一种新型的干涉,这涉及到帝国在它的全球领土之上对于有形的物理力量的运用。敌视帝国的敌对力量在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威胁,而不

---

① Jean Baudrillard 在他近年来的著作中,比如说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表现出一种打破传统式讽刺。随着这种讽刺的出现,法国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性情又回到了超现实主义的框架中。

是在军事上挑战帝国。尽管如此，帝国运用于武力以及其他各种确保帝国效力的部署之中的力量已经在技术上大大领先，在政治上也更加坚固。①

帝国用于干涉的武库已经十分庞大，它不仅包括军事干涉，也包括其他形式的干涉，如道德干涉、法律干涉。实际上，帝国的各种干涉力量的运作最好被理解为以它们的道德工具为开端，而非直接以致命的武力为开端。我们所说的所谓道德干涉今天正在被各种实体所践行，包括新闻媒体和宗教组织，但各种实体中最重要的还数所谓的非政府组织(NGO)。正因为这些组织不直接听从政府的指挥，它们的行动被视为发自伦理或道德的必须。非政府组织这个术语可涵盖范围广泛的群体，但我们主要指那些在全球、区域和地方致力于经济和人权保护的组织。这一类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新世界秩序最强大的绥靖武器之一(尽管这与这些组织的参与者的意愿相悖)。这些非政府组织发起"正义战争"，尽管它们的战争没有硝烟，没有暴力，也没有边界。就像中世纪的多明我会，以及现代性诞生之初的耶稣会一样，这些团体为了确定普遍需要和捍卫人权而竭尽全力。它们通过自己的语言与行动，首先把敌手界定为匮乏，然而再在敌手身上钉上罪恶之名。

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基督教道德神学如何首先把恶确定为善的匮乏，然后再把它界说为应受惩罚的对善的违背。在这样一种逻辑框架中，非政府组织对匮乏所作出的一些反应就不仅毫无奇怪之处，更属理所当然。它们公开谴责"罪人"(或用于标准迫害意义上的"敌人")，还把实际

---

① 从冷战后期的"强化民主"、"民主过渡"等概念到帝国理论中的"强化和平"的概念，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未中断的连续线索。我们已经着重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伦理哲学家支持海湾战争，而许多法理学家在 Richard Falk 的带领下反对那一场战争。举例而言，读者可以参阅 Richard Falk 的文章"Twisting the UN Charter to US Ends"，该文收入 Hamid Mowlana，George Gerbner，Herbert Schiller 合编的论文集 *Triumph of the Image：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读者也可以参阅 Danilo Zolo 关于海湾战争的讨论，*Cosmopolis：Prospects for World Government*(Cambridge：Polity Press，1997)。

解决任务的工作留给"世俗"势力。就以这种方式,道德干涉成了活动于前线的帝国干涉力量。实际上,这种干涉由下层预设了例外状态,而且不受国界限制,因为它们装备有效力强大的通讯交往手段,且以对敌人的象征性生产为取向。非政府组织完全浸没在帝国构成的生态政治环境之中。在进行绥靖性、生产性的正义干涉方面,它们比权力更先行一步。如此说来,一些旧国际秩序学派中忠厚的法理学家(比如理查德·福克[Richard Falk])会被非政府组织的魅力所引诱就毫无惊人之处了。① 非政府组织把新秩序展现为一种和平的生态政治环境,它似乎遮住了那些理论家们的眼睛,令他们看不到道德干涉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的预示所造成的野蛮效果。②

道德干涉通常被用为初步的行动,为以后的军事干涉扫清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军事部署表现为一种得到国际认可的警察行动。今天,产生于旧国际秩序,甚至产生于联合国的决定已越来越难以制造军事干涉行动。更多时候,军事干涉为美国单边掌控,这个国家首先自行承担起基本任务,然后再要求其盟友一起驱动武力控制和/或镇压帝国的当前敌人的程序。敌人通常被称为恐怖主义者,它是一个粗制滥造的概念和术语,它是对对手的贬低,而警察心理则是它的根源。

在对民族冲突的干涉中,预防与压制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尤其清晰。民族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紧随而至的新的和/或复苏的民族认同感的强

---

①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可参见 Richard Falk 的文章 *Positive Prescriptions for the Future*,该文收入 World Order Studies Program occasional paper, NO. 20(Princet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1)。要考察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融入"全球立宪主义"那多多少少带有些洛克主义色彩的框架中,读者应当参阅 Antonio Cassese 所做的公开声明。除此之外,读者还应当读一读他的一些专著,如: *International Law in a Divided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Human Rights in a Changing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即便是那些要求改革联合国的建议也多多少少在沿这样一条路线进行。要得到有关这方面著作的文献资料,读者可以参阅 Joseph Preston Baratta 的 *Strengthening the United Nations: A Bibliography on UN Reform and World Federalism* (New York: Greenwood, 1987)。

化有效地分裂了建立在民族政治路线上的旧集群。这些冲突使全球关系的组织呈现出更强的流动性。同时，借助于确认新的同一性和新的地域，也增强了受控材料的延展性。在此种情形下，压制可表述于预防性行动之中。那些预防性行动构建起新的关系（这些关系最终将在和平中得到巩固，但在此之前战争势在必行）、新的疆界和新的政治结构，所有这些在帝国的构成中都发挥起职能作用（或者说它们能发挥更强的职能作用，它们本身也具有更好的适应性）。[①] 通过预防性活动为压制做好准备的另一个例证是打击公司企业团体，或“黑手党”，尤其是那些涉足毒品贸易的组织的活动。对这些团体的实际压制倒不是最重要的，比这更重要的是给它们的活动定好罪名，安排针对它们的存在的社会警报系统，以使对它们的控制更简便易行。即使控制“民族恐怖主义者”和“毒品黑手党”在警察代表国家完成的范围宽广的职能中占据核心地位，这种行动也属常规性行动，也就是说属于系统性行动。“正义战争”得到“道德警察”的有力支持，正如帝国权力的认证与它的职能的合法化得到必需的、连续不断的警察力量的支持一样。

无论国际法庭还是超国家法庭，它们都受到限制，必须紧随领导力量，这一点已十分明显。军队和警察比法庭先行一步，它们预先构建了正义的统治，法庭也只能把这种统治贯彻实施。尽管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寄厚望于道德原则，但这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传统的构造逻辑已被颠倒。支持帝国构成的行动党团很有自信，认为当帝国的构造工作进展充分时，法庭在界定正义方面将担当起领导作用。尽管现今的国际法庭并没有什么实权，可向公众展示它们的活动依旧很重要。最终必须形成适应于帝国构成的新法律职能，法院也必须经历逐步的转型，由一个原先向被征服者下达审判结果的组织，变成一个法律实体，或由一群实体构成的体系，由它来掌握和核准道德秩序、政治行动和帝国主权合

① 这也正是美国的军事组织在它们的一些战略性文件中促成的路线。

法化机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①

这种在军事和道德两个方向上进行的连续不断的干涉是武力使用的合乎逻辑的形式，其力量之源是建立在永久例外状态和警察行动基础之上的合法化范式。干涉永远是例外，纵使它不断发生；它采用警察行动的形式，因为它的目的是维持内部秩序。这样，干涉就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它通过警察部署直接为构建帝国的道德、规范、制度秩序作出贡献。

君权

在帝国的构造中，传统上称为君权的东西实际上被重复，甚至得到实质性更新。如果我们驻足在经典的国内、国际法的概念框架中，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一个超国界的半国家正处在形成期中。但我们觉得这种说法并未精确表述出当今形势的特点。当现代主权的君权再现于帝国中之时，它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比如说，部署军事力量的主权职能过去由民族国家承担，而现在由帝国来完成。但是，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对这种部署的合法认证现在建立在一种永久性的例外状态之上，而军事部署本身也采用了警察行动的形式。其他一些君权，比如说贯彻正义概念，设定税种，它们的存在同样也有其界限。在前面，我们已讨论了在帝国的构成过程中，法律权威的边际地位，我们也可以说(随着税种的设置日益与特定的、地方的紧急事态相联系)现在税种的设立也居于这种边际地位上。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帝国的主权就是在各种边际地带得到实现。在这些边际地带，国界之划分更灵活可变，各种角

① 在这里，读者应再一次参阅 Richard Falk 和 Antonio Cassese 的著述。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下，在如何发挥联合国正义法庭的功能这一问题上，一种"弱势"概念正在被另一种"强势"概念所取代。换而言之，过去要求正义法庭承担起法律认准的职能，而且这种职能要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行使。现在要求正义法庭在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实质性公正问题时，要发挥更直接、更主动的作用，直至在人权的名义下展开直接干预。

色身份也更具混合性和流动性。很难说中心和边际这两者哪方对帝国更重要，实际上所谓中心和边际本身亦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令任何从地域上把它们确定下来的努力无功而返。我们甚至可以说过程本身是虚的，它的力量存在于虚空的力量之中。

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即便帝国主权的建构过程确实是虚而非实的，即便它确实在各种边际地带活动，在许多方面这种建构过程依然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当然不想否认那样的事实。然而，我们的主张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的是一种特殊的主权，这种主权具有非连续的形式。这种主权由于其“在最紧要关头”做出行动而应当被认为是有限的、边际的；它将它的惟一一个参照点固定在它所控制的权力的绝对性之中。因此，帝国看起来就像一部技术含量极高的机器：它是虚而非实的，建造它的目的是控制边缘事件，组织、支配系统的分解，必要时进行干涉（这与技术先进的机器人生产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帝国主权是非实态的，非连续的，但这并未减弱它的力量。相反，恰是这些特点令帝国主权的各个机构的力量得到加强，在当代历史环境中展示它的效力，在最紧要关头施展它解决世界难题的合法性力量。

现在我们已进入阵位，可以着手探讨这个问题：今天，在新的生态政治前提之下，我们还能不能以法律模式绘制出帝国的形象，把握住帝国生命的脉搏？在此之前，我们已注意到，即使以联合国和其他大型国际机构最新的发展去理解，那样一种法律模式仍旧不能由现有的国际法结构框架形成。这些国际组织对国际秩序的精细化至多也只能被确认为朝向新的帝国权力的过渡而已。帝国之形成，既非以任何契约或条约机制为基础，也非借助于任何一种联邦力量。帝国常规性的源泉是一种新的机器，一种新的经济—工业—通讯交往机器——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全球化的生态政治机器。因此很明显，我们必须发现某种别的东西，某种不同于到今天为止构成了国际秩序之基础的东西，某种不依赖按照各式各样的传统扎根于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体系的权力形式的东西。无论

使用哪一种旧式的法律理论工具，都不可能把握帝国的形象，揭示帝国的起源，因为所有那些工具都被用于现实的、制度的、实证的或自然的权力框架之中。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让自己因为这种无能为力被迫接受玩世不恭的纯粹力量的框架，或马基雅维利式的立场。在帝国的发生起源之中，确有一种理性在发挥作用。尽管这种理性不太符合法律传统，但在常常被隐蔽起来的工业管理史和技术的政治化运用史中，这种理性较清晰地显现出来。（在这里，我们也不应忘记，沿着这些线索前进，我们就能揭示阶级斗争的构造和它的制度化效果，不过我们将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部分中讨论。）正是这种理性把我们置于生态政治和生态政治技术的中心。

如果我们借用马克斯·韦伯就权力的合法化形式所立的著名的三段式公式，那么帝国引入其界定之中的质的飞跃就是一团混合物，其无法预先确定的成分包括：1）典型的传统权力成分；2）已在形态上适应于生态政治环境的官僚制权力的延伸；3）被“事件”和所谓“领袖魅力”所界定的理性，这种理性上升为一种令整体走向单一，令帝国干涉生效的力量。[①] 这种新韦伯式观点的逻辑在特色上是功能式，而非数学式，是根茎状和起伏状，而非归纳或演绎。它既将语言的次序视为意义的机械次序，对它进行管理，同时又将语言次序视为创造，是口语化、不可分解的创新。

帝国权力关系所要阐释的基本目标是系统的生产力量，这个系统就是新生的生态政治、经济、制度系统。帝国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不仅在于帝国进行积累和全球扩张的力量，也在于帝国向纵深发展、获得重生、把自身涨满世界社会的生态政治空间的能力。帝国权力的绝对性同帝国内存于生产和再生产之中的完全性是两个互补的术语，它们同生态政治环境有着互相补充的关系。或许，这最终无法为一种法律秩序所表

① 参见 Max Weber 的 *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现，但它千真万确是一种秩序，是一种被虚拟性、动态性和功能的开放性所界定的秩序。因此，合法化的基本常规将建立在这部机器的深处，建立在社会生产的中心。社会生产和法律的合法认证不能被视为首要和次要力量，也不能被视为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应被理解为处于绝对的平行和交织状态中，它们共同扩展至整个生态政治社会空间。在帝国中，在生态权力的统治下，经济生产和政治构造日益趋向于契合。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无产阶级运动一旦表现为工人委员会的力量(后者在国际范围内取代了其他所有力量),就成为了它自身的产物,这一产物就是生产者自己。生产者就是他自身的目标。只有在那时,对于生活的惊人忽视才终将也被忽略。

——盖伊·德波尔

现在已到了熔炉的时间,只应看见光。

——何塞·马蒂

戏用黑格尔的说法,人们可以说帝国的建造是"自在的善"(good in itself),但并不是"自为的善"(good for itself)。[①] 现代帝国主义权力结构威力最强大的行动之一就是在全球的民众间立起藩篱,把人们划分入相互对立的阵营,更确切些说,是把人们分裂成无数对立冲突的人群。在主导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某些部分甚至相信,他们的利益仅仅同他们的民族同一性和帝国的命运相联系。因此,将反抗剥削的斗争和反抗民

① 我们说"flirt with Hegel",其方式就如同马克思在他那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的跋中所描述的那样。同马克思一样,我们觉得黑格尔的术语对于建立起讨论的框架还是有用的,可我们很快就会撞上它们的使用局限。

粹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结起来，就成了意义最深刻的反抗现代权力结构的反抗和革命行动。在那些事件中，人类似乎进入了神奇一刻，因要求解放的共同欲望而结为一体，我们已似乎看到了未来的一线曙光，现代的一切支配机制都将被一劳永逸地摧毁。反抗的大众，他们对解放的渴望，他们构造另类的实验，以及他们的生成力量的运用实例，所有这些，在发挥到最淋漓尽致之时，都指向着关系的国际化和全球化，都要求冲破民族、殖民制度、帝国主义统治所划定的分界。在我们这个时代，民众激发出的这个欲望已在帝国的构建中得到满足（其方式有些奇异而反常，但却非常实在）。人们甚至可以说，构建帝国和它的全球网络的确是一种回应，它所针对的就是各种反抗现代权力机器的斗争，尤其是民众向往解放的欲望所推动的阶级斗争。唤出帝国的正是民众。

然而，说帝国是“*自在的善*”并非等同于说它是“*自为的善*”。尽管帝国在埋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同时它又建立起了它自己的以剥削为基础的权力关系，在许多方面新权力关系比已被摧毁的旧权力关系更野蛮。现代性辩证法的终结并未带来剥削辩证法的终结。今天，几乎人类的全部要么被吸纳入资本主义剥削之网，要么屈服于它。今天，越来越多的财富控制在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民众依旧生活在贫困与无权力的极限边缘，贫富分化越来越走向极端。那些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圈划好的、进行压迫和剥削的界线，在今天，在许多方面非但没有收缩，反而在爆炸性地膨胀。

尽管要承认这一切，我们仍然要坚称帝国的构建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只有迈出了这一步，我们才能消除对帝国之前的权力结构的一切怀旧情绪。也只有迈出这一步，我们才能拒绝一切重温旧梦式的政治策略，比如说，试图复活民族国家以抗衡全球资本的努力。马克思称，资本主义比在它之前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先进。同样，我们也要宣称，同过去相比，帝国具有先进性。马克思的观点的基础是：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狭小、森严的等级制度感到一种强烈的厌恶感（一种

健康的感觉);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在新的境况中,解放的潜能在增长。与之相同,今天我们也看到,帝国结束了现代权力的残酷统治,解放的潜能同样也在增长。

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确认这一命题时,我们在顶着我们的朋友们和左派战线上的同志们,逆流而行。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几十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左派危机中,批判思想中的大部分一直在致力于在社会主体认同,或民族、地域集团的基础上重建起抵抗阵地,这种思想常常将政治分析建立在"斗争的地方化"之上。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在那些"依附性"国家中情形也大致如此。有时,此类论点被建立在"基于地方"(place-based)的运动或政治中,地方(既可以是地域概念上的,也可以是认同观念上的)的边界被用来抵御全球网络那无差别、同质性的空间。① 还有一些时候,政治论点从有着悠久历史的左派民族运动中汲取养分,将国家视为抵御外国和/或全球资本的支配的首要机制。② 今天,位于各式各样的"地方"左派政治策略核心的推理方法似乎完全是逆向性的:如果资本主义支配正越来越全球化,那我们要抵抗它,就必须保卫地方,建立起各种壁垒,以阻遏越来越快的资本流动。从这种观点出发,资本现实的全球化和帝国的构建只能被视为失败的标志。

然而,我们坚持认为,今天这种地方主义立场已变得虚假,有危害性,尽管我们钦佩和仰慕它的一些倡导者的精神。之所以它是虚假的,首先是因为问题的提出方式很糟糕。在许多描述中,问题的存在依赖于

---

① 得承认,这一段阐述偏于简单化,许多研究就地域问题提出了更为精密的阐述。可是,我们觉得,那些政治分析最后又都回到"捍卫"或"维系"有限地方认同或地域的观点上。Doreen Massey 在他的专著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中明确提出一种地域的政治学。在这种政治学中,地域不再被视为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接受着地域以外的流动的渗透。然而,我们认为,如果地域的概念没有了边界,那也就完全掏空了这个概念的内容。读者可参见 Dirlik 未发表的文章"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② 在第五章,我们将回到民族这个概念上来,对它做更深入的探究。

一种虚假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将事物截然分为全球和地方，并认定全球就包含着同质化和无差别同一性，而地方则在保存异质性和差别。这种论点所隐含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地方所具有的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自然的，或者说至少产生这些差别的根源毋庸置疑。早在现今的状况出现之前，地方差别业已存在，必须保卫这些差别，抵御全球化的入侵。既有了这样一些看法，许多地方的保卫者们采用了传统的生态学术语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更有甚者，还有观点将"地方"政治方案同保护自然与生物多样性视为一体。这种观点很容易蜕化成一种原始主义，后者强调固定社会关系与社会认同，并把它们浪漫化。与之相反，真正需要注意的恰恰是地方性如何产生这一问题，也就是说，社会机器如何生产、再生产出认同感和差别，使它们被理解为地方。① 地方性中所具有的差别既非早已存在，亦非自然天成，而是生产的统治的结果。同样，全球性也不应被理解为文化、政治或经济的同质化。同地方性一样，全球性应被理解为生产认同和差别的政体，更确切地说，是生产同质化和异质化的政体。因此，要建造起一个更好的框架以指明全球与地方的区别，我们应当指向不同的流动和阻碍网络，在其中，地方的重要或思路会优先考虑再次领土划界的各种壁垒和边界，而全球的重要则将优先权赋予领土去界的流动性。不管怎么说，宣称我们可以（重新）建立某种有点像世外桃源的地方，认同并保护它免受资本的全球流动和帝国的入侵，这种说法都是虚假的。

以这种左派策略去反抗全球化，保卫地方性的做法也具有危害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地方认同的东西并非自发和自律的，而是在支持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帝国机器的燃料。实际上，由帝国机器

① "我认为处所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基本物质属性，但我也认识到处所的产生也是社会性的。"这句话出自 David Harvey 的专著 *The Limits of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的第 374 页。Arjun Appadurai 对"处所性的产生"所做的讨论也是和 Harvey 以及我们的论述相吻合的。参见其专著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掌控的全球化或领土去界并不反对地方化和领土划界，而是驱动调节起流动变幻的分化和同一之流。地方抵抗策略认错了，从而也掩盖了真正的敌人。我们绝非反对关系的全球化这件事本身。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左派国际主义中最强大的力量曾有效地领导了这一进程。真正的敌人是一种特定的全球关系统治形式，我们称之为帝国。更重要的是，那种保卫地方的策略的危害性正在于它模糊了，甚至否定了确实存在于帝国之内的异端另类和解放的潜能。我们应一劳永逸地终结对世外桃源的追寻，打消那种可以保持我们的政治纯洁的幻想。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更好的做法是进入帝国，面对它的同质化和异质化流动中的各种复杂状况，将我们的分析建立在全球民众的力量之上。

事实的本体论戏剧

现代性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就是自相残杀的战争、毁灭性的"发展"、残酷的"文明"，以及在过去无法想象的暴力。埃里克·奥尔巴赫曾写过，在西方文学中，悲剧是惟一能称得起现实主义之名的文体。或许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其理由就是西方现代性施加在世界之上的悲剧。[①] 集中营、核武器、种族灭绝战争、奴隶制、种族隔离，历数那种种悲剧场面又有何难？我们坚持现代性的悲剧特征，却并非要追随欧洲的"悲剧"哲学家。从叔本华到海德格尔，那些哲学家们将实实在在的毁灭转变成关于存在的否定性的形而上学叙事，倒仿佛实际的悲剧仅仅是幻觉，或者它们就是我们的最终归宿！现代的否定性并不存在于什么超验的领域中，它就在我们眼前那硬梆梆的现实之中：从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场被涂满爱国主义色彩的战役到纳粹的焚尸炉，从广岛和长崎在瞬间被灭绝

① 参见 Erich Auerbach 的专著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的数千生命到越南和柬埔寨的地毯式轰炸，大屠杀在四处进行，从塞提夫到索韦托，名单越列越长。就是约伯也无法忍受如此的苦难！（无论是谁，只要他开始编纂一份这样的名录，他很快就会意识到不管怎样给所有那些悲剧定量、定性，都还是远远不足。）好吧，如果那个现代性已走到了头，如果曾经作为帝国主义支配和无数战争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的民族国家正在退出世界舞台，这实在是可喜可贺！我们必须扫除任何那种对现代性的"美好年月"的怀旧情结。

然而，我们在政治上不能仅仅满足于对我们所继承的客观历史之中的现代权力进行批判。我们还需要考虑民众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使历史得以延续，并使它在今日的帝国之中重新成型。其中问题也就是怎样转化强加到大众头上的必需（在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中，这种必需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民众自身所诉求，被视为逃脱地方的苦难与剥削的一条途径），把它转化为能孕育出解放的可能的状态，那将是人类新的领域中的新可能。

就在这发生的时候，一场本体性的戏剧也将上演，舞台上幕布徐徐升起，帝国的发展变成了它对自身的批判，而帝国的构建过程也成了它倾覆的过程。这是一出关于本体性的戏剧，其原因在于在戏剧过程中，存在被生产和再生产。这出戏剧意义之明确与表达之深刻远非我们的研究所能及。但我们一开始就坚持要说，这决非启蒙辩证法的又一变体。我们不想再重复已被说了无数次的话，不想再说我们不可避免要经过炼狱（在这里，披着帝国机器的外形），然后才能指向从那光辉未来射来的一缕阳光。我们不想再重新画出理想主义目的论的图式，不想再以任何结局的许诺来为之前的磨难辩解。相反，我们的推理基于两条方法论途径之上，它们是非辩证式的，具有绝对的迫切性。第一条是一条批判和解构之途，其目的是颠覆霸权语言和社会结构，并由此出发，展现建立在民众的创造性和生产性实践之上的另类本体基础；第二条是一条构建和伦理—政治之途，它寻求领导主体性的生产过程，走向一个有效的

社会、政治另类,走向一个全新的生成力量。①

对帝国秩序,需要实实在在地进行意识形态和物质解构,而我们的批判方法正是要正视这种需要。在后现代世界中,帝国通过多种多样的自我认证式话语和结构构造出它的主导景象。在很久以前,从列宁到霍克海姆到阿多诺到德波尔这样的许多作者已认识到,这样一种景象也就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尽管上述那些作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的确为我们预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之路。② 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解构不能仅限在文本层面上进行,更要不断努力,寻得方法,把解构的威力集中施加到事件的本质上,施加到决定了今日之帝国运动过程的决定因素之上。我们展开批判的途径就是暴露出上述过程中的矛盾、循环和危机。每当我们这样做时,那些原先被臆想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的东西就会出现裂缝,从而令我们看到其他的可能。换句话说,通过解构客观历史,解构全球化资本主义幽灵的统治,我们可以揭示出异端社会组织的可能。或许,在批判性、唯物主义的解构主义的方法建构方面,我们只能做这么多,但这业已是一个巨大贡献。③

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的第一条途径——方法论途径——要将接力棒传给我们的第二条途径——一条建构性的伦理—政治途径。这时,我们必须深入种种具体异端形式的本体基础中,也就是要深入在具体历史境遇中发生作用的主体力量之中。在这里将出现的不是一种新的理性,而是由不同的理性共同上演的一幕戏剧,一片由形态各异的活动、反抗、意志、欲望构成的新天地,它们都拒绝接受霸权秩序,提出各种摆脱霸权的

---

① 批判与建构之间的方法论联系要牢牢地建立在拥有共同的主体的基础上。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自己的历史著述中已做了充分表达。在 20 世纪,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著述者有对此加以发挥,如 E. P. Thompson,意大利的工人作家,以及南亚的一些非主流历史学家。

② 读者可参阅 Guy Debord 的专著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New York:Zone Books,1994)。虽然该书中的言语有些疯狂而错乱,它或许是当代资本大胜利意识最好的表达。

③ 要找到一个好的例证以显示解构主义方法的优点和局限,读者可以参阅 Gayatri Spivak 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她为她和 Ranajit Guha 合编的论文集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所写的导言。

策略，制定各条通向异端的路线。这种基础公开接受批判，并由伦理—政治途径加以修正，代表着哲学的真正本体对象，或者说代表了解放哲学的标准域。从方法论上讲，这一途径同过去的一切历史哲学宣告决裂，因为它拒绝接受有关历史发展的一切决定论概念，拒绝对结果的一切"理性化"颂扬。与之相反，它展现出历史事件的潜势形态。"这并非合二为一，而是一分为二。"中国的革命者曾列出这样一条精美的反儒家（反柏拉图）公式。[①] 哲学并不是只会等到历史实现之后才去欢庆美满结局；哲学是主体的提议、欲望和实践，而这些统统都会应验于事件之中。

《国际歌》的副歌

就在不是很久以前，国际主义还是无产阶级斗争，以及一切普遍意义上的进步政治的主义。"无产阶级不分国界"，或者更准确些说，"无产阶级的国家就是全世界"。《国际歌》是所有革命者的圣曲，它唱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如果说我们把国际主义理解为一种不同民族认同之间的共识，它既保存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又可协商取得有限一致的话，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口号中表现出的却并非国际主义精神。实际上，无产阶级式的国际主义是反国际的，是超国界和全球式的。"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并非建立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而是直接通过共同的需求和欲望实现，这种联合无视国境与分界。

国际主义表述出一个积极的大众主体的意志，这个主体意识到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件核心工具正是民族国家，而民众则不断被征集起来，去打各种毫无意义的战争。简而言之，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中的矛盾既无法被消化吸收，亦无法被升华，只能被摧毁。国际团结实际上就是一

① 参见 Arif Dirlik，"Mao Zedong and 'Chinese Marxism'"，收于 Saree Makdisi，Cesare Casarino 和 Rebecca Karl 合编的 *Marxism beyond Marxism*（New York：Routledge，1996）以及 Arif Dirlik，Panl Healy 和 Nich Knight 合编的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Atlantic Heights，N.J：Humanities Press）。

项摧毁民族国家,建立全球化社会的工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在一个世纪里影响着无产阶级,它们提出种种言辞含糊的战略定义,而上述无产阶级工程就是这些定义的后盾。① 如果民族国家是支配之链上的核心一环,故而必须被摧毁,那么"国家"无产者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摧毁自身(因为这个自身由国家来界定),从而从牢狱中释放出国际团结。我们不能把国际团结视为一种慈善行动,或只为他人的利益着想的利他主义思想,或为另一国家的无产阶级做出的高尚牺牲。它是各国无产阶级的欲望和斗争的固有成分。无产阶级式的国际主义构造出一部既矛盾又强大的政治机器,它不断向前推进,越过民族国家的分界和等级,在全球地域内设置乌托邦式的未来。

今天,我们大家理应都清楚意识到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式的国际主义时代业已终结。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一个现实:国际主义观念确曾活跃在民众的心中,并在他们心中留下苦难与欲望,胜利与失败的回忆,以及意识形态的紧张与需求的余味。更进一步,今日之无产阶级的确已发现自身不仅是国际的,更是全球的。有人甚至会倾向于说,在当今世界向全球化和帝国的过渡中,鉴于民族国家的力量业已衰退,可以说无产阶级式的国际主义实际上已获取胜利。但这种胜利的说法实在是既奇特,又反讽味十足。更确切一些,我们可以说它们所为之斗争的结果确已到来,尽管它们的斗争已以失败告终。

在国际斗争圈中,无产阶级式的国际主义在实践中得到最明晰的表述。在这个框架中所发生的反抗(民族)国家的(民族性)总罢工和起义只能被视为在国际地域上进行的斗争和解放进程之间的支流的一部分。

---

① 关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的"民族政策"问题的策略性模糊化,参见 Otto Bauer 的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omocratie* (Vienna: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24);以及斯大林著名的"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收于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第五章将继续讨论这几位作者。另可关注 Enzo Traverso 的 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juive* (Paris: La Brèche, 1990)。

从柏林到莫斯科，从巴黎到新德里，从阿尔及尔到河内，从上海到雅加达，从哈瓦那到纽约，在19世纪和20世纪，斗争遥相呼应，此起彼伏。随着暴动的消息传播到远方，并被应用到种种具体境遇中，一个国际斗争圈渐渐成形。这就恰似在更早的时代，商船把奴隶暴动的消息从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屿带到另一个岛屿，从而点燃了一根无法熄灭的导火索。要形成一个斗争圈，消息的接受者必须把事件"转译"到他们自己的语言中，把他人的斗争视为自己的斗争，从而为斗争之链添上一环。有时，这种"转译"相当之精微，比如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听到了菲律宾和古巴人民的反殖民斗争，并把它们"转译"到自己的革命语言之中。也有一些时候，这种"转译"以更直接的方式进行，比如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消息就立即鼓舞起了意大利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或许，这些运动之间的联系尚不只是一条铁链上环与环之间的联系，它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更类似于病毒：同一种病毒在不同的寄居体中调节自身的形式，以适应具体的寄居环境。

我们不需要多少力气，就可绘制出一张斗争激烈状况的年代分布图。第一波浪潮可被视为始于1848年之后，随着第一国际引起的政治动荡而掀起。浪潮一直延续至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行业组织。俄国1905年革命后，这一波浪潮达到了顶峰，在此形成国际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个周期。[①] 俄国1917年革命之后，斗争的第二波浪潮开始涌起，其后就是斗争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最终，这一波浪潮在一些国家被法西斯主义所压制，在另一些国家它的冲动则被新政和反法西斯同盟所吸收。最后一波浪潮始于中国的革命，并席卷了非洲和拉丁美洲，在那里的斗争中延续，最终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斗争在世界范围的大爆发。

---

① 关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反帝国主义周期，参阅 Rebecca Karl 的专著 *Staging the World: China and the Non-West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这样的国际斗争的循环往复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真正动力,它既推动了资本制度的发展,同时也推动资本进行一系列自我更新与自我重构。① 19、20 世纪各种最为强大的反抗斗争中的各式各样的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的、反殖民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还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这一切预演并预构了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帝国的形成。从这一意义上说,帝国的形成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反应。说民众的斗争预演并预构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其中并没有任何辩证法或目的论成分。相反,各种斗争本身就展现了欲望的创造性,展现了建造在活生生的生存体验之上的乌托邦,以及历史性的潜在作用。

在那些预演并预构了全球化的斗争中,得到体现的是活劳动的力量。它寻求出路,要把自己从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地域划界刻板严明的政权中解放出来。就在抗争死劳动之时,活劳动总是在寻求途径,突破固定的地域格局,打破国家体系的限制以及使自己沦为奴隶的政治框架。正是凭着活劳动的力量,凭着它躁动不息的运动以及它消除地域界限的欲望,这一破裂过程撞开历史的每一扇门户。一旦我们接纳了运动中的民众的视角、主体性和欲望,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全球化如何成为民众解放的一个真实条件(只要它是在沿着消除旧有剥削和控制结构的地域划界的方向运行)。但今天,这一解放潜能如何才能得到实现?人们获取自由的不可抑制的欲望如一团熊熊烈火,这把火焚毁了旧有的民族国家体系,带来了向帝国的过渡;这把火也焚毁了以国际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国际无产阶级主体。今天,烈火已熄灭,在余烬之下,还有人们争取自由的欲望吗?在国际无产阶级作为主体已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又有哪种力量能填补它留下的空缺呢?从哪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种新型民众的萌芽已成为全球化的整合纵横中的一个积极的,或导向异端

① 关于斗争先于,且预构了资本主义发展和结构重组这样一种假设,参阅 Antonio Negri 的专著 *Revolution Retrieved* (London: Red Notes, 1988)。

的动因呢？

鼹鼠与蛇

我们要认识到，劳动与反抗的主体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构成已经历了转化，故而我们的理解也必须转变。从概念上讲，无产阶级已成为一个十分宽广的范畴，它包含所有那些自己的劳动遭受直接的和间接的剥削，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①] 在过去的一个时代，这个范畴将重心建立在产业工人阶级之上，并一度被实际上纳入后者名下。它的典范形象是男性产业工人大众。无论是在经济分析之中，还是在政治运动中，产业工人阶级都被赋予领导作用，其地位凌驾于其他所有劳动者（例如农民）之上。时至今日，那个阶级已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它其实并未消亡，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特殊位置及它在无产阶级构成中的霸权地位已被取代。无产阶级已不再是昔日的旧模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消亡。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再度面临这一艰巨的任务：把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对它的新构成进行分析、理解。

我们理解的无产阶级范畴包括一切受剥削于、受支配于资本主义的人。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是一个具有完全的同一性，没有任何分化的整体。实际上，各种分化和分层以不同的方向把它分割得支离破碎。一些劳动是有酬的，另一些则是无酬的；有些劳动仅在工厂内进

---

① 关于无产阶级的这种看法，用马克思自己的语言说，可被理解为一个严格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而这个经济范畴也就是依附于资本之下的劳动主体。随着我们重新界定劳动这个概念，并对它名下的活动范围加以拓展，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传统分界也随之瓦解。即使在马克思最严格的经济公式中，无产阶级也必须被理解为实在的政治范畴。参阅 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 的合著 *Labor of Dionysu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以及 Antonio Negri 的文章“Twenty Theses of Marxism”，收入 Saree Makdisi，Cesare Casarino 和 Rebecca Karl 合编的论文集 *Marxism beyond Marxism*（New York：Routedge，1996）。

行,另一些则分散在广阔的社会领域中;有些劳动有一日 8 小时,一周 40 小时的时间限制,另一些则占满整个人生;有些劳动仅被给予最低限度的价值认可,另一些则被抬高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支柱的显赫地位。在后面,我们要争辩,在活跃在今天的各种生产成分中,非物质劳动力量(从事通讯交往、合作及各种情感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图式和无产阶级的构成结构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且这种核心性仍在与日俱增(详见第 13 章)。我们的观点是,所有这一切劳动形式都在某种意义上屈从于资本主义规范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际上,正由于它被容纳在资本之中,并维持着资本,无产者自身作为一个阶级才得到界定。

我们需要再具体一些,考察新无产阶级表达自身的欲望与需求的斗争形式,在 20 世纪后半部分,尤其是从 1968 年到柏林墙倒塌之间的 20 年间,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调整和全球扩张与无产阶级斗争的转型同时进行。如我们在前面已论述过的,一种建立在劳动力反抗中表达出的共同欲望的交流、转移基础上的国际斗争圈的形象似乎已不再存在。作为组织斗争的具体形式,斗争圈已消失。然而,这一事实并未把人们推入无底深渊。相反,我们仍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看到一些影响巨大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民众展示出他们对剥削的拒绝,这些事件显示出了新无产阶级的团结性与斗争精神。

看看下面这些发生在 20 世纪的最后岁月中的最激烈、也最有影响力的斗争吧:1992 年 5 月的洛杉矶暴动,从 1994 年开始的恰帕斯起义,在 1995 年 10 月几乎令法国陷入瘫痪的一系列罢工,以及 1996 年发生在韩国的类似罢工。这其中,每一次斗争都发生在特定的环境中,都建立在对本地区问题最直接的关注之上。在任何一个方面,它们都无法相互联结,结成一条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延长的斗争之链。这些斗争没有一个能引燃新一轮斗争,因为它们所表达的欲望与要求无法被转移入不同的社会语境。换句话说,世界其他地区的(潜在)革命者无法在听到发生在纳布卢斯、洛杉矶、恰帕斯、巴黎和汉城的事件之时,立即就把它们视为

自己的斗争。不仅如此，这些斗争不仅不能与其他社会语境交流沟通，甚至在本地区也缺乏充分的交流沟通。故而，它们往往只能延续很短的一段时间，转瞬间就燃尽了自己。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关键，也最迫切的政治悖论：斗争已变得不可交流沟通。

这一不可交流性的悖论使得把握和表达新涌现出的斗争所施展的力量变得极其困难。我们应该认识到，就在各种斗争损失了宽泛性、持久性和共通性的同时，它们的激烈性获得了增强。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各种斗争已都把焦点聚集到本地的、最贴近的境况之上，它们也提出各种具有超国家关联性的问题，各种为新的帝国式资本主义规范所固有的问题。举例而言，在洛杉矶，为暴动的烈焰补给燃料的是当地的种族对抗，以及排斥性的社会和经济格局，这在许多方面是当地的（后）城市地域所特有的。可事件几乎立刻就跃升到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层面，它表达了人们对后福特主义社会控制政府的拒绝。在洛杉矶事件中，人们看出，随着社会调解机制的衰落，在种族混居、社会复杂的大都市区域进行管理已变得举步维艰。洗劫货物、焚毁财产，这些行为已不仅仅是一种隐喻，更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全球状况。[①] 同样，发生在恰帕斯的叛乱基本上集中在地方性问题上：各种因排斥而引发的问题，以及地方缺乏自己的代言人。这些既是墨西哥社会和墨西哥政府所特有的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长期以来存在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种族阶梯结构中的共同问题。然而，这场叛乱同时也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强加给当地的社会体制的迎头痛击。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它也是对系统化的排斥和压制的回击，这种系统化的排斥和压制发生于全球市场在各地的构建过程中。[②] 最后，1995 年发源于巴黎，随后波及整个法国的大规模罢工也把斗争目标集中在本地和本国的问题上，诸如养老金、工资、失

① 见 Michael Hardt, "Los Angeles Novos", *Futur antérieur*, no.12/13(1991)。

② 参见 Luis Gomez 所编 *Mexique : du Chiapas à la crise financière*。

业等(在汉城,情况也是如此)。然而,那场斗争也立即被确认为是对构建中的新欧洲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直接抗争。最重要的是,法国的罢工呼唤一种新的公众观,呼吁建构新的公众空间,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机制。后者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或多或少出现于世界各地。[①] 或许,恰恰因为上述这些斗争无法相互沟通,无法以斗争圈的形式在水平方向上扩散,它们所蕴含的力量只得沿着垂直方向上跃,立刻触及到全球层面。

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些表征并不表明新一轮国际斗争已出现。相反,它们表明了已出现一种具有新品质的社会运动。换句话说,尽管上述各次斗争间有着千差万别,我们仍应洞察到它们所共同拥有的一些基础特征。首先,尽管上述各次斗争扎根于本地的状况,但它们都能直接上升到全球层面,并对帝国体制进行具有普遍性的攻击。其次,各次斗争都摧毁了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间的传统分界。它们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此它们是生态政治斗争,是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它们是生成性斗争,它们正在创造新的公众空间和新的社会形态。

我们应该能认识到这一切,但这也并不那么简单。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甚至就在我们努力发现上述事件的新颖意义时,我们仍在感到它们已经陈旧和过时了,它们只会制造混乱,这种感觉萦绕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所有那些斗争,尽管它们引出了新的因素,但从一开始看上去就已陈旧过时了,而这正是因为它们无法彼此交流沟通,它们的语言无法被转变到他处。一方面,斗争本身无法与人沟通;可另一方面,它们却遭到媒体的超级曝光。它们出现在电视上,因特网上及其他一切人们能想得到的媒体上。

毫无疑问,我们能察觉到存在着真实的障碍,阻绝了交流沟通的发

---

① 主要参见 *Future antérieur*, No. 33/34 中文章"Tous ensemble! Réflections sur les luttes de novembre-décembre"(1996)。读者也可参阅 Raghu Krishnan 的文章"December 1995: The First Revolt against Globalization",刊载于 *Monthly Review*, 48, No. 1(May 1996)。

生。障碍之一是人们找不到一个可为一切斗争的矛头之所向的共同敌手。洛杉矶、纳布卢斯、恰帕斯、巴黎、汉城，各地的境况似乎都具有极端特殊性，尽管实际上它们都直接攻击帝国的全球秩序，寻求另类以取而代之。明确共同敌手的本质因此就成了一项基础性政治任务。第二个障碍（这实际上是由第一个障碍导出的一个结果）是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以将各次具体斗争所使用的特殊语言转变为一种国际性语言。不要说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斗争，就连我们自己这儿的斗争所使用的语言也似乎是一门不可理解的外语。这指向另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建构一种新的共同语言以加速交流沟通，就如同在上一个时代人们建构起一种反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语言一样。或许，这应该是一种新型的交流沟通，它发生作用的基础应是差异，而非类同。它是一种建立在个性之上的沟通。

明确共同敌手、创建共同语言，这些理所当然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也将在本书中尽力推进这两项任务。然而，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沿着这条分析路线走下去，我们最终将无法把握新斗争所呈现出的实在潜能。换句话说，横向联结斗争以形成一个圈，这种模式已无法再帮助我们辨别出当代的斗争以何种方式取得全球性意义。这样一种模式实际上遮蔽了我们的目光，使我们看不到它们的实际潜能。

在19世纪，当无产阶级斗争圈出现于当时的欧洲之时，马克思曾试图把它的连续性理解为鼹鼠和它的地下通道。当阶级矛盾趋于公开之时，马克思的鼹鼠也会钻出地面。然后，它又会钻入地下，可并不是去消极地冬眠，而是去巩固它的地道。这只鼹鼠随着时代和历史一道前进，每当时机成熟之时（1830，1848，1870），它就会从地洞之中一跃而出。“挖得好，老鼹鼠！”[①]我们寻思，也许马克思的这只鼹鼠已经不复存在。

---

①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实际上,我们觉得,在当今向帝国的过渡之中,鼹鼠那结构坚固的地下通道已被蛇的游移所取代。[①] 在后现代社会中,现代社会所有的深层结构及地下通道都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今天的斗争悄然无息地游移过帝国的地表。或许,当今各种斗争的欠互通性,缺乏结构严密的交流沟通渠道也正是当今斗争的优势,而非弱点。说它们是优势,是因为当今各种斗争本身就具有着直接的颠覆性,而无需等待来自外部的援助,或必须扩展自身以保证其效力。或许,资本的全球生产和控制之网扩张得越广,在每一个孤立点之上发生的反抗的威力也就越强。仅仅靠集中自身的力量,把它紧缩在蜷曲的身形之中,斗争之蛇直接攻击帝国秩序的最高点。帝国向我们呈现出一个平面的世界,从任何一点出发,穿过表面,就可抵达帝国的核心。即便各个分散的点的确形成了某种新的斗争圈,这个圈的成形也不会来自斗争的沟通和扩散。相反,它的成形来自各个点的出现,来自各个点所具有的强度。简而言之,一个事实界定了新的阶段,那就是:斗争不再横向连接,而是纵向跃起,直击帝国的核心。

从革命传统的角度出发,或许会有人反驳说,在 19 和 20 世纪,革命行动胜利的战术特点就在于它有能力在帝国主义之链上的最弱处轰开一个缺口,这是革命辩证法的基本常识。因此,今天看来前景并不很乐观。的确,今天我们所目睹的蛇形斗争之路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明确的战术。或者,这样一条斗争之路在战术家看来也许根本就不可理解。然而,当人们面临一连串激烈的、直接攻击帝国组织的最高层的颠覆性社会运动时,再坚持过去那种战略和战术间的划界或许已毫无益处。在帝国的结构中已不再有权力的外部,因而也无所谓薄弱环节——如果我们将薄弱环节理解为某个处于权力范围之外,因此权力的结合也较脆弱

① 参阅 Gilles Deleuze 的文章"Postscript on Control Societies",该文收入论文集 *Negotiation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的地方。[①] 要取得意义，每一次斗争就得直接攻击帝国的心脏，攻击它力量最强大之处。然而，这一事实并不把某些地域划入优先考虑范围，并非只有在华盛顿、日内瓦、东京发展社会运动才能打击到帝国的心脏。与之恰恰相反，帝国的构造以及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全球化意味着现在从任何一点都可直击帝国的心脏。旧的革命学派对战术的过分关注现今已彻底不适用。对今日之斗争者而言，惟一可行的策略就是在帝国内部形成一股生成性的反制力量。

可能会有人难以从斗争自身的角度接受当前形势的新颖性和存于其中的革命潜能。可如果从帝国权力的角度去看，从帝国权力必然会对斗争做出反应这一事实来看，它们就会易于被认识到。纵然斗争之场变得与外界全然难以交流沟通，它也会受到帝国的关注和批判，成为狂热的焦点。[②] 在政府管理机关和部门的教室中，它会成为具有教育意义的课程——它的教训要求使用压制手段。基本教训就是如果资本主义全球化要继续下去，这种事件就不能再发生。然而，这一类斗争有自己的分量，自己的特定强度。更重要的是，它们内在于帝国权力的程序和发展之中，它们对全球化进行投入，并维系着全球化本身。帝国权力只有轻唤各种斗争的名字，才能把它们转入消极状态，才能把它们塑造成一个神秘化形象。但最重要的是，帝国权力惟有如此才能探明哪条全球化之路行得通，哪条

---

① 所谓的"最薄弱环节"理论不仅是第三国际的策略核心，而且被整个反帝国主义传统所采纳。与之相对应，意大利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出现的 operaismo 运动提出所谓"最强大环节"理论。关于这一理论的基本论点，请参阅 Mario Tronti 的专著 *Operai e capitale*（Turin：Einaudi，1966）。

② 在从 *Le Monde Diplomatique* 到 *Z Magazine* 到 *Covert Action Bulletin* 这样的出版物中，人们可以不断找到足够的文献以显示这种信息误导和消声策略。Noam Chomsky 在他的众多专著和讲座中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揭露和抗衡这种信息误导。读者可以参阅 Edward Herman 和 Noam Chomsky 的合著 *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Media*（New York：Pantheon，1998）。海湾战争为帝国对交流的操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参阅 W. Lance Bennett 和 David L. Paletz 合编的论文集 *Taken by Storm*：*The Media*，*Public Opinion*，*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以及 Douglas Kellner 的专著 *The Persian Gulf TV War*（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

行不通。就这样,帝国的全球化进程对这些事件做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的猜测,既把它们视为限制,又把它们看作重新校准帝国仪器的机会。这些民众的爆发直接触及帝国权力的最高层,假如全球化进程没有在被这些事件阻挠的同时又受到其刺激,它就不会存在,或停滞不前。

双头鹰

奥匈帝国的国徽——一只双头鹰——倒是对当代帝国形式的一个恰当描绘。但是在昔日,那只老鹰的两个头眺望的是两片相对自治、和平共处的领土。可今天,它的两个头相互对视,相互啄咬。

帝国之鹰的第一个头是由生态政治控制机器构造起的司法结构和宪制力量。无论是帝国的司法程序或帝国机器都始终受制于矛盾和危机。秩序和和平——这两个为帝国所推崇的价值——永远也不会实现,可它们会不断被提议。帝国的司法程序经历过这频频爆发的危机,把它们视为自身发展的代价。然而,附加项目总存在着。帝国在不断扩张,并不断施压,要求越来越紧密地遵从复杂、深刻的生态政治领域,这就给帝国机器施加了压力,使它在似乎解决了一项冲突的同时,又为其他项冲突的发生打开门户。帝国机器试图使它们与自身工程取得通约性,可它们依旧出现,仍旧不可通约,新领域的一切成分都在时空中流动,变幻不定。

帝国之鹰的另一个头是由全球化的生产主体、创造主体构成的民众复合,后者已学会如何在这片广阔的海域上航行。这些主体处在永恒的变动之中,形成繁若星云的个体和事件,在全球范围内一刻不停地重新设定系统的特性。这种永恒的变动可以发生在地域上,但它也可指混杂之物在形式和程序上的调整。在这个永远变幻不定的领域,"系统"与"非系统运动"根本无法被固定在符合逻辑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之中。①

① 参见 Giovanni Arrighi, Terence Hopkins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 *Antisystemic Movements*(London: Verso, 1989)。

即便新的民众制造出的非系统性成分实际上也是无法与系统通约的全球力量。在帝国系统缔造的秩序之内，每一次爆炸性事件都会震撼整个系统。从这个角度来看，偶然性和不可靠性就是我们居住其中的制度框架的特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其特点就是事件序列的不可预见性。这些事件序列在时间上变得越来越短促，越来越紧密，因而也越来越难以控制。[①] 随着事件不断加速自身的时间性，帝国也越来越难以对事件时间序列的不可预见性进行干预。各种斗争已展现出与此最相关的一个方面是突然加速。这种加速通常是累加好的，但它也可成为一场大爆炸，展示出固有的本体力量，在无法预见的时刻对帝国的核心平衡给予一记猛击。

帝国持续不停地决定着自身系统的构成。同样，在一系列斗争事件之中新的抵抗力量也得以成形。这也正是今日之民众的存在的另一个根本特征：他们存在于帝国之内，同时又反抗帝国。在事件与事件的碰撞之中，在普遍的游牧状态之中，在个人和民族普遍的混合与通婚中，在帝国生态政治机器的技术变形之中，新的抵抗力量和新的主体被生产出来。尽管各种斗争缺乏系统性，新的抵抗力量和主体还是会产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并不仅仅反对帝国体系——它们并不仅仅是否定力量，它们同时还在积极表述、培育、发展它们自己的建设性项目。它们在为了活生生的劳动力的解放、为了创造众如繁星的有力的个体而努力。民众运动有无数面孔，它的建设性一面无疑是帝国的历史建构的积极领域。这不是历史循环论意义上的积极性。相反，它是一种民众的积极性，一种具有对抗性和创新性的积极性。一方面，民众的反地域化力量是维系帝国的生产力量；可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力量呼唤摧毁帝国，并使这成为必需。

---

① 记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局限性，在这里读者应当参阅 Félix Guattari 的著述，尤其是他在最后的岁月里完成的著述，如 *Chaosmosis*(Sydney：Power Publications，1995)。

说到这一步时，我们也得认识到我们的比喻到此时也不再适用了。其实，双头鹰并不是关于帝国和民众关系的一个合适的象征，因为这样一个象征把两者放到了同一层面上，没有认识到两者间的等级性的非连续性，而正是这种非连续性界定着帝国和民众两者间的关系。从一个角度上看，帝国像新型利维坦一样明显凌驾于民众之上，它迫使民众屈从于自己庞大的机器的统治。可换一个角度，把我们的观察点移到社会生产力和创造性之上，也就是说采纳我们之所谓的本体视角，两者间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民众才是我们的社会和世界的生产力量，而帝国仅只是一件用来俘获的工具，远离民众的活力。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帝国是一只死劳动积累的吸血蝙蝠，它只有靠吸食活人的血液才能生存下去。

一旦我们采纳了这一本体立场，我们就可以回到在前面我们讨论过的司法框架问题，并发现存在于由国际公法向新的帝国公法的过渡过程中的缺陷。这个缺陷正是界定着帝国的新权力观。换句话说，在帝国权力观试图摧毁那些曾作为国际公法的参照点而发挥作用的旧价值观念(民族国家、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联合国等等)时，它所遭受的挫折和持续不断的不安定，以及那些所谓的骚动，都表明它存在着本体上的缺失。就在帝国建构超国家力量之时，权力似乎丧失了承载它的地基。更确切地说，它丧失了推动它前进的动力。从一开始，我们就应把帝国环境中的生态统治看成一部空壳机器、一部寄生机器、一部仅供观瞻的机器。

民众的创造动力带给帝国一种新的存在感。或者说，民众的创造运动一直在作为一种另类范式存在于这一过程中。它内在于帝国之中，推动着帝国的构造向前发展，而不是什么由否定带来肯定，或其他类似的辩证路线。它始终在作为一种绝对的肯定性力量发挥着作用，推动支配力量走向抽象而空洞的大一统。到那时，它就会将自身表现为一个鲜明的另类。从这一角度说，当构成帝国的力量仅仅表现为存在和生产的缺失，表现为民众构成力量的空洞而抽象的痕迹时，到那时我们就将发现

我们分析的真正立足点。那将是一个既是战略意义上的，又是战术意义上的立足点，因为到那时两者已不再有什么区别。

政治宣言

路易·阿尔杜塞在离群索居的日子里，写过一篇颇不同寻常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阿尔杜塞对马基雅维利作了一番解读，提出一个相当合理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视《君主论》为一部革命的政治宣言？[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尔杜塞首先把《君主论》的特点同政治宣言典范——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做了一番比较，由此将“宣言文形式”界定为一种特定文体。在《君主论》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中，阿尔杜塞发现两者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结构近似。在两部著作中，构成论点的是“彻底具体的工具，它在话语和它的客体与话语和它的主体之间建立起特定关系”。在几位作者笔下，政治话语都产生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生产关系，都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生产关系本身也正是民众采纳的视角，本身就是自我生成性、集体性的行动。简而言之，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宣言游离于政治科学的传统之外（这种传统的古典形式是对政府形式的分析，当代形式则是管理科学），将政治界定为群体的运动，将政治的目标界定为主体的自我生产。在这里，我们得到一种唯物主义目的论。

阿尔杜塞接着写道，尽管两者间有着重要的近似，它们之间的区别同样也十分重要。两者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决定作品立场的主体（现代无产阶级）和客体（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共存共生的，因此前者的组织发展直接包涵着后者的产生；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主体（群众）和客体（君主和自由国度）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

① 见 Louis Althusser, “Machiavel et nous”，见 *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vol. 2, François Matheron 编（Paris: Stock/IMEC, 1995）。

距离。这一距离引导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寻求一套能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民主措施。换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宣言追踪线性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而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著作中则提出一项计划、一种空想。阿尔杜塞最终认识到，两部著作都有效地将理论提议引到实践层面，两者都认定现在相对于未来是空荡荡的，而在它空荡荡的空间中，它们建立起主体的内在性行为，由此构筑起存在的新位置。

在后现代时代，这种形式的宣言将成为适应于具有反叛精神的主体的政治话语方式。然而，对内在性领域的选择能够充分地决定这种宣言的形式吗？从生态政治的角度看，后现代状况具有显著的自我矛盾特征，被理解为不间断的生活之流、生产之流、政治之流，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的一切力量都被激发为生产力量；另一方面，同样的力量又受制于全球支配力量，而这种支配力量日益趋于抽象，从而日益对生活再生产中的工具感视而不见。在后现代时代，“历史的终结”被有效地施加于世人，可同时人类的一切力量又被召唤起以作贡献于劳动力、社会和生活的全球再生产。在这样的框架中，政治（当其被理解为行政和管理时）失去其透明性；通过常规化的制度过程，权力隐蔽，而非揭示和解释界定着权力对社会和生活的控制的特点和关系。

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才能再激励起革命政治话语？它如何才能获得新的连贯性，如何才能为最终的宣言注入新的唯物主义目的论？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套机制，将主体（民众）和客体（世界解放）融合于后现代性之中？显然，仅仅追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宣言中给予的提示，我们难以做到上述几点，即便我们彻底接受内在性的论点也不行。马克思和恩格斯视创造性主体和解放过程为共生共存，可在冰冷、平静的后现代性中，这种共生共存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从后现代的角度看，马基雅维利的宣言在当代似乎又重新取得了相关性。借用马基雅维利的宣言，以之作一个类比，我们可这样提出问题：分散到各种网络中的生产劳

动如何才能找到一个中心？如何才能使大众之精神和肉体的物质性、非物质性生产构建起共同感和方向感？或者说，对于民众构造这一主体和民主政治工具的构成，当我们付出努力，缩短、消除两者之间的距离时，我们如何才能发现“君主”？

然而，这一类比最终仍有不足。在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君主身上，仍然存在着一种空想状态，拉开了工程同主体之间的距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尽管使用了极具内在性的方法，但仍旧将政治之功能局限于较高的层面，与之相比，任何后现代解放必须实现于此岸世界之中，必须实现在内在性层面之上，决不允许任何世外桃源般乌托邦的存在，哪怕它仅只是一个可能。今天，政治究竟应采取何种形式以表达主体性，这个问题尚还没有一个明确答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拉近工程中的主体和客体，把他们投放到内在性关系中，这应是一种比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叙述更深刻的内在性。换而言之，要把他们投放到自我生产的过程之中。

在现代性的晨光中，斯宾诺莎宣告：预言创造出自己的人民。[①] 或许，今天我们应该更新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目的论。或许，我们应同斯宾诺莎一样，认识到预言的欲望也是一种不可压抑的欲望。这种欲望愈是与民众结为一体，它也愈强烈。现在，我们还完全不清楚，这种预言功能能否适应我们的政治目的，能否维系后现代革命反抗帝国的潜在政治宣言。不过，某些共同和巧合看来颇令人吃惊。比如说，马基雅维利提出，由下而上构建新社会的工作要求有金钱和武器，并强调我们必须向外部要求它们。对此，斯宾诺莎的回应是：难道我们不是已经拥有它们了吗？这些必须拥有的武器难道不是恰恰存在于民众的创造力和预言力之中吗？当我们将自身定位在后现代性的革命欲望之中时，或许我们

① 见 Baruch Spinoz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vol. 1 of *Chief Works* (New York: Dover, 1951)。

也应作出同样的回应：难道我们不是已经拥有“武器”和“金钱”吗？或许，马基雅维利所强调必须拥有的金钱实际上就存在于民众的创造性之中，正掌握在生态政治生产和再生产的最直接行动者之手中。那必须拥有的武器或许就存在于民众的潜能之中，也就是存在于民众运用自己手中的生产力量，去破坏、摧毁后现代世界中的寄生性积存的能力之中。

今日之政治宣言，以及今日之政治话语应当完成斯宾诺莎所提出的预言功能，亦即组织起民众的内在性欲望之功能，最终，在这里没有任何空想，也没有任何宿命，新出现的是一种反制力量。其本体基础并不在于什么“为了明天的今天”，而在于民众的实际活动，在于民众的创造、生产和力量——一种唯物主义目的论。

第二部分

主权的转变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 你可以先肯定它绝无谬误，然后再由它推演出主权；你也可以先施加主权，然后再由此得出它绝无谬误。可无论怎样，你总要确认一种绝对权力，并把它奉为神明。同样，无论你施加主权的手段是通过政府的镇压或哲学家的说理，也无论你把主权归于君王或归于人民，结果总是一样。
>
> ——弗朗索瓦·基佐

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描绘了20世纪初期的维也纳。书中有一位启蒙贵族莱斯多夫伯爵。此君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总算搞清了现代性所带来的复杂局面。可在一个核心悖论上，他卡了壳。“有件事我感到难以理解，”他说，“那就是：人们应当彼此相爱，而政府也强力迫使人们这样做，这些早已不新鲜了。可既然如此，这怎么又会突然变成一个要么/要么的问题呢？”[①]在这位生活在穆齐尔的世界中的慈善家看来，在现代性的中心有一大矛盾。矛盾的一方是各种内在力

① 参见 Robert Musil 的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New York:Knopf,1995)。

量——欲望、联想、对社团的热爱;矛盾的另一方则是一个庞大、无处不在的政府,它采用各种强力手段,以施加、确保社会领域的秩序。要解决此矛盾双方之间的张力,或至少进行调和,就必须借助国家主权之力。可尽管如此,这个矛盾还是不断浮现出来,表现为一个"要么/要么"的问题:要么选择自由,要么选择屈服;要么是欲望的解放,要么是它的屈服。莱斯多夫伯爵条理分明地确认出贯穿于欧洲现代性的始终、居于现代主权概念核心之中的矛盾。

追踪在现代欧洲哲学的不同发展时期中主权概念逐渐凸显出的形象,我们将发现欧洲和现代性并不是统一、和平的建构。相反,它们从一开始就带有斗争、冲突、危机的特点。在欧洲现代性的构成过程中,我们可以辨认出三个历史时刻。在那三个时刻,现代主权概念的最初形象得到表述。首先,内在性层面的革命性发现;其次,对内在力量的逆动及权威形式的危机;最后,形成现代国家,从而部分、暂时地解决了危机。国家成为主权的承载者,从而超越并调和了内在力量的层面。在这一前进过程中,欧洲现代性本身也变得日益同主权原则无法分离。然而,正如莱斯多夫伯爵所感叹的那样,即使在现代性的巅峰时期,原有的张力仍不断挟全部之力破土而出。

说现代主权是个欧洲概念,是因为这一概念主要是在欧洲同现代性一道协同发展起来的。在构造欧洲中心论的过程中,这个概念起到了基石的作用。然而,尽管现代主权概念诞生于欧洲,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欧洲与欧洲以外世界的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欧洲的殖民工程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中。因此,现代主权概念实际上是作为欧洲以内和欧洲以外的欧洲反动和欧洲支配的概念出现的,它们是同一发展阶段的两个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侧面。这一发展阶段就是:统治欧洲,主宰世界。

具有革命性的内在层面

一切都始于一场革命。在欧洲,在1200—1600年之间,在一片广阔

的地域上(其地域如此广阔，以至于当时只有商队和军队才能在其中四处旅行，也只有在后来印刷术出现之后，它才能连成一体)，发生了一些奇异的事。人类开始宣称他们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是城市和历史的建造者，是天堂的创造者。他们继承了一种双重意识，一种社会等级观念，以及形而上学的科学思想。但同时，他们又把实验科学思想和关于历史和城市的生成性观念传给后代，他们还将存在确定为知识和行动的内在领域。在这一初始时期，新思想同时在政治、科学、艺术、哲学、神学诸领域中诞生，展现出激进的现代性力量。

欧洲现代性之起源的一个特点是它发源于一个世俗化过程，这个过程拒绝了神圣和超验对世俗事务的权威。这个过程当然十分重要，但在我们看来，它也仅是现代性的原初事件所表现出的一个迹象：肯定此岸世界之权力，发现内在性层面。“每个实体都拥有其独特的本质。”①邓斯·司各脱的这句话完全颠倒了中世纪的存在概念，因为根据中世纪的概念，存在之物是可类比的，因此是二元的、可预测的。一个存在体的一半居于此岸世界之中，而另一半则居于超验的彼岸世界之中。司各脱说这句话时，时代正处在 14 世纪之初，处在中世纪末期的动乱之中。司各脱告诉他的同辈人，要医治时代的动乱，就必须把人们的思想重新集中到存在的个别性上。这种个别性并非朝生夕灭，或偶然发生的，而是本体所固有的。在远离司各脱所居住的不列颠北部数千英里的意大利，但丁对司各脱进行了呼应，这充分证明了司各脱的言论的力量。“这种个别的存在具有强大力量，”因为它是实现一切可能的智慧力量的驱动力。② 就在欧洲现代性诞生之初，人类在自己的世界中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并把这新获得的尊重糅合成对理智和潜力的全新认识。

---

① 参见 Johannes Duns Scotus 的 *Opus Oxoniense*，Book Ⅳ，Distinctio Ⅻ，Quaestio Ⅰ，收录于 *Opera Omnia*，vol. 8(Hildesheim：Georg Olms Verlagsbuchhandlung，1969)。

② 参见 Dante Alighieri 的 *De Monarchia*，Louis Bertalot 编(Frankfurt：Friedrichsdorf，1918)。

15世纪,众多作者展示了这一全新的内在性本体知识的连贯性、革命性和独创性,我们只需从中选出三位代表性人物。首先是库萨的尼古拉斯。他说:"沉思是智力的运动,它的起点是quia est,终点是quid est。既然quid est距quia est无限遥远,这样一种运动也永远不会走到尽头。这也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运动,因为它是智力的生命力之所在。这种运动正是从这一事实上寻得满足,它不会制造疲乏,只会带来轻松和热力。"① 我们要引用的第二位代表人物是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他说:"如果你把上帝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感知力的存在,首先你必须确保这种知识和这种生命是被理解为完美而无任何缺陷的。设想,这种知识以最完美的方式洞悉一切。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加上一条:这种知识仅凭自身就能洞悉一切,因此,它无需到自身以外去寻找答案,否则它就仍未达完美。"②这样,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就把人类的心灵变为一部神圣的知识机器,而不是遥不可及的,超越一切的上帝。我们要引用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布维勒斯(Bovillus),他说:"过去,那人在本质上仅是人。可凭借艺术的丰富贡献,他获得了双倍的人性。也就是说,那人成了人中之人。"③凭借艺术和实践的力量,人性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倍增,将自身力量提升到更高的层面上。

在上述的现代性的源头中,知识由超验转为内在。最终,人类知识成为行动,成为改变自然的实践。弗兰西斯·培根构想了一个世界,在那里,"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发现通过使用、观察、争论得到重新组织……通过引入对心灵和智力更先进的使用和更完善的技术,来处理最

① 参见Nicholas of Cusa的文章"Complementum theologicum",收录于*Opera*,vol. 2(Frankfurt:Minerva,1962)。

② 参阅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的专著*Of Being and Unity*(Milwaukee: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1943)。

③ 参阅Carolus Bovillus的专著*Il libro del sapiente*,Eugenio Garin编(Turin:Einaudi,1987)。

遥远的实在和大自然最隐秘的奥妙，这是一种有益的做法。"①在这一进程中，伽利雷·伽利略更坚称我们人类的知识有可能同神的知识平起平坐：

> 让我们从广泛含义上对待"理解"，我要说人类智力对某些事物所能达到的理解是如此完善，具有如此之高的确定性，以至于它几乎可以同自然自身的理解相等同。这些事物中一项是纯数学，其中包括几何和算术。关于它们，自然之所知无限大于人类之所知，因为自然理解它们的一切。然而，就人类智力已知的知识而言，我确信它们在客观性和确定性上并不输于自然之所知。②

在从13世纪绵延到16世纪的一系列哲学发展中，具有革命意义的是：过去为天堂所垄断的创造力量现在被带回到尘世间来，对内在性层面的丰富内涵的发现由此开始。

同哲学和科学一样，政治学也在这现代性的早期从中世纪超验论那里收回了失地。在三到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历史以排山倒海之势完成了以普遍人性和群体行动重新奠定权威之基础的进程，其间有可怕的悲剧，也有英雄式的征服。举例而言，奥卡姆的威廉宣称："教会就是虔诚者的群体"③——他的意思是说教会不应凌驾于基督徒群体之上，或超脱其之外，而应内在于群体之中。帕多瓦的马西里奥斯(Marsilius of Padua)也就共和国下了相同的定义：共和国及其法律的权威并非来自什么高高在上的原则，而是来自于它的公民的集体。④ 一种新的权力理解，连同一种新的解放观念被驱动起来；从但丁和中世纪末期为"可能的

---

① 参阅 Fancis Bacon 的 *Works*，James Spalding，Robert Ellis 和 Donald Heath 编(London：Longman and Co.，1857)。

② 参阅 Galileo Galilei 的 *Opere*(Florence：G. Berbèra Editore，1965)。

③ 参阅 William of Ockham 的专著 *A Short Discourse on the Tyrannical Government*，trans. John Kilcull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④ 参阅 Marsilius of Padua 的专著 *Defensor Pac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8)。

智力"所作的辩护,到托马斯·莫尔盛赞自然生命所具有的"巨大的、不可解释的力量",并把劳动确立为政治安排的基础;从新教民主到斯宾诺莎的民主绝对性概念。当我们进入到斯宾诺莎的时代时,内在性的视界和民主的视界已完全重叠到一起。一方面,个体的力量在内在性层面得到实现;同时,这一层面也从历史上、技术上和政治上决定了新人类的真理。正因如此,因为不可能有外部媒介的存在,个体也同时被展现为集体。①

现代性以革命开端,一举推翻了旧秩序。构成现代性的不是孤立的理论,而是同对实践和实在的深刻思考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理论性行动,它们使人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之所以说这一历史进程具有革命性,正是因为它决定了一种范式,也给民众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作为危机的现代性

现代性并非一个统一的概念,它至少表现为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刚才我们已经界定的,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进程。这个现代性打破了同过去的联系,并宣布内在性为世界和生活的新范式。它发展出作为科学实验的知识和行动,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向,把人类的欲望推到历史的中心。从艺人到占星家,从商人到政客,新的生活改造了生存物质,无论是在艺术中,还是在宗教中。

然而,新兴力量的崛起已导致了一场战争。这样一种狂飙突进,推翻一切的力量怎么可能不激起强烈对抗呢?这样的一场革命又怎么可能不决定了反抗革命行为的出现呢?确有一场标准意义上的反革命;它

① 在 Spinoza 的著述中,我们可以读到现代性起源中革命一面的最清晰、最合成的形式。参阅 Antonio Negri 的专著 *The Savage Anoma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同时在文化上、哲学上、社会上和政治上发起攻势。既然它已无法把时代扭转回过去，也无法摧毁新生力量，它就寻求压制、支配新生运动的力量。这就是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它被构建起来，以发动反对新生力量的战争，以建立起庞大、无所不及的权力体系，从而可以支配新生力量。在文艺复兴革命时期，这场反革命即已启动。它企图更改文艺复兴的发展方向，把人类的新形象移植到超验的层面，把科学改造世界的能力相对化。最重要的是，它反对民众对权力的重新分配。这第二种现代性推出超验以对抗内在，推出秩序以对抗欲望。于是，文艺复兴在战争——宗教战争、社会战争、国内战争中——拉下帷幕。

欧洲文艺复兴，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出独具特色、辉煌璀璨而又一反传统的作品，它也是为实现现代性而进行的战争的战场。紧接着，宗教改革运动席卷全欧洲，它就如又一场旋风，紧随第一场而至，在大众的宗教意识中添加入人文主义文化。由此，这场战争扩大到大众生活中，并同人类历史的最隐秘处结合在一起。阶级斗争横扫过这片领域，在资本主义的创生期唤起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剥削秩序所具有的创造性，而这一切都按照一定的逻辑路线发展，这条逻辑路线既显示出进步性，也暴露出反动性。这是一场巨人间的争斗，其场面就如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庭教堂穹顶上所画下的壁画一样：它是现代性的创世纪中的悲剧性冲突。

欧洲现代性的革命进入了热月。在争夺霸权，控制现代性范式的斗争中，胜利落入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手中，落入试图中和革命生成力量的秩序力量手中。尽管昔日的一切已不可能恢复，但有一些事还是可能做到的，那就是：重立控制和权威的意识形态，利用大众的焦虑与恐惧，利用他们渴望减小不安定，增加安全感的心理，重新布置超验力量。革命必须被阻止。整个 16 世纪，无论在哪里，只要那里的革命闪耀出成功的光辉，那里的风景就被人用暗淡的色调遮掩住。和平成了最高的需要——可什么样的和平？就在欧洲的腹地，三十年战争以最可怕的方式

勾画出这场不可逆转的危机的轮廓，于是即使是最顽强、最智慧的人也只得屈从于热月的必需，屈从于换取和平的悲惨的、令人蒙羞的条件。曾经一度，和平是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是伊斯拉谟式的，这种内涵使它成为改变之路。然而在不长的一段时期里，和平完全丧失了曾经有的内涵。它成了悲惨的生存条件，成了避开死亡的急需。和平的旗帜上写的只有对斗争的疲倦以及对热情的篡夺。热月在胜利中结束，革命告一段落。

然而，热月并未解决危机，反而使危机恒久化。内战也未结束，而是被吸纳入现代性的概念中。危机界定了现代性本身，而危机就源于内在的、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力量同试图恢复秩序的超验力量之间一刻也没有间断的冲突。[①] 这一冲突是现代性概念的关键，然而，这一冲突又被有效地遏制住。文化和宗教领域内的革命被迫走入刻板的，甚至是暴虐的遏制结构中。到 17 世纪，封建制再度统治了欧洲。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会是时代逆动的第一个，也是最有说明性的例证，因为在此之前，天主教会在改革、革命和欲望的地震中已经摇摇欲坠。紧随其后，新教教会和政界秩序也开始制造出与革命相逆的秩序，迷信的鬼火燃遍欧洲每一寸土地。然而，在基层，创新的运动仍在继续着解放事业，每当一块地区被封闭，运动负载着不可压抑的经验产生出的欲求和希望，或者转入游击，或者另寻出路。[②]

---

① 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到阿尔多诺，出现了众多否定思想的哲学框架。它们都预见到了现代形而上学的终结，并将现代性同危机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说，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然而，这些著述者所没能看到的是有两种现代性正在发挥作用，而危机正是两种现代性冲突的直接后果。正因如此，他们未能看到现代性自身内部的另类选择，而这种另类选择可以冲破现代形而上学的局限。关于否定思想和危机，请参阅 Massimo Cacciari 的专著 Krisis：Saggio sulla crisis del pensiero negativo da Nietzsche a Wittgenstein(Milan：Feltrinelli，1976)。

② 关于欧洲现代性的这些转变历程，请参阅 Ernst Block 的专著 *The Principle of Hope*(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6)。读者也可参阅 Reinhart Koselleck 的专著 *Critique and Crisis：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8)。

与此同时，欧洲现代性的内部冲突在全球范围内也表现为一种外部冲突。与文艺复兴思想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还有欧洲对美洲的发现，和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支配的起始。欧洲发现了它的外界。“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质的突破”，撒米尔·亚明(Samir Amin)写道，“这恰恰是因为欧洲从那时起开始意识到以它的文明征服世界是个可能的目标……从那一时刻起，而不是在那之前，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凝结成形。”①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倡导了一系列革命性观念——人类平等、个性和集体、合作和群体。这些观念回响过全球，向全球传播着力量和欲望，随着新的土地、新的人民的发现而倍增。可同时，同样的反革命力量在力图控制欧洲的生成性颠覆性力量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把别处人民置于欧洲统治之下的可能与必需。欧洲中心论的出现正是对新诞生的人类平等观的潜在力量的逆动，它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反革命。同样，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占了上风；可也同样，它的优势并不具决定性。从一开始，欧洲现代性就是一场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战争。欧洲的霸主地位从来就处在危机中，而这一危机与前面我们提到的，界定着欧洲现代性的危机本就是一回事。

到了17世纪，现代性作为危机的概念得到强化。在这个世纪之伊始，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接着，它目睹了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可怕内战。可这个世纪最为可怕的一幕发生在德国的三十年内战中。与此同时，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和对当地人民的屠杀和奴役，其惨烈程度一日超过一日。到了17世纪下半叶，绝对君主制似乎彻底封堵住了自由在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行路。绝对论企图定格现代性概念，企图使用超验论的新武器来消弥一直界定着现代性的危机。与此同时，在海外，征服逐渐被殖民主义所取代，原先危险重重的掠夺和对黄金、财富的搜刮也日益让位于贸易专营权、稳定的生产形式和非洲奴隶贸

① 参阅 Samir Amin 的专著 *Eurocentr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9)。

易。17 世纪就是这么一个模棱两可,一个既脆弱,又充满巴罗克式富丽堂皇的世纪。从社会最黑暗的深渊总会泛起几片这个世纪试图埋葬的回忆。

我们只需提及一位伟大的人物,就可证明这一事实。这个人就是斯宾诺莎,他的内在性哲学统治了整个 17 世纪下半页的欧洲思想。他的哲学使革命的人文主义重新发射出耀眼的光辉,他以人性和自然代替了上帝,把世界变成实践之场,肯定了民众民主是政治的绝对形式。斯宾诺莎也思考到死亡(当时的国家和政治力量正是以此为武器,来压制解放的欲求和希望),他把死亡看成仅仅是被用来敲诈自由思想的人质,因此把它从他的哲学中驱逐了出去。"一个自由的人所思考的远超过死亡,他的知识是对生活的深思,而非死亡。"①人文主义者们把爱看成表达智性的最完美形式,而斯宾诺莎不仅把它确立为个性解放的惟一可能基础,也把它视为集体生活中的道德粘合剂。"自然之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智者之爱相抵触,也没有任何东西可把它夺走。"②斯宾诺莎证明了即使在 17 世纪,人文主义的革命工程也未中断。

超验工具

当欧洲进入启蒙主义时代的数个世纪里,旨在消弭现代性中的危机,与革命潮流背道而驰的工程开始展开。③ 这场启蒙运动的基本任务就是既控制住内在性思想,又不产生出中世纪那样绝对二元分立的文

---

① 参阅 Baruch Spinoza 的 *Ethics*,收录入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vol. 1, Edwin Curley 编(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5)。

② 同上。

③ 我们的讨论仰仗了以下这些著述者的专著:Ernst Cassirer 的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Max Horkheimer 和 Theodor Adorno 合著的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ontinuum, 1972); Michael Foucault 的文章 "What is Enlightenment?",收录于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vol. 1 of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New Press, 1997)。

化，而其达成任务的手段就是建造一件超验工具，使它有能力约束由拥有形式自由的主体构成的民众。旧王国文化上的本体二元分立现在必须被一种功能性二元分立所取代，现代性的危机也必须借助适当的调和机制来解决。最关键的一点是，要避免民众被理解为同神性和自然有着直接的联系，避免他们被理解为生活和世界的道德生产者。相反，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加入中介。哲学家们诘问道：这种中介位于何处，它又占据哪一级形而上学层面？可不管这样或那样，中介被界定为人类行动、艺术和联合不可或缺的条件。于是，构成人文主义革命思想母体的三要件——力量、欲望、爱——同构成特定中介的三要件对立了起来。除非透过现象的滤镜，否则自然和经验不可能被认识；除非借助于智性的沉思，否则人类知识不可能被获取；除非通过理性的图式，否则道德的世界不可能实现交流沟通。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一种中介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弱势超验。它使经验相对，并取消了个人生活和人类历史中的一切直接和绝对。可为什么这种相对主义会成为必要呢？为什么不能允许知识和意志宣布自身为绝对呢？因为在民众的自我构成中，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服从于早已成形的秩序，如果宣称人能够直接建立起存在的自由，那势必会造成狂乱和颠覆。这构成了一条意识形态之路的核心内容，而具有霸权的欧洲现代性概念正是在这条路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笛卡尔完成了发展过程中第一部具有战略意义的杰作。尽管笛卡尔装扮出追寻人文主义的新目标——知识——的模样，他实际上重建了超验秩序。当他把知识确立为上帝和世界间的惟一中介域时，他卓有成效地重新竖立起二元论，以其为经验和思想的界定特征。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在笛卡尔那里，中介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实际上，如果我们细察笛卡尔的原文，我们就会发现它只神秘地存在于上帝的意志中。笛卡尔的精明策略大致如下：当他谈论思想在中介的超验功能中的核心作用时，他又为神性超验的残余留下空间。他宣称中介的逻

辑在思想之中，而上帝则在无限遥远的地方。然而，像帕斯卡这样的一个新思想者对笛卡尔提出正确的反驳，称此只是笛卡尔的狡诈的一个例证。[①] 实际上，笛卡尔的上帝并不遥远。超验统治必须被视为必要的、普遍的、预构好的，这种认识要铭刻到人们的意识之中，而上帝正是做到这一切的保证：

> 不必迟疑，四处大声宣告吧：是上帝制定了自然的法则，正如国王制定了他的王国的法则。只要我们转动一下我们的大脑，像这样考虑问题，那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了。一切法则都内在于我们的心灵之中。一个国王如果有足够的力量，同样也会把他制定的一切法律植入他的臣民的心中。另一方面，上帝的伟大也是我们所难以理解的，即使我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也正是他无法理解这一事实令我们奉上更深切的崇敬。同样，如果一个国王不被他的臣民所了解，他就能享有更宏大的威严，当然其前提是不能让他的臣民觉得国王并不存在。他们必然对国王有足够的了解，以致对国王的存在深信不疑。[②]

人文主义的主体原则开拓了潜在性领域，可先验统治和秩序先决性地把这一领域限制了起来。笛卡尔鬼鬼祟祟地将神学带回人文主义已经清理过的区域，其工具绝对是超验的。

笛卡尔把我们带到启蒙历史，或者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开端。[③] 他所提出的超验工具是欧洲启蒙思想的鲜明标志。无论在经验主义，或是在唯心主义思潮中，超验主义成为视界中惟一可见之物。在接下

---

① 参阅 Jacques Chevalier 的专著 *Pascal*（Paris：Plon，1922）。

② 参阅 René Descartes 的信函“Letter to Mersenne（15 April 1630）”，收录于 *Philosophical Letters*，Anthony Kenny 编（Oxford：Blackwell，1970）。如果读者要参考其法文原文版本，可参阅 *Oeuvres complètes*，Charles Adam 和 Paul Tannery 合编（Paris：Vrin，1969）。

③ 参阅 Antonio Negri 的专著 *Descartes politico o della ragionevole ideologia*（Milan：Feltrinelli，1970）。

来的几个世纪里，几乎所有的主要哲学思潮都被拉入到超验主义工程之中。在这片领土上，智力劳动同制度、政治、科学修辞的共生成为绝对，每一种概念的形成都烙上它的印记：政治的形式化、科学和技术以利润为目的的工具化、社会冲突的缓靖化。当然，在上述的各领域中我们都可发现特定的历史发展，但每一件事物都已被固定在欧洲现代性自说自话的宏大叙述之线路上，而故事的叙述者用的方言正是超验主义。①

从许多方面看，伊曼纽尔·康德位于这一发展的中心。康德的思想极其丰富，把后人引向不同的方向。但在这里，我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把超验原则推上欧洲现代性最高点的那股思想。康德将主体置于形而上学的中心。可同时，他又用我们前面已提到的三重机制控制住主体，也就是：把经验空泛化为现象，把知识削弱为智性思考，把道德行动在理性图式中中和。笛卡尔的沉思引出他对二元论的肯定，康德则使二元论具体化，不是通过神，却是通过一种伪本体批判——人被放到宇宙之中心，可这已非那通过艺术和行动使自己成为人中之人的人。这个人在经验中迷失，在对道德理式的追求中幻灭。当康德把主体自身的发现定为危机时，他完全清楚他又把我们抛入现代性的危机之中，可这种危机被用来辩护超验力量在知识和行动之中的独特、惟一地位。世界成了理式的华屋，被授予我们的惟一实在。

再没有一个人对浪漫主义的表达像康德那样强烈，浪漫主义是全部康德哲学的母题：超验的必需、一切形式的直接的不可能、存在之物的理解和行动之中的符咒。从这一角度看，阿瑟·叔本华可能是对康德主义和浪漫主义姿态理解最透彻的读者。要把事物的表象同事物的本质统一起来，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极其困难，这是事实，而这个事实

① 这种欧洲式自满自足的超验路线在最近的一个例证可见于 Massimo Cacciari 的专著 *Geofilosofia dell'Europa*（Milan：Adelphi，1994）。

也成了这个处在痛苦的匮乏之中的世界的诅咒。因此,这个世界的构造方式就不允许高尚崇高的力量,那些飘向真理和光明的力量繁荣昌盛。[①] 换而言之,叔本华认识到康德主义对人类进化的思想断然说不。

出于相同的原因,叔本华更激烈地反对黑格尔。他把黑格尔叫做"智力上的野蛮人",以此指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野蛮性。[②] 当他发现黑格尔竟然把康德的超验批判所具有的惨淡的构造功能变成了一个坚实的本体形象,他觉得这不可容忍。实际上,这正是欧洲现代性意识形态中超验的最终归宿。黑格尔只不过挑明了一层从开始就隐含在欧洲反革命发展之中的意义:现代人类的解放仅只是服务于人类支配的一项功能,而大众对内在性的追求已被转变成国家超验力量的必需。的确,黑格尔恢复了内在性,剔除了知识的不确定性、行动的非果断性,封堵住了康德主义所打开的缺口。但他的内在性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内在性,他的内在性拒绝承认民众所具有的潜力,并把它归入到一个神的秩序的寓言之中。人文主义的危机变成了辩证舞台艺术,在每一幕中,结果代表一切,手段只不过是点缀。

再没有什么值得去奋斗、去欲求、去爱了。潜在性被阻遏,被控制,遭到终结性的压制而自相矛盾。中世纪基督教传统所宣扬的分析性存在这时爬出坟墓,摇身一变成了辩证存在。叔本华把黑格尔称为野蛮人,可后来正是野蛮人这一形象成了反抗欧洲支配,肯定非欧洲式欲望的象征,它实在具有讽刺意味。然而,在只有在欧洲扩张,在欧洲奴役非洲、美洲和亚洲人民的背景下,黑格尔那关于"他者"和"主与仆"之争的戏剧也才可能上演。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不把黑格尔同欧洲的殖民主义联系起来。黑格尔谈绝对精神中的他者,谈他那从少数民族出发到达位于欧洲的巅峰的普遍历史,而他所谈的这一切都同欧洲在殖民和征服

---

① 参阅 Arthur Schopenhauer 的专著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Dover, 1966)。

② 同上。

过程中的暴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而言之，黑格尔的历史不仅大大攻击内在性的革命层面，更否定了一切与欧洲相左的欲望。

最后，这位“智力上的野蛮人”把一个新概念——时间性塞入现代性的发展之中。他把时间性展示为一种辩证目的论，它已得到实现，已到达终极点。现代性已完备了，它已不能被超越。这样，当黑格尔迈出更远的，也是决定性的一步时，这也绝非偶然。这一步给全局下了定论：辩证的危机在国家的支配下被中和。和平和正义再度开始它们的统治，“国家是一个道德整体，这种整体性存在于国家自身之中，也只为国家自身而存在……国家的存在对上帝驶过世界的远征至关重要。”①

现代主权

黑格尔就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戏剧所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体现出现代欧洲政治同形而上学之间深刻而又密切的联系。政治处在形而上学的中心，因为现代欧洲形而上学本就是为了应对个体解放和民众的革命构成而兴起的。它成为现代性第二种形态的主要武器，因为它能提供一件超验工具，施加秩序于民众之上，阻止民众自发组织起来，自动表达他的创造性。最为重要的是，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要确保它能控制出现于欧洲本土和欧洲殖民地的新生产力量，从而控制这改变自然的新力量，并从中渔利。因此，政治同形而上学一样，其核心主题就是根除中世纪的超验形式，因为它阻碍了生产和消费。同时，它又要以适应于新人类的生产形态的形式维持着超验的支配地位。故而，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在政治哲学中得到体现；也正是在此，新的中介形式找到应付内在性革命的最适合的回应，打造一件超验的政治工具。

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一个最终的、绝对的、最高的统治者，一个“人

① 参阅 G. W. F. Hegel 的专著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Allen Wood 编(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间上帝”,他的这一提法在构造超验政治工具的过程中起到基础性作用。霍布斯推断人类社会的初始状态是战争,是个体行动者之间普遍的冲突,这一推断成为他的逻辑的起点。接下来,为了抗拒战争造成的死亡威胁,保证生存,人类必须达成协定,赋予一位领袖以绝对的行动权力,或更确切地说,赋予他剥夺除了人类的生存权和生殖权以外的一切权力。“既然理性与正义并不存在,那么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正义和理性就必须填入空白,而那个人,或那些人也就成了最高权力的拥有者。”①基本过程通过契约完成,契约把民众的一切自律权转交给最高权,从而使民众臣服于其下,接受其统治。

现代哲学在它发展的巅峰,在康德的图式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提出超验状态是必需和不可避免的,而这件超验政治工具正好同这种超验状态相匹配。按霍布斯所说,不同个体的共同意志汇聚到一起,并在超验主权的意志中得到体现。因此,主权被界定为既具有超验性,同时又具有代表性,而此二者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是相互矛盾、互不相容的。一方面,主权的超验性并非建立在外在的神学支持之上,而是建立在人类关系的内在逻辑之上。另一方面,赋予主权以合法性的代表性又使它彻底疏离了广大民众。如同他的前人让·布丹一样,霍布斯认识到“保持主权的威严和权力的绝对的关键点就在于向臣民颁布法律而无需征得他们的首肯”②,但霍布斯也努力把这一观念同使主权具有合法性和先验性的代表性契约论图式结合起来。至此,现代主权概念以一种纯净的超验形态诞生。联合契约内在于臣服契约之中,二者密不可分。这一主权理论向现代性的危机提出了第一种政治解决方案。

霍布斯的理论在他自己的时代中对君主专治的发展起到了作用,

---

① 参阅 Thomas Hobbes 的专著 *The Elements of L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② 参阅 Jean Bodin 的专著 *On Sovereignty: Four Chapters from the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ed. Julian Frankl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可实际上这样一种超验图式可同样应用于多种政府形式：君主制、寡头制，或民主制。随着资产阶级跃居显著地位，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方案可代替这种权力图式。故而，卢梭的民主共和论同霍布斯提出的模式颇为相似也就不是偶然。卢梭的社会契约保证个体意志的统一在普遍意志的构建过程中得到发展，并被纳入普遍意志之中。普遍意志随着个体意志的异化的向前发展，迈向国家主权。作为一种主权模式，卢梭的"绝对共和党人"同霍布斯的"尘世间的上帝"并无二致。"准确地理解，(契约中的)所有条款都可归结为一条，也就是说所有契约签订者同自己的一切权利相分离，把一切权利赋予社会总体。"①卢梭也为他的主权观订下一些更为民众欢迎，也更具民主意义的条件。可一旦放到超验绝对论的基础之前，那些条件就显得完全没有关联性。具体地说，卢梭的直接代表观被总体代表观(这种代表观同他的主权观必然联系在一起)所扭曲，最终完全被后者压迫住，而他的总体代表观同霍布斯的代表观完全兼容。早在16世纪下半页，让·布丹已对这种自相矛盾下了概念界定，而卢梭和霍布斯只不过再现了这种自相矛盾而已。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主权只能存在于君主制下，因为只有一个人可以拥有主权。如果同时有两个、三个，或许多人实施统治，也就无所谓主权了，因为主权绝不会向他人的统治低头。② 人们大可以宣告民主制、多元制，或其他什么政治形式，但现代主权只属于一个政治体：一个单一的超验力量。

然而，在现代主权理论的基础中更有一个重要因素——一重填充、维系主权权威的形式的内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市场是社会生产的价值之基础的肯定使这重内容得到表现。这重内容总是暗示性地在超

---

① 参阅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 *On the Social Contract*，收录于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vol.4，Roger Master 和 Christopher Kelly 合编(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4)。

② 参阅 Bodin 的 *On Sovereignty*。

验工具的内部发生作用。[①] 假使没有它,主权形式就无法适存于现代性之中,而欧洲现代性也就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霸主地位。正如阿瑞夫·德里克(Arif Dirlik)所言,欧洲中心论所以能把自身同其他民族中心论区别开,并在全球取得优势,这主要得靠资本之力。[②]

欧洲现代性同资本主义密不可分。这一现代主权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核心关系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已得到全面阐述。斯密以一种工业理论开始他的论述,这一理论提出私人致富同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解决此矛盾的第一张药方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资本家"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他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促进本非他所愿的目的"。[③] 可这第一张药方药力既不牢靠,药性又不持久。作为管理和立法科学的一个分枝,政治经济学必须找到更好的药方。它必须把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理解为政治经济自身的产物,它朝向建立市场的自律状态:"即使所有的系统——不管是优惠性的还是抑制性的——都被撤除,自然自由的明显而又朴素的系统会自动建立起来。"[④]然而,这张药方还是没有得到保障。实际上,还有一个必需的第三步,所需要的是一个国家政权,它规模微小,但卓有成效,它迫使个人的利益同大众的利益相吻合,它把一切社会功能和一切劳动活动简化到一重价值标准之下。这个国家干涉与否尚是次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它给予利益的调和以实际内容,且代表着那种调和中理性的一方。现代国家的政治超验性被界定为经济超验性。斯密的价值理论不仅是现代主权国家概念的发源,也构成这一概念的实体。

现代主权理论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合成最终在黑

---

① 参阅 C. B. Macpherson 的专著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② 参阅 Arif Dirlik 的专著 *The Postcolonial Aur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③ 参阅 Adam Smith 的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④ 同上。

格尔那里完成。同样，在他的著作中也实现了现代主权理论的绝对论与共和论，也就是说霍布斯式理论和卢梭式理论的完美结合。

> 在民法和私有财产领域，在家庭和市民社会领域，国家是外在的必需，是更高的权威，所有法律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性质，而所有利益也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但这只是国家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它们内在的目标，国家的力量就在于普遍的、最终的目标同个人的具体利益的契合，也就在于这一事实：人们对国家担负责任的同时，也享有与之程度相等的权力。①

黑格尔关于具体和普遍的关系充分地将霍布士—卢梭式的主权理论同斯密的价值理论结合了起来。现代欧洲主权是资本主义主权，这种统治形式规定下个体与总体的关系的功能是服务于资本的发展。

主权机器

当主权和资本彻底结合，而权力的超验性也彻底转变为权威运用的超验性时，主权就变成了一架统治全社会的机器。这部机器每分每秒把民众转变成秩序井然的总体的一部分。我们应密切关注这一过程，因为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超验图式是具有多么具体的功能的意识形态，我们也能看到现代主权与古代政体的主权形式有着多么大的差异。现代主权是一种反抗自己以外一切政治力量的政治力量，是一个反抗一切其他国家的国家。除此之外，现代主权还是一种警察力量。它必须一刻不停地在广泛范围内完成把个体吸纳入总体，把所有人的意志凝结成一种普遍意志的奇迹。现代官僚体制是超验的关键器官。黑格尔在对国家公务员群体进行半神学的圣化时纵有夸张之嫌，至少他说清了他们对国家的有效运转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官僚体制所运行的机器把合法

---

① 参阅 Hegel 的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性和组织效率性、权利和权力的运用、政治和警察统一了起来。就这样，现代主权理论到达了它的成熟期。凭借把整个社会都纳入权力之中，它实现了一种新型的“个体”。一点一点，随着管理一步步发展，社会和权力、民众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被倒转了过来，直至今日权力和国家产生出社会。

实际上，这一思想史发展历程一直就同社会史平行发展。同它相对应的是国家的组织动力由中世纪等级制向现代规训制的转变，是社会由控制型向功能型的转变。在此我们只需提起两个最耳熟能详的名字：马克斯·韦伯和米歇尔·福柯。此二者都耗费大量篇幅坚持权力的社会形态的转型。在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漫长转变过程中，第一种政体形式，如我们所述，即植根于超验。中世纪社会是按照权力等级的图式建立起来的，而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把这种等级图式彻底摧毁。福柯称这种转变为由主权范式向政府性范式的转变。他所说的主权是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孤家寡人的超验地位，而他所说的政府性则指贯彻于整个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则。[①] 我们更倾向于把此视为主权观自身的转变，一种向新超验形式的转变。现代性以制造秩序功能的超验性取代了传统的超验控制。其实早在古典时代，已经形成了种种规训，但只是在现代时代，规训图式才成为行政管理的图示。在转变过程中，行政官始终不知疲乏地在广泛领域内努力使国家日益接近于社会现实，从而生产出社会劳动，并使其处在自己控制之中。昔日的观点认为要使行政管理体横跨不同的社会时代；而今日，这种观点得到重大修正，尽管尚未被彻底抛弃。但福柯并未停留于此，他宣称，由行政管理所实施的规训过程已如此深刻地渗入社会之中，以至于它所构成的工具甚至已把人口的再生产这一集体生理维度都纳入考虑之中。现代主权之实现也

① 参阅 Michael Foucault 的文章“La ‘gouvenementalité’”，收录于 *Dits et écrits*（Paris：Gallimard，1994）。

就意味着生态权力的诞生。①

在福柯之前，马克斯·韦伯也已描述过行政管理机制对现代主权的形成的介入。② 福柯的分析是历史性的，有着广阔的时间跨度，而韦伯的分析则是共时性的，其深度令其强大有力。就我们关于现代主权的讨论，韦伯的第一个贡献是他将现代性之开端界定为一种断裂——一种个体和民众反抗国家的巧取豪夺的创造性境况。接着，国家主权被界定为对这种力量关系所作的规范。现代性的首要标记是对立力量间的紧张关系，任何一次合法化过程都受到这种紧张关系的规约，力求消减它的破坏力，同时释放出它所携带的创造力。在新的主权力量中，现代性危机的闭合可以旧的、半自然主义的形式完成，比如说发生于传统的立法过程中。或者，这种闭合也可以神圣、非理性而具有创新性的形式完成，比如说发生于奇里斯马的立法过程中。最后，它也可以行政管理合理化的形式完成，而在晚期现代性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最有效的形式。而对上述几种合法化过程的分析是韦伯的第二个相关贡献，它在第一个贡献的基础之上确认了范式的双重性。韦伯对转变的程序特点的研究构成了他的第三个相关贡献，不同合法化形式之间的相互混合总是存在，也总是可能，它们有能力持续不断地扩大、深化对社会现实的控制。由此引出一个最终的悖论：如果说一方面这种过程闭合了现代性的危机，可另一方面它又使现代性的危机重新开启。闭合危机过程所采纳的形式就如现代性的起源一样，既举足轻重，又矛盾重重。在这一方面，韦伯的著作有着巨大的优点，它彻底地摧毁了黑格尔所炮制的自鸣得意的现代国家主权观。

很快，韦伯的分析就被投身于现代性批判的作家所拾起，他们从海德格尔到卢卡契，从霍克海姆到阿多诺。他们都认识到韦伯揭穿了现代性的幻景，这个幻景就是现代性基础之中的二元对立可被纳入一个包容

① 参见第二章中我们关于 Michael Foucault 的生态政治概念的讨论。

② 主要可参阅 Max Weber 的 *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社会和政治的一切方面,包容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综合统一之中。他们最终意识到,现代主权已过了它的巅峰期,正走向衰亡。

现代性的衰落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在此,我们再一次发现存在于现代性的根源和基础之中的戏剧性对立。有没有什么东西已改变了?国内战争再一次全面爆发,生产力和支配关系的综合又一次似乎变得不可靠、不可能。民众的欲望及民众对一切支配形式的反抗驱动它再一次摆脱支持着主权力量的合法化过程。当然,没有人幻想这将把人们带回到激励起第一次人文主义革命的旧的欲望世界。新的领域已被新的主体所占据,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已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模样。然而,仍有一些东西被保存了下来。当我们看到那些从源头起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斗争再度出现时,我们有一种先验的感觉。现代性之后,革命的经验将重生,但它将重生于现代性极其矛盾地构建起的新条件中。马基雅维利向根源的回归似乎已与尼采的英雄式永恒回归融为一体。一切都已不同,可一切又似乎并未改变。这就是人类新力量的来临吗?"这就是灵魂的秘密:英雄抛弃了灵魂后,在梦里——超级英雄走近它。"①

人文主义:在人之死之后

米歇尔·福柯在他关于性史的最终著作中再度复活了革命的冲动,也正是同样的冲动激励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自我的道德呵护再度涌现,成为自我创造的生成力量。这怎么可能?要知道,这位著者耗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向我们证明人已死。要知道,这位思想家毕生都高举着反人文主义的大旗。可最终,他居然会去捍卫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主旨?我们不想说福柯自我矛盾,或者说他改变了早年的立场。他总是在坚持不懈地保持着他的话语的连续性。在他最后的著作中,福柯向我

① 参阅 Friedrich Nietzsche 的 *Thus Spake Zarathustra*(New York:Modern Library,1967)。

们提出了一个既矛盾，又迫切的问题：在人之死之后，人文主义会是何等模样？或者说，何谓反人文（或后人文）人文主义？

然而，这个问题仅仅似乎是个矛盾，而矛盾的根源至少部分产生自两种区别明显的人文主义的术语混乱。在20世纪60年代，反人文主义对福柯和阿尔杜塞是一项如此之重要的工程。不过，这项工程可同斯宾诺莎在300年前打的一场战役联系起来。斯宾诺莎谴责任何把人性理解为主权中的主权的思想。换句话说，他拒绝接受任何赋予人类本质以不同于整体自然法则的特殊性的法则。在我们当代，多娜·哈拉维把斯宾诺莎的工程继续下去，坚持要打破我们在人、动物、机器间树立起的藩篱。如果仍要视人为孤立于自然之外，那么人就不能存在。这种认识恰是人之死。

然而，这种反人文主义根本不必同我们在前面叙述过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革命精神相冲突。实际上，这种反人文主义恰恰是在紧紧追随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世俗化工程。或更准确地说，它在紧紧追随着内在性层面的发现。宗教思想赋予上帝凌越于自然之上的力量，而现代“世俗”思想则把这种力量赋予了人，二者间有着严谨的连续性。就如上帝在他之前，这样的人孤立于自然之外，凌越于自然之上，他在内在性哲学中没有位置。同样，和上帝一样，人的这一超验形象迅速引向社会等级和支配。反人文主义被视为对一切超验的拒绝，可它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是对激励起现代传统中的革命洪流的创造性生命力的拒绝。与之相反，对超验的拒绝恰是思考内在力量的可能性条件。

在福柯最后的著作中，人文主义又一次出现，而在此20年前，福柯已在他的著作中公开宣称：人已死。可前者不应被视为对后者的矛盾，或背离。一旦我们认识了我们的后现代肉体和心灵，我们就需要探索那激励着一切自然，当然也在激励着我们的创造力，就需要把我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这就是人之死之后的人文主义，也就是福柯所说的，在连绵不断的构建工程中创造，再创造我们自己，我们的世界。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外国人，别把我们自个儿留在法兰西。

——巴黎街头标语，1995

我们还以为我们在为祖国而献身。可没多久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所服务的不过是银行的金库。

——阿纳托尔·法朗士

随着欧洲现代性一日日成形，各种权力机器也被制造出来，以应对现代性的危机。这些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寻找着可以解决——至少是可以控制——危机的路径。在上一部分中，我们集中追溯了对带来现代主权国家的发展的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除此之外，还有第二套方案，该套方案围绕民族概念而展开。这一方案在第一套方案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套更完善的机制，以确立秩序和控制。

国家的诞生

在欧洲，民族概念是由绝对制父权国家发展而来的。父权国家被界定为君主的财产。在横贯欧洲的许多国家里，绝对制父权国家曾以多种

多样，同时又彼此类似的形式存在，成为适应统治封建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要求的政治形式。[①] 封建财产必须被授权委托，根据社会权力分配的等级分配财产使用权。封建财产是君主之体的一部分。同样，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形而上学领域，也会发现具有主权地位的君主之体是上帝之体的一部分。[②]

在16世纪，就在宗教改革运动正如火如荼，在现代性和各方力量发生激烈冲撞之际，父权君主制仍被呈现为和平和社会生活的保障。它仍被赋予了控制社会发展的权力，而其权限又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把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纳入自身的统治机器之中。即使宗教也必须屈服于地域主权，甚至宗教都成了主权的财产。17世纪，同现代性中的革命力量相抗争的绝对主义反动力量为君主父权国家大唱赞歌，把它作为一件武器来挥舞，以达到自身的目的。然而，在那时，对父权国家的赞颂只会是意义含混，甚至自相矛盾的，因为其权力的封建基础已经崩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把一切权力结构都投入到新条件之中。[③] 可在三大资产阶级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发生之前，还不可能出现任何其他政治形式能成功地对抗这种模式。在这一时期，专制的父权统治模式能存续下来，完全是因为借助了各种政治力量的一个特定妥协。由于新生产力的出现，这种统治模式正在从内部腐烂。可不管怎样，那种

---

① 读者如果想得到对遍布于欧洲的一般形式及其各种变体的广泛分析，可以参阅 Perry Anderson 的专著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New Left Books，1974）。

② 参阅 Ernst Kantorowicz 的专著 *The King's Two Bodies：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以及他的文章"Christus-Fiscus"，该文收录于 *Synopsis：Festgabe für Alfred Weber*（Heidelberg：Verlag Lambert Schneider，1948）。读者也可参阅 Marc Leopold Bloch 的专著 *The Royal Touch：Sacred Monarchy and Scrofula in England and France*，trans. J. E. Anderso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2）。

③ Franz Borkenau 在他的分析中将欧洲经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同现代欧洲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请参阅其专著 *Der Ubergang vom feudalen zum burgerlichen Weltbild：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Phllosophie der Manufakturperiode*（Paris：Félix Alcan，1934）。Alessandro Pandolfti 在这个问题领域对哲学文献有卓越的讨论，请参阅其专著 *Genéalogie er dialectique de la raison mercantiliste*（Paris：L'Harmattan，1996）。

统治模式在当时的确存续了下来。更重要的是,它得到了改造,而促使改造发生的就是一些基本特征的发展,那些基本特征被遗传下来,直至后世。

专制式的、父权—君权式的模式的转变发生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原先地域性父权—君权政体的神学基础为新的基础所取代,不过后者在本质上仍是超验的。① 民族的精神认同不再是君主的神圣之体,领土和民众取而代之,成为理想的抽象。更确切地说,有形的领土和民众成为民族的超验本质的延伸。这样,现代国家概念继承了君主制国家的父权—君权之体,只是把它套入新的外套之中。构筑起这一新的权力总体性的有两方面势力: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另一方面则是旧有的绝对主义行政网络。国家认同使二者关系中的紧张得到缓和、稳定:这是一种文化的融合的认同感,其基础是血缘关系的延续性、领土的空间连贯性和语言的共有性。

很显然,尽管这一过程保住了主权关系的本质,但其中许多成分已发生了变化。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随着父权—君权统一体转变成为民族统一体,封建臣民式的封建秩序也让位于公民秩序。人民的作用在从被动转向主动,而他们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正是读取他们作用转变的指数。民族总是被表现为主动力量,是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生成形式。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其他一些学者所指出,民族常常被体验为(或至少,它的功用使人感到它仿佛是)一种集体性想象,是全体公民主动创造的产物。② 在这里,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父权—君权制国家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似之处与具体区别。后者无论在领土上还是在民众上都忠实再现了前者的总体性同一感,但民族和民族国家提出全新的方案,以解决现代主权的不稳定。这些概念以最严格的方式使主

① 参阅 Pierangelo Schiera 的专著 *Dall' arte de governo alle scienze dello stato*(Milan,1968)。

② 参阅 Benedict Anderson 的专著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Verso,1983)。

权物化；它们把主权关系变为一件可触及之物，从而涤净任何社会对抗的残余。民族成了一条意识形态捷径，由此可把主权和现代性概念从对抗和危机中解脱出来。民族主权悬置起了现代性的冲突根源（尽管这些根源并未被消除），同时也关闭了现代性之内的一切另类路径，终止了一切拒绝把权力呈献给国家权威的努力。①

现代主权概念到民族主权概念的转变也要求有一些物质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它要求在资本积累过程和权力结构间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很好地显示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同现代主权观念的完善是相对应的。在理想化的民族概念之幕后是业已支配了财富积累过程的阶级力量。故而，"民族"不仅构成了卢梭所说的"总意志"的实体，同时也产生出所谓"需求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欧洲长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其资产阶级性质，也或多或少保持了自由性。

在19世纪和20世纪，民族概念被放到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中，并导致了欧洲内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运动。但仍然，这一概念被表现为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概念，它宣告要聚合各种超越阶级的需求，以寻得政治统一，从而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换而言之，民族被视为是可承负起现代性和发展的惟一积极载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罗莎·卢森堡在第三国际的内部争论中猛烈地抨击了民族主义（然而她的抨击毫无见效）。卢森堡反对把波兰的"民族自决"视为革命平台中的一个要件，但她对民族主义的抨击过于空泛。② 她对民族的批判决不仅限于现

① 参阅 Étienne Balibar 的文章"The Nation Form: History and Ideology"，该文收录于 Étienne Balibar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合编的论文集 *Race, Nation, Class*（London: Verso, 1991）。

② Luxemburg 的相关文章收入 Rosa Luxemburg 的文集 *The National Question*，Horace Davis 编（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关于对 Luxemburg 立场的详细总结，请参阅 Joan Cock 的文章"From Politics to Paralysis: Critical Intellectuals Answer the National Question"，该文收录于 Political Theory, 24, no. 3（August 1996）。列宁对 Luxemburg 的立场持强烈批判态度，主要因为她没能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先进"性质（哪怕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因此，列宁肯定了民族自决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实际上是向所有人妥协的权利。

代化本身，毫无疑问她已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所涉及的含混性；她所主要关心的也不只是民族主义在欧洲工人阶级内部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分裂，当然她个人从中欧到东欧游牧般的经历使她对此极端敏感。卢森堡最有力的论点是：民族意味着独裁，因此，它同任何建立民主组织的努力水火不容。卢森堡意识到，如果凭借更新地域主权，并通过社会动员以完成现代化，民族主权和民族神话将夺取民主组织的领地。

民族的构造更新了主权概念，并给主权以新的界定。很快，这一构造过程在每一个历史背景中都演化成一场意识形态噩梦。现代性的危机（也就是一批具有新生产力量的自由主体和企图剥削这些主体的规训力量间的矛盾共存）并未被民族概念抚平，更未被解决。民族只是掩盖危机的意识形态面具，它只能转移危机，延缓危机的力量。

民族和现代性的危机

在领导发展出民族主权概念的欧洲思想家中，让·布丹名列首位。他的巨著《国家论六卷集》于 1576 年问世，当时的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的危机最深重的时期。书中，布丹探讨了当时正在法国和欧洲各地进行着的市民和宗教战争，以它们为自己研究的基本问题。他面对着政治危机、冲突和战争，可所有这些并未完全地推出某种田园诗式的选择，哪怕只是理论上的，或纯空想的。正因如此，布丹的著作不仅仅为现代主权概念的萌芽作出贡献，同时也有效地预见了日后主权以民族形式的发展。正由于他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立场，他成功地预见了现代性自身对主权的批判。布丹说，无论是君王与民众的统一，或是公众与私有的统一，都无法产生出主权。同样，只要人们还坚持契约法权观或自然法权观的任何一种，主权的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实际上，政治力量也好，主权的界定也罢，它们皆在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正是这一胜利使一方拥有主权，而另一方则沦为臣民。武力和暴力创造了主权，正是权力的物理

决定性带来权力的完满性。这意味着权力的完整和统一，因为“只有依赖听命于一个惟一的统治者的统一，才能使共和国的全体成员结为同盟，而其他所有事情的效力也才肯依赖于这种统一。一个拥有主权的君王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正是他的力量赋予共和国的全体成员以特征”①。

在放弃了自然法权观的结构框架，以及这种结构框架必然会用到的超验主义观察视角后，布丹为人们展示出一个新的主权形象，或者说一个新的国家形象，这个国家现实地、历史地创设自己的起源，构建自己的结构。现代国家正是从这种转变之中崛起，也只有在这种转变之中它才能继续发展。这是一个理论耦合点，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主权理论同地域主权经验结为一体，并完善了后者。布丹拾起罗马法典，汲取其表述权力根源、命令财产形式的能力，从而使自己的主张成为一个联合政治体的理论，这一理论被表述为一种看上去超越了现代性的危机所造成的困难的行政。它把理论思考的中心由合法性问题转移到国家的生命和主权的统一之上，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当他谈论“主权的政治权力”时，布丹业已预见到民族对主权的决定。他开辟出一条大道，它通往几个世纪之后。②

继布丹之后，欧洲在 17 和 18 世纪同时发展出两派思想，这两派思想也赋予主权问题核心位置，同样也有效地预见了日后民族主权概念的出现：这两派思想就是国家主权的自然法权传统和现实主义（或历史主义）传统。③ 这两个学派都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方法，抓住了物质冲突，并以这种方法去调和超验的主权观；二者也都把国家主权的构造同共同体

---

① 参阅 Jean Bodin 的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② Julian H. Franklin 对 Bodin 的著述作过十分精彩的阐释，将其牢固地建立在 16 世纪欧洲的力学框架中。参阅其专著 *Jean Bodin and the Rise of Absolutist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如果读者要得到一种更为宽泛的观点，以追踪欧洲政治思想的悠久历史，可参阅 Gérard Mairet 的专著 Le principe de souveraineté（Paris：Gallimard，1997）。

③ 参阅 Friedrich Meinecke 的专著 *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Munich：Oldenbourg，1924）。

的政治—社会形成结合起来。同布丹一样,这两派思想也不断面临主权的概念危机,这种危机不断被现代性中所蕴含的冲突力量,以及国家的司法、行政构造活动释放出来。

在自然法权学派中,从格劳修斯到阿尔特胡修斯(Althusius),从托马修斯(Thomasius)到普芬道夫(Puffendorf),主权的超验形象被拉回凡间,植根于制度和行政程序的现实中。一个多重契约系统被发动起来,该系统的设计使它可以干预行政权力结构上的每一个突点,由此主权得到分配。这一过程的目标并非抵达国家之最高点,或获取主权之名义。相反,合法性问题被人的行政机器的角度加以解决,通过各种权力运用的耦合而发挥功能。主权和服从之圈开始闭合,自我复制,在社会现实中延伸。人们越来越不从现代性危机的冲突这一角度去研究主权,而视其为一个行政程序,它仅仅表达了冲突,而其目标则是在权力的辩证运动中达成统一。因而,自然法权学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出一种思想,主张通过实在的行政形式来分配和表述超验主权。①

在自然法权学派中,综合还只是隐约可见,可一旦被放到历史主义的背景中,综合就一览无遗了。一个论点是:把主权理论同国家理论糅合为一体,并把它们都放到共同的历史基础之上。当然,这个论点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才被一些反革命学派正式提出,把它同启蒙主义时期的历史主义捆在一起并不很精准。然而,早期的思想中已留下后期思想发育的种子。自然法权学派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出以实在的行政形式表述超验主权的思想,而启蒙时代的历史主义思想家们则试图构想出历史过程的主体性,由此为主权的归属和运用寻得坚实基础。② 举例而言,在

---

① 参阅 Otto von Gierke 的专著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 Norton, 1939)。

② 参阅 Friedrich Meinecke 的专著 *Historicism: The Rise of New Historical Outlook*(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

维柯的著作中，决定主权司法概念的所有因素都建立于历史发展力量的基础之上。他的著作就如一颗流星划过启蒙时代浑浊的天际，引起人们的惊恐与不安。在他的著作中，超验的主权力量被喻示为神圣进程的指示，它同时具有人性和神性。历史中主权的构造具有了强大力量，历史迫使一切意识形态构筑都必须面对现实。在历史的领域，现代性的源生危机从未终止，也没有必要终止，因为危机创生出新的力量，推动历史和政治不断发展。不过，这一切仍处于超验主权的掌握之中。多么天才的颠倒！可同时，它又是多么完整的神话！构成危机的成分，以及不可被解决、永远不中断的危机本身，现在都被理解为进步的积极因素。实际上，在维柯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见日后黑格尔为“效率”所做的辩护的雏形，它使现存的世界安排成为历史的目的。①

维柯还只是在暗示，可在后期的德国启蒙主义者那里，暗示已演变成公开、激进的宣告。首先在汉诺威学派，然后在赫尔德那里，现代主权理论仅只面向分析那些被认为构成社会和文化延续性的东西：领土、人口、民族实在的、历史的延续性。维柯认为理想的历史存在于所有国家的历史之中，这一论点到了赫尔德手中变得更为激进，演变成每个人的完善从一定角度上说，也是国家的完善。② 同一性不再被构想为社会和历史差别的消融，而是一种原始统一的产物。国家是一个完整的主权力量，它先于历史发展。更确切地说，一切历史发展在最初即已被预构好

---

① 要认识 Vico 的著述中 Hegel 的唯心主义的萌芽，读者可以参阅 Benedetto Croce 的 *The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New York：Russell and Russell，1964），以及 Hayden White 的文章“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Croce's Criticism of Vico”，该文收录在 Giorgio Tagliacozzo 主编的论文集 *Giambattista Vico：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9）中。在那篇文章中，White 强调 Croce 如何以唯心主义的语言来翻译 Vico 的著述，从而把 Vico 的历史哲学变成了精神哲学。

② 参阅 Giambattista Vico 的“De Universi Juris principio et fine uno”，收录于 *Opere giuridiche*（Florence：Sansoni，1974）。也可参阅 Johann Gottfried Manuel 的专著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8）。

了形式。换句话说,国家宣告它先于主权而存在,惟此才能维系主权概念。[①] 国家最终成为一切人类行动和社会生活本身的可能条件。

国家的人民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之间,完整的现代国家主权概念终于出现在欧洲。在概念的最终成形之后是一次精神创伤——法国大革命——和创伤的愈合——反革命势力对政权的篡取,和对国家概念的颂扬。国家概念经过迅速的重构,变成一件政治利器,而造成这种重构的基本因素我们可在伊曼纽尔-约瑟夫·西哀士的著述中略见端倪。在他那既奇妙,又充满诽谤的长篇政论《何谓社会第三等级?》中,他把国家概念同社会第三等级,也就是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西哀士试图把主权概念引回到它的人文主义源头,重新发掘它的革命可能。对我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西哀士对革命活动的积极投入使他可以把国家概念解释为一个构建性政治概念,一种生成性机制。然而渐渐,在西哀士以后的著作中,以及他的追随者的著作中,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朗,尽管国家诞生于政治,但它最终只是一幢精神建筑。因此,国家概念也从革命中被剥离出来,被全部托付给了热月党人。国家明明白白成了资产阶级以霸权手段解决主权问题的概括。[②]

在那些时候,国家概念已成为一种为大众熟知的革命理论(法国大革命时期,它的确如此),人们以为国家已挣脱了现代主权概念和它的那一套统治压制工具,服务于民主的共同观念。国家概念和人民概念的联结是一个强有力的革新,它构成雅各宾派及其他革命派别的理性的核心。然而,这种国家的、大众的主权观所表现出的革命与解放也只不过

---

① 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情景中,Emmanuel-Joseph Sieyès宣称民族具有绝对的优先权。他说:"民族先于一切,它是一切的根源。"

② 关于Sieyès的著述和法国革命的发展,参阅Antonio Negri的专著 *Il potere costituente: saggio sulle alternative del moderno* (Milan: Sugarco, 1992)。

是把楔子钉得更深一些，它进一步扩大了现代主权观从一开始就携带的统治和压制。当以主权力量解决现代性危机已显得不可靠时，国家就被拉进来，作为支持；当国家也不可靠时，人民又被拉进来。换言之，正如国家概念宣告它先于主权而存在，从而补充完整了主权概念一样，人民概念也通过另一个虚假的逻辑回溯补充完整了国家概念。每一步逻辑回溯都加固了主权力量，因为它使这种力量的根基神秘化，也就是说依靠概念的自然性。国家的同一性，甚至人民的同一性都必须表现为自然的、源生的。

相反，我们必须消除这些概念的自然色彩，我们不仅要问何谓国家，它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要问何谓人民，它又是怎样形成的。尽管"人民"被推出为国家的源生基础，现代人民概念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一个产物，也只有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中才能存续下去。当代许多对人民所做的分析都错了，而错误的原因正是分析者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概念的自然性和人民的同一性。我们应注意，人民的概念和民众的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① 早在17世纪，霍布斯即已很注重这个区别和这个区别对构造主权秩序的重要性："如果人们不对人民和民众做足够明晰的区分，这对文官政府，尤其是君主制文官政府将是一个巨大的阻碍。人民是一体的，只有一个意志，我们也只能把一种行动归于它。可民众却丝毫没有这些特点。人民统治着所有的政府，即使在君主制国家中，发号施令的也是人民。因为人民通过一个人来生成自己的意志……君主就是人民。"②民众则是杂多的，是个性构成的层面，是一个开放的关系群组，它自身既缺乏同质性，也不具备认同感；它同外界的关系总是不明晰的、兼容性的。相反，人民在内部总是体现出同质性和认同感，对外界

① 关于大众和人民之间的区别，Paolo Virno 曾作过精彩的分析。请参阅他的文章"Virtuosity and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Exodus"，该文收录在 Paolo Virno 和 Michael Hardt 合编的论文集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② 参阅 Thomas Hobbes 的专著 *De Cive*(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Crofts, 1949)。

它总是显示出自己的区别，并排斥外物。民众是一个未定的，尚在生成之中的关系，而人民则是业已形成的综合体，为主权做好了准备。人民提供着单一的意志和行动，这种意志和行动独立于民众所具有的多种意志和行动，且常常与后者发生冲突。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把民众变为人民。

同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概念相关，两种基本行动为现代人民概念的形成做出贡献。二者中更重要一些的是殖民种族主义机制，这一机制在一场辩证之戏剧中，以原住民他者为对立面，构造起了欧洲的人民同一性。国家、人民和种族，这三个概念从来就比邻而居。① 绝对的种族区别的建立是同质性国家认同感的基础之精髓。今天，移民的压力和文化多元主义正在欧洲制造出冲突。尽管有些人固执地怀念旧时光，可许多杰出的研究已显示欧洲社会和人民从来就不那么纯正，那么同一。② 人民的同一性是建立在一个想象的层面之上，该层面隐藏或/也消除差异，而它又同种族压迫、社会清洗的现实层面相呼应。

构造人民的第二种行为是让一个拥有霸权的集体、种族，或阶级代表全部人口，以此遮掩内部的分歧，而这第二种行为亦得到了第一种行为的帮助。代表群体是有效的国家概念之后的活跃动因。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从热月到拿破仑时期之间，国家概念展露出它的本质内容，它就如一剂解毒药，中和了革命的概念和暴力。即便在西哀士的早期著作中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出国家如何被用来缓和危机，而主权又是如何通过资产阶级的代表被瓜分。西哀士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基本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同时接受不同的利益，秩序就不可能建立起来。社会的秩序性必

① 参阅 Étienne Balibar 的文章"Racism and Nationalism"，该文收录于 Étienne Balibar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合编的论文集 *Race, Nation, Class*（London: Verso, 1991）。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回到殖民主义背景中的民族这一问题上。

② 举例而言，读者可参阅 Robert Young 的专著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London: Routledge, 1995）。

然设定目标的统一性和手段的协调性。[①] 在法国革命的早期岁月里，国家概念成为大众霸权建立过程中提出的第一项假设，和一个社会阶级所做的第一项有意识的声明。同时，它也是已彻底完成的世界改造所做的最后公告。当国家概念把自己展现为革命之时，它的反动性也达到了顶点。[②] 然而，革命尚未结束，历史也未终结。从革命性活动到构建起国家和人民这样的精神建筑，这一发展历程是不可避免的，也内在于概念自身之中。[③]

国家主权和大众主权成了精神建筑，也就是同一性的产物，当埃德蒙德·伯克对西哀士提出反对时，他同西哀士的意见分歧却远不如当时狂暴的政治气候所要求的那样深刻。即使对伯克，国家主权事实上也是同一性的精神建筑的产物。如果去翻一翻那些在欧洲大陆上推行反革命工程的人的著述，事实就更清楚了。精神建筑的种种欧陆版本复苏了国家概念的历史的、唯意志论的传统，又在历史发展概念中添入国家主权中的超验合成。这种合成总是在国家和人民的同一性中早已完成了。举例而言，费希特用多少有些神秘的语言宣称祖国和人民是人间永恒的代表和度量，人间之物亦可不朽。[④] 浪漫主义对革命的反对实际上较启蒙革命更现实一些。它聚拢起、固定住已完成的东西，在霸权的永恒之光中为它们大唱颂歌。社会第三等级就是权力；国家是它的总体化代表；人民是它牢固的、自然的基础；国家主权是历史的顶点。因而，资产

---

① 参阅 Sieyès 的 *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

② 参阅 Roberto Zapperi's 的导言，同上。

③ 一百多年后，Antonio Gramsci 提出所谓的"民族的—普及的"概念，这被认为是恢复服务于无产阶级争取霸权的阶级行动的一部分。对 Gramsci 而言，"民族的—普及的"是一个基础结构，在此之上知识分子可以同人民联合起来。因此，它是建立起一种受大众欢迎的霸权的有力源泉。参阅 Antonio Gramsci 的 *Quaderni del carcere*（Turin：Einaudi，1977）。Alberto Asor Rosa 对 Gramsci 的观点作过精彩的批判，参阅其专著 *Scrittori e popolo*（Rome：Savelli，1976）。

④ 参阅 Johann Gottlieb Fichte 的专著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Westport Conn：Greenwood Press，1979）。

阶级自己的革命历史超越了一切异于资产阶级霸权的历史选择。①

这一资产阶级国家主权概念的公式远远超出了先前的一切现代主权公式。它加固了现代主权的一个特定的、霸权的现象——资产阶级胜利的形象,然后把这一形象历史化、普遍化。国家特性成了潜在的共性。长期发展中的一切线索现在都被编织到一起。在国家和人民的同一性中,也就是在它们的精神实质中,有一片饱含文化意义的领域,一个共同的历史,以及一个语言共同体。但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一个阶级的胜利的巩固,有一个稳定的市场,有经济扩张的潜能,有投放资本、文明教化的新空间。简而言之,国家同一性的建立保障了合法性不断得到加强,也保障了不可亵渎、不可压抑的统一的权力权利。在主权概念发展过程中,这是决定性的一个转变。凭借着同国家概念和同人民概念的结合,现代主权概念转变了自己的中心,它从冲突和危机的调和一跃变为国家—主体,和想象中的共同体的共同经验。

从属民族主义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关注欧洲逐渐取得世界的支配地位的过程,国家概念在欧洲的发展历程。然而,在欧洲之外,国家概念却常常起着很不同于欧洲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人们甚至可以说,当国家概念体现在从属集团而非支配集团中时,它的作用就完全颠倒了过来。如果用最大胆的语言,我们可以说,在支配者手中,国家概念总是促成静止和复

① 我们应当注意到,对 Hegel 的种种带自由思想的阐释,从 Rudolf Haym 的到 Franz Rosenzweig,仅仅将关注的焦点放到其有关民族的方方面面上。在恢复 Hegel 的政治思想方面,它们成功做到的仅此而已。参阅 Rudolf Haym 的专著 *Hegel und sein zeit*(Berlin:1857),Franz Rosenzweig 的专著 *Hegel und der staat*(Munich,1920),以及 Eric Weil 的专著 *Hegel et l'Etat*(Paris:Vrin,1950)。在 Hegel 的思想中,国家同民族性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Rosenzweig 对这一悲剧的理解最为透彻。参阅 Franz Rosenzweig 的专著 *The Star of Redemption*(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1),以及 Stephane Moses 就此所作的精彩阐释 *Système et révélation:la philosophie de Franz Rosenzweig*(Paris:Seuil,1982)。

辟；可在被支配者手中，国家概念就成了变革和革命的武器。

从属民族主义的进步性质可由它的两项基本功能界定，而它两项功能的每一种都具有高度的含混性。最为重要的是，当国家作为一道反抗更强大的国家的支配，抵御外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力量入侵的防线时，它就表现出进步性。从属国家的自决权实际上就是中止支配力量行使统治的权力。[①] 因此，反殖民主义斗争利用国家概念来打败、驱逐占领主权；类似地，反帝国主义政策也竖立起国家壁垒，以阻挡外国资本无所不及的影响。国家概念还被用作意识形态武器，以抵御那些诋毁被支配人民和他们的文化的支配性话语。国家的要求增强了人民的自尊，也赋予独立、平等的要求以合法地位。在上述所有例子中，国家都具有先进性，但这种先进性严格限于这个国家是抵御更强大的外部力量的防线。这种壁垒在完成其阻遏外部支配的功能时，表现出先进性；可对于受到它保护的内部，它同样可能发挥着相反的功能。保护内部不受外部支配的结构本身也是一种支配性力量，对于它的内部，这种力量同样会进行压制，以国家认同、统一和安全之名义压抑分歧和反对，很难把保护和压制截然分开。这种"国家保护"战略是一柄双刃剑。但有时，尽管它具有破坏性，它仍是必要的。

国家表现出先进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它推出潜在共同体的共有性。在从属国家中，国家"现代化"的部分后果是众多人口的统一及宗教、民族、文化、语言障碍的突破。诸如印度尼西亚、巴西这样的国家的统一都是一个仍在继续之中的进程，其中有难以计数的障碍要突破。在许多方面，欧洲的殖民力量为统一做好了准备。或许，的确如安德森所言，国家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但同时我们理应认识到，这种说法被颠倒了过来，从而使国家成了假想共同体的惟一途径，任何关于共同

① "因此，[社会主义者]必须毫不动摇地要求压迫国家(尤其是那些所谓'大国')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从政治意义上承认和捍卫被压迫国家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分离的权力。"参阅 Lenin 的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体的假想都被译码成国家。就如处于支配性国家的背景中一样,民众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遭到人民的同一性和同质性的否认。同前面一样,从属国家的统一力量仍是一柄双刃剑,既有进步性,又有反动性。

从属民族主义的前进和后退的两个方面的含混性在美国的黑人民族主义传统中都得到了体现。尽管这种民族主义已被剥夺了任何领土,但它同样展示出两项基本的进步功能,有时它也努力把自己推上同那些有着明确领土界定的国家相类似的位置。举例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万隆会议的推动下,也随应着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出现,马尔科姆·X试图将非裔美国人斗争的中心由"民权"转向"人权",从而把论坛的诉求对象由美国国会转向联大。① 就如马科斯·加维以后的许多黑人领袖一样,马尔科姆·X清楚地认识到以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身份发言的份量。在这里,国家概念成了一种保护,把自己同霸权性的"外部"力量区分开,同时也代表着统一的共同体的*自治力量*,代表着人民的力量。

比这些理论性和策略性立场更为重要的则是黑人民族主义者的实际行动:从社区操练队、游行到用餐项目、独立的学校、社区经济发展计划和自给自足计划。威尼玛·卢比亚诺(Wahneema Lubiano)如此评论道:"黑人民族主义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在美国黑人的生活中无所不在。"②在种类繁多的活动和不同的生活领域中,黑人民族主义明确提出

---

① 参阅 Malcolm X 的文章"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收录于 *Malcolm X Speaks*(New York: Pathfinder,1989)。关于 Malcolm X 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他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试图建立非一美团结组织的努力的讨论,参阅 William Sales,Jr. 的专著 *From Civil Rights to Black Liberation: Malcolm X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Afro-American Unity*(Boston: South End Press,1994)。

② 参阅 Wahneema Lubiano 的文章"Black Nationalism and Black Common Sense: Policing Ourselves and Others",该文收录入 Wahneema Lubiano 主编的论文集 *The House That Race Built*(New York: Vintage,1997)。读者也可参阅 Wahneema Lubiano 的另一篇文章"Standing in for the State: Black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the Black Subject",该文刊载于 *Alphabet City*,no.3(October 1993)。

自我评估系统，以形成共同体，凸现相对的自决和自我立宪。尽管黑人民族主义中包含许多互不相关的现象，我们仍能从中辨认出从属民族主义的两项基本激进功能：保卫共同体，统一共同体。

在黑人民族主义的例子中，先进的成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笼罩在后退的阴影之下。国家和人民概念中所蕴含的压制性力量为共同体的自我评估提供动力，也摧毁了共同体的多样性。当黑人民族主义提出以非裔美国人的团结和统一为其基础，或者当它把共同体的一部分（比如说，非裔美国男性）定为整体的实际代言人时，从属民族主义的先进性功能就明明白白地暴露出了它的含混性。① 在对外时，这些结构发挥着抵御作用——它们深化权力、自治和共同体的统一；可在对内时，也正是这些结构发挥着压制作用，否定了共同体自身的多样性。

我们应当强调，主要在国家尚未同主权建立起有效联系时，国家概念才表现出具有两面性的先进功能，也就是说当想象中的国家尚不存在时，当国家还仅只是一个梦想时。一旦国家开始成形，成为一个主权体，它的先进性就开始消退。让·热内为黑豹党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革命热情所倾倒，但他也意识到主权国家的建立之日也就是他们的革命品质消失之日。“到了巴勒斯坦人建立起制度的那一天，”他说，“我将不再站在他们一边。等到巴勒斯坦成为同别的国家一样的国家，我将不再留在那里。”②随着民族的解放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主权的所有压制功能都不可避免地全面释放出来。

---

① Cedric Robinson 批判了 W. E. B. Du Bois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利比里亚毫无保留的支持，而所谓“黑人主权”问题正是这一批判的利害之所在。Robinson 认为 Du Bois 毫无保留地支持了现代主权力量。参阅 Robinson 的文章“W. E. B. Du Bois and Black Sovereignty”，该文收录于 Sidney Lemelle 和 Robin Kelley 合编的论文集 *Imaging Home: Culture, Cla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African Diaspora* (London: Verso, 1994)。

② 参阅 Jean Genet 的文章“Interview avec Wischenbart”，该文刊载于 *Oeuvres complètes*, vol. 6 (Paris: Gallimard, 1991)。总地说来，要了解 Genet 同黑豹党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经历，可参阅他的最后一部小说 *Prisoner of Love* (Hanover, N. 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民族国家的极权主义

当民族国家确是作为主权制度而发挥作用，它能否最终消弭现代性的危机？人民的概念和主权的生态政治转移能否成功转变合成的名目和存在领域，由生成力量到定形力量，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而带领人们步出危机？数量极为众多的作者、诗人、政治家（主要出现在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确是如此认为的。19 世纪雅各宾左派变全国性左派，第二和第三共产国际越来越多地采用国家计划，殖民和后殖民世界中解放斗争所采用的民族主义形式，直至今日众多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反抗，以及由此引起的巨变，这一切都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民族国家的确可以提供新的功力，以摆脱现代主权所带来的历史和概念灾难。①

然而，对于国家的功能我们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我们认为在国家和它的人民的统治下，现代性的危机也绝未被闭合。再度拾起 19 至 20 世纪主权概念在欧洲的发展系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的国家形式首先衰落为民族国家的形式，接下去民族国家又堕落为一系列野蛮统治。在 20 世纪开始的岁月里，阶级斗争再次打开了被神秘化了的现代性融合，再一次有力地显示出国家和民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转。这种反转立即把欧洲带入战争之中。然而，这一次战争却套上了民族国家冲突的伪装。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和其他的欧洲法西斯国家站到社会主义苏联的对立面，国家被展示为冲突中阶级主体的神话或

---

① Benediet Anderson 一直认为哲学家们不公正地鄙视国家这一概念，而我们应不偏不倚地看待它。每个人都从属于一个国家，就像每个人都从属于一个年龄、一个种族、一种性别，等等。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危险，就是 Anderson 将国家概念和我们对它的依附自然化了。与之相反，我们必须驱除这一概念的自然色彩，必须认识到它的建构历史和政治效应。

② 关于阶级斗争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请参阅 Ernst Nolte 的专著 *Der Europäische Bürgerkrieg, 1917-1945*（Frankfurt: Propyläen Verlag, 1987）。

替代。如果纳粹德国是把现代主权转化为国家主权，并以资本主义形式进行表述的一个理想形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则代表着另一种理想形式：它把大众利益以及由此而生的残酷逻辑转化为国家的现代化计划。为了自身的利益，它动员起渴求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

在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国家社会主义为何要把现代主权概念神圣化，又是如何把它转化为国家主权。没有什么比从普鲁士君权到希特勒政权的权力交替更清楚地展现出转化过程的连贯性，而这种权力交替正是在资产阶级的资助下完成的。这一转化历程早已为世人熟知，同样为世人熟知的还有权力交替所带来的暴力，德国人民具有的典型服从精神，他们在为国服务时，在军事和民事各方面表面出的英勇。此外为世人熟知的还有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后继后果，在此我们简洁地称之为奥斯维辛（象征犹太人民所经历的浩劫）和布痕瓦尔德（象征德国法西斯对共产党人、同性恋者、吉普赛人的灭绝）。我们还是把这些留给别的学者，留给历史的耻辱吧！

我们所关心的是那一时代欧洲国家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换而言之，当民族主义同社会主义在欧洲携手并进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再访欧洲社会主义史上的几个核心时刻。我们尤其要牢记，在它开端后不久，也就是在 19 世纪中至 19 世纪末之间，社会主义国际必须同强劲的民族主义潮流达成协议，而经过这种对阵，工人运动原有的国际主义热情很快就烟消云散。在德国、在奥地利、在法国，尤其在英国，最强大的工人运动很快就打出了民族利益的牌子，社会民主改良完全建立在这种以国家之名而达成的妥协之上。这是一种阶级利益的妥协，也就是说，它是各国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霸权结构的某几个阶层达成的妥协。在此，我们就不要再提欧洲工人运动的某些部分转而支持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事业的耻辱背叛，也不要再提欧洲各国的改良主义赞同帝国主义把千万大众驱入一战战场这一不可原谅的愚蠢吧。

对自己的立场，社会改良主义确能拿出充分的理论依据。好几位奥

地利的社会改良主义教授炮制出了这一理论，这些人都是穆齐尔笔下的莱斯多夫伯爵的同代人。在田园诗般的如画环境中，在"回归康德"的温软的学术氛围中，那些教授们(其中之一是奥托·包厄[Otto Bauer])坚持必须把民族看成现代化的基础成分。[①] 实际上，他们坚信，在民族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对阵中会冒出一种辩证过程，随着该过程的展开，无产阶级将最终得到利益，越来越多地掌握社会霸权。可这项计划忽视了一个事实：民族国家的概念是不可分的，它的构造方式反对任何无产阶级重取社会空间和社会财富的趋势。如果现代化在根本上同资本主义体系的改良捆绑在一起，敌视一切重启革命进程的努力，那么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些教授为国家大唱颂歌，又不想为此付出代价。更确切地说，他们在颂扬国家时，又把国家概念中的毁灭力量神秘化了。对他们的观点加以考虑后，就会发现社会民主改良主义会支持帝国主义事业、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只是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立场。

布尔什维克主义也进入了民族主义神话之域，尤其是革命前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问题写的小册子促成了此点。[②] 根据斯大林的观点，国家具有直接的革命性，而革命就意味着现代化，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发展阶段。通过斯大林的转译，民族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式的，随之社会主义也变成俄罗斯式的。共产国际变成了代表苏联国家利益的集会。共产主义革命，它曾是困扰着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幽灵，从巴黎公社到1917年的圣彼得堡直至毛泽东领导的长征，它曾聚集起逃亡者、国际主义党人、罢工的工人、世界主义知识分子，可最终它变成了重分地盘的国家主权统治。欧洲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会模仿国家社会主义，这实在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讽刺。这倒不是如某些自由主义者所想的

---

① 在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者的著述中，需要考虑的主要文本是 Otto Bauer 的专著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24)。该书的部分章节的英译收录在 *Austro-Marxism* 中(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② 参阅 Joseph Stalin 的文章"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该文收录入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那样“两个极端终会相遇”，而是因为二者的心脏都是国家主权的抽象机器。

在冷战最严重之时，极权主义这个概念被引入政治科学中，可这个概念也只触及问题的皮毛。即使表述得最连贯时，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也仅被用来谴责破坏民主公共领域、持续雅各宾主义意识形态、实行极端种族民族主义、否定市场力量。然而，这个概念理应对现象作深得多的挖掘，向人们提出更好的解释。实际上，极权主义不仅在于总合社会生活的效应，并使它们服从于全球的规范约束，更在于否定社会生活本身，侵蚀社会生活的基础，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剥夺民众的存在可能。极权之物也正是社会和国家的有机基础和一致源泉。共同体也不再是个体动力的集体创造，而是成了一种原始神话。关于人民的源生品质观设下一种同一性，对人口进行同质化和纯净化，同时也阻碍着民众内部分歧和差异的建设性互助。

西哀士从19世纪的国家和大众主权概念中已看到极权主义的雏形，那些概念都有效地保留了君主制的绝对权力，把这种权力转移到国家主权之上。他的目光投向可称为极权主义民主的未来。[①] 在就法国革命第三年宪法的争论中，他谴责了“以极权代替共和的恶劣计划，它将是对自由的致命打击，不仅将毁灭公共领域，也将毁灭所有领域”[②]。可以说从一开始，国家概念和民族主义实践就踏上了一条道路，这条路的尽头不是共和，而是极权。

---

① 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我们采纳，但并不追随 J. L. Talmon 的政治观点。参阅其专著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London:Secker and Warburg,1952)。

② 该段文字引用于 Roberto Zapperi 为 Sieyès 的 *Qu'est-ce que le Tiers tat* 所写的导言。

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现在，我们要后退一步，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考察主权概念的系谱。现代性危机从一开始就同种族征服和殖民有着密切联系。在自己的内部，民族国家和它的侍从意识形态结构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努力创造出，再生产出纯净的人民；在外部，民族国家则是一部制造他者的机器，它创造出种族差异，划定疆界，以支持主权的现代主体，去除统治的限制。然而，这些疆界和壁垒并非是不可穿透的，它们规范着欧洲同外界的双向流动。东方、非洲、美洲都是构成欧洲同一性和现代主权的反面基础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黑色的他者构成启蒙的欧洲的基础，正如同"黑色大陆"的生产关系构成欧洲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①] 欧洲现代性的内在种族冲突是界定着现代主权的永久性冲突的又一个表征。殖民地辩证地站在欧洲现代性的对立面，既是欧洲必不可少的复制，又是欧洲难以压制的对抗者。殖民主权是试图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又一次不充分的尝试。

---

① "文艺复兴的阴暗面……支撑着古典传统的重生，为殖民扩张辩护。"这段文字出自 Walter Mignolo。参阅其专著 *The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 Literacy, Territoriality, and Coloniz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人类是同一的，也是多样的

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以及随之而至的地球上各个地区、各族人民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总罩在一层乌托邦色彩之中。但那么多鲜血流淌了，那么多生命和文明被毁灭了，现在显得尤为迫切需要谴责西欧（当然也包括后来的美国、苏联和日本）在对外扩张，谋求统治全球的过程中所犯下的野蛮罪行和所造成的恐惧。然而，我们觉得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应忘记同全球化发展进程伴生的乌托邦趋向，尽管这种发展进程不断被现代主权力量所击败。在这里，对差异的热爱，对普遍自由和人类平等的信念，这些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固有的革命思想在全球范围内重现。正是这些乌托邦成分促使我们不是简单地退到特殊主义和孤立主义，以回击帝国主义和种族支配的集权力量。相反，它推动我们实施一个反全球化计划，缔造起一个反帝国。然而，这种乌托邦运动总是具有两面性，这种趋向同主权秩序和支配处在恒常的冲突之中。我们发现，这种乌托邦主义有三个代表性表述，分别存在于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图森·路维杜尔和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中。

在欧洲人登上美洲大陆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拉斯·卡萨斯惊惧地目睹了征服者和殖民者的暴行：他们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奴役和他们的种族屠杀。对黄金和权力的贪婪使西班牙军人、行政人员和殖民者的绝大部分视这个新世界的原住民为他者，不把他们当人看，或至少认为他们天生劣于欧洲人。拉斯·卡萨斯向我们记述了这些新到不久的欧洲人如何对待当地原住民比对待自己的牲口还不如。在这种背景下，尽管拉斯·卡萨斯也是西班牙教士团的一员，但他能同当时的主流思潮保持足够的距离，坚持美洲印第安人也是人，并向西班牙的残暴统治做出控诉，这实在是个奇迹。他的一切抗议皆发自一个简单的原则：人类是同一和平等的。

同时，人们也应认识到，这位善良的恰帕斯主教的人道主义同一个教士的使命感内在地联结在一起。实际上，拉斯·卡萨斯只能把平等理解为相同。只有当美洲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潜在的欧洲人，或者说作为一个潜在的基督徒时，他们才在本质上同欧洲人具有了平等地位。“人的本质是相同的，基督以同一个名字召唤每一个人。”①拉斯·卡萨斯对美洲的看法也无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对他来说，最大的慷慨和爱就是把美洲印第安人纳入到真正的宗教和它的文化控制之下。土著人是尚未开化的潜在欧洲人。在这个意义上，拉斯·卡萨斯的行动已属于改良野蛮人的历程，这个历程直延伸至 20 世纪的许多年。对美洲印第安人而言，正如对 16 世纪西班牙的犹太人而言，远离迫害，通向自由之路必须通过皈依基督教这道关卡。拉斯·卡萨斯离迫害实际上并不那么远。他意识到了人类的同一性，但他却意识不到人类同时具有多样性。

拉斯·卡萨斯之后的两个多世纪，也就是到了 18 世纪末期，欧洲人对美洲人的支配已经由征服、屠杀和掠夺转变为更稳固的殖民结构——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和贸易专营权。这时，在法国殖民地圣·多米尼哥（现在的海地），一位名叫图森·路维杜尔的黑人奴隶领导了一次反抗现代奴隶制，争取独立的斗争，斗争第一次取得了胜利。图森·路维杜尔接受了从巴黎飘荡而来的纯净法国革命言辞。他认为，如果巴黎的革命者反抗旧政权，提出“自由、民主、博爱”为普遍的人权，那么殖民地的黑人、穆拉托人和白人也应在公民权力的巨伞下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从发生在欧洲的封建贵族的失败和对普遍价值的礼赞中，他推导出“种族贵族”也将失败，奴隶制将被废除。现在，在新法兰西共和国中，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平等的兄弟。在写给法国军事和政府领导人的信中，图

① 参阅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的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Stafford Poole 编（De 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4）。亦可参阅 Lewis Hanke 的 *All Mankind Is One：A Study of the Disputation between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nd Juan Gines de Sepulveda in* 1550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Capacity of the American Indians*（De 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4）。

森·路维杜尔分毫不差地紧扣革命言辞，由此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可这样恰好也暴露出那言辞的虚伪。不管是出于天真，还是有意识地以之为政治策略，图森·路维杜尔揭露出那些革命的领导人如何背叛了那些他们表示自己最为珍视的原则。在1797年10月5日的一份报告中，图森·路维杜尔警告法国领导人，任何返回奴隶制的退步，任何原则的妥协都是不可能的，自由的宣告不可逆转。他写过："你们是否认为那些已接受了自由的赐福的人们，会平静地看着自由被夺走？……不，打破我们的锁链的手不会再重新奴役我们。法兰西不会自食自己的原则，它不会收回赐予我们的最大恩惠。"①

巴黎曾如此自信地发出普遍权利的宣言，可当同样的宣告从圣·多米尼哥传来时，它在法国的心脏所引起的只是恐慌。在漂泊过大西洋后，理想的普遍性变得更实在，并被付诸实践。艾密·西塞尔（Aimé Césaire）这样说道，图森·路维杜尔把计划推过了极限，他混淆了"单纯的思想同实际的现实，权利同它的具体实施，理性同真相"②。图森一字一句地全盘接受了《人权宣言》，并坚持要把它付诸实践。图森领导的革命寻求从欧洲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但革命并不谋求重返已失落的非洲世界，或在孤立中重建传统的统治形式；图森目光的方向是前方，投向在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中新近成为可能的新型自由和平等。③

有时候，图森信中的语言表示自由的思想是法国创造的，仿佛他和他的同伴能够获取自由，完全蒙巴黎的思想所赐。这可能仅仅是他的一项策略，是他对法国统治者暗含讽刺的奉承的又一实例。当然，人们不能认为自由纯粹是欧洲思想。自从他们被捕，并被强迫移居南美，圣·多米尼哥的黑奴就一直在反抗奴隶主。他们的自由不是别人赐予的，而

---

① 该段文字引用于C.L.R.James的*The Black Jacobins*(New York:Random House,1963)。

② 参阅Aimé Césaire的专著*Toussaint Louverture: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 problème colonial*(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61)。

③ 参阅Eugene Genovese的专著*From Rebellion to Revolution:Afro-American Slave Revolt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9)。

是通过浴血奋战赢得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它的征服并不是法国产品，圣·多米尼哥的黑奴们也不需要巴黎人教他们为自由而战。图森所接受并有效利用的只是法国革命者的具体言辞，这些言辞使他对自由的追寻有了合法的形式。

到了19世纪，卡尔·马克思和他之前的拉斯·卡萨斯和图森·路维杜尔一样，认识到了日益增进的全球互动和交流中潜在的乌托邦。如同拉斯·卡萨斯一样，马克思也对欧洲人的征服和剥削中的暴行感到震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的背后是广大被征服、被殖民的非欧洲人民的血和汗。"欧洲的工资劳动者们忍受着隐蔽的奴役，而这是以新世界中公开的奴役为基石的。"①同图森·路维杜尔一样，马克思也认识到，人类自由是一项普世工程，它要在实践中实现，没有任何一个种族可以被排除在外。

然而，马克思身上的这种全球乌托邦精神又是含混的，或许含混性在他身上的体现要比他之前的那两位身上的体现更明显。从他在1853年就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而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可清楚看出此点。马克思写这一系列文章的基本目的是解释当时正在英国议会中就东印度公司地位问题进行的争论，马克思把这次争论定位于英国殖民统治史中。当然，马克思很快就注意到英国"文明"传入印度过程中发生的暴行，以及资本和英国政府难填的欲望给印度带来的混乱和苦难。但他立即又警告人们，不要简单地反对英国的暴行，不要盲目支持印度社会保持现状。马克思所理解的，存在于英国入侵之前的印度村落体系绝不值得人们去捍卫。尽管英国人造成的毁灭和灾难"肯定会使目睹者感到恶心"，"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些田园诗般的乡村社会尽管看上去谁也不会伤害，却一直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它们把人的心灵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把人变成迷信的不知反抗的工具，把人变成传

① 参阅 Karl Marx 的 *Capital*(New York:Vintage,1976)。

统下的奴隶，剥夺了人的一切尊严和历史能动性”①。印度王公们的统治结构同样不值得支持，即使他们在反抗英国。“毫不奇怪，那些严辞声讨‘英国王权和贵族的野蛮业绩’的人为了印度的主权和贵族的衰败而伤心落泪。而那些衰败的贵族的大多数甚至没有古老的历史，他们大多是近期才被英国的阴谋推上台的篡权者。”②

殖民地的形势很容易就会落入二者皆恶的选择的窘境：要么屈服于英国资本和英国统治，要么回到印度传统社会结构，屈服于王公的统治；要么接受外国的支配，要么接受本国的支配。对马克思而言，必然有另一条道路可以拒绝两种选择，必然会有另一条反抗和自由之路。在这层意义上，也就是在为新社会创造可能方面，“不管英国曾犯下什么样的罪行，它是历史创造革命的不自知的工具。”③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也能成为一种启蒙力量。同图森一样，马克思也认识到仅仅靠重返封闭的、传统的压迫形式来推翻外国统治是毫无用处的。人们的选择必须是向前看，展望一种同全球交换的巨大网络相联结的新型自由。

然而，马克思可想出的惟一可选择的道路是欧洲已走过的道路。马克思对于印度社会的差异和它所蕴含的不同的潜能毫无认识。故而，他只能把印度的过去看成空洞和静止的。“印度社会没有历史，至少没有已知的历史。我们所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在那里只不过是接二连三的入侵，入侵者们在那个既不反抗，也不改变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起各个帝国。”④说印度没有历史并不意味着在印度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而是说事件的发展完全被外来力量所操控，而印度社会则保持消极，“既不反

---

① 参阅 Karl Marx 的文章“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该文刊载于 *Surveys from Exile*，vol.2 of *Political Writings*(London:Penguin,1973)。

② 参阅 Karl Marx 的文章“The Native States”，该文收录于 *Letters on India*(Lahore:Contemporary India Publication,1937)。

③ 参阅 Karl Marx 的“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④ 参阅 Karl Marx 的文章“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该文刊载于 *Surveys from Exile*，vol.2。

抗,也不改变"。当然,马克思的观点因他对印度的现在和过去知之甚少而受到局限。[①] "然而,信息的匮乏还不是关键。这里,核心问题是马克思想象,欧洲以外的历史只能严格地沿着欧洲走过的道路发展。"英国在欧洲要完成双重任务,他写道,"一个是毁灭性的,而另一个则是再生性的——毁灭亚洲的旧社会,同时为西方社会在亚洲的出现打下物质基础。"[②]印度只有转变成西方社会才能前进,整个世界也只有亦步亦趋地紧随欧洲才能前进。最终,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同拉斯·卡萨斯相去也并不甚远。

殖民地奴隶制的危机

尽管在现代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的历史进程中,乌托邦精神不断浮现,但它始终遭到欧洲支配力量的军事和意识形态镇压,镇压的结果是大屠杀(其规模之大难以想象)和欧洲的种族、政治、经济结构对非欧洲世界的统治。欧洲霸权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本的发展和扩张的驱动,它填充着欧洲对财富难以填平的食欲。然而,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没有歧义的。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口中,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由于所走道路不同,在有的地方它阔步前冲,在有的地方它停滞不前,在有的地方则向后退行。17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美洲历史上的大规模殖民地奴隶生产就是其中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那一段历史并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历史,而是发生在资本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发展之中。

使用奴隶劳力进行大规模种植生产始于 17 世纪中叶的加勒比地区。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从非洲进口奴隶,以填补土著人被欧洲的武

---

① Aijaz Ahmad 指出马克思对印度历史的描述似乎直接取自黑格尔。参阅 Aijaz Ahmad 的专著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 Verso, 1992)。

② 参阅 Marx 的文章"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器和疾病杀害后留下的虚空。到了18世纪末，美洲奴隶产品已占到欧洲总贸易额的三分之一。[①] 欧洲资本主义同美洲的奴隶生产保持着暧昧关系。或许有人会逻辑地推理，既然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物质上都基于自由劳动，或更确切地说基于工人对他或她自己的劳动能力的拥有，资本主义必定会反对奴隶制。从这个角度看，奴隶制是一种类似于封建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它将逐步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在这里，资本主义自由意识形态是一种启蒙力量。

然而，资本同殖民地奴隶制的关系实际上很密切，也很复杂。首先，即使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奴隶制，可现实中资本不仅容纳和增强世界各地现存的奴隶生产体系，更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制造出新的奴隶制体系。[②] 或许，有人会把资本制造的奴隶体系视为资本主义的学徒，是从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到真正的资本主义间的过渡阶段。的确，18世纪加勒比地区种植园的规模和组织的确在某些方面预示了19世纪欧洲式工厂的出现。[③] 然而，美洲的奴隶生产和非洲的奴隶贸易并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它们是一种稳定的支持，是一种超级剥削的基石，资本主义正立于其之上。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殖民地的奴隶生产使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欧洲资本对放弃它也毫无兴趣。

就在欧洲力量在大西洋彼岸立起奴隶经济基础的同一时期，在欧洲（主要在东欧，但也包括南欧部分地区）卷起一股土地经济再封建化之风，出现了一股阻止劳动力的流动，冻结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强势。欧洲被投入第二个农奴制时期。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谴责资产阶级的非理

---

① 参阅 Robin Blackburn 的专著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1776-1848* (London: Verso, 1988)。

② 参阅 Elizabeth Fox Genovese 和 Eugene Genovese 的合著 *Fruits of Merchant Capital: Slavery and Bourgeois Property in 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③ 参阅 Blackburn 的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性,而是要理解奴隶制和农奴制——两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机制——如何能同资本主义生产和平共处。其实,奴隶制也好、农奴制也罢,还有其他一切强制性劳动组织形式,都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内在必要成分。在那一时期,奴隶制和工资劳动相互挽扶,就如一对舞伴,协调精确地迈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舞步。①

当然,一些具有高尚精神和启蒙思想的欧洲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提出废除奴隶制,他们从道德立场出发反对奴隶制。然而,只有当废奴者的观点有益于资本的利益时,它们才具有实际力量。比如说,废除奴隶制可削减采用奴隶制生产的竞争对手的利润。即便如此,它们的力量仍十分有限。实际上,无论是国内的道德呼吁或是国际上利润率的计算都未能打碎奴隶制政权,只有奴隶们自己的反抗和革命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杠杆。资本只有为了应对有组织的工人对抗的威胁时,才会重造生产结构,采用新技术;同样,也只有当组织起来的奴隶对自己的权力构成了实在的威胁,并已使生产系统不可再用时,欧洲资本才会放弃奴隶生产。换而言之,奴隶制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被放弃,而是被政治力量所推翻。② 政治运动当然会削减系统的经济效益,但更重要的是,暴动的奴隶已形成了一股实在的反制力量。发生在海地的革命是现代奴隶反抗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19世纪之初,它的幽灵游荡在美洲各地,恰如一个世纪之后,十月革命的幽灵游荡在欧洲各地。我们不应忘记,暴动和反抗本就是美洲奴隶制的一个常在部分,如同现代性经济一样,奴隶制经济也是一种危机中的经济。

说奴隶制和农奴制政权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之中,这引出劳动力和资本间的一种密切关系:劳动主体渴望逃脱被控制的关系,而资

---

① Yann Moulier Boutang在他的著述中细致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工资劳动和奴隶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的著述的核心问题领域之一。参阅他的专著 *De l' esclavage au salariat : économie historique du salariat bridé*(Paris: Presses universitaries de France, 1998)。

② 这也是Robin Blackburn在他的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一书中表达的核心论点之一。

本则试图阻止人口的流动，把人们限制在固定的地域边界内。叶纳·莫利叶·布唐(Yann Moulier Boutang)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逃亡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 一股匿名的、集体性的、持续的和不可抑制的脱逃力量推动劳动力市场走向自由。同样的力量迫使自由主义为自由劳动、私有财产权和边界开放做出辩护。这股力量也迫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建立起模式，以钝化劳动力，对它进行规范。所有这些都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出上千种奴役形式。资本积累的这一不可回避的方面早在自由主义时代的无产化问题出现之前即已存在，它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①

民众克服地域限制的欲望是驱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动力，而资本则必须经常做出努力，压抑民众的这种欲望。

制造异己性

殖民主义作为欧洲现代性的危机的暂时解决方案，其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也体现在同一性和文化上。殖民主义制造出各种异己形象，并在一个复杂、辩证的结构中操控它们的流动。由非欧洲的他者形成的反面构筑最终构建起并延续了欧洲的同一性。

首先，殖民地同一性通过一种二元论排斥逻辑发生作用。弗兰兹·范农(Franz Fanon)告诉我们："殖民地是一个被一分为二的世界。"②被殖民者不仅在生理上和地域上，也不仅仅在权利和特权上同欧洲人隔离开，这种隔离更发生在思想和价值观上。在世界大都市的想象中，被殖民者被塑造成他者，处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被殖民者被抛出欧洲一切文

① 参阅 Moulier Boutang 的 *De l' esclavage au salariat*。

② 参阅 Franz Fanon 的专著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Grove Press,1963)。

明价值的界定之外。(我们不能同他们讲道理;他们不会自我控制;他们不尊重生命的价值;他们只理解暴力。)种族差异成了一个黑洞,它可以吞下一切邪恶、野蛮、过度纵欲,等等。处在黑暗中的被殖民者因其他者身份而显得幽暗、神秘。殖民地同一性的建立严重依赖于世界都市和殖民地之间严明、稳固的分界。同一性的纯洁性,不管是生理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都至关重要。维护这样一道分界确实引起不少人的焦虑与不安。范农指出:"实际上一切价值,一旦它们被允许同殖民地种族接触,就会染上毒素和病菌。"①保护欧洲空间的纯净性的边界经常遇到围攻,而殖民法律主要就在边界上运行。一方面,它支持着边界的排斥功能;另一方面,它有区别地应用于分居边界两边的主体上。种族隔离其实仅是殖民世界中的隔离的一种,或许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分割殖民地世界的壁垒并不仅仅建立在自然边界上,不过有形的分界永远存在,以帮助使分割自然化。异己性不是既定的,而是被制造出的,这一前提在最近几十年中已成为跨域广阔的一批研究的出发点,其中包括艾德华·萨义德的著作。"我的工作始于这样一种见识:东方不是自然中的一个不变的事实……东方是被制造出的,或按我的话说,是'东方化'的产物。"东方主义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关于一件实物——东方——的精确知识而开展的学术工程。它更是一种话语,在话语自身的展开过程中,它制造出它的对象。这种东方主义工程的两个基本特点是:一、它把东方同质化,整个东方被描绘成哪儿都差不多;二、它把东方原质化,东方和东方特点被描绘成千秋万代,一成不变的同一性。萨义德指出,这种学术工程的产物已不再是本来的东方,而成了被东方化的东方,成了欧洲话语的对象。② 东方,或者至少说我们通过东方主义所了解到的东方,是话语的产物。它在欧洲被制造出来,再被返销回东方。

---

① 参阅 Fanon 的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② 参阅 Edward Said 的专著 *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1978)。

在卷入了异己性的文化生产的各学术门类中，人类学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类，它把原住民他者进口到欧洲，然后再出口出去。[①] 从非欧洲民族同欧洲人的真实差异中，19 世纪的人类学家们构造出一个性质迥异的他者的存在。不同的文化和形态特征被解释为非洲人、阿拉伯、土著人，以及其他种种非欧洲他者的原质。随着殖民扩张达到其巅峰，各方欧洲力量卷入非洲的混战，人类学和对非欧洲民族的研究也不再是一种学术努力，更成了进行公众教育的一个广阔领域。他者被进口到欧洲，出现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和原始民族展览中，因而也日益可为大众想象所接触。无论在学术意义还是在普及意义上，19 世纪人类学都把非欧洲民族和它们的文明展现为欧洲人和欧洲文明尚未开化时的模样。它们成了原始的象征，代表着欧洲在走向文明之途上经过的不同阶段。从而，人类文明进化的历时阶段在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原始种族和文化中被共时地呈现出来。[②] 人类学的文明进化理论，以及它对非欧洲人的展示认证并加固了欧洲人的优越地位，从而使殖民主义整体工程获得合法依据。

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卷入了他者性在学术意义和普及意义上的生产，从而为殖民统治的合法化出了力。比如说，英国管理者到达印度后，发现那里无史可用。他们不得不自己写出“印度历史”，将印度的过去历史化，以触及它，并使它为己所用。然而，就如同一个殖民地国

---

① 在过去几十年里，文化考古学对自身作了激烈的批判，凸现出早期这一学科多么深入地参与到和支持了殖民主义工程。早期这种批判的经典文本来自 Gérard Leclerc 的 *Anthropologie et colonialisme : essai sur l' histoire de l' africanisme* (Paris: Fayard, 1972) 以及 Talal Asad 主编的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London: Ithaca Press, 1973)。在最近出现的众多这一方面的作品中，我们觉得尤其有用的是 Nicholaus Thomas 的专著 *Colonialism's Culture :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在 Valentin Mudimbe 的著述中，这一论点清晰地形成。参阅其专著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家的形成一样,一部英国造的印度史只有通过将欧洲逻辑和模式强加到印度现实之上才可完成。[①] 印度历史成了英国历史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英国学者和行政人员制造出了一部印度历史,又把它出口给印度,这部历史支持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使作为历史的印度的过去不再为印度人可接触。印度和印度人的现实被一种强大的表征所取代,在这种表征中,它们被立为欧洲的他者,文明历程中的原始阶段。

殖民主义中的辩证

在殖民主义表征逻辑之中,构造独立的殖民地他者,分隔同一性与他者性,既是绝对的,彼此间又有着密切联系。实际上,整个过程中包含两个有着辩证联系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差异必须被推到极端。在殖民想象中,被殖民者不仅是被放逐到文明之外的他者,更是被理解为、被制造出的他者。他是绝对的否定,是视界中最遥远的一点。举例而言,18世纪的奴隶主就十分明白这种绝对差异。"黑人的本质和性情不仅不同于欧洲人,简直就是彻底相背。善良和同情在他们胸中燃起不可熄灭的仇恨之火,而鞭打和侮辱却激发出感激、爱意和忠诚。"[②]非欧洲人的行动方式、交谈方式、思考方式无不与欧洲人背道而驰。

可正因为他者的差异是绝对的,在第二阶段它们可被转化为自我的基础。换而言之,被殖民者的邪恶、野蛮和放荡使欧洲人可能具备了善良、文雅、节制的品质。从而,起初显得奇异、异质、遥远之物变得贴近而密切。知晓、目睹、甚至触摸被殖民者都具有了至关重要性,尽管这种接触仅发生于表征层面,而同分别生活于大都市和殖民地的实实在在的人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密切关系并不会模糊两种同一性的分界,只会使这

---

① 参阅 Ranajit Guha 的专著 *An Indian Historiography of India: A Nineteenth-Century Agenda and Its Implications*(Calcutta: Centre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1988)。

② 参阅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Insurrection of Negroes in the Island of St. Domingo*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Crukshank, 1792)。

种分界和被这种分界保护的纯净性更重要。欧洲自我的同一性正是在这一辩证阶段中被制造出来。一旦被殖民者被塑造成绝对的他者，它就能反过来融入更高一层的统一之中，绝对他者反射到自我之中。惟有站到被殖民者的另一面，大都市的居民们才能真正成为自我。从而，起初看来仅是简单排斥的过程变成了辩证的否定之否定。殖民者确实把被殖民者造为否定，可通过一次辩证转化，被殖民者的否定同一性被再次否定，从而肯定了殖民者的自我。现代欧洲思想同现代自我都同保罗·吉罗伊(Paul Gilroy)所说的"种族恐怖和征服关系"①有着必要联系。不仅仅现代欧洲城市，甚至欧洲思想都是建立在欧洲同他者密切而辩证的斗争之上。

我们必须注意，殖民地世界从来就没有服从于这个二分式的辩证结构。举例而言，要分析18世纪海地在革命前的社会，我们不能仅仅考虑白人和黑人，至少我们还要考虑混血人群的立场。后者有时同白人联盟，因为他们拥有自由和财产；有时又与黑人联盟，因为他们的肤色还不够白。即使进行简单的种族划分，这个社会至少也需要三条分析轴，可这样仍不能抓住社会的真实分裂。我们还要认识到当地白人不同阶级间的冲突，也要意识到黑人奴隶的利益同黑人自由民和流放者是截然不同的。简而言之，殖民地的真实社会状况从来就没有整齐划一地分为两股纯净的力量。现实总是产生出四处扩散的多样复杂性。我们的论点并不是说现实呈现出表面的二分结构，而是说殖民主义把这种绝对的二分强加到殖民地之上。殖民主义同质化了真实的社会差异：它制造出一种压倒一切的对立，将差异推到极端，然后再把对立融入欧洲文明的同一性之中。现实并不辩证，辩证的是殖民主义。

很多著述者，如让－保罗·萨特和弗兰兹·范农都认识到了殖民表

① 参阅 Paul Gilroy 的专著 *The Black Atlant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征和殖民地主权在形式上的辩证性，他们的著作对揭示这种辩证性发挥了很大作用。首先，辩证的结构表明斗争中的同一性并非原质。白人和黑人、西方人和东方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这些概念都只是表征。它们只有处在相互关系中时才会发生作用，它们在自然、生理、生理性上并没有必要的基础。殖民主义是一部制造出同一性和他者性的抽象的机器。然而，在殖民地的真实状况中，这些差异和同一发生作用，仿佛它们是绝对的、原质的、天成的。故而，辩证理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去除种族和文化差异的天成色彩。这并不是说，一旦确认了殖民地同一性为人工产物，它们就会烟消云散。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幻影，它们仍在发生作用，仿佛它们是原质的。认识本身还不是政治，它仅仅指明了反殖民地政治是可能的。其次，辩证的阐释表明，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表征建立在激烈斗争的基础之上，这种斗争需要不断被更新。欧洲自我需要暴力，需要面对自己的他者，以感受、维持自己的力量，以不断再塑自我。殖民地普遍存在的战争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人们不想看到的——暴力是殖民主义的必需基础。第三点，把殖民主义定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肯定了，也显示出了形势之中的内在颠覆潜能。范农提及，黑格尔提过主人只能获得空洞的认识形式；而在经历了生与死的斗争之后，奴隶具有潜能，走向全面觉悟。[①] 辩证理应指向运动，然而欧洲同一性的辩证却退入静止。这种辩证的失败显示出：可能存在一种真正的辩证，它将通过再一次否定，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他者性的回飞镖

许多著述者，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60年代间非殖民化斗争轰轰烈烈的时期，提出应以一种真正具有否定性，从而也具有革命性

① 参阅 Franz Fanon 的专著 *Black Skin, White Masks*(New York:Grove Press,1967)。

的辩证来挑战建立起并稳固着欧洲主权同一性的辩证。这些著述者言称，仅仅依靠揭露同一性和差异的人为性质，我们还不能战胜殖民主义制造出的他者性。惟一可选择的策略是将殖民主义逻辑彻底颠而倒之。萨特宣告道："在团结终将到来，将所有受压迫者都带入到同一场斗争中之前，殖民地必须首先经历一个隔离或否定阶段。这种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是走向废除种族差异的惟一道路。"①萨特想象，这种否定辩证会最终驱动历史。

否定辩证通常被构想在文化方面，比如说发现黑人本质，揭示黑人心灵的探索。根据这种逻辑，要对付殖民主义的表征，就必须使用反向的、对称的表征。即使人们认识到被殖民者的黑人特性只是在殖民想象中被制造出来，并被神秘化的东西，可它并未因此就被否定或被驱散，反而其原则性更得到了肯定。根据萨特，像艾密·西塞尔和利奥波德·桑奥尔(Léopold Senghor)这样的革命诗人采用了欧洲辩证遗传下的否定极，把它转化为肯定，强化它，宣称它是一种自我觉悟。从此，他者不再是稳定和平衡力量，他由被驯服者变成了野蛮人，成了真正的他者。萨特用优美的语言写过："这是回飞镖回击的时刻。"②否定能反向毁灭欧洲自我——因为欧洲社会和它的价值观是建立在驯化和否定地兼容被殖民者的基础之上。因此，否定阶段被设定为达到最终目标，实现无种族差异社会，承认所有人的平等、自由和普遍人性的第一步。③

尽管萨特提出的文化政治有着连贯的辩证逻辑，我们觉得他所提出

---

① 参阅 Jean-Paul Sartre 的文章"Black Orpheus"，该文收录于"*What Is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参阅 Jean-Paul Sartre 为 Fanon 的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所作的序言。

③ "实际上，黑人自豪感仿佛是辩证前进中的弱拍：对白人优越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肯定是正命题，而黑人自豪感作为一种反命题出现的时刻也就是否定的时刻。但这种否定的时刻自身还不够，而使用这种否定的黑人对此也十分清楚。他们知道，这种否定是在为某种命题做着准备，或者说为实现无种族人类社会做着准备。因此，黑人自豪感的目标是摧毁自身，它是一种'跨越'，而非'达到'。它是手段，而非目的。"上面这段文字出自 Sartre 的文章"Black Orpheus"。

的策略是虚幻的。殖民主义势力利用手中的辩证力量把殖民地世界的现实神秘化,现在再采用这种力量,以其为反殖民主义工程的一部分,这倒好像辩证本身就是历史运动的形式。然而,现实和历史并不是辩证的,也没有什么唯心主义修辞操练可使它们服从于辩证法。

然而,假如否定策略被赋予了非辩证的形式,出现于政治意义,而非文化意义上,回飞镖的时刻就会以另一种面貌出现。举例而言,范农就拒绝接受黑人文化政治和黑人同一性的觉醒,他提出以有形暴力进行革命反抗。最初造成暴力的是殖民主义: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征服和剥削。接下来,暴力出现于被殖民者对殖民者暴力的回应中。在殖民地社会环境中,这种暴力可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畸变形式。"被殖民者首先会向他自己的同胞展示加注到他身上的侵略性。"①存在于殖民地人口间的暴力有时被认为是古老氏族和宗教抗争的残余,然而实际上,它是殖民主义暴力的病态反映,它最常见的表现是迷信、神话和精神错乱。范农并未建议殖民地人民逃离或回避暴力。殖民主义的运行使暴力永久存在,如果不直接面对暴力,它就会继续以各种毁灭性、病态的形式表现出来。范农医生建议,通向健康的惟一道路是反向暴力。② 不仅如此,这也是通向解放的惟一道路。一个奴隶如果从不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如果他只能被动接受主人的许可,那他永远只能是个奴隶。这也正是马尔科姆·X提出的应对美国白人霸权的暴力的策略——反向力。③

对范农和马尔科姆·X而言,这种反向暴力不会走向辩证综合:今日的斗争不会在明天的合谐的斗争中得到解决。公开的否定仅仅健康地表达了真实存在的对抗,表达了一种直接的力量关系。因为它并不是实现最终综合的途径,这种否定自身还不是政治,它仅仅提出一种同殖民

---

① 参阅 Fanon 的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② 同上。

③ 参阅 Malcolm X 的文章"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收录入 *Malcolm X Speaks*(New York: Pathfinder,1989)。

主义分隔开的立场，为政治开辟出一片领域。真正的政治生成过程将发生在这一片开阔的力量之域中。

民族解放浸毒的礼物

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次等国家民族主义确实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在被支配群体中，国家这一概念既起到防御武器的作用，可用它来保护群体免受外部支配，同时它也是团结、自治、群体权力的标志。在去殖民化时期以及以后，国家概念似乎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必要工具，因此也就成为通向自由和自主的不可规避的道路。在全球各国间实现民主，包括各国在形式上的平等和主权完整，这样的承诺在最初就写入了联合国宪章："本组织和它的成员将遵守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①国家主权意味着免受外部支配的主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因此它标志着殖民主义的彻底失败。

然而，与国家主权的积极作用形影相随的却是国际支配力量的强大结构。当我们从外部来看，从"被解放的"国家所处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民族解放所包含的危险就更明显地显现出来。许多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领袖，从甘地到胡志明到纳尔逊·曼德拉都在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之间划上等号。可实际上，这样的等式最终只是一个把戏。这样一个等式的作用就是可以动员起广泛的力量，并把一场运动加尔文化。然而，运动究竟把人们引向何处？它又服务于什么人的利益？大多数情况下，运动会带来一场被代表的斗争，现代化计划将确立新统治集团的权威，他们被赋予将现代化计划付诸实施的重任。于是，革命被捆住手脚，献给了新的资产阶级。或许有人会说，二月革命应该在十月革命后发生。然而，连日历也都错乱了：十月永远也不会到来，革命者

①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2.1，见 Leland Goodrich 和 Edvard Hambro 的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46)。

陷入"现实"的泥沼,现代化最终也迷失在世界市场的序列中。民族主义者的梦想是自律的、以自身为核心的发展。然而世界市场所施加的控制不正是这一梦想的对立面吗?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确实效果显著,只不过是在相反的方面。被解放的国家又发现自己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被别国操纵、摆布。

即使是解放性的国家主权这一概念本身如果说不是完全自相矛盾的,至少也是含糊不清的。就在这样的民族主义寻求将大众从外国支配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它又在国内建立起同样严厉的支配结构。联合国将世界幻想成一场和谐的音乐会,它的各个成员国都是平等、自主的主体。抱着这种玫瑰色的幻想是无法理解新取得主权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的。在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组织中,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是重要的一份,同时也是被支配的一份。正如帕莎·恰特吉所说,民族解放和民族主权还不仅仅是无力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序列,更为这一序列的组织和功能作出贡献:

>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民族主义都没有向理性和资本相结合的合法性发出挑战,民族主义思想……并不具备意识形态上的手段来发出这样的挑战。怎么才能解决国际资本同人民—国家之间的冲突呢?其方法就是将民族的政治生活吸纳到国家的躯体之中。民族国家对消极革命持保留态度,现在又开始在资本的全球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同时努力将资本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永久悬置。在代表民族的国家的压倒一切的要求下,一切政治都被消耗。①

我们可以如此总结整条逻辑链:人民代表大众,民族代表人民,国家代表民族。每一处连接都试图悬置现代性的冲突,每一次代表过程都意味着向着抽象和控制又迈出一步。从印度到阿尔及利亚,从古巴到越南,国

①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1986)。

家成为民族解放浸毒的礼物。

然而，解释着后殖民时期的民族国家必然受支配的最后一环却是资本的全球秩序。资本的全球序列以自身的秩序支配着形式上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然而这种支配根本不同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际支配电路。殖民主义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现代世界和现代统治形式的终结。当然，现代殖民主义的终结并没有开启一个无条件自由的世界，而是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真正瞥到通向帝国的变迁。

传染

当路易-费迪南·迪杜奇（塞利纳）（Louis-Ferdinand Destouches [Céline]）到达非洲后，他所发现的就是疾病。那次刻骨铭心的旅行发生在《长夜漫漫的旅行》这本书中，书中的叙述者在自己的恐惧引发的谵妄中看见一个被疾病层层浸透的人群："那些地方的当地人痛苦地经受着每一种传染疾病。"或许，我们期待从迪杜奇医生口中能听到的也正是这句话。要知道，他是被国联派到非洲去的，他的工作是卫生专家。当然，塞利纳在工作中也带着普通的殖民意识。

把殖民主义同疾病联系，这会产生出两方面效应。首先，当地土著居民病症缠身这一简单事实就已是殖民主义工程的辩护："这些黑人在害病！你能看到的！他们的机能已彻底败坏！……他们在退化！"疾病是身体和道德败坏的迹象，是缺乏文明的迹象。这样一来，殖民主义的开化工程就为它所带入的卫生所辩护。然而，在另一方面，从欧洲人的角度看，殖民主义的最根本危险就是疾病——或更确切地说，传染。在非洲，路易-费迪南发现了"每一种传染疾病"。生理传染、道德败坏、疯癫：殖民地领土和被殖民人群的黑暗是传染性的，欧洲一直在担着风险。（在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中，库尔茨所认识到的也正是此事。）一旦在纯

洁的、文明的欧洲和败坏的、野蛮的他者间建立起了级差，可能出现的就不仅仅是从疾病到健康的文明开化过程。相反的过程——从健康到疾病的过程——也将无可逃避。传染既是恒久的，也是当前的危险，是文明开化使命的黑暗背面。

有趣的是，在塞利纳的《长夜漫漫的旅行》一书中，疾病所代表的其实并不是死亡，反倒是生命的过度旺盛。书中的叙述者——路易-费迪南——发现不仅非洲的人群，就连非洲的土地都"怪得离奇"。丛林染上的疾病就是生命在任何一处破土而出，一切都在毫无节制地生长。在一位卫生专家看来，这是何等地恐慌！殖民地放脱的疾病就是生命界限的缺失，就是无限的传染。回头看看，欧洲的荒凉倒让人放心。（请记住，在《黑暗之心》一书中，当马洛从比属刚果回到布鲁塞尔，他看到的是满眼死气沉沉的苍白。可同殖民地生命的无节制和过度旺盛相比，欧洲的荒凉环境倒更令人舒坦。）实际上，如果我们站在那位卫生专家的立场之上，我们就可更好地理解殖民者意识中的焦虑不安。欧洲的征服和殖民释放出一种恐慌，这是一种对无限制的接触、流动和交换的恐慌。或更确切地说，这是对传染、通婚和无节制的生命的恐慌。卫生学要求有保护性的壁垒。有利的交换和传染的危险是一对矛盾，欧洲一直在受着这对矛盾的侵扰。在大都市和殖民地之间，也在各个殖民领土之间，交流沟通和卫生免疫壁垒在复杂地相互作用着，这也构成了欧洲的特点之一。

当代的全球化过程已抹平了殖民地世界的许多界限。居住在新的地球村中，就在我们为不受阻碍的交流而弹冠相庆之时，我们也能感受到接触剧增所引发的焦虑及对殖民主义卫生免疫措施的几分割舍不下。全球化意识的阴暗背面是对传染的恐惧。如果我们抹平世界中的一切界限，在全球村中大开普遍接触之门户，我们怎样才能预防疾病和败坏的传播呢？这种焦虑在爱滋病的大流行中明白无误地被暴露出。爱滋病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它显示出全球传染的新

危险。随着爱滋病首先被确立为一种疾病，接着又被确定为全球传染病，人们已拿出各种爱滋病的起源和传播图。各图都把重点放到了非洲中部和海地，这倒叫人又回忆起昔日之殖民主义想象：不受节制的性欲、道德堕落及卫生措施的匮乏。的确，在爱滋病防护中，主导性的话语一直都围绕着卫生防护这个中心：我们必须避免接触，采取预防措施。那些受感染的人群对医疗卫生如此不重视，同他们打交道，医疗工作者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也只能懊丧地抬起手，耸耸肩。（想想看，那位迪杜奇医生这时会说些什么！）为了阻止爱滋病的蔓延，国际和超国家计划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建立起保护之界限：要求人们在穿越国境时接受 HIV 测试。然而，民族国家的边界正一天天被越来越多的各种交流渗过，再没有什么可以带回殖民地界限这面卫生免疫之盾了。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全球传染的时代。

第七章　转变的迹象

这个人不属于我们的人民，不属于我们人类。他一直在忍受饥饿。他一无所有，除了那一时刻，那一漫长的痛苦万分的时刻……他所有的仅是痛苦，整个地球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治愈他的创伤。他两脚无寸土之地可立，双手无尺长之物可抓。他的一无所有更甚于在音乐厅中表演空中飞人的艺人，后者至少还有一根线，可把自己拴在上面。

——弗兰兹·卡夫卡

殖民主义的结束和国家力量的式微显示出一场由现代主权范式到帝国主权范式的普遍转变已经到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林林总总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首先向我们展示了这场转变，但这些理论仍有局限。正如这些理论所带的“后”字所显示的，它们不知疲倦地批判旧的统治形式，以及旧形式在现在的遗留，从中寻求解放。后现代主义者不断回到徘徊不去的启蒙的影响中，以之为支配的根源。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则在同殖民主义思维的残余作斗争。

我们怀疑，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会走入死胡同，因为它们未能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中的批判对象，也就是说，它们认错了敌人。

这些理论的批评家们花了那么大的气力来描述、抗争现代权力形式，可如果这种权力形式已不再控制我们的社会了，怎么办？这些理论家们如此倾注于同旧支配形式的残余作斗争，可假如他们因此而未能认识到现在正浮现于他们眼前的新支配形式，怎么办？假如原本作为批判对象的支配力量已经历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抽去了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潜能，又怎么办？简而言之，假如一种新的权力范式、一种后现代主权已取代了现代主权，通过向混杂的、零碎的主体性构成的等级结构（这可正是后现代主义所颂扬的结构）来实施统治，该怎么办？如果上述一切假设是事实，那么现代主权形式就已不再是要解决的问题，而那些看上去具有解放性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策略已不再是挑战，而成了新统治策略的实际同属，甚至不自知地强化了新的统治策略。

后现代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推崇建立在个性差别、流动性和混杂性上的政治学，以此来挑战现代主权提出的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但当我们开始考虑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时，那样的意识形态就显得受到权力策略的夹击。权力已经把受到攻击的堡垒疏散，还绕到进攻者的背后，同他们汇合到一起，以个性差别之名发起攻击。所以，这些理论家发现自己就像是在推一扇并不存在的门。我并不是说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是全球资本和世界市场的走狗。安东尼·阿帕亚（Anthony Appiah）和阿瑞夫·德林克（Arif Dirlik）说这些理论家是“智力界的同谋者”和“全球资本主义雇养的智者”，这也太刻薄点了。[①] 毋庸置疑，驱动大部分此类工作的仍然是民主和精英欲求，有时其中也有反资本主义欲求。但重要的是，在新权力范式的背景下，这些理论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新的敌人不仅对旧式武器具有抗打击能力，实际上更凭借那些武器而滋蔓，于是他就加入到他的假想敌的行列中，

① Arif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把敌人的武器运用到极致。万岁,个性差别!打倒本质主义式的二元对立!

在相当程度上,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是重要的结果,它们反映或追踪全球市场的扩张和主权形式的变迁。这些理论的矛头指向帝国,但它们模糊而混乱,并没有意识到主权形式变迁所带来的范式飞跃。我们必须深深扎入这一变迁中,详细解释它的名词,清楚列出构成帝国的阵列。而完成这一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价值和局限。

差异政治学

要全面理解后现代话语的批判威力,我们必须首先关注主权的现代形式。我们在前面已说过,现代主权的世界是一个二元论世界,它分裂为一系列二元对立:自我和他者、白人和黑人、内部和外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后现代主义思想所挑战的正是现代性的二分逻辑,它为那些同父权、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作斗争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在后现代理论中,我们文化中的混杂性、含混性和我们的从属感中的流动性似乎向支持现代殖民主义、性别主义、种族主义话语的二分逻辑发出挑战,同样,后现代主义者坚持的差异和具体也挑战着极权主义、统一化话语和权力结构。肯定破碎的社会同一性似乎成了一种手段,借此可以抗争现代主权、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它们所指向的等级结构。在这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话语极为重要,因为它提出了(或征兆着)一次同现代主权的全部发展的决裂。

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下树立着许多种话语,很难对它们做一个总结。不过,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受益于(至少是间接地)利奥塔对现代性控制叙述的批判、让·波德里亚对文化仿像的肯定,以及雅克·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根据许多后现代主义倡导者的界定,各种后现代主义

理论在最基本公式中拥有一个同类项：对启蒙的批判。[①] 从这个角度看，召唤行动的声音是清晰的：问题出在启蒙，而答案就在于后现代主义。

然而，我们要小心谨慎地仔细审视，后现代主义所说的“启蒙”和“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什么？[②] 在前面，我们已论述，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同质的过程，这其中至少包括两个区别明显、相互冲突的传统。第一个传统由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革命所开创，它始于邓斯·司各脱，沿袭至斯宾诺莎；它发现了内在性，并颂扬个性和差异。第二个传统是文艺复兴革命后的热月事变，它寻求通过建立二元论来控制第一种传统中的乌托邦力量，最终达到现代主权概念，以之为暂时的解决方案。当后现代主义提出，反对抬高理性的普遍性来维护欧洲白人霸权的启蒙和现代性，我们应当清楚它反对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图示中的第二项传统。换而言之，更确切的说法是，后现代主义挑战的不是全部启蒙和现代性，而是现代主权传统。再确切一些，这些理论走到一起，因为它们都向辩证法提出挑战，以之为现代支配、排斥和控制的核心逻辑，因为它将多样性和差异性削减为二元对立，接下来再把差异融入统一秩序之中。按这种逻辑的发展是：如果现代权力本身是辩证的，那么后现代主义工程就必须是非辩证的。

一旦我们认识到后现代主义话语是对现代主权的辩证形式的攻击，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出它是怎样解构了维持一系列等级结构（白人和黑人、男性和女性，诸如此类）的边界，从而同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这样的支配系统相抗争的。正因如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可以视自己的理论实践为现代和当代整个解放斗争谱带上的一点。挑战欧洲经济——政治霸权和殖民统治的历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妇女运动，还有反种族主义

---

① 许多后现代理论者把现代主义思想的种种形式都合并到“启蒙”这一个标题之下。读者如果要找这方面的例证，可参阅 *Kathi Weeks* 的专著 *Constituting Feminist Subject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1998）。

② 见 Kathi Weeks，*Constituting Feminist Subject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斗争,这些都被解释为后现代主义政治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运动的目标也是打破现代主权的秩序和二元对立。如果现代是欧洲白人男性的权力立场,那么后现代则是与其精确对称的反像——它是非欧洲、非白人、非男性的解放立场。正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所说,最优秀的后现代主义实践吸纳了被错置者、被放逐者、被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价值观,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① 现代主权的二元对立被打破,但这不是为了建立起新的二元对立;相反,二元对立的威力被消解,而"我们驱动差异在各种边界间游戏"②。

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内,后现代主义思想被奉为迎接学术和智力实践新范式的一声号角,它也被视为挑战各个学术领域内的支配范式的机遇。③ 从我们的角度出发,这其中最重要的实例之一是国际关系领域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④ 在这里,"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多多少少被等同于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方法,因此其核心是主权概念,而主权概念通常被理解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国家暴力的合法使用、领土统一完整的同义语。以后现代主义者的角度看,因为"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接受了

---

① 参阅 bell hooks 的专著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② 参阅 Jane Flax 的专著 *Disputed Subjects* (London: Routledge, 1993)。

③ 对于后现代主义批判,什么是必须的呢?首先,要确定在本领域"现代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其次,要提出一种后续范式,而这种范式要与某种后现代主义思想相融洽。我们可以取一个乍看来不大可能适于这种操作的领域作例证。这个领域是公共管理,也就是对官僚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中,主导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可定义为"以中性的公共管理为规范",这归功于三位人物:Wilson(政治同管理的分离),Taylor(科学管理)和 Weber(等级命令)。如果学者们相信这样的范式已过时,导致非民主的政府行为,他们就可以以后现代主义思想为武器,来改造这个领域。在这个具体例子中,他们可以提出"非基础论话语理论",以之为一种后现代的模式,用它来创造更活跃的政府互动和更民主的官僚主义机构。

④ 参阅 James Der Derian 和 Michael Shapiro 合编的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9); Jim George 的专著 *Discourse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cations, 1994); Michael Shapiro 和 Hayward Alker, Jr. 合编的 *Territorial Identities and Global Flow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各种划界，并以这些划界为核心，所以它趋向于支持民族国家的主权和支配力量。这一领域内的著述者们明确地将批判按照后现代主义语义发展出的“启蒙”同挑战现代国家主权的确定分界联系起来。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试图通过解构统治阶级设定的分界，强调无规律的、不可控的国际运动和流动，从而破裂稳固的团结和对立，挑战国家主权。“话语”和“阐释”被展现为对抗现代主义立场中的刻板制度的有效武器。由此而生的后现代主义分析指向一种差异性全球政治，一种在一个平滑、没有国家边界的僵硬限制的世界中实现不限地域的自由流动的政治。

尽管各门各派的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在拒绝现代主权逻辑方面毫不含糊，可他们大都对这种逻辑同时蕴含的解放潜能感到迷惑不解。或许这正是因为他们不能认识今天已取而代之的权力形式。当后现代主义者把自己的理论展现为政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时，他们只是在将刀剑挥向旧敌人的影子。只有当权力通过原质同一性、二元分裂和稳定的对立，从外部确立起等级结构时，对混合性和差异在分界间的自由游戏的肯定才具有解放作用。而当今世界中的权力结构和逻辑对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性政治已具有完全的“免疫力”。实际上，帝国本身也正致力于扫除主权的现代形式，驱动差异在分界间游戏。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有着最良好的意愿，可他们的差异性政治不仅没有效果，而且更有可能同帝国统治沦为同路，成为其功能和实践的支持者。危险在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过于关注旧的权力形式，它的头一直都朝向后方，这样它很容易跌入新权力张开的臂膀。如此看来，对后现代主义的赞扬和肯定是太天真了。

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发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它们所表征的一个历史现象：它们显示，现代主权传统已发生了断裂。当然，反对现代主权的“反现代”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诸位伟大思想家。然而，一个新的现象是后现代主义者指向现代主权的终结，也展示出一种在现代二元对立和现代同一性的框架之外进行思

维的能力,展现了一种多元性与多样性思想。不管他们表述是否清晰,也不管他们自己有无意识到,后现代主义者指向一场走向帝国生成的转变。

解放混合性,或超越殖民主义的二元对立

后殖民主义研究中的一股也提出全球差异政治,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路线相重叠。我们在前面的分析其实已经提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同后现代主义理论相一致的强大潜能。只要现代主权被等同于欧洲走向全球支配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只要殖民行政和帝国主义行径仍是现代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就确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在这个角度上,后现代主义显示出后欧洲中心主义的基础特征。

后殖民主义研究是一个范围广阔,种类众多的话语群组,但在这里,我们想把注意力聚集到霍米·巴巴的著作上,因为它最清晰地显现出后现代主义话语同后殖民主义话语之间的连续性。在霍米·巴巴的著作中,基本的,也是最经常出现的攻击对象是二元分裂。实际上,拒绝二元分裂,以及其预示的殖民主义世界观界定着巴巴所呈现的全部后殖民主义工程。世界并没有分为两块,成为相对立的两大阵营(中心和周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构成世界的是无数不完整的、流动着的差异。由于巴巴拒绝以二元分裂的视角看待世界,这也导致他拒绝接受总体性理论、各种同一性和同质性理论,以及社会主体原质论。所有这些拒绝彼此间都有着密切联系。二分的世界观意味着世界两个部分的同一性都有着属于自己原质而通过跨越中心分界的关系,一切经验都将被融入一个连贯的社会总体之中。简而言之,徘徊于巴巴的分析之中的幽灵就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将相互对立的社会同一性融入一个连贯的总体之中。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界定着后殖民主义以及后现

代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首先就是它们的非辩证性。

巴巴对辩证法的批判，也就是他对二元对立、原质同一性和总体化的攻击，既是关于社会本质的社会学声明，也是一项以改变社会为目的的政治工程。实际上，前者正是使后者成为可能的条件。社会和国家从来就不是想象中的连贯统一体。被殖民者对殖民者话语的模仿重过了同一性观念，使它远离原质。文化的构成也总是不完整的、混杂的。这些社会现实构成了基础，在其之上可发展颠覆性政治工程，摧毁权力和同一性的二分结构。总结一下，巴巴的解放逻辑就是：权力，或压迫力量通过把二分结构和总体化逻辑强加给社会主体，压抑主体的差异而发生作用。然而，这些压迫性结构从未能总括一切，差异总能以某种方式（通过模仿、含混、混杂、同一性的破裂，等等）表达出来。这样，后殖民主义政治工程就是要肯定差异的多样性，从而颠覆二分结构的统治。

在打碎、移走各种二分和总体化结构后，巴巴所指向的乌托邦并不是一种封闭的、破碎的存在，而是一种新型共同体。它是一个无居所的共同体，一种新国际主义，它是大迁徙中人民的聚会。对巴巴来说，肯定差异和混杂也就是肯定了共同体："居住在一个无居所的世界中，看着含混和歧义在虚构之殿中起舞，或者听着艺术作品中发出的破碎、断裂之声，这本身就肯定了要求社会团结的深刻欲望。"[①]他认为要密切注意文化的地方性、混杂性，以及文化对等级社会的二分结构的抗争，他相信由此将生出替代共同体的种子。

在确认作为这一后殖民主义框架的敌人的支配力量时，我们要小心谨慎。权力被认为完全通过辩证的和二分的结构运行。换句话说，巴巴认识到的惟一支配形式是现代主权。也正因如此，他可以说"等级的或二分的"，仿佛这是两个可互换使用的术语。在他看来，等级本身必然建立在二分对立之上，因此仅仅混杂性就有足够的力量去摧毁等级。混杂

① 参阅 Homi Bhabha 的专著 *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4）。

性就已是实现了的差异性政治,它驱动差异在分界间游戏。在这里,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会师:它们联起手来,攻击现代主权中的辩证法,提出解放就是差异性政治。

像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一样,我们对巴巴这样的理论家兴趣主要在于他们预兆出一场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变化,也就是走向帝国的变化。或许,只有在现代主权的统治业已式微之后,这些话语的出现才成为可能。然而,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关于这场转变的观点十分迷惑不明,因为他们仍停滞于对旧权力形式的攻击中,他们所提出的解放策略只有在旧领域内才能生效。后殖民主义观点基本上仍在关注殖民主权。正如巴拉科什(Gyan Prakash)所言,"后殖民作为一种后果存在——殖民主义作用产生的后果。"[①]这可能会使后殖民主义成为解读历史的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但在理论表述当代之全球权力方面,它却力不从心。即使爱德华·萨义德这位后殖民主义旗帜下最才华横溢的理论家也只能做到批判当前的全球权力结构延续了欧洲殖民主义统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残余。[②] 他控诉道:"大帝国(欧洲帝国主义)的策略在美国又被复制出来。"[③]可这里,他忽视了掌控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和逻辑的新颖性。帝国绝不是现代帝国主义的一声微弱回响,它是一种全新的统治形式。

基要主义和/或后现代主义

在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中,出现了另一个迹象,征兆着历史的转变。这个迹象就是所谓基要主义的崛起。自苏联解体后,各种意识形态

---

① Gyan Prakash,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Indian Historiography," *Social Text*, no. 31/32 (1992)。

② 参阅 Edward Said 的专著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3)。

③ 参阅 Edward Said 的文章"Arabesque",该文刊载于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7 (September 1990)。

灌输者和宣扬历史终结论的理论者们就一致把基要主义立为全球秩序和稳定所面临的主要危险。然而，基要主义是一个既不精准，又令人困惑的名称，在这个名称下聚集了一大堆彼此相去甚远的现象。最泛泛地讲，我们可以说尽管种种基要主义有巨大差别，但一个共同点把它们联系起来，那就是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外部，基要主义都被理解为反现代化运动，被理解为原始同一性和价值观的回归。它们被视为一种历史倒流，一种去除现代化的过程。然而，更精确一些，也更有裨益的做法是不将基要主义理解为前现代世界的再造，这是对当代历史转变的强有力的拒绝。在这层意义上，基要主义同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是显示出历史正在走向帝国的征兆。

今天的媒体往往削去“基要主义”这个术语所意指的各种不同社会结构，仅用该术语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即使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杂性也被削减，最后该词仅指一种狂暴的、毫无容忍性的宗教痴狂，而其第一特征就是反西方。当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本身有着众多不同的形式和悠久的历史，在 18 和 19 世纪的不同时期，伊斯兰复兴主义和改良主义就曾一度旺盛，与现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有颇多明显相近之处。然而，各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具一致性的一点是它们坚决反对现代性，反对现代化。只要政治和文化现代化仍是一个世俗化进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坚决反对它，原教旨主义把圣书置于政治立宪的核心，把宗教领导人推上政治力量的宝座。在性别地位、家庭结构、文化形式等方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推行一成不变的传统宗教规范，以对抗日新月异的现代性世俗形式。大异于现代主义动力和世俗社会，原教旨主义似乎要设立一个静止的、宗教的社会。作为一种反现代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似乎倾力于反转社会现代化进程，把自己从全球现代性之流中分隔出来，再造出一个前现代的世界，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甚至可以视 1979 年伊朗革命为一场反革命，因为它复活了古代的秩序。

美国的基督教基要主义也把自己展现为反社会现代化运动，它也试图在圣书的基础上重造想象中的昔日社会结构。当然，这种运动更应同在美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创造新耶路撒冷工程联系在一起，这项工程试图在美国土地上创造一个既区别于欧洲的堕落，又独立于"未开化"世界的野蛮的基督教共同体。① 当代基督教基要主义团体最引人注目的社会议程集中于(再)缔造稳定的，具有等级关系的核心家庭，这种家庭结构被认为曾存在于过去时代。因此，美国基督教基要主义者们展开一场反对堕胎和同性恋的十字军东征。美国的基督教基要主义者也一直倾向于建立白人霸权，保持白人种族的纯净。新耶路撒冷理所当然是由白人父权统治的耶路撒冷。

通常的描述把基要主义说成前现代或传统世界及当时的社会价值的回归，然而，这种描述让人糊涂，而不是叫人明白，实际上，基要主义式的回归过去基本是建立在历史幻觉的基础上。比如说，基督教基要主义者所颂扬的纯净、完整、稳定的异性核心家庭，从未存在于美国。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基础的"传统家庭"只不过是一种价值模仿，其源泉更多是电视节目，而非真实历史经验。② 这是一个投向过去的虚构导像，它通过当代的焦虑与恐惧的透镜而被合成出来。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的"回归传统家庭"根本就不是在向后看，而是一种新造，是反抗当代社会秩序的政治工程的一部分。

同样，现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不应被理解为回到过去的社会形式和价值观，甚至就连它的践行者自己也不这样看。法兹勒·拉赫曼(Fazlur Rahman)说："其实把这些现象称为'原教旨主义'是用错了名称。它们仅仅强调两大源泉——《古兰经》和穆罕默德先知——是伊斯

① 对于视美国为"新耶路撒冷"这种观念，Anders Stephanson 在他的专著中作了精彩的解释。参阅他的专著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ism and the Empire of Righ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5)。

② Stephanie Coontz, *The Way We Never Were: American Families and the Nostalgia Trap*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兰教的基础。在其他方面，它更强独创性思想。"①的确，当代伊斯兰激进主义基本上就是基于"独创性思想"和新造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价值观和实践行动。或许，它回响出其他时代伊斯兰复兴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声音，但它所实际针对和回应的是现今的社会秩序。因此，原教旨主义，不管是基督教的还是伊斯兰教的，所倡导的"重返传统"实际是新造。②

或许，如果我们把界定着基要主义的反现代锋芒理解为属于一项后现代，而不是前现代的工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它。应认识到，原教旨主义的后现代性主要在于它拒绝接受作为维护欧洲—美国霸权的武器的现代性，在这方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确是一则范例。在伊斯兰传统的背景下，原教旨主义的后现代性在于拒绝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传统，因为后者总是将现代性编码为被西方霸权同化，或向其屈服。如果现代意味着在后殖民时代的第一抹曙光中追逐西方教育、西方技术和工业化：阿卡巴·艾哈迈德(Akbar Ahmed)写道，"那么后现代就意味着重返传统穆斯林价值观，拒绝现代主义。"③仅仅从其文化含义上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后现代理论。说它后现代，仅仅因为它长期追踪、反对伊斯兰现代主义。然而，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后现代性就更明显，拉赫曼写道："当前的后现代原教旨主义具有相当大的新颖性，因为它的基本活动皆源自它对西方的反抗……因此，它将古典现代主义斥为纯粹的西化力量。"④当然，自从伊斯兰教创始以来，该教的某些组成部分就一直在一定意义上"反西方"。在当代原教旨主

---

① Fazlur Rahman, *Islam and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of 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② "被羞辱的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并非是过去的传统，而是对西方现代化失败的意识形态反应，它的出现不可避免。"以上这段文字出自 Robert Kurz 的文章"Die Krise, die aus dem Osten Kam"。Arjun Appadurai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探讨了当代围绕传统和群体认同这样的观念出现的一些谬误。参阅他的文章"Life after Primordialism"，该文刊载于 *Modernity at Lar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③ 参阅 Akbar Ahmed 的专著 *Postmodernism and Isla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④ Rahman, *Islam and Modernity*。

义的回涨中,真正新颖的是对正在浮现于新的帝国秩序之中的权力的拒绝。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只要伊朗的革命是对世界市场的强有力的拒绝,它就是第一场后现代主义革命。

考虑到原教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对立的两极,它们的结合确实是够奇怪的。我们觉得,当前原教旨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风潮不仅出现时间相近,而且它们所要回应的问题也相同,只不过由于权力地理分布上的巨大差异,它们分别出现于全球等级结构相对立的两极上。用最简单的话讲,我们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主要诉求对象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赢家,而原教旨主义的主要诉求对象则是输家。换而言之,当今世界朝向越来越高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和混杂性的发展趋势被某些人体验为一种解放,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加剧了他们的苦难。当然,当今对原教旨主义的支持主要来自在全球化经济中被进一步压制和排斥的人,资本与日俱增的流动性对这一类人的威胁也最大。在全球化进程中,对改变作出最强劲指示的或许恰恰是那些输家。

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所珍视的许多概念在现今流行的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形态中得到绝佳的响应。世界市场意识形态一直就是出色的反基础论、反原质论话语。流通、流动性、多样性和混杂一直就是它的可能条件。贸易把各种差异聚拢到一块,而且越多越好。在世界市场中,差异(商品的、人口的、文化的,等等)似乎在无限繁生,而最沉重的打击就给予了固定分界:随着差异的无限裂生,它淹没了任何二元划分。

随着世界市场的实现越来越彻底,它也趋向于解构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前一个时代,在全球生产和交换的帝国主义组织形式下,民族国家是主要行动者。可对于今日之世界市场,民族国家却日益表现为障

碍。前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瑞奇认识到了世界市场对国家边界的超越，并为之欢呼。他说："既然生产的每一要素——资金、技术、工厂和设备——现在都可毫不费力地穿越国界，那么国家经济这个概念本身已无任何意义。"在将来，"将不会有国家产品或技术，不会有国家公司，也不会有国家工业。国家经济将不复存在，至少我们所理解的国家经济将不复存在。"[①]随着国家边界的消隐，世界经济从民族国家施加的二元划分中挣脱出来，在新的自由空间中出现无数差异。当然，这些差异并没有在平滑的全球空间里自由游戏，而是被控制在由高度分化、高度流动的结构构成的全球权力网络之中。阿尔均·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捕捉到这些结构的新品质，把它们比喻为远景。在当代世界中，他看到了金融远景、技术远景、民族远景及其他。[②] 一方面，远景一词使我们看到各个领域中的流动性与不规律性；可另一方面，它又显示出各个不同领域，如金融、文化、商品，所拥有的共同形式特征。

今日之世界市场中的各个远景为资本提供的潜力之巨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后现代主义思维及它的核心概念会盛行于标准的资本理论中和资本实践领域中(如，市场营销、组织管理、生产组织)也就不足为奇了。后现代主义简直就成了全球资本运营的逻辑。或许，同后现代主义关系最明确的要数市场营销，甚至会有人说，资本主义的市场营销策略一直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方面，营销行为和消费成了发展后现代主义思维的首要领域。举个例子，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就将永久的购物、消费和商品化形象视为界定着后现代经验的典型活动，它是我们穿越混杂性的集体旅程。[③]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思维强调差异和混杂，颂扬风格和仿像，沉醉于新潮和时尚，所有这些恰恰描绘出理想的资本主

---

① 参阅 Robert Reich 的专著 *The Work of Nations*(New York:Random House,1992)。

② Arjun Appadurai,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见 *Modernity at Lar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③ 比如说，读者可以参阅 Jean Baudrillard 的 *Selected Writing*，Mark Poster 编(Oxford:Blackwell,1988)，或 Umberto Eco 的 *Travels in Hyper-reality*(London:Picador,1986)。

义商品消费计划,从而后现代主义也为营销策略的完善提供了机会。诚如一位市场营销理论家所言,"在当代市场营销行为和后现代主义概念问题之间有着明显的平行。"①

市场营销本身就是一种建立在差异之上的行为,差异越多,也就能发展出越多的市场营销策略。日益混杂、日益分化的人群使"目标市场"数目也猛增,对每一具体市场都可施行一套具体市场营销策略。后现代的市场营销认识到商品之间和人群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差异,并相应构造具体策略。② 每一项差异就是一次机遇。

后现代市场营销行为代表着当代资本的消费循环,这是资本的外部。但更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循环之内的后现代趋势。在生产领域,后现代思维的最大、最直接的冲击或许体现在管理和组织理论领域。这一领域内的著述者们说,庞大、复杂,有着严格分界和同质单位的现代组织形式不适于在后现代世界中做生意。有一位理论者如此写道:"后现代的组织有一些鲜明特征,主要有:强调中、小型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采用流动性结构和机构间相互合作模式,以应对波动的组织和环境条件。"③故而,后现代组织被想象为,要么建在不同的系统和文化之间,要么具有内在的混成性。对于后现代管理而言,最紧要的是组织的流动性和应对差异的能力。在这里,后现代主义理论为资本主义组织的内部结构中的转变铺平了道路。

---

① 参阅 Stephen Brown 的专著 *Postmodern Marketing*(London:Routledge,1995)。Brown 指出,尽管市场营销的实践是后现代的,市场营销理论本身仍然是"现代的"(在这里,它的具体含义是实证主义的)。Elizabeth Hirschman 和 Morris Holbrook 也哀叹市场营销理论和消费者研究对后现代思想的抵御。参阅他们合作的专著 *Postmodern Consumer Research: The Study of Consumption as Text*(Newbury Park,Calif.:Sage,1992)。

② 参阅 George Yudice 的文章"Civil Society,Consumption,and Governmentality in an Age of Global Restructuring:An Introduction",载 *Social Text*,no.45(1995 冬)。

③ 参阅 William Bergquist 的专著 *The Postmodern Organization: Mastering the Art of Irreversible Change*(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3)。读者也可参阅 David Boje,Robert Gephart,Jr. 和 Tojo Joseph Thatchenkery 合编的论文集 *Postmoder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Theory*(Thousand Oaks,Calif.:Sage,1996)。

这些组织的"内部文化"也采纳了后现代主义思维。跨越各国国界、联结全球系统的大跨国公司本身就比早先的现代公司具有大得多的内在文化多样性和流动性。那些被聘为顾问和策略策划人的当代公司文化精神领袖们大力宣扬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效率和效益。[①] 只要仔细审视一下美国的公司意识形态,就可以发现各公司并不依靠简单地对性别和/或种族他者的排斥来运行。实际上,旧的现代主义式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已成为新公司文化的公开敌人。各公司力求容纳差异,从而在公司的工作空间内最大实现创新、自由和多样性。具有不同性别、种族和性倾向的人都应被容纳进来,工作空间中单调重复的每日工作程序应被预想不到的改变和欢乐氛围所改造。打破旧的分界,让百种鲜花绽放![②] 相应,老板的任务也就是组织起这些精力和差异,让它们为利润服务。这一工程被恰当地冠以"多样性管理"的名称。从这一角度看去,各公司不仅表现出"进步性",更表现出"后现代性",它们成为一种真实的差异政治的领导者。

资本的生产过程所采取的形式也在回响着后现代主义者的声音。我们将有充裕的空间分析生产如何在具有流动性和混成性的网络中被组织起来(尤其见第十三章)。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正是在这一方面,当代资本的转变和世界市场构成了后现代化的真实进程。

当代一些理论者,如大卫·哈维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认为后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积累和商品化的一个新阶段,它伴随着当代世界市场的实现而出现。[③] 我们同意这些理论者的观点。界定着由世界市场建立起的

---

① 参阅 Avery Gordon 的文章"The Work of Corporate Culture: Diversity Management",该文刊载于 *Social Text*,44,vol.13,no.3(Fall/Winter 1995)。

② 参阅 Chris Newfield 的文章"Corporate Pleasure for a Corporate Planet",该文刊载于 *Social Text*,44,vol.13,no.3(Fall/winter 1995)。

③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和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1989)。

差异性政治的不是自由和平等,而是新的等级结构,或一种恒常的等级化过程。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实际上都是显示出这一正在发生中的转变的迹象(原教旨主义以另一种方式也起到同一作用),在这一方面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

真相委员会

我们应当记住,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只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在人群的一定阶段范围内才有效;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后现代主义在欧洲、日本、拉丁美洲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流行,但它的主要应用场所是美国知识界的精英部分。同样,同后现代主义有着不少相同趋势的后殖民主义主要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城市和主要大学中发展、传播。当然,这一具体细节并未减弱它们的理论视角的有效性,但它也应使我们驻足片刻,考虑一下这一具体细节的政治含义和实践效果。历史上,各种精英团体曾提出许多种具有真正进步性和解放性的话语,在此我们不想质疑这些话语的诚挚。同理论家的具体细节相比较,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概念能够在不同的地理和阶级分布上激起回响。

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人而言,混成、流动和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具有解放性。许多人视流动为苦难的一个侧面,因为流动意味着他们被愈来愈快地移入艰苦境地。近几十年以来,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世界各国都有数量庞大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入都市。国际劳动力流动仅仅在近些年才增长,其形式不仅有自南向北的合法和非法劳工输出和移民,也有南南之间的流动,也就是在南方各国和地区间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劳工流动,比如说从南亚到波斯湾地区。尽管劳工流动人数巨大可同那些因战争和饥荒而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数相比,但又相形见拙。从中美到中非,从巴尔干到东南亚,只要随便扫视一下世界,就可看到那些被抛入流动中的人的绝望挣扎。对他们而言,跨越国境的流动通常就意味着被

迫在贫困中迁移，何言解放？实际上，他们最迫切需要的相反是一个稳定、明确的居住场所，是一定的固定性。

后现代主义认知论挑战“启蒙”，它攻击主控叙述，批判真理。可一旦被移出欧洲和北美的精英学术层，这种挑战也就失去了其解放光环。作为例子，我们可以想想看萨尔瓦多内战结束后成立的真相委员会，以及其他南美和非洲国家的后独裁政府成立的类似组织。在国家恐怖的环境中，坚持真理概念的首要作用是一件强大的反抗武器。建立起最近的历史真相并将之公诸于众，让政府官员为各个具体行动负起责任，有时还令他们接受惩罚，这是走向民主未来的先决条件。在这里，启蒙的主控叙述似乎并无压制性，而真理概念也绝非流动和不稳定的——恰恰相反，真相就是，那个将军下命令暗杀了那位工会领导人，这位上校下令屠杀了全村村民。把这样的真相公诸于众，正是现代主义政治的典型工作。在这种具体环境下，批判真相只会帮助受到攻击的神秘化、压迫性政府。

在现今的帝国世界中，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中的解放潜能只有在拥有一定财富、享有一定权力、在等级结构中占据一定地位的精英人群中才会引发共鸣。可这一局限性也不意味着彻底否定。这根本就不是非此即彼式的选择。差异、混成和流动本身不具备解放性，可真相、纯净和静止亦是如此。具有真正革命性的实践必须提及生产。真相不会让我们自由，可控制真相的生产却能做到。流动性和混成性自身不能做到解放，可控制流动性和静止性、纯净性和混成性的生产却可以解放。帝国的真正真相委员会将是由民众组成的集合，它将是生产真相的社会工厂。

穷人

每一历史时期都会确定下一种社会主体，这种社会主体以一种普遍

存在的生活形式与核心，存在于一切时刻，且在每一地点都有着相同的形态。我们所说的可不是有权者和富人的生活形式，那些人代表的只是不具全面性的地方形象。惟一贯穿于所有地域和时代，能称得起纯粹差异的“共同之名”的是“穷人”。穷人一无所有，遭受排斥、压迫、剥削——可他们仍在生存！穷人是生活的分母，是民众的基础。后现代主义著者们极少在他们的理论叙述中采用穷人的形象，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同时也喻意深刻。说它奇怪是因为穷人从某些方面说是永恒的后现代者：穷人的形象代表着一种差异的、流动的主体，一种横越两端、无处不及的主体。

这一共同之名——穷人——也是一切人类可能的基础。马基雅维利指出，在“回返起始”的途中（这标志着宗教和意识形态现代性的革命阶段），穷人总是被视为拥有预言的能力：穷人不仅存在于世界之中，更是这个世界的可能。生活在赤贫和痛苦中，惟有穷人才能活出实实在在的，也是当前的存在，故而也惟有穷人才有更新存在的能力。穷人组成的民众拥有神性，可这种神性并不指向什么超验之物。相反，就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中，在穷人的存在中，内在之域被展现出，获得确认和加固，它的门户被开启。穷人实质为人间上帝。

今天，超验上帝的幻影也最终消散了。穷人打碎了那一形象，接收了他的力量。许久以前，现代性的帏幕在拉伯雷的笑声中徐徐升起。后来，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崛起为一个集体主体，可在物质性和内在性中表达自身。它成为穷人组成的民众，不仅预言，更从事生产，因此也打开了具体实在，而非虚拟人的可能之途。最后到了今天，在生产的生态政治统治下和后现代化的过程中，穷人成了一个被压制、被剥削的形象，可他们又是生产的代表者。新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今天，在每一寸土地上，在“穷人”这个概念和这个共同之名的根基中都存在着生产关系。为何后现代主义者读不出这种发展轨迹？他们告诉我们说，在生产中，横越一切的语言关系已侵入统一和抽象的价值世界之中。可

是，在横越一切领域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的主体究竟是谁？又是谁赋予语言以创造性的意义？谁受到压迫，但仍在欲求？谁沦落为贫穷但仍力量强大，且越来越强大？这一切除了穷人，更有谁能做到？在全球生产的统治下，穷人的杰出已不仅限于他们的预言能力。在创造利益共同体的过程中，他们的身影已不可缺少。贫穷本身已成了力量。存在着世界贫穷，可首先存在着世界可能，也只有穷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像鸟一样自由”，马克思用这样的字眼形容无产阶级。在现代性之初，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获得双重解放。首先，他们从封建领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不再是封建领主的财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从农奴制中得到解放）；其次，他们从生产手段中获得解放。无产阶级同土地相分离，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他们再无第二件可售之物。在这一意义上，无产阶级被强迫成为财富的纯粹可能。然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主流却始终憎恶穷人，其原因正是他们“像鸟一样自由”，他们不受工厂的约束，也不受为了创建社会主义所必须有的纪律的约束。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维多里奥·德·西加和西扎尔·扎瓦提尼拍了一部名为《米兰奇迹》的电影。在这部优美的电影的结尾，两位导演让穷人乘上扫把飞离。这部影片遭到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言人的猛烈抨击，被贬为空想，想想这件事，其中喻义也就不言而明了。

这“像鸟一样自由”的人要么是天使，要么是行踪不可测定的恶魔。在尝试了那么多次把穷人转化成无产阶级，再把无产阶级转化成一支解放的军队之后，民众及“穷人”这个共同之名再一次出现在后现代时代，出现在万里晴空中炫目的阳光下。它公然闯入光天化日之中，因为在后现代性中，被压迫者已吸纳了被剥削者。换句话说，穷人，每个贫穷的人，和由穷人组成的民众已吞下无产阶级民众，并已将其消化。正由于有这一事实，穷人已获得了生产能力。所有形式的贫穷——甚至娼妓的身体、一无所有的人，以及民众的饥饿——都已变得有生产能力。于是，穷人的重要性在与日俱增：穷人的生活支持着这个星球，把它包卷在他

们对创造和自由的渴望中。穷人是一切生产的条件。

有一种说法,在后现代感受的根源中,同时也在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可以遇到一群法国社会主义哲学家。在他们年轻时,这群人曾赞美过工厂纪律,赞美过实在社会主义那金光耀眼的地平线。但在1968年的危机之后,他们幡然悔悟,放弃了青年时的理想。他们宣称,共产主义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姿态不会有任何用处。今天,还是那批人,他们玩世不恭地解构,嘲笑一切对抗交换价值的普遍胜利的斗争。媒体和媒体制造的文化告诉我们:这批哲学家认识到了世界的新时代的来临。可真相并非如此。后现代性的发现存在于将穷人再推到政治和生产领域之中心的努力中。真正具有预言威力的是查理·卓别林那"鸟一般自由"的笑声。他已摆脱了一切空想幻影,最重要的是,他已把一切解放的戒律甩在身后。他对"摩登时代"进行阐释,可同时他又把穷人之名同生活联系在一起。那是解放了的生活,解放了的生产力。

第八章　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我被说服了，我们之前还没有哪一部宪法像我们这部一样计算精准，既适应于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又适应于自治政府。

——托马斯·杰斐逊

我们的宪法既简单，又实际，它总能满足种种非常之需。所要做的仅仅是调整一下重点和安排，而不会损失它的本质形式。

——富兰克林·罗斯福

要表述帝国主权的实质，首先我们需要后退一步，考虑一下为它做好准备，并构成它的前史的政治形式。美国革命代表着现代主权系谱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和断裂。美国的宪法工程出现于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经由一段富含另类可能的历史而完成，它是绽放于现代主权传统中的一朵奇葩。追踪主权概念在美国的最初发展轨迹，可令我们认识到它同我们迄今为止描绘过的现代主权的重大区别，从中辨识出新帝国主权形成的基础。

美国革命和两个罗马的模式

美国革命和《联邦党人》一书的作者所宣告的“新政治科学”的问世

标志着美国突破了现代主权的传统,“回到根源”,同时发展出新的语言和新的社会形式以调和惟一统治者同民众之间的关系。美国的立宪者们反对霍布斯式或卢梭式旧超验主义现代主权,认为只有共和才能给民主带来秩序。民众秩序的建立不应来自权力或权利的所有权转移,而应来自民众的内部安排,产生于网络之中的权力的民主互动。换而言之,新的主权只能产生于宪法形式中的制约和平衡。这样,既可形成中央权力,也可保证权力仍在民众手中。在这里,超验主义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和空间了。《联邦党人》一文的作者们如此写道:

> 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政治科学也已得到很大的改善。现在,许多原则的作用已被详细理解,而我们的古人对它们要么一无所知,要么一知半解。将权力规则地划归不同部门;引入立法平衡和制约;建立由法官组成的法院;由人民自己的选举选出代表,以在立法机关中代表人民;所有这些要么是全新的发现,要么在现代时代才得到重大改进和完善。要保持共和政府的优越,减少和避开它的不足,这些就是途径,而且是强有力的途径。①

尽管我们的先辈的笔下流淌着浓重的宗教色彩,真正形成的却是一种世俗的、内在的思想。这种思想重新发现了文艺复兴的革命人文主义,并将其完善,使其成为一种政治和宪制科学,权力可由在网络系统中自我规范、自我安排的一系列权力构成;主权可在广阔的活动领域内实施,可被分割,又不会因此而损害它的统一性。它一直服从于民众的创造运动。

当代历史学家,如J.G.A.波科克(J.G.A.Pocock)在理解美国主权概念同欧洲现代主权概念的分离方面走得相当远,他们将美国宪法和政

① 参阅 Alexander Hamilton,James Madison 和 John Jay 的相关文章,这些文收录入文集 *The Federalist*,Max Beldt 编(Oxford:Blackwell,1948)。

治主权概念的发展同马基雅维利式传统联系起来。[①] 他们不是将美国宪法与巴罗克式、反改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为国家以及随之而生的一切不平等的辩护有联系)，而是与共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传统相联系。继激发起英国革命中革命者的斗志后，这一传统又在大西洋畔的流放地上得到重建，而完成重建工作的就是一批被打败，却未被消灭的欧洲民主主义者。[②] 在马基雅维利本人的著作中，共和传统确有厚实的基础，首先是马基雅维利关于权力的概念，权力被视为一种生成性力量，是内在社会动力的产物。对马基雅维利而言，权力总是共和性质的，它总是民众生活的产物，它构成表达民众生活之基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中的自由城市就是承载着这一革命原则的乌托邦。马基雅维利的第二条原则是这种民主主权的社会基础总具有冲突性。凭借反制权力的出现和交互作用，权力才得以被组织起来。因此，城市是一种生成性力量，在它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冲突被表达出来。也正因如此，城市才得以形成。马基雅维利本人正是如此解读古罗马的共和组织，而文艺复兴的城市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为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基础：社会冲突是权力稳定的基础，也是城市扩张的逻辑。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触发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将政治重绘为永恒运动。上述就是共和马基雅维利传统给大西洋畔形成的民主教义的指导。[③]

共和制罗马并非令马基雅维利沉醉、使大西洋畔的共和者受益的惟一

---

① 参阅 J. G. A. Pocock 的专著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和 J. C. D. Clark 的专著 *The Language of Liberty, 1660-18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② 关于共和传统从英国革命到美国革命的大西洋之旅，请参阅 Antonio Negri 的专著 *Il potere costituente* (Milan: Sugarco, 1992) 和 David Cressy 的专著 *Coming Over: Mi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England and New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读者仍可参阅 Antonio Negri 的专著 *Il potere costituente*。读者也可参阅 J. G. A. Pocock 的文章 "States, Republics, and Empires: The American Founding in Early Modern Perspective"，该文刊载于 Terence Ball 和 J. G. A. Pocock 合编的论文集 *Conceptual Changes and the Constitution*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8)。

的罗马。"新政治科学"也得到帝国的罗马的启发,尤其是经由波利比奥斯的著作。首先,波利比奥斯所绘制的帝国罗马模式更加固了共和式社会诸力量调和过程的基础,并通过将几种不同类型的政府综合在一起,使这一过程最终完成。在波利比奥斯看来,完美的权力形式应有着不同的成分,它将君主力量、贵族力量和民主力量混为一体。① 美国的新政治科学家们将这三种力量组织为共和制宪法的三分分歧。三种力量间任何一点扰动都是腐败发生的病征,这是波利比奥斯的影响的又一处迹象。美国的这种马基雅维利式宪法具有着反腐败的内在结构——不管腐败是宗派的还是个人的,群体的还是国家的,美国宪法的设计使它可以避免堕入腐败漩涡的厄运,因为它可激励起全体民众,在有组织的反制力量网络中组织起他们的生成能力,形成一种动态的、庞大的自我规范过程。

然而,古代的模式也只能用来描绘美国经验的一些特征,因为这种经验根本上是新创的、独特的。② 在两个不同时期,托克维尔和汉娜·阿伦特都领会了这种新意识形态和新权力形式的新颖性。两人中,托克维尔更谨慎些。尽管他认识到美国的新政治世界所蕴含的生机活动,也目睹了几种不同的政府如何被融为一个民主整体,他还是宣称在美国,他看到民主革命已达到它的自然极限。关于美国民主是否能避开腐败漩涡,尽管他的判断并非彻底悲观,但也含了一定悲观色彩。③ 相较之下,汉娜·阿伦特则毫无保留地为美国的民主欢呼,视美国为现代政府再造自身之场所。她说:美国革命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的建立。更具体地说,就是建立起一个政治实体的基础,以保证自由的运行空间。④ 阿伦特

---

① 参阅 Polybius 的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Harmondsworth:Penguin,1979)第六卷。

② 参阅 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 *Democracy in America*,2 vols.(New York:Knopf,1994),尤其是其中作者的导言部分。

③ 参阅 Hannah Arendt 的专著 *On Revolution*(New York:Viking,1963)。

④ 在这里,我们直接提及 Max Weber。请参阅他的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Scribner's,1950),读者也可以参阅 Michael Walzer 的专著 *Exodus and Revolu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5)。

将重点放在民主的建立之上,也就是其基础的固定性和功能的稳定性。在她看来,革命的成功程度已足以中止生成性力量的动力,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定型的力量。

在以后的部分中,我们将对美国宪法中的权力网络概念展开批判,但现在我们只想把注意力集中到它的独创性上。欧洲的现代主权观将政治力量放置到超验领域中,从而使力量之源同社会疏远。而在美国,主权观所指向的是一种完全内在于社会的力量。政治不仅不会同社会相对立,相反可以融合社会,使之完整。

广阔的帝国

在分析新的主权原则怎样在美国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之前,首先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关注一下这个概念自身的性质。美国主权观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相对于欧洲主权的超验特征,它提出内在权力的思想。这种内在性思想的基础是关于创造性的思想,否则,这一原则就毫无效力可言;内在性自身并不会使社会变为政治。构成社会的民众拥有创造力,而美国主权也不在于对大众进行规范。相反,它是民众的创造力的结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革命及其后的新教宗派都发展了这种创造性思想。按照新教伦理,或许有人会说只有通过民众的创造力才能显现出上帝的存在和凡间所具有的神性。[①] 权力不应常常在上,对人们颐指气使,它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的。美国的《独立宣言》用最明晰的语言颂扬了这个权力新思想。要把人类从一切超验力量中解放出来,其基础就是民众构筑自己的政治制度、形成社会的力量。

然而,这一生成性创造原则在一种辩证运动中又服从于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或为这一过程所解释。这就是美国主权观的第二个特点。就

① 要找到有关美国宪法内部冲突的详细分析,读者可以参阅 Michael Kammen 的专著 *A Machine That Would Go of Itself*(New York:Knopf,1986)。

在主权生成于内在性层面的过程中，由于民众自身性质中所固有的冲突性和多元性，又产生出一种极限经验。新的主权原则似乎制造出自身的内部极限。要避免这些障碍打破秩序，彻底抽空政治工程的内容，主权力量就必须依赖于控制手段的使用。换而言之，在最初肯定了民众的生成性力量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一次辩证的否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细化发展新概念时已到达一个危机点？是否超验在一开始被拒之门外之后，又会通过权力的使用从后门溜进来？

结果是常在的威胁。但在认识到这些内部局限后，新的美国主权概念以罕见之势向外扩展，仿佛它要把控制的想法和反思的时刻从自己的宪法中彻底清除出去。这种主权观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发展趋向，而这个趋向的目标是开放的、广阔的、运行于无边界的地域之上的政治工程。尽管美国宪法的文本也很注重反思时刻，可在美国司法和政治史中，美国宪法的生命和动作则与之相反，具有开放性和扩展性，层层更新权力的民主基础。扩展原则始终在同限制和控制力量作坚持不懈的斗争。①

美国的实验同古代的宪制经验，尤其同帝国罗马所启发出的政治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那一传统中，当局限和扩展出现冲突时，解决方案总是倾向于扩展。根据马基雅维利的界定，如果共和国的民主基础导致矛盾冲突不断产生，新的领土不断被占有，这样的共和国就是扩展性的。波利比奥斯将扩展性视为三种政府形式完美结合的回报，因为这种权力的杰出形式鼓励民众的民主压力突破一切局限和控制。如果不能扩展，共和国则时常面临被吸入腐败漩涡的危险。②

权力网络概念所蕴含的民主扩展倾向必须同帝国主义式扩张严格

---

① 在解读 Polybius 的过程中，Machiavelli 始终强调这样一种必需：共和国必须不断扩大，以避免堕入腐败。参阅 Antonio Negri 的 *Il potere costituente*。

② 在"Empire of Right"中，改良主义和扩张主义结合了起来。Anders Stephanson 在他的著述中把这种结合精彩地呈现了出来。参阅他的专著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

区分开。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内在主权概念中的扩展性是容纳性，而非排斥性的。换而言之，新主权并未废止或摧毁它在扩展之途中所遇到的其他力量，而是向它们开放自身，把它们纳入权力网络。开放的是共识的基础，这样，通过权力与反制权力形成的网络，整个主权体就得到了不断的更新。正因为有这种扩展，新的主权概念也有着深刻的改革性。①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将民主共和国的扩展倾向同超验主权的扩展主义，或现代民族国家的扩张主义区分开了。主权是网络中的扩展性力量，这种思想是一个连接点，它将民主共和国的原则同帝国的思想连接了起来。帝国只能被构想为一个普遍的共和国，是构建于无边界、容纳性建筑中的由权力和反制权力组成的网络。帝国的扩展同帝国主义扩张毫无瓜葛，同为了征服、掠夺、种族屠杀、殖民和奴役而设计出的国家机构也毫无关系。同帝国主义不同，帝国扩展、巩固着权力的网络模式。当然，当我们历史地考虑帝国进程时，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帝国的扩展运动中也浸透着鲜血和眼泪，但不光彩的历史仍不能否定帝国扩展同帝国主义扩张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或许，帝国式主权的最根本特点在于：它的空间永远是开放的。在前面部分我们已分析，从16世纪起发展起来的欧洲现代主权观把空间视为封闭的，边界由行政当局把守。现代主权正是居存于它的极限之上。相反，在帝国式主权观中，权力在扩展过程中不断地革新、再造自身的秩序逻辑。要界定帝国权力，就会遇到许多矛盾：主体的无足轻重相对于生产网络的个体化；帝国空间的开放性、扩展性相对于不断进行的地域化等等。然而，帝国同时又是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也正是建立于聚拢各个矛盾的两极之上，这些概念矛盾的张力将贯穿于表达和建立帝国式主权的实践之中。

---

① 参阅 Virgil 的 Ecologue Ⅳ，收录入 *Opera*，R. A. B. Mynors 编（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帝国的发展和扩展的根基之中有着一种和平的思想。这是一种内在的和平思想,对立于超验式的和平思想。对后者而言,社会的本性就是战争,只有超验主权才有能力把和平施加于社会之上。而帝国式主权则与之恰恰相反,在这里,和平才是社会的本质。①

开放的边疆

对帝国式主权概念的认识是一个长期过程,它在美国宪制史的不同阶段逐步发展起来。当然,作为一种书面文件,美国宪法多多少少保持了稳定性(除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修正案。但宪法同时也应被视为由司法解释和实践构成的物质统治,实施宪法的不仅有法官和陪审团成员,也包括全社会的成员。自从共和国成立以来,这种物质的、社会的宪法已经历了巨大改变。实际上,美国的宪制历史可明显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统治阶段。② 第一阶段从《独立宣言》的公布到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第二阶段是个极其矛盾的阶段。该阶段横跨 19 和 20 世纪,对应于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期。该阶段中包含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帝国主义纲领和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国际改良主义。第三阶段由新政时期开始,穿过二战,直至冷战的巅峰期。最后,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开启了第四阶段,该阶段一直延伸至前苏联和它所操控的东欧集团的解体。在美国宪制历史上,每一新阶段的出现都标志着帝国主权的实现向前又迈进了一步。

在宪法的第一阶段,在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和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在位期间,边疆地区的开阔空间成为共和制民主的概念域;这一开阔地

---

① Bruce Ackerman 提出一种对美国构成史的最早三个阶段进行分期的方法。参阅其专著 *We The People: Found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最重要的是,人们共同感受到一种全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因其在社会、经济、空间上的开放性而与众不同。"这段文字出自 Stephanson 的专著 *Manifest Destiny*。

带为美国宪法作出第一个强有力的界定。当时，国家的形成仍被视为处于一个开放的集体创造进程之中。[①] 在这样的空间中，自由的宣告具有了实际含义。最重要的是，在这片美国土地上，没有欧洲式的集中和等级结构。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尽管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在这一点上倒是意见一致；美国的市民社会不是在封建和贵族权力的重重桎梏下发展，而是发展自独立的、不同的基础。[②] 一个古老的梦想似乎又成为可能。一片无边无垠的疆域开放了人类的欲望，而人类也可因此避开曾伏击和倾覆了欧洲的人文主义民主革命的美德与财富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新生的美国而言，为人类发展设下障碍的不是历史，而是自然，而自然中可没有不可逾越的对抗和固定的社会关系。自然是一片有待超越和改造的领域。

在这第一阶段，一种迥异于欧洲的新主权原则已得到肯定：自由是最高权力，主权被界定为开放的、不中断的扩展过程中的激进民主。边疆是自由的边疆。假使他们没有预先设想了这片广阔、流动的边疆，联邦党人的措辞将会是何等空洞，而他们自己的"新政治科学"又将多么不足。在欧洲的现代主权概念中，匮乏同战争一样处在核心位置。而在美国所经历的宪制过程中，匮乏已被否决地清除出去。杰斐逊和杰克逊都认识到边疆的实质性作用，认识到它是支持着民主的扩展性的基础。[③] 自由和边疆处于一种正反蕴含的关系中：自由所遇到的每一项困难、每

---

① 马克思在分析美国经济学家 Henry Charles Carey 时，对美国经济作了一番分析。在美国"这个国家中，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从封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中发展起来的"。该段文字出自马克思的 *Grundrisse*（New York：Vintage，1973）。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讨论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同时他也讨论了其他殖民地，如澳大利亚的情况）。关于 Tocqueville 的美国的经济社会根源的分析，请参阅 *Democracy in America*，第一卷，第二、三章。

② Thomas Jefferson 视"扩张为一个稳定、安全、繁荣的自由帝国的不可或缺的伴生物"。参阅 Robert Tucker 和 David Hendrickson 的专著 *The 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U.S. Constitution，Article I，Section 2。关于五分之三的统治，参见 John Chester Miller，*The Wolf by the Ears：Thomas Jefferson and Slavery*（New York：Free Press，1977）。

一个局限都是一个要逾越的障碍,一个要跨过的门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绵延着一片自由和财富的疆域,它时刻等待着人们去开创新航线。前面,我们已看到在美国宪法内发展出一种辩证运动,它会迫使《独立宣言》中的内在原则屈从于超验秩序。可在这里,在开放的领域中,这种辩证运动被部分转移或解决。在这片广阔的开放空间里,生成趋向压倒了宪法律令,原则的内在性压倒了规训反思,民众的活力压倒了权力的集中。

开放空间的空想在美国宪制史的第一阶段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其中也先天地隐藏着一种残酷的征服。要把北美领土构想为空荡荡的,必须先做到一点:就是刻意忽视土著美洲人的存在,或更确切地说。把他们视为人类的另一种类,一种亚人类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正如必须清除土地上的树木和岩石以便耕作,土著居民也必须从领土中清除出去;正如边疆人民必须着重装以御严冬,他们也必须武装自己以抵御土著居民。土著美洲人仅仅被视为自然中一个特别棘手的成分,于是战争持续进行,以驱逐和/或消灭他们。在这里,我们遇上了一个无法被融入宪法机器的矛盾:土著美洲人无法被融入边疆的扩展运动。他们必须被排斥在领土之外,这样才能打开空间,使扩展成为可能。只要他们被承认,也就不存在什么边疆和可填补的开放空间了。作为美国宪法的反面基础,他们存在于美国宪法之外。换而言之,对他们的排斥和灭绝是使美国宪法生效的根本条件。甚至不能把这一矛盾视为一种危机,因为对土著美国人的排斥是如此之剧,他们存在于宪法机器之外如此之匮乏的地方。

在这贯穿了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到南北战争的第一阶段,宪法权力没有因内部矛盾而步入危机。土著美洲人被抛出宪法之外,然而非美国人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宪法之内。边疆的概念、民主开放空间的思想和实践,这些实际上同同样开放和有动力的人民概念、民众概念、种族概念被一起编织出来。共和制下的人民是一种新型的人民,是走出制的人民,是正在增补着一片空荡荡的(或被清空的)领土的人民。从一开始,美国

空间不仅幅员广阔、没有边际，更充满内涵。它是一个交叉的空间，是不断发生着混合的“熔炉”。美国自由所遇到的第一次危机必然完全会发生在这充满内涵的内部空间。黑奴制，这一殖民权力的遗留物，成了自由民族形成之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美国的伟大反殖民主义宪法不得不容纳下这种典型的殖民主义制度。土著人尚可被排除在美国宪法之外，因为新生共和国并不依靠他们的劳动，可黑人劳动对新近诞生的美国却是个极其重要的支持。非美国人必须被纳入美国宪法，却不能被平等地纳入。南方的立宪者就毫无困难地展示出，在辨证的、自我反思的运动中，宪法会允许，甚至主动要求曲解劳动的社会分工，尽管这种曲解同《独立宣言》所传达的平等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从美国宪法起草过程中达成的妥协，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矛盾的微妙本质。这一妥协是经过曲折艰难的谈判后才达成的，其结果是：奴隶人口在决定各州在众议院的席位时确可发生作用，但必须打上一个折扣。这个折扣是：每一个奴隶相当于 3/5 个自由人。（南方各州竭力提高这个比率，以增强它们在国会中的力量，而北方各州则竭力降低它。）立宪者们实际上被迫把不同种族的宪法价值量化。如果白人是一，黑人为零，这还好一点，可 3/5 对一部宪法来说实在是个麻烦的数字。非美国人既没被彻底排斥，又不能被完全接纳，黑人奴隶既是美国宪法的例外，又是它的基础。这真是矛盾。

这一矛盾令新近发展出的美国主权观面临危机，因为它阻碍了自由流通、混合和平等，而这些也正是激励出美国主权观的基础中的生机活力的因素。[①] 帝国式主权必须不断突破壁垒，超越划界，不管它们位于边疆或自己的内部。正是这种不断的突破和超越令帝国空间保持开放。在帝国内部，在白人和黑人、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壁垒堵塞住了帝国的

① 如果读者要找到一部简史，叙述从立宪会议到南北战争之间因奴隶制问题而激化的宪法危机，请参阅 Kammen 的专著 *A Machine That Would Go of Itself*。

融合机器。

亚伯拉罕·林肯在领导南北战争时,认为他正在为这个国家制造基础。他是对的。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通过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就民权和非美国人平等权利问题的斗争。不仅如此,关于奴隶制的辩争必然同关于新领土的辩争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起着作用的是对国家的空间的重新界定,而利害所在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民众的自由移居(它统一于一个多元社会)还能不能继续发展、继续自我完善,实现公共空间的重新构建?新的民主必须摧毁超验的国家观以及它对种族所作的划分。必须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人民,而界定这新型人民的不是旧时代的遗存,而是适应社会构建和扩展需要的新伦理。新的国家只能是对混合的同一性进行政治和文化管理的结果。除此之外,它别无选择。

帝国空间的关闭

美国的巨大开放空间最终也耗尽了。即使把土著美洲人赶得更远,赶入更小的禁闭空间,仍没有足够的开放空间产生。在 19 和 20 世纪,美国的自由、它的新型权力网络模式,以及它关于现代主权的另类观点,这一切都撞上一个认识:开放的领土毕竟有限。从这一刻起,美国宪法就时常被拉到一个矛盾的临界线上。每当宪法中的扩展性同它的局限发生冲撞时,美国就会被诱上一条欧洲式的帝国主义道路。然而,另一种选择也始终存在,那就是:重归帝国式主权工程。这一出新的政治剧上演于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也就是从 189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段时间。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阶级斗争不断加剧,进入到政治舞台的中心。阶级斗争提出了匮乏问题。这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匮乏,而是为资本主义历史所固有的匮乏。也就是说,它是适应于社会的劳动分工而发生的商品分配的不平等。阶级斗争成了一道极限,它威胁着宪法在扩展

中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庞大的资本托拉斯也开始组织起新的资本形式——金融资本，从而使财富与生产、金钱与生产关系脱钩。在欧洲，金融资本的出现是一个相对连续的过程，因为金融资本是在地租和与之相应的贵族制度之上逐步建立起来的。而在美国，金融资本的出现是一个爆发性事件。它威胁到了宪法网络的存在可能，因为一旦一种权力获取了垄断性，网络本身也被摧毁。既然空间扩展已不再可能，从而也无法再成为解决矛盾的策略，社会冲突就直接作为暴力性、不可调和的事件表现出来。大规模工人运动在美国出现也证实了宪法中的调和空间已关闭，在空间上转移冲突已不再可能。秣市骚乱和普尔曼罢工以响亮而清晰的声音喊出：再也没有开放空间了，矛盾将导致直接冲突。① 实际上，当权力撞击它的空间极限时，它就被迫向自身内部收缩。一切行动都必须在这种新环境中展开。

空间的关闭向原先的美国宪法精神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而应对挑战之路上也危机四伏。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当时那样强烈感到将美国变为一个欧洲式主权国家的欲望。我们关于“反动”、“主动性反革命”、“预防性警察”的概念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美国的阶级压迫者没有理由嫉妒欧洲的皇帝和沙皇。即便到了今天，那一时期的残酷资本主义和国家镇压仍在继续，不过最初的压迫者（如弗里克、卡内基、梅隆、摩根）今天已穿上了慈善家的衣装。那时，压迫是多么残酷呵！可压迫越强，反抗也更烈。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当时对压迫的反抗不是那么强烈，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本关于帝国的书。

在北美大陆上，应对空间闭合的道路不只一条，而且不同的道路更

---

① 关于美国产业工人阶级作为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出现，请参阅 David Brody 的专著 *Workers in Industrial America: Essays on Twentieth-Century Strugg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Stanley Aronowitz 的专著 *False Promises: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3), 以及 Bruno Ramirez 的专著 *When Workers Fight: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1898-1916*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8)。

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在决定往后美国宪法的发展趋向方面,影响力最大的两项方案都是在20世纪初,在美国"进步主义"的框架内发展细化出的。第一项方案的提出者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第二项方案的提出者是威尔逊总统。第一项方案彻底采取了传统的欧洲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而第二项方案则采取了和平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以之扩展权力网络的宪法概念。这两项方案的目的都是回应社会关系的危机,以及由此而生的杰斐逊空间的危机。对两种方案而言,第二重要的事都是通过强大的托拉斯的形式对权力网络的腐化。两任总统的政府都通过了重要的反托拉斯法令,其内容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内对铁路的立法直至威尔逊总统任内对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广泛立法。两位总统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缓和阶级对抗。到那时,美国的阶级对抗已几乎销毁了除美国的权力网络之外的一切事物。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在系统范围内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这也是两位总统的第三个共同点。开放的领土已被用尽,纵使它未被耗尽,也不可能控制运动以民主方式进行。

既然空间闭合的问题已无法在内部解决,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进步主义就只得在同外界的联系中实现。两位总统提出的回应办法都强调向外的运动,然而威尔逊总统的方案却远比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方案更具乌托邦色彩。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而言,西班牙—美国战争就构成了解决方案的原型。而随着他转向民粹主义,那一形象在他的政策中的核心地位也日益加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解决空间极限的方案就是放弃美国模式的原有特色,继而追寻与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的民粹殖民帝国主义和法兰西第三帝国的进步主义帝国主义相类似的目标,采用同它们相类似的方法。[①] 这条帝国主义道路给美国带来了它

① 如果读者要找到一种从外交政策角度对美国扩展主义和欧洲殖民主义作的优秀分析,可以参阅Akira Iriye的专著*From Na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U.S. Foreign Policy to 1914*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在菲律宾的殖民经历。罗斯福宣称道："保证生活在野蛮中的人从各种枷锁下解放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样一来，对解放斗争作出让步，允许菲律宾人那样的未开化民族自己统治自己就成了一种"国际罪行"①。罗斯福，以及他之前的数代欧洲意识形态鼓吹者，都依赖于"文明"这一概念，用这一概念为帝国主义的征服和统治辩护。

威尔逊总统的危机解决方案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他那宪法的权力网络国际扩展工程是一个具体的政治乌托邦。在欧洲，在《凡尔赛条约》签约期间，他对美国意识形态的解释受到最大的嘲弄，可即便在美国国内，它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欣赏。但他在美国宪法扩展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世界秩序的概念，以及他视和平为新的世界权力网络的产物的思想，这些都是具有强大和持久生命力的方案。② 他的方案同美国宪法的原有逻辑和它关于帝国扩展的思想相应合。欧洲的现代主义者们忍不住要嘲讽这一后现代帝国的方案：历史中充斥着对乔治·克列孟梭、劳合·乔治的冷嘲热讽，他们同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宣称他们的独裁和战争的核心就是抗拒威尔逊的方案。然而，可怜的威尔逊总统今天却以另一副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不错，他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但他清晰地预见了正等待着欧洲各国的可怕的将来。他最先提出创建世界和平政府，他的提议当然无法实现，然而他的远见也有力地促动了向帝国的转变。尽管甚至威尔逊总统本人也未能意识到这一切，但它们却是千真万确的。在这里，我们实际已接触到了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具体区别。在威尔逊的空想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白痴的远见和睿智。

---

① 这段文字在 Frank Ninkovich 的文章"Theodore Roosevelt: Civilization as Ideology"中被引用。该文刊载于 *Diplomatic History*, 20, no. 3 (Summer 1986)。Ninkovich 清楚地显示了 Roosevelt 的帝国主义是如何牢固地建立在所谓"文明的扩张"的意识形态之上。

② 关于 Woodrow Wilson 和进步国际主义的命运，请参阅 Thomas Knock 的专著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美国帝国主义

美国宪法的第三阶段可以被认为从新政法令在国会的通过开始。但我们基于自己的目的,认为最好将它的起始点再向前推一推。我们甚至可以把该点一直推到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传遍全美、全世界的时期。回过头看,在十月革命后的十几年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日后冷战的苗头——世界领土的两极分裂,以及两大体系间的疯狂竞争。新政法令本身,同时还有西欧建立起的相对福利系统,都可视为是应对苏联引发的威胁的策略。也就是说,它们的目的是应付国内外日益增长的工人运动的力量。[①] 美国发现,它正越来越受到缓和阶级对抗这一需求的挤压,反对共产主义也因此成为压倒一切的必须。冷战意识形态造就出最夸张的二元分裂。结果,一些界定着欧洲现代主权的特点又出现于美国大地上。

越来越明显,由此开始,美国已远非它的创始者们设想的那个独特、民主的国家,一个自由帝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美国成为野蛮的帝国主义工程的直接作者。作为世界警察和镇压世界各地自由斗争的策划者,美国的这一形象既非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亦非始于冷战的正式开始。其起始可一直追溯到十月革命,甚至更早。或许,我们更应该把帝国式主权发展之路上出现的例外串接起来,使它们成为一种趋向,成为美国历史中的另一种抉择。换而言之,或许我们应该追溯到这个国家的根源之中,(追溯到黑奴制和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战争之中)以找寻这些帝国主义行径的根基。

在前面,我们主要把黑奴制视为南北战争前的宪法问题。可在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通过后许久,种族压迫和对黑人劳动力的超级剥

---

① 参阅 Antonio Negri 的文章"Keynes and the Capitalist Theory of the State",该文载入 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 合著的 *Labor of Dionysus*。

削仍旧存在。包围着美国黑人的有形和无形的意识形态藩篱始终抵触着开放空间和混合人民这样一些帝国式概念。尤其，在劳动分工、工作条件、工资结构等方面，黑人劳工在美国的位置同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劳工在欧洲的位置极其类似。实际上，对黑人劳工的超级剥削也提供了一个例子，一个内部的例子，它显示出一直存在于美国历史之中的帝国主义倾向。

此外还有一则外部例证，这就是门罗主义和美国施加努力以控制南北美洲的历史。于 1823 年由詹姆斯·门罗总统宣布的门罗主义的最初，也是最主要的目的是防范欧洲殖民主义。“从此以后，自由、独立的美洲大陆不再会被视为欧洲大国殖民统治的对象，”[①]美国自命为保护美洲各国免受欧洲侵略的保护者。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响应门罗主义，声称美国是“国际警察力量”，从而最终把美国的“保护者”地位公诸光天化日之下。然而，把美国对美洲各国的多次军事干涉都形容为抵御欧洲侵略，未免也太勉强了。[②] 美国的政治实际上是一股强劲的帝国主义传统，只不过它套上了反帝国主义的外衣。

冷战期间，这种帝国主义诱惑——或者说保护者和支配者之间的模糊——变得范围更广，程度更剧。换句话说，保护世界各国免受共产主义之苦（或更准确地说，免受苏联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以帝国主义手段支配、剥削各国已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美国卷入越南可视为这一趋势的

---

① Monroe 的最初宣言的效果至多也只是模糊不清的。Ernst May 争论说，在促使门罗主义诞生方面，国内政治压力和国际问题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请参阅其专著 *The Making of Monroe Doctrin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只是随着 Theodore Roosevelt 的帝国主义运动，尤其是随着修建巴拿马运河项目的开始，门罗主义才成为一项有效的外交政策。

② 关于美国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在中美洲长期的军事干涉，请参阅 Ivan Musicant 的专著 *The Banana Wars：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Macmillan，1990），Noam Chomsky 的专著 *Turning the Tide：Intervention in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Peace*（Boston：South End Press，1985），以及 Saul Landau 的专著 *The Dangerous Doctrine：National Security and U. S. Foreign Polic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8）。

极点。从一个角度上看,或从美国政府的内战意识形态的内部看,越南战争是保护"自由世界"免受共产主义入侵、遏制共产主义前进的全球政治战略的一部分。然而,这场战争同时是,也只能是欧洲帝国主义在美国的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帝国主义已在各场关键战争中败北,它们的控制正在消亡。就像上了年级的拳击手,它们一个个走下擂台,让位给阔步迈进的新冠军——美国。美国军方相信,他们完全有能力避免重蹈法国人在奠边府的覆辙,对此他们从未有丝毫疑虑。在停留在越南的短暂岁月里,美国人的暴力、残酷和野蛮令任何一个欧洲帝国主义国家都为之汗颜。似乎美国社会宣布自己为欧洲帝国主义力量的合法继承人,披上它们的帝国主义华服,赶超它们的帝国主义行径。

当然,美国在越南的冒险以失败告终。越南人民显示出了无可比拟的力量与勇气,接连与两大帝国主义力量作战,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尽管胜利的果实极其苦涩。然而,对美国而言,也对我们的简短的宪制史而言,越南战争可被视为美国帝国主义趋向的最后时刻,因此它的结束也标志着朝向新宪法阶段的转变的开始。欧洲式的帝国主义道路被永远地证明是一条不归路,从此以后美国又退回到它原先的道路上,向着帝国统治跃进。

作为一种简化的历史定位,我们可把美国宪法第三阶段的结束和第四阶段的开始定在1968年。[①] 那一年1月进行的春节攻势标志着美国的帝国主义冒险在军事上已走上了必败之路。更为重要的,强大的国内社会运动已施加了巨大压力,从而为美国重返共和原则和宪法原有的精神扫清了道路。正当美国深深陷入它在国外的帝国主义冒险,正当它已

① William Chafe提出,从一个社会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1968年是美国政府类型的一个转变。"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用'分水岭'这个词来描述一个固定时刻,他都冒着将复杂的历史过程过度简单化的危险。然而,如果用这个词来意指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标志着一群力量的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另一群力量的主导地位的开始,它似乎是描述1968年在美国所发生的情形的适当的词。"请参阅William Chafe的专著 *The Unfinished Journey: America since World War* Ⅱ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游离到脱离原先宪法精神最远点时,宪法精神在国内大爆发出来,这不仅体现在反战运动上,同时也体现在民权运动和黑人力量运动上,体现在学生运动上,并最终体现在第二波浪潮的女权运动上。新左派的各组成部分纷纷涌现出来,这极大地肯定了宪法中的生成性力量原则和重启开放空间的宣言。

超越冷战

在冷战期间,美国披上了帝国主义的华服,令老的帝国主义力量臣服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美国所发动起的这场冷战并未战胜它的社会主义敌人,或许这也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基本目标。苏联是被国内矛盾的重担压垮的。冷战最多也不过创造出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在苏联集团内部回荡,从而使具有爆炸性破坏力的矛盾迅速裂生。冷战最重要的一个效果就是在帝国主义世界中重新整理出霸权路线,加速了旧力量的衰落,相应提高了美国所倡导的构筑帝国秩序的地位。假使新型的霸权倡导没有事先准备好,美国也不会最终成为冷战的胜利者。这一帝国工程,或者说这一建立权力网络的全球工程,界定着美国宪制历史中的第四阶段。

在冷战逐渐缓和及冷战之后的岁月里,行使国际警察力量的职责就结结实实地落在了美国肩上。海湾战争中,美国第一次全面使用这种力量。其实,从那场战争的目标、地区利益及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来看,那仅是一次压制行动,没多大意义。我们已看到美国及其盟国直接导演的多场类似战争。伊拉克被指责触犯了国际法,因此必须受到审判和惩戒。海湾战争的重要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这场战争把美国展示为惟一可行使国际主义的力量,且它的行动不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动机,而是以维护全球正义的名义进行的。当然,在此之前,许多力量也曾宣称过,它们的行动服务于全体的利益,可它们的宣称都错了。可这一次,美国的新

作用完全不同于以往。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美国关于普遍性的宣称仍旧是错误的,但错误与过去不同。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不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而是服务于帝国利益。从这一角度上说,海湾战争确如乔治·布什所宣称的那样,宣告了新世界秩序的诞生。

然而,帝国秩序的合法化不能仅仅依赖法律制裁和军事力量。必须制造出国际司法常规,合法地、持久地提高霸权行动者的力量,帝国秩序的合法化惟有由此才可发展出。这时,威尔逊总统最早提出的立宪过程终于到达成熟期,再一次跃现于世人眼前。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威尔逊总统的救世主义和新政的国际政治—经济倡议之间,一系列国际组织相继成立,产生出传统的契约式国际权力观所称的常规和效力剩余。在创建了联合国的旧金山协议精神中,这种剩余得到了广泛的普遍基础。冷战阻碍了统一过程,但并未完全阻挡住它。在冷战的岁月里,一方面能够制造权利的国际组织迅速增多,另一方面对这些组织的抵制在减弱。在第一章第一节中,我们已强调了这许多不同国际组织的迅速增多,和它们以一种共生关系的相互加强,仿佛一个可以令另一个成为自己合法化的理由。它们的国际权力观向前推进,越过契约论或谈判论,开始指向一个中心权威,一个能推动司法行动的合法的超国家发动机。这些大国际机构诞生于谈判和协议的有限基础上,但它们引出了组织和行动者的急剧增多,这些组织和行动者的行动似乎表明,一个保证正义的中心权威已就位。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被要求担负起确保和加强新的超国家权利形成过程的法律效力的作用。在公元 1 世纪,罗马参议员们要求奥古斯都大帝为了公众的利益接掌起帝国权力。同样,今日的国际组织也要求美国在新世界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在 20 世纪末的所有地区冲突中——从海地到波斯湾,从索马里到波斯尼亚——美国都被要求进行军事干涉。这些要求全是实实在在的,绝不是平息美国公众的不同意见的花招,虽然不太情愿,美国军队仍要以世界和平秩序的名义对这些要求作

出回应，这或许就是帝国的中心特点之一，它存在于一个对它的存在不断提出要求的世界环境中。

许多原因组成美国的特殊地位，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在对抗苏联及以后的新世界秩序中持续发挥的核心作用。然而，从立宪史的角度上看，美国能获取特殊地位，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宪法自身的帝国倾向。恰如杰斐逊总统所说，美国的宪法最适合于一个大帝国。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这一部宪法是帝国式的，而非帝国主义式的。说它是帝国式的，因为美国宪法的构造模式能够重新表达开放空间，能够在一片无边无垠的领域内不断重造网络中多种多样的独特关系。（相反，帝国主义则在封闭的空间内线状扩张自己的力量，它侵略、毁灭，把国家主体并入自己的主权之中。）

正是在美国宪法的全球扩展中，帝国得以诞生。实际上，我们进入的是由一部国内宪法的扩展走入帝国的形成过程。在修昔底德所描绘的古代世界中，国际权利的形式必然是一个谈判商讨和签订契约的过程。在国家理性的时代，在现代的国与国关系中，情况亦是如此。可今天，权利的形成所涉及到的是内部的宪法制度化过程。由一致和协同构成的网络、调和和解决冲突的渠道，对各国动态的协调，这一切都成为帝国的内部机制。全球的边境正转变为帝国主权下的开放空间，而我们正在经历这场转变的第一阶段。

第九章　帝国主权

> 帝国的新人民相信新的开篇、新的章节，而我在继续在为旧故事而打拼。我希望，在故事结束之前，它能揭示出为何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
> —J. M. 考特茨(J. M. Coetzee)

现代对现代性的二元性的批判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那一批判传统的立足点却是典型的现代式的。它处在危机的临界点，故而既在现代之内，又在现代之外。在向着帝国世界的转变过程中，边界地带已不再存有了，故而现代批判策略也不再有效。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现代欧洲哲学史上，自康德至福柯对“何谓启蒙”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康德对启蒙作出了最经典的现代主义的描述：敢于获取知识，摆脱“不成熟”状态，在社会领域的中心欢庆公众对理性的运用。[①] 福柯的答案，如果我们历史地去看，同康德的答案差别也并不巨大。福柯不必同腓特烈二世的暴政周旋，也不必像康德那样希望把暴政引向更具理性的政治。在他所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

① 参阅 Immanuel Kant 的文章“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该文收录入 *Political Writing*，Hans Peiss 编(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政治系统中，广大的政治交换领域已为人们习以为然。然而，他的回答再一次强调要横跨传统意义上的“内部”主体性和“外部”社会空间；不过，福柯的划分把传统划分颠了个个儿，他把“内部”的系统同“外部”的主体性区分开。[①] 现代批判的合理性，它的重心，就落在内与外的边界上。

福柯的确加入了另一条通过质询寻求超越边界和公众领域的现代观。“重要的是……如何才能使能力的增长同权力关系的激化相脱离？”这一新的任务要求使用新的方法：“我们必须超越非内即外的选择。”福柯的回答仍是相当传统的：“我们必须走上前线。”[②]最后，福柯对启蒙的哲学批判又回到启蒙的立足点，就在这内与外的潮涨潮落中，对现代性的批判最终未能突破现代性本身的术语和局限，而是在它的边界上静止下来。

边界地带——这个既属于内部，又属于外部的地带——成了批判权力系统的立足点。同样的观念也激发出现代政治理论的批判传统。长期以来，现代共和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结合了现实的基础和空想的创新。共和总是将自己的根基牢牢地扎在主流历史进程之中。可同时它又寻求改变政治领域，从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外部，一个解放的开放空间。我们认为，这一批判传统的三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和马克思。他们的思想总是把基础建立于真实的现代主权形成过程之中，他们试图引爆这一过程中的矛盾，为一个另类社会的出现开辟出空间。外部从内部建立起来。

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建立起民主政治的生成性力量诞生于中世纪秩序的破裂中，诞生于规范向现代性转变时所出现的混乱局面的必须中。

---

① 参阅 Michel Foucault 的文章“What Is Enlightenment”，该文收录入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的第一卷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Paul Rabinow 编（New York: New Press, 1997）。

② 同上。

新的民主原则是乌托邦式的开端,它直接响应于真实的历史进程和时代危机的要求。同样,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对现代主权的批判发自历史进程内部。针对君主和贵族力量,斯宾诺莎将民主界定为政府的绝对形式,因为在民主制下,统治的是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实际上,民主制是惟一可实现绝对的政府形式。最后,对马克思而言,每一种解放的开端——从工资斗争到政治革命——都提出使用价值的独立性,以反抗交换价值的世界、反抗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但这种独立性又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自身之中。在上述的所有例证中,对现代性的批判都位于权力形式的历史演化之中,都是在寻找着外部的内部。即便在对外界最极端、最激进的追寻中,内部仍被作为基础,有时作为负面基础。马基雅维利的新共和国的形式,斯宾诺莎的民众民主解放,还有马克思的国家的革命废除,在所有这些理论中,内部都存在于被投射为乌托邦的外部之中。

我们并不是想暗示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从未真正达到能引起视角转换的破裂点,也不是想表示这些现代批判对我们的工作毫无益处。马基雅维利的自由、斯宾诺莎的欲望、马克思的活劳动,这些都是包含着真正改变力量的概念,这是一种面对现实,并超越既有生存条件的力量。之所以这些批判概念的力量能摆脱它们自身同现代性的暧昧关系,这主要在于它们被作为本体需求而提出。[①] 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的力量所在之处,也正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敲诈被拒绝之处。换句话说,当乌托邦式思想摆脱了将其限制于现有领域的同系现象的压力,一种新的形式就诞生了。

外界不再存在

在许多不同的现代话语中,内部和外界所占的领域,以及它们之间

① 关于现代形而上学和政治理论的关系,请参阅 Antonio Negri 的专著 *The Savage Anoma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的关系都有着不同的构形。[①] 不过，我们认为，内部和外界的空间构形是现代思想中一个较普遍，也较具基础性的特征，在从现代到后现代，从帝国主义到帝国的转变中，内部和外界间的区分正越来越模糊。

尤其从主权角度看时，这种转变显得愈发明显。对现代主权的构想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片领土，以及这片领土同外界的关系之上。早期的现代社会理论家们将公民秩序理解为一种有局限性的、低一级的秩序，与之相对立，或相对照的是自然界的外部秩序。公民秩序的封闭空间通过它与自然界的外部空间的隔离而得到界定。同理，现代心理学理论家们也从空间角度理解欲望、感情、本能和无意识，隐喻化地把它们理解为心灵的外界，自然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延伸。自我的主权就在于由欲望构成的自然秩序和由理性或意识所构成的公民秩序的辩证关系中。最后，现代人类学中关于原始社会的诸多话语将它们视为外界，界定着文明世界的周边。在上述各不相同的语境中，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外界内化的过程，也就是使自然成为文明的过程。

在帝国世界中，公民秩序同自然秩序间的辩证主权已走向终结。所以说当今世界是后现代的世界，这也是原由之一。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告诉我们，“当现代化进程已完成，自然已永久消失时，我们所得到的就是后现代主义。”[②]当然，我们的世界中依然有森林，依然有虫兽，依然有电闪雷鸣，我们也依旧认为我们的心理受到自然本能和情感的驱动。所以说我们已不再有自然，这主要是说上述那些力量和现象已不再被我们视为外界，也就是说，它们不再被视为独立于人为的公民秩序之外而存

---

① 从许多我们十分景仰的当代哲学家身上，我们都能找到各种以空间来构造内部和外部的思想。这些哲学家甚至包括远离辩证法的 Foucault 和 Blanchot，甚至包括滞留在现代思想的最含混、最模糊的一点上，滞留在内部和外部间的空地上的 Derrida。关于 Foucault 和 Blanchot，请参阅 Foucault 的文章“Maurice Blanchot: The Thought from Outside”，该文收录于 *Foucault/Blanchot*(New York: Zone Books, 1987)。关于 Derrida，请参阅 *Margins of Philosoph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② 参阅 Fredric Jameson 的专著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在。在后现代世界中,一切力量和现象都是人工的,或者,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是历史的一部分。

在另一种颇为不同的现代辩证关系中,外界同样在消退。那就是自由政治理论中界定着公众与私人之间关系的辩证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公众空间构成了自由政治的领域,可在后现代世界中,这种公众空间也正逐步趋于消失。根据自由主义传统,处在私人空间中的现代人将公众空间视为自己的外界。外界是适合于政治的场所,在那里,个人的行动暴露于他人面前,并从他人处寻求认可。① 可在后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样的公众空间也正变得越来越私人化了。城市外景正将其焦点由人们共有的广场转移到各种封闭场所之上,如购物中心和高速公路。在洛杉矶和圣保罗这样的大都市中,建筑和城市规划正越来越趋向于限制公众的进入和互动,其程度已足以避免不同人群间的偶遇,制造出一系列受保护的内部和孤立的空间。② 想想看,巴黎的郊区已成为一系列无定界、不明确的空间,这种空间促进孤立,而非交流互动。公共空间的私人化程度已如此之高,以至于再用私人与公众、内部与外界间的辩证关系来理解社会组织已毫无意义了。可供现代自由政治发挥作用的空间已消失了,故而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的后现代、帝国式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政治的缺失。

这样看来,盖伊·德波尔对景观社会的分析在这种社会形成30年后就愈发显得中肯和紧迫。③ 在帝国社会中,景观社会是一处虚拟的场所,或更准确地说,是政治的虚无地带。景观社会同时具有统一性和弥散性两种性质,以至于无法区分出孰为其内部,孰为其外界,也就无法在

---

① 在这里,我们所想到的主要是 Hannah Arendt 在她的专著 *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中表达的政治观点。

② 关于 Los Angeles,请参阅 Mike Davis 的专著 *City of Quartz*(London: Verso, 1990)。关于 Sło Paulo,请参阅 Teresa Caldeira 的文章"Fortified Enclaves: The New Urban Segregation",该文刊载于 *Public Culture*, no. 8(1996)。

③ 参阅 Guy Debord 的专著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New York: Zone Books)。

自然和社会间、在私人和公众间划定分界。在这样一处虚拟场所中，关于公众的自由主义观念（公众就是人们在他人注视下行动的外部空间）也被推广以至包容全部，或者说被抽去了实际内容。

最后，军事意义上的外界也不再存在。当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当代历史变迁的一个界定特征就是历史的终结时，他的意思是说大规模冲突的时代已告终结。主权力量不再面对它的他者，不再面对它的外界。它正在逐步扩大它的疆界，直至最终整个地球都成为它的领土。[①] 帝国主义战争和抗击帝国主义战争的历史已走到尽头，历史的终结引入了和平的统治，更确切地说，我们已进入了小规模内部冲突的年代。从洛杉矶到格林纳达，从摩加迪沙到萨格勒布，帝国的每一场战争都是内部事务，是警察行动。实际上，对外武装力量和对内武装力量在任务上的区分也已越来越淡化、越来越不明确了。

对我们而言，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实际指的是现代性的核心危机的终结。这一贯存在于现代之中，并界定着现代性的冲突，构成了现代主权的基础。黑格尔式的历史观视历史为矛盾的辩证运动，而历史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也只是在这一意义上终结了。界定着现代冲突的二元对立已日渐模糊，为现代主权自我定界的他者也已破碎，不再确定，再没有一个外界来为主权领土划定边线了。正是外界的存在使现代性的危机具有了连贯性。今天，美国的鼓动家们越来越难以说出一个统一的敌手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躲躲藏藏的小敌手。[②] 现代性危机的终结引起了小型不明确危机的扩散，而我们更喜欢把所有这些小危机统称为一场无处不在的危机。

我们应当记住，资本主义市场是一部反对建立内外之分的机器。当

---

① 参阅 Francis Fukuyama 的专著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② “我们已注视到战争机器……正把它的目光投到一种新型的敌手身上。这个敌手不再是一个国家，或一种类型的政府，而是任何敌人。”上面这段文字出自 Gilles Deleuze 和 Félix Guattari 的合著 *A Thousand Plateau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它遇到壁垒和排斥时，它的发展就受到阻挠；相反，当它纳入越来越广大的空间时，它就兴旺发达，利润也只能产生自接触、契约、交换和商业贸易。世界市场的实现使这种趋向最终到达预定点，最理想的形式是：在世界市场之外再无其他，整个地球都成了它的领域。[①] 我们不妨借用世界市场的模式帮助我们理解帝国主权。或许，正如福柯将环形监狱视为现代权力的图示，我们也可将世界市场视为帝国力量的图示。[②]

现代性空间中纵横交错的沟壑造就出许多场所，这些场所一直在同自己的外界进行着辩证游戏，它们的基础也就在于此。而帝国空间则是平滑连续的。或许，它看上去已摆脱了现代性边界所造成的分裂或沟壑。可实际上，在它的表面上，如此多的错误线条纵横交错，它仅仅表现为一片连续的、统一的空间。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性界定明确的危机已让位于帝国世界中无处不在的危机。在帝国平滑连续的空间中，权力没有一个确定的场所，它既无迹可寻，又无处不在。

帝国种族主义

在我们的社会中，种族主义的构造正在发生着改变，而由现代主权到帝国主权的变迁展示出了变化之中的种族主义的多张面孔中的一张。首先，我们应认识到现在种族主义的基本轮廓已越来越难辨认。实际上，政客们、媒体，甚至历史学家都在告诉我们：种族主义正在稳步后退。以奴隶制的寿终正寝，到非殖民化斗争，直至民权运动，某些传统的种族主义行径确实已消亡了。会有人倾向于认为，南非种族隔离法的废除，

---

① 毫无疑问，在世界市场中存在着一些匮乏区，在这些区域内，资本和商品的流动都降至底线。有些时候，外部的政治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匮乏（如对伊拉克的制裁）；另一些时候，匮乏是由全球资本的内部逻辑造成的（如非洲撒哈拉地区的贫穷和饥饿）。然而，在任何时候，这些匮乏区并不构成资本主义市场的外界。相反，它们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市场之内发生，是全球经济阶梯上最低的一级。

② Gilles Deleuze 对 Foucault 的 diagram 观念作了精彩的分析。请参阅他的专著 *Foucau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象征着整个种族隔离时代的终结，然而，在我们看来，很明显当代世界中种族主义非但没有退却，反而在前进，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皆是如此。之所以它看上去好像正在退却，仅仅是因为它的形式和策略都改变了。如果说，在过去我们把二元式分裂和严格的排斥手段（在南非、殖民地城市、美国东南部各州和巴勒斯坦）视为种族主义的代表模式，我们现在就必须问一问：种族主义在后现代时代的形式是什么？在今日之帝国社会中，它又采取了哪些策略？

许多分析家把这种转变描述为种族主义的主要理论形式的转变，即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由生理向文化的转变。最主要的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及与之共生的隔离行径都是围绕着种族间生理差异这个核心。血缘和基因支持起肤色差异，使它成为种族差异的实际内容。被统治民族被视为非人类，被认为是另一类存在。这些以生理差异为基础的现代种族主义理论暗示出，或偏向于一种本体差异——一道存在类别上必需的、永恒的、不变的裂缝。于是，现代反种族主义理论也就相应反对生态原质论，坚持不同人种间的差异是由社会和文化力量构成的。这些现代反种族主义理论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社会构成论可以把我们从生理决定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如果人们间的差异是由社会和文化因素决定的，那么所有人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在本体上都属于同一类别，都具有相同的本质。

然而，随着世界向帝国转化，生理差异也已被社会和文化能指所取代，后二者成为种族间仇恨和恐惧的主要表现。这样一来，帝国式的种族主义理论就从后方向现代反种族主义发起攻击，而且实际上把敌手的论点收归己用。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同意种族并不构成可分隔的单位，自然也不可划分为不同的人类种族。它也同意个人的行为、能力及性格倾向不是血缘和基因的结果，而是由个人所属的，由历史决定的文化所决定。①

① 参阅 Étienne Balibar 的文章“Is There a 'Neo-Racism'?”，该文刊载于 Étienne Balibar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合编的 *Race, Nation, Class*（London: Verso, 1991）。

故而,差异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社会历史的偶然结果。帝国式种族理论同现代反种族理论所说的相差不多,在这方面确实也很难把它们分得很清。实际上,正因为这种相对主义的、文化主义的论点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反种族主义的,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才会表现出反种族主义的相似性,而帝国式的种族主义理论也才会看起来根本就不是种族主义。

然而,我们应当更用心观察,看看帝国式的种族主义理论是如何运行的。伊苔那·巴里巴把这种新型种族主义称为差异论式的种族主义,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或更准确地说,一种不依赖生理种族概念的种族主义,虽然生理差异作为种族主义的基础和支撑已被摈弃,文化却被拉了来,发挥起了生理差异曾发挥的作用。[①] 我们习惯于认为,天性和生理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而文化则是流动和可塑的。文化可以在历史中发生演变,不同文化还能融会,生成出无限多的混合体。然而,在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者看来,不同文化的流动性和兼容性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分析到最后,不同文化和传统间的差异是不可逾越的。根据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允许不同文化融合,或坚持它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非裔美国人和朝鲜裔美国人必须彼此分开。

作为一种社会差异理论,文化种族主义的"原质论"色彩丝毫不比生理种族主义淡。或者说,它至少也为社会分离和隔离创造出一个同样有张力的基础。然而,它又具有多元主义的理论基础,它认为所有文化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只要人们同意依照彼此间同一性的差异行事,只要人们在行动中体现出各自的种族,这种多元主义立场也就乐于接受所有的差异。因此,种族差异被认为在原则上是偶然性的,但在实践中,它们作为社会隔离的标志又是必需存在的。在理论上,文化对生理差异或种

① 参阅 Bailibar 的文章"Is There a'Neo-Racism'?"。

族的取代就变成了一种种族保护理论。[①] 种族主义理论的这种变化向我们展示出帝国式理论如何能做到既吸纳传统的反种族主义立场，同时又保存住社会隔离原则。

在此刻，我们必须小心地注意到，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本身只是一种隔离理论，而非一种等级理论。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在各种族间设定了一套等级秩序，以之为实行隔离的基础条件；而帝国式种族主义在不同种族或民族孰优孰劣这一问题上闭口不语，将其视为纯偶然性、实际性的一件事。换而言之，它不再将种族等级视为社会状况的原因，而视其为结果。举例而言，在某些地区，非裔美国学生在学习倾向测试中的得分一向比亚裔美国学生低。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是因为种族劣性，而是文化差异。亚裔美国人的文化总是给予教育以很大的重要性，它鼓励学生集体学习，等等。不同种族之间的等级差异成了已被决定的后决状况，成了文化的结果。根据这种理论，种族霸权和统治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理论问题，因为它是在自由竞争中产生的。

当然，种族主义实践并不一定就会老老实实地按照种族主义理论行事。然而，从我们的分析，已很清楚帝国式的种族主义的实践行为已失去了一个核心支持。它已不再拥有种族优越理论，而这种理论也正是现代种族排斥行为的基础。根据加利奥·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欧洲种族主义的运行从来就没有依赖过排斥，或指认某人为他者……种族主义的运行受决定于与白人面孔比较的相去程度，它一直努力把不相符特征融合进来，融入向心性越来越强的波潮中……从这个角度来

---

① 参阅 Walter Benn Michaels 的专著 *Our America: Nativism, Modernism, and Plur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和他的文章“Race into Culture: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Cultural Identity”，刊载于 *Critical Inquiry*, 18, no. 4 (Summer 1992)。Benn Michaels 批判了出现在文化多元主义中的那种种族主义，但这样一来，他又似乎支持了一种新自由种族主义。参阅 Gordon 和 Newfield 在他们的文章“White Mythologies”中对 Walter Benn Michaels 所作的精彩批判。

看,不存在所谓的外界。"①德勒兹和瓜塔里向人们的一般认识发起挑战,他们不再从二元分裂和排斥的角度去构想强制种族主义行为,而将其构想为一种差别性容纳策略。没有哪一种身份被标为他者,也没有哪一个人被排斥在领域之外,所谓外界根本就不存在。帝国主义式的种族主义理论无法将人种之间的原质区别确立为自己的出发点,同样,帝国式的种族主义行为也无法以对种族他者的排斥为自己的起始点。白人霸权在发挥其功能时,它首先进攻他者,然后再根据与白人特征的相去程度将各种差异一一征服。对奇怪的、未知的他者的仇恨与恐惧与这毫无关系。仇恨诞生于相似性中,并通过邻里间的差异程度得到细化、精化。

这也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中就没有种族排斥。毫无疑问,一条条由种族壁垒造成的隔离线纵横交织,它们穿越城市,覆盖全球。我们要表达的要点是:种族排斥通常是差别性容纳的结果。换而言之,今天再把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法当作种族等级的典型模式已是错误。差异并未被书写入法律之中,而他者性的提出也不会走向极端,成为他者。帝国不会将差异视为绝对,它从不把种族差异确立为天生的、必然的差异,而是把它们确立为等级上的、偶然的差异。征服实现于对日常活动的统辖之中,尽管这些日常活动流动多变,却能制造出稳定、残酷的种族等级。

认识帝国式种族主义的形式和策略有益于在更普遍的意义上突出现代主权和帝国主权之间的对比。殖民地种族主义首先把差异推到极端,接下来再纳入他者,以之为自我的负基础。现代时期民族的形成同这种操作紧密相连。对某一个民族的界定不仅仅在于其成员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欲望或潜能,更在于其与自身的他者的辩证关系。对一个民族的界定总是根据地域(无论是实在的,或是虚拟的)进行的。与此形成对照,帝国秩序同这种辩证关系毫不相干。帝国式种族主义,或曰差别性种族主义,将他者融入自己的秩序中,然后再在一个控制系统中

① 参阅 Deleuze 和 Guattari 合著的 *A Thousand Plateaus*。

对差异进行协调统一。这样，固定的、生理性的民族观就趋于消融，化为一个流动的、无定形的民众。当然，各种冲突和抗争之线纵横贯穿其中，但其中任何一条也无法成为固定的、永久的分界。帝国社会的表层处在连续不断的变化更新之中，其程度如此之剧，以至于令任何地点的观念都失去稳定性。现代种族主义的核心一刻发生在边界上，发生在内部与外在的对比、对抗之中。正如杜·波依斯在近一百年前所说的，20 世纪的问题也就是肤色分界线的问题。与之相比，帝国式种族主义向 21 世纪展望，它所依赖的是差异的运行，以及在其连续扩张的领域内对微观冲突的操控。

主体性的产生和败落

内部和外界之间的分界正日益模糊，这对主体性的社会生产有着重要意义。现代社会理论对制度进行了分析，其最核心，也是最常见的论点之一是：主体性并非预定的、原生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形成于社会力量立场中。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理论逐步清除了主体性定于社会的观点，而将主体性的生产建立在主要社会制度的功能中，这些制度包括监狱、家庭、工厂、学校等。

在此应特别提到这一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首先，主体性生产是一个恒常的社会生成过程。当你的老板在楼梯上向你打招呼，或一所高中的校长在学校走廊里向你打招呼时，一种主体性就形成了。在具体制度环境中，为主体所展开的物质行为就构成了主体性的生产过程。反过来说，主体通过自身的行动而被作用、被生成。其次，制度为主体性生产的实施提供了具体的地点（家庭、教堂、教室，等等）。现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应被视为由主体性生产工厂构成的群岛。在人的一生中，个人穿入，再穿出这些制度（从学校到兵营再到工厂），被它们打造成形。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关系具有基础意义。每一种制度都有着自己的一套

规则和主体化逻辑。学校对你说“你再也不是在家了”,军队又对你说,“你再也不是在学校了”。[①] 然而,在每一种制度的高墙内,个人至少部分受到庇护,免受其他制度的左右。在修道院中,你通常就免受家庭制度的左右;在家里,你通常就超出了工厂纪律的节制范围。制度的这种定界分明的地域性在被制造出的主体性的规则的、固定的形式上得到体现。

在转向帝国社会的过程中,现代状态的第一个方面仍保持原状,也就是说,主体性仍是在社会工厂中被制造出来。实际上,社会制度的主体性生产在方式上更加集中。我们可以说,当社会构成论这一现代理论已走到极端,当一切主体性都被确认为人造品时,我们也就达到了后现代时代。然而在今天,正如人们都在说的那样,所有涉及到的机制几乎在所有地区都陷入了危机。既然如此,上述的一切又怎么可能呢?现代制度的普遍危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那些制度已不再生产主体性。真正已发生了改变的是第二个条件。这也就是说,对主体性生产地点的界定已不同于以往。换而言之,危机意味着今天,曾在过去界定各种制度的有限空间的封闭边界已崩溃,从而令原先主要在各制度的高墙之内发挥作用的逻辑现在已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内部在外界已变得难以区分。

尽管这是一场无所不在的危机,但在不同情况下,其表现也有很大差异。举例而言,在美国人口中,核心家庭的比例持续下降,而被囚禁人口的比例都在持续上升。核心家庭和监狱这两种制度都处在危机之中,因为它们发生效力的地点都已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人们不应该认为,核心家庭的危机已带来父权的衰落。相反,在整个社会领域,“家庭价值”的话语与实践似乎无处不在。老式的女权主义口号“个人也是政治”已被颠倒了过来,以至于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划界已彻底破碎。[②] 同样,监狱

---

① 参阅 Deleuze 和 Guattari 合著的 *A Thousand Plateaus*。

② 参阅 Lauren Berlant 的专著 *The Queen of America to Washington City: Essays on Sex and Citizenship*(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的危机意味着卡瑟罗(carceral)逻辑和技术正日益扩大到社会其他各领域。在帝国社会中,主体性的生产正越来越趋向于不受任何具体地点的限制。一个人总是仍在学校中,仍在监狱中,等等。这样,随着边界的普遍崩溃,制度的功能同时得到广化和深化。生产地点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于生产出的主体性在形式上的不确定性。这样,帝国的社会制度可被视为处于由主体性的生成和衰败构成的流动过程中。

这种转变并不仅限于主要国家和地区,而是趋于普遍到整个世界,尽管各地程度不同,殖民地当局在为自己辩白时,总是为其在殖民地建立起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大唱颂歌,说这些制度将构成新市民社会的背景。在现代化过程中,最强大的国家向外输出自己的制度形式;而在当前的后现代过程中,被输出的则成了制度的普遍危机。帝国的制度结构就像一套带病毒的软件程序,不断地调整着、败坏着周围的制度形式。帝国的控制型社会正趋于成为今日各地的秩序。

帝国的三项必需

帝国的控制手段实际上由三个分界明确的阶段构成:首先是包容阶段,紧随其后是区别阶段,最后是操控阶段。第一阶段代表了帝国宏大、自由的一面。一切都被迫进入帝国的疆界之内,不管他们的种族为何、教条为何、肤色为何、性别如何、性倾向如何。在包容阶段,帝国对一切差异视而不见,它在接受时完全不做任何区别。它把僵硬的、难以操控的,从而也易于引起社会冲突的差异撇到一边,从而达到了普遍包容。[①] 把差异撇在一边,它要求我们把差异视为非本质、相对的。它也要求我们想象出一种状态的存在,在这种状态中差异并非不存在,但可被我们

① 帝国的自由秩序取得那种 John Rawls 所说的"跨越的共识",所有人被要求把他们的主义搁置在一边,以为宽容服务。参阅 John Rawls 的专著 *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所忽略,一层忽视的面纱为普遍接纳做好了准备。当帝国对这些差异视而不见时,当它强迫自己的成员把这些差异撇在一边时,就能够出现一种横跨整个帝国空间的广泛共识。实际上,把差异撇在一边也就意味着抽去帝国的各种构成主体的潜能,由此而产生出的中性权力公共空间使普遍权力观的建立和合法成为可能,而帝国的核心也将由这种权力观形成。产生于包容性、中性、无差别性的法则就是一种普遍基础,因为它同时应用于在帝国的规则下所有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主体。故而,在这第一阶段,帝国就是一部普遍融合的机器。它张开大嘴,食欲无穷。它邀请所有人和平地走入它的领域。帝国从不加强它的边界以把其他人驱赶走。相反,它把人们拉入它的秩序,就如一个巨大的漩涡。由于差异或受到抑制,或被撇到一边,帝国成了一种平滑的空间,主体可滑行于其上,而遇不到大的阻碍或冲突。

帝国实施控制的第二阶段是区别阶段,它涉及到对被接纳的差异的肯定。从司法角度看,差异必须被撇到一边;可从文化角度看,差别应受到欢迎。既然现在,这些差别已被视为是文化的、偶然的,而非生理的、原质的,它们就被认为不会对帝国的共同性核心或广泛共识构成冲击。它们都是非冲突性的差异,属于那种必要时,就可撇到一边的差异。举个例子,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在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少数民族认同感得到了美国、联合国及其全球性政体的支持,正被(再)制造出来,地方语言、传统地名、手工、艺术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之物都受到称道,被视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重要成分。[①] 这些差异都被想象为是文化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因为人们认为它们不会造成不可控制的冲突。相反,它们将作为一种和平的地区同一力量而发挥作用。与之类似,美国官方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许多促进也涉及对传统的民族和文化差

① 关于中国的民族认同的(再)出现,参阅 Ralph Litzinger 的文章"Memory Work:Reconstituting the Ethnic in Post-Mao China",该文刊载于 *Cultural Anthropology*,13,no.2 (1998)。

异的称颂。总而言之，帝国并不制造差异，它只是拿来已有差异，再加以利用。

在帝国控制的区别阶段之后，就必须是对这些差异的操控和等级分化。殖民力量寻求确定纯正的、分离的同一性，而帝国则借助流动和混合而繁荣。殖民工具是一件锻造出固定的、区别明确的塑件的模子，而帝国的社会控制则借助于调节来发挥其功能，“就像一个从一刻到另一刻不断变化的自我毁灭的塑件，又像一个图案在不停变化的筛子。”①殖民主义者只设立一个等式，也只给出一个答案，而帝国则面临着复杂的多元变量，也接受多种不同答案。尽管这些答案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却都是有效的。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认为殖民主义更注重意识形态，而帝国则更注重实用效力。作为一个例证，让我们看一看 20 世纪初，在新英格兰的工厂和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煤矿中实行的帝国式行径吧。这些工厂和煤矿主要依赖新近来自东欧国家的移民劳力，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把本国的工人斗争传统也带入美国。然而，工厂和矿山的老板们并未因此就避免把这些具有潜在爆炸力的工人混合在一起。实际上，他们发现，只要对同一车间和矿井中不同民族背景工人的构成加以精心控制，就可形成强有力的控制模式。在每一工作单位内，其成员在语言、文化、民族上的差异具有稳定功能，它们可被用作对抗工人组织的武器。使不同的同一性不会在美国这个熔炉中分解，确保每一民族群体继续居住在分隔的社区中，保存各自间的差异，这有利于老板的利益。

从近年来中美洲地区的香蕉种植园所采用的劳工管理作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策略。② 在劳动过程中，多元的民族分裂成为对劳工

---

① 参阅 Gilles Deleuze 的文章“Postscript on Control Societies”，收录于论文集 *Negoti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参阅 Phillipe Beourgois 的专著 *Ethnicity at Work: Divided Labor on a Central American Banana Pla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控制的一个成分。当地的工人民族群体祖籍为欧洲、非洲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少来自不同的美洲印第安群体。当地跨国公司就据此对他们进行不同方法、不同程度的剥削。其实已证明，沿着民族和同一性分界线而展开的分裂和冲突提高了资本的盈利，也便利了资本对劳工的控制。理所当然，彻底的文化同化不会成为帝国的首先策略。（这同帝国的司法融合形成对比。）在20世纪末，不仅在欧洲，同时在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都再次出现了民族和国家差异。这使得帝国中的等式愈发复杂，其中包含了数不清的变量，且处在恒常的流变状态之中。这一等式并没有一个惟一的答案，这其实并不成为问题。恰恰相反，偶然性、流动性和灵活性恰恰是帝国力量之所在。帝国的答案并不是否定或淡化差异，而是肯定它们，在有效的控制系统中安排它们。

“分而治之”尚还不是帝国策略的准确公式表述。更多情况下，帝国并不制造差异，而是承认已有的、潜在的差异，赞颂它们，在总的控制经济中操控它们，帝国的三项必需也就是融合、区别、操控。

从危机到败落

在第二部分的开头，我们详细论述了现代主权是危机这一观点。持续的冲突使危机得到界定。冲突的一方是欲望这一内在力量和民众的团结合作，而冲突的另一方则是力图抑制前者，向前者发号施令的超验权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主权并非围绕一个核心冲突而建立起来，而是通过由许许多多微小冲突构成的灵活网络建立起来的，这与现代主权恰恰形成对照。在帝国社会中，各种冲突游移不定、四处扩散。它们也不可被限定在具体地区之内：矛盾无所不在。因此，界定着帝国的主权的概念不仅是危机，我们不妨称其为一场无处不在的危机，我们也更喜爱称之为败落。在林林总总的关于帝国的古典文献中，从波利比奥斯到孟德斯鸠到吉朋，帝国从其最初形成起就被形容为颓废和败落，

这已是常识。

败落一词很容易被人们误解。我们将帝国式主权界定为败落，并不是对它进行道义上的控诉，说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根据败落一词在现当代的用法，它所表达的概念确实很难胜任我们的任务。当今，该词不仅涉及反常的，更含有远离道德、善良、纯洁等意。在该词的使用上，我们借用了一项在当代已为大多数人所废弃的古代用法，我们的意图则是以该词指涉一种普遍的分解或畸变过程，而不含有任何道德贬义。[①] 举例而言，亚里士多德把败落理解为身体的一种转变过程，它也是生成的一个辅助过程。我们不妨把败落看作一种逆生成过程——一种与生成和合成反向的过程，一个使空间不再发生改变的变形阶段。当我们提到帝国的颓废、败落、退化时，我们必须忘掉这些词在人们常识中的形象，那样的道德评判在我们这里完全是呆错了地方。更重要的是关于形式的严格讨论。换而言之，帝国的特征就是形式具有流动性——由形成与毁灭、生成与退化构成的涨落盈蚀。

说败落界定着帝国式主权，我们的意思是：一方面，帝国不纯净，是个混合体；另一方面，帝国规则主要通过分裂、解构而发挥其功能。分裂和解构发生于帝国社会的每时、每地，但并不意味着帝国正在奔向毁灭。我们所描述的现代性危机并不指向任何迫在眉睫，或必然发生的崩溃，同样，帝国的败落也并不指向可见的毁灭。换而言之，现代主权的危机不是暂时性和特殊性的，而是现代性的常态。同样，败落也不是帝国主权的偏离，而是其精髓。比方说，帝国的经济正是借助败落而发挥其功能，舍此以外别无他途。当然，有一种传统将败落视为帝国的悲剧性缺陷。如果没有这个缺陷，帝国可能就已大功告成了。莎士比亚和吉朋的作品就是两则例子，尽管他们两人间差距也非常大。但我们不把帝国的

---

① 参阅 Aristotle 的 *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Reiner Schürmann 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了生成于腐败的哲学概念。请参阅其专著 *Des hégémonies brisées*（Mouvezin：T. E. R. 1996）。

败落视为偶然,而是视其为必然。或者,更准确地说,帝国要求一切关系都成为偶然。帝国的权力正是建立在对一切确定的本体关系的破坏和分裂之上。在本体的真空中,败落成为客观和必然。败落引起了矛盾的扩散,在此之上,帝国主权滋蔓成长,稳定帝国的恰恰是它的不稳定和不纯净,而抚慰帝国的正是它所引发的焦虑和惊慌。永久的更改和变形、反基础论的基础、去本体式的存在,这一切因败落而得到正名。

我们已抵达一系列区分点,它们在概念上标志着从现代主权到帝国主权的变迁:从人民到大众,从辩证对立到处理混杂,从现代主权的固定处所到帝国的虚无,从危机到堕落。

拒绝

巴特比宁愿不做。梅尔维尔这则经典故事的神秘之处就在于绝对的拒绝。当他的老板要他完成自己的工作时,巴特比一遍又一遍安静地回答:"我宁愿不做。"梅尔维尔笔下的这个人物正应从了拒绝工作的悠久历史。任何一个有点理智的工人当然都希望能拒绝老板的权威,但巴特比把拒绝推到了极端。他并不是反对做这项或那项工作,也不为自己的拒绝提供任何理由——他只是被动地,但绝对地拒绝。巴特比的行为实在让人发不出怒,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如此从容和宁静,但更多是因为他的拒绝如此无边无际,以至于成为绝对。他就是宁愿不做。

考虑到梅尔维尔对形而上学的巨大偏好,巴特比这个人物会引起本体意义上的阐释就不足为奇了。他的拒绝如此绝对,以至于他自己看起来是一片空白,成了个没有特性的人,或者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的话说,仅仅是个人。巴特比的纯粹被动,他对一切具体的拒绝,这些向我们展现出一个一般存在的形象,一个纯粹的存在,仅仅是存在,再无其他。随着故事的发展,他剥落许多,一步步接近于赤裸的人性、赤裸的生活、赤裸的存在。最后,他消亡下去,在"坟墓",这所曼哈顿

臭名昭著的监狱中化为乌有。

J.M.柯蒂的杰出小说《麦克·K的生平》中的中心人物麦克·K也是一个绝对拒绝式的人物。然而，巴特比是静止的，停留在纯粹的被动中，几乎处于麻痹状态，麦克·K却马不停蹄地一直在运动。麦克·K是个园艺匠，一个简单的人，他是如此简单以至于看上去简直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居住在一个被内战所分隔的假象国度中，他的行程不断被权威所设立的监狱、路障、检查站所阻断，但他总能不声不响地拒绝它们，继续自己的行程。麦克·K也不仅仅是为了永远旅行才旅行。那些障碍所阻断的也并仅仅是麦克·K的行程，它们更阻断了生活，麦克·K绝对地拒绝它们，以保持生活的流动。他真正想做的就是种南瓜，照看它们四处生长的藤叶。麦克·K对权威的拒绝同巴特比一样绝对，这种绝对和简单的性格也把他推上本体纯净的层面。K也接近了赤裸裸的普遍性的层面，他是个“无法再分类的人”，仅仅是个人。

这些简单的人和他们的绝对拒绝正迎合了我们对权威的憎恨。拒绝工作和权威，或者更准确地说，拒绝自愿的屈服，这正是解放性政治的开端。许久以前，依苔娜·德·拉·多蒂(Etinne de La Doetie)就宣扬过类似的拒绝政治：“下定决心，不再服务，你立刻就会得到解放。我不要求你们亲手推翻暴君，你们只要不再支持他就行了。然后，你们就会看见，就如同一尊被抽去底座的巨大雕像，暴君会被自己的重量压倒，摔成碎片。”拉·多蒂认识到了拒绝所具有的政治力量，认识到了把我们自己从支配关系中抽出所具有的力量，认识到通过出逃，可以颠覆主宰我们的主权力量。巴特比和麦克·K将拉·多蒂的政治学继续了下去，并把它推到极点。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拒绝是解放性政治的开端，但它也仅仅是个开端。拒绝本身是空洞的。巴特比和麦克·K或许有着美好的心灵，但他们处于绝对纯净中的存在却挂在一个无底深渊边。他们在逃脱权威的线路上处于完全的孤独之中，他们始终踏在自杀的边缘。从政治角度

讲，单纯拒绝（对工作、权威、自愿屈服）也只能把人们引向社会自杀。斯宾诺沙说，如果我们仅仅把暴君的头颅从社会躯体上砍下来，我们只能得到社会残缺不全的尸体。我们要做的是创造出新的社会躯体，而这个任务远不能止步于拒绝。我们的逃亡和出逃线路必须是建设性的，必须能创造出实在的替代物。在简单拒绝之后，或者说作为拒绝的一部分，我们更要构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这项工程不会引领我们成为单纯的人，我们会成为人中之人，人性将因集体的智慧和对社会的爱而丰富，而倍增。

间奏——反帝国

这座天国之城还在俗世间，行进在通向圣域的路上。就在此时，它已向所有的民族发出召唤，于是聚集起一个充斥着各地的外来者，操着各种语言的社会。

——圣奥古斯丁

我们要摧毁所有那些以纪念“为祖国而献身者”的名义而修建起的纪念碑，它们滑稽可笑地矗立在每一所城镇，用轻蔑的目光向下灼视着我们。在它们的旧址上，我们要竖立起新的纪念碑，为了那些逃兵。逃兵的纪念碑同样也代表着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因为每位死者在离开人世前都在诅咒战争，在嫉妒逃兵的幸福。抵抗源于叛逃。

——反法西斯党人，威尼斯，1943

此时，我们的讨论抵达它的转折点。不妨先回顾一下此前我们的讨论轨迹——从确认现代性为危机到分析新的帝国主权形式的初次表述。这条轨迹允许我们理解正在转变之中的世界秩序的构成。可除非我们可以指定生产的新统治形式，那一秩序也只是一具空壳。不仅如此，我们至今还未能以任何连贯的语言指出，究竟哪种类型的政治主体可能抗

争帝国，并最终将其颠覆。其原因是，那些政治主体只会出现在生产的领域。仿佛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幢幢魅影，可正是这瞳瞳魅影将激活我们的未来。让我们下探到生产的隐蔽领域，瞧一瞧究竟何方神圣在那里呼风唤雨吧。

我们已经准备触及我们的问题领域的生产性、本体性维度，以及源于这一维度的抵抗。然而，我们仍然不能指出任何已存的、具体的、详细的帝国政治替代品。我们还没有抵达阵位，就算到了本书的结尾，我们仍然没有抵达阵位。我们这样的理论叙述从来都不能产生出任何有效的蓝图，这样的蓝图只会出现在实践中。马克思在他思想发展的特定阶段也需要巴黎公社来帮助他完成飞跃，以具体的语言构想出共产主义，将其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替代物。类似的某次实验或一系列几次实验也将诞生于集体性实践的智慧中，今天的人们也肯定需要它们来迈出实在的一步，创造出超越帝国的新社会肌体。

大联盟

我们的研究始于这样一个假设：只有在帝国最普遍的层面上，只有在它的全球性中，我们才能理解帝国的力量，也才能理解帝国式主权的运行机制。我们相信，当对帝国和它的全球市场的挑战和抵抗进行到最后阶段，同样必须在同样普遍的层面上，即在全球的层面上推出其替代物。或许有人会提出一些孤立的特殊社群，这些社群因其或种族的、或宗教的、或地域的特殊性而脱离帝国，以固定的疆界保护自己免受帝国力量的侵袭。可任何这样的提议最终只会产生出贫穷的隔离区，就像中世纪欧洲城市中的犹太人聚居区。任何以有限的地区自治为目标的计划都无法抵抗帝国。我们既无法退回到先前的社会形式中，也无法在孤立中前进。我们必须奋力穿过帝国，在它的另一边突出。德勒兹和瓜塔里争论说，与其抵抗资本的全球化，我们不如加速它的进程。他们问道：

“哪一条才是革命的道路？还存在这样的道路吗？我们应该从全球市场撤出吗……？或者，我们应该向相反的方向前进吗？再进一步说，我们应该随着市场、解密和去地域化的大流一起前进吗？”[①]要抵抗帝国，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它自己的普世范围上，推动它自己提供的进程，直至这些进程超出它们自身的极限。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挑战，学会以全球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全球化之于反全球化，帝国之于反帝国，只有它们才棋逢对手。

圣奥古斯丁曾预见一项抗争腐败的罗马帝国的工程，他的预见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灵感。没有任何局限性社群可以战胜帝国规则，并提供一种替代物；要做到此点，惟一的选择是一个普世的天主教社群，这样的社群将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语言都汇聚到共同的天国之旅中。神圣之城市既是一座普世之城，也是一座由陌生人构成的城市，所有的陌生人汇聚到一起，相互交流，彼此合作。与圣奥古斯丁不同，我们朝往圣域的航行不会驶向任何超验的、尘世以外的目的地，它的目的地始终就在尘世之内。它不停地运动，把互不相识的人聚集到一起，把这个世界变成家园。这一切既是手段，也是目标，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目标的手段。

从这一角度说，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可以说是现代的奥古斯丁式伟大工程。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间，联盟佬组织起强劲有力的罢工和反抗行动，其范围横跨整个美国。从马萨诸塞的劳伦斯到新泽西的佩特松，到华盛顿州的埃弗瑞特，处处可见他们的踪影。[②] 联盟佬持之以恒的运动实际就是一种尘世中的朝圣之旅，它在旧世界的躯壳中创造出新的社会，但它并没有固定的、稳定的规则结构。（实际上，官方的左派

---

① 参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② 参见 John Dos Passos, *USA*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6)，及 Joyce Kombluh, ed., *Rebel Voices: an I. W. W. Antholog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最初对 IWW 的批评就是尽管它的罢工很有力,也常取得胜利,但从来没有留下任何具有持久性的联盟结构。时至今日,同样的批评依旧可闻。)联盟佬在广大的具有高流动性的移民人口中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因为他们会说那一混合劳工大军的所有语言。联盟佬在英语中称为"Wobbly",关于其起源,有两种说法被广为接受,而这两种说法都反映了其运动两个核心特征:组织的流动性和民族—语言的混杂性。第一种说法认为"Wobbly"的意思是没有中心,这体现出 IWW 的战斗行动所具有的流动性强,可遇见性弱的特征。而根据第二种说法,"Wobbly"这一名称源于一位居住在西雅图的中国厨师的错误发音,他把"IWW"读成了"I Wobbly Wobbly"。IWW 所最关注的是工程的普遍性。全世界的产业工人,不管他说什么语言,属于哪个种族,也不管他处身于哪个行业,都应该汇聚到这个"大联合"中来(可实际上,这一联合仅仅扩展到墨西哥。)

我们不妨从 IWW 中汲取灵感(同时也在此时同奥古斯丁说再见),将我们的政治视野投向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激进共和主义传统。在今天,做一名共和主义者究竟意味着什么?激进共和主义的立场构成了现代性中的激进民主式的另类选择,而在当今这个后现代的时代,采取这样的斗争立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使批判不仅可能,更是有效的立足点究竟在何处?在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型中,我们还能找到某处位置,从那里发起批判,构筑另类的选择吗?或者,如果我们注定要被打入帝国中的真空地带,我们还能够把它建设成一个强有力的真空地带,并将其具体化,使之成为后现代的共和主义领域吗?

真空地带中的剥削

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请允许我们先稍稍偏离下主题。我们早先也提过,马克思的理论方法建立在内与外的辩证法之上,同现代对现代

性的批判传统相吻合。无产阶级斗争从实在和本体的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它迫使资本不断采纳更高水平的技术，从而改变了生产的过程。[①] 斗争迫使资本不断改良生产关系，同时也改造支配关系。从手工制造到大规模工业，从金融资本到跨国公司对市场的重构，直至市场的全球化，有组织劳动力量的创造性始终决定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形态。辩证法贯穿于剥削所处地位的历史中。劳动力是最内在的因素，是资本的真正源泉。与此同时，劳动力也代表着资本的外部。也就是说，只有在超出资本以外的世界，无产阶级才能确认自己的使用价值和自身自律，只有在那里才能获得解放的希望。对剥削的拒绝——更确切地说，是抵抗、破坏、暴动、起义、革命——构成了我们所处现实的发展动力，同时也构成了它活生生的对立面。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内与外的关系完全是由无产阶级的双重位置所决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既停留在资本之内，又超脱于资本之外。如此的空间特性引出了许多政治立场，它们都梦想加强使用价值的地位，将其从交换价值和资本主义关系中提纯出来。

在当今世界中，上述的空间特性已经改变。一方面，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正扩展到一切地方，不再局限于工厂，而倾向于占领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另一方面，社会关系也完全浸透于生产关系中，已不可能再将社会生产和经济生产再区分开。生产性力量和支配系统间的辩证运动已不再有确定的场所，劳动力的一些根本性质无法再被把握。同样，剥削也无法再被具体化和量化。实际上，剥削和支配的对象已不再是具体的生产性活动，而是一般性的生产能力，也就是抽象的社会活动和它所具有的包容一切的力量。这种抽象劳动是没有固定处所的活动，然而它非常强大。它是脑与手，灵与肉的无间合作；它是流动中的广大工人大众的欲望和追求，同时它也是广大智力和情感工作者的智性力量和语

① 参见 Karl Marx, *Capital* (New York: Vintage, 1976), 1:563。

言、交往建设。①

今日,由使用价值界定的内部和由交换价值界定的外部已无处可寻,因此任何使用价值的政治学也销声匿迹,那样的政治学总是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可以区分这一幻想之上。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生产和剥削已经完结。无论是革新和发展,还是权力关系的不断重构,它们都没有走到尽头。相反,随着生产性力量越来越与具体地域脱钩,变得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它不仅生产出商品,更生产出丰富、强大的社会关系,这在今天更甚于往日。新的劳动力居无定所,然而,这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切处所。就在这无边无垠的真空地带中,他们从事生产、忍受剥削。帝国就是世界生产的真空地带,劳动在帝国中忍受剥削。与之相比,我们在此再一次发现现代共和主义具有革命性的形式。它仅仅是形式,因为它没有属于自己的地域;但今天,它成为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形式。今天,我们不再把它看做从个体和集体性主体中抽象而出的形式,而将其视为构成个体的肉体和灵魂的一般性力量。在全球的广度上,真空也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心脏、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四肢。

对立中的存在:游牧、离弃、逃亡

上面的认识再次把我们带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在今天,做一名共和主义者意味着什么?现代批判的反应是打开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辩证运动,而我们已经看到,这在今天已经不再可能。后现代共和主义的任何主张都必须建立在全球大众的活生生的体验的基础之上。在最基础的层次上,我们所能触及的一个因素是"对立意志"。一般而言,对立意志并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不服从于权威本来就是人类最自然、最健

① 参见 Antonio Negri, "Twenty Theses on Marx," in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Karl, eds., *Marxism Beyond Marx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及 Antonio Negri, "Value and Affect," *boundary* 2,26, no.2(Summer 1999)。

康的行为之一。受剥削就要反抗，对我们而言，这道理再明显不过了。条件允许，受剥削者还会造反。可今天，这道理却似乎没那么明显了。很久以来，政治学家都在说，问题不是为什么人们会造反，而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德勒兹和瓜塔里说："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仍然是斯宾诺沙曾清楚表述过的那个。斯氏问道：'为什么人们会坚定地为自己的屈从而战，仿佛那是他们的救赎？'"①今天，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并不是是否或为何人们要反抗，而是如何确定造反的对象。实际上，对敌人的无法确定常会领着反抗意志绕圈子。可想一想，当今的剥削已不在局限于具体的地域和领域内，而我们自身也如此透彻地沉浸在复杂的权力系统之中，确定敌人也确实不是件容易事。我们被视为敌人，忍受剥削，经历异化，接受命令，可我们并不知道如何确定压迫产生的地点。但是，我们仍在反抗，仍在斗争。

我们不该夸大这些逻辑上的悖论。尽管在帝国的疆界中，剥削和支配无法以具体的处所去界定，它们依然存在。它们在全球的范围内发布号令，这代表了一种颠倒的图像，就像我们在负片胶卷上所看到的图像一样。它代表了大众的生产性活动的普遍性的反像。然而，帝国的力量和大众的力量之间颠倒而对称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实际上，帝国的力量再也无法规范大众的力量，它只能在大众的一般性社会和生产能力上施加控制。从经济的角度上看，工资控制作为一种规范的功能业已被更灵活的全球货币体系所替代，具有实质内容的指令业已被控制的程序和警察机构所替代，支配的实施在交往网络中得以成型。剥削和支配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帝国的疆界里形成一种非地域性。尽管剥削和支配仍然被大众的肉体切实地体验，然而它们已弥漫到每一寸空间，我们已无处藏身。如果再没有一处地方可以被视为外部，那我们就必须在每一处地方保持对立。在当今的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治立场如果要保持积极，任何一种欲望如果要保持有效，甚至对于民主本身，这

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种对立中的存在都已成为关键。欧洲最早的反法西斯者,那些对抗自己骗子政府的逃兵,被再恰当不过地称为"对立的人"①。今天,大众已一般化的对立存在必须将帝国主权确立为自己的敌人,寻找适当的途径,将其颠覆。

在这里,我们再次与共和主义原则相遇:离弃、出逃、游牧。在戒律时代,抵抗的基本概念是破坏;在帝国控制的时代,抵抗的基本概念是离弃。在现代性时代,对立常常意味着直接的或者/及辩证的力量对抗;在后现代性时代,对立在倾斜的或对角的位置上效果最为显著。通过减除和叛变,我们能够赢得对帝国的战争。我们所说的离弃并没有固定的发生场所,它把权力所居的一切场所疏散、清空。

在现代性的整个历史中,劳动力的流动和迁徙一次又一次打破限制着工人的戒条,而权力则对这种流动动用了极端的暴力。在这一方面,奴隶制可被视为阻止劳动力流动的最为极端的工具,它同工资统治的不同阶段处在同一条连续发展带上。美洲黑奴的历史既展现出控制劳动力流动的根本需要,也展现出奴隶们要逃亡的不可抑制的欲望。流动和大规模工人游牧总是表达了工人们的拒绝和对自由的寻求:他们所抗争的是剥削的恶劣状况,而他们所求索的是自由和新的生存状况。一项很有趣的工作是从工人们渴望流动的立场撰写一部生产方式发展普通史(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小城市到国际大都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而不是仅仅从资本如何规范劳动的技术状态这一立场去回顾那一历程。这样一部历史将会从实质上重新构造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组织化的不同阶段的概念,而马克思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是众多著者的理论框架,直到普蓝尼。②

---

① 参见 Elio Victorini, *Uomini e no* (Men and not men),参见 *Vogliamo tutto* (Milan: Feltrinelli, 1971); and *The Unseen* (London: Verso, 1989)。

② 参见 Yann Moulier Boutang, *De l' esclavage au salaria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今天,劳动力的流动和迁徙已极度扩散,难以把握其方向。在现代性历史上,即使最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包括白人和黑人跨越大西洋的迁徙)同我们这一时代的人口转移相比也相形见绌。一个幽灵在世界上游荡,这个幽灵就是移民。旧世界的一切力量结成同盟,采取无情行动,以制止它,但流动依旧不可阻逆。不仅仅有来自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潮,同时还有寻求政治避难者的流动和智力工作者的转移,此外还有由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无产阶级形成的大规模流动。合法的、有文件可寻的移民同非法移民相比简直显得微乎其微。主权国家的边界已千疮百孔,而每一次彻底规范移民的尝试都遇到强大的压力。经济学家试图拿出公式,建立模式以解释这一现象。但即使他们的公式和模式完整无缺,也无法解释在这一流动之后的不可抑制的欲求。实际上,在背后推动移民流动的力量,从消极意义上说,是对帝国再生产过程中悲惨的文化和物质条件的离弃;但从积极意义上说,是丰富的欲望,是积累起的表现能力和生产能力,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注入每个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意识中,正是它们拉着人们向前。然而,这种流动构成的斗争还停留在自发的层面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提过,它更多时候把人们引向新的贫困和悲惨。

一支新的游牧部落,一个新的野蛮种族,将会崛起,将会入侵帝国、清空帝国。尼采在 19 世纪就预见到它的命运。"问题:20 世纪的野蛮人究竟在何处?显然,只有在巨大的社会主义危机后,它们才会出现并巩固自己。"[①]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尼采的痴言梦语究竟预言了什么。但确实,近来还有什么事件猛烈地证实了离弃和出逃的力量,证实了游牧部落的力量吗?它不正是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集团的崩溃吗?通过离弃"社会主义戒律",野蛮式流动和大规模移民对摧毁这一体系贡献巨大。事实上,生产干部的离弃行为破坏了苏联世界官僚体系的内部组织,这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New York: Vintage, 1968), p. 465 (no. 868, November 1887 – March 1888).

直接击中了它的心脏。受过高度训练的东欧工人大规模出逃,这对引发柏林墙的崩塌起到了核心作用。[①] 虽然这一事件体现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特殊问题,它同样也显示劳动力的流动确实可以表达出公开的政治冲突,对摧毁统治发挥作用。然而,我们所需要的还不仅于此。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力量:它不单可以组织起大众的摧毁能力,更能够经由大众的欲求构建起另一选择。反帝国必须具有新的全球眼界,它必须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在现代性时代,许多共和主义计划把流动视为斗争和组织的优先领域: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 Socians 到 17 世纪组织起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以躲避屠杀的宗派,再至 20 世纪头 10 年里遍布全美各地的 IWW 的鼓动者,再至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在欧洲的自治主义者,他们无一例外。在这些现代的例证中,流动成为一种积极的政治策略,建立起一种政治姿态。劳动力的这种流动和政治出逃有着成千上万的线索,它们相关交织,旧的传统和新的需要交织在一起,就好像现代性的共和主义同现代的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一样。假使后现代共和主义者要崛起,他们必须面临相似的任务。

新野蛮人

那些选择对立的人在逃离本地对他的生存状态的具体限制时,必须不断努力,以建立新的身体和生活。这肯定会是一个充满野蛮和暴力的过程,但如同沃尔特·本雅明所说,它是积极的野蛮。"野蛮?确实如此。我们确认它,以引入一种新的、积极的野蛮观念。经验的匮乏迫使野蛮人不得不做些什么?重新开始,重新的开始。"新野蛮人"觉得没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正因如此,他处处都看到道路。别人在这里看到的是

① 参见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p. 263 - 269。

高墙和险峰，而他在这里依然能发现道路。但也因为他处处都看到道路，他也得处处清理出道路……因为他处处看到道路，他发现自己时时处在十字路口。身处这一时刻，没人知道下一时刻会是什么样。现存的已被他夷为平地，但这样做并不是要得到平地，而是为了在这片平地上清理出一条穿越而出的道路。"①新野蛮人以肯定性的暴力摧毁旧世界，并在自己的物质生存之中踏上新的道路。

这些野蛮部署普遍作用于人类关系上，但今天，它首先，也最显著地表现在肉体关系和性别的构造之中。② 传统的在两性之间和同性之间的肉体和性别关系正越来越多地面临挑战和变革。肉体自身正经历改造，创造出新的后现代肉体。③ 这种肉体改造能够出现的首要条件是认识到人类本性决不能独立于自然整体之外，在人类和动物之间，在人类和机器之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并不存在着什么固定的、必然的界线。这也就是要确认自然本身也是个人造的领域，它也会经历改变、混合、杂交。④

---

① 参见 Walter Benjamin, "Erfahrung und Armut,"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Rolf Tiedemann a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s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2), vol. 2, pt. 1, pp. 213 - 219;以及"The Destructive Character," in *Reflections*, ed. Peter Demetz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8), pp. 302 - 303。

② 参见 Francois Peraldi, ed., *Polysexuality* (New York: Semiotext(e), 1981); and Sylvère Lotringer, *Overexposed: Treating Sexual Perversion in America* (New York: Pantheon, 1988)。以及"The Last Sex: Feminism and Outlaw Bodies," in Arthur and Marilouise Kroker, eds., *The Last Sex: Feminism and Outlaw Bod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和 Kathy Acker, *Empire of the Senseles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8)。

③ 参见 Judith Halberstam and Ira Livingston, "Introduction: Posthuman Bodies," in Judith Halberstam and Ira Livingston, eds., *Posthuman Bo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 - 19; and Steve Shaviro, *The Cinematic Bod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以及 Alphonso Lingis, *Foreign Bo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4)和 Stelarc, *Obsolete Body: Suspensions* (Davis, Calif.: J. P. Publications, 1984)。

④ 见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and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esp. pp. 1 - 8 和 Rosi Braidotti,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Camilla Griggers, *Becoming-Woman in Post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and Anna Camaiti Hostert, *Passing* (Rome: Castelvecchi, 1997)。

我们不仅有意识地颠覆传统的界线,比如说,男着女装,我们也进入一个创造性的、不确定的地带。这是个处在两性之间的地带,在那里我们可以忽视边界的存在。今天,这种肉体改造构成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出逃,它代表着共和主义对抗帝国文化的构造中一个极其重要,但还十分含混的成分。之所以说人类学意义上的出逃重要,是因为在这里,变异所具有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开始显现:它是正在进行之中的本体变异,它在虚无中具体创造出一处新的场所。这一创造性演化不仅仅占领了已存的处所,更创造出一处新领地。它是创造出新肉体的欲求,是打断现代性的自然主义谱系的变形。

然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出逃这一观念还很含混,因为它所使用的方法——杂交和变异——正是帝国主权所使用的方法。举例而言,在虚拟朋克小说的黑暗世界中,我们常常无法区别孰为塑造自我的自由,孰为控制一切的权力。[①] 我们当然要改变我们的肉体和我们自身,或许改变的方式要远比虚拟朋克小说的作者所能想到的更激进。在当代世界中,常见的为了美而对身体的改变,比如穿空、刺青,都是这种肉体改造的初兆。但最终,它们并不能为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剧烈变异提供一盏明灯。对立意志所需要的是这样一部躯体:它根本无法屈从于命令,它根本无法适应家庭生活、工厂纪律、传统就性生活作出的规范,等等。(如果你发现你的身体拒绝这些"正常的"生活方式,别绝望,实现你的天赋。)[②]仅仅不适从常规还不够,新的躯体要能够创造出新的生活。要界定那产生于虚无的新领地,我们还要走得更远。混合和杂交的经验,以及围绕此进行的所有实验都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目标是构造出连贯的政治体,一种人为的综合。人文主义者说因艺术和知识而产生出人中之人,斯宾诺

---

① 见 William Gibson, *Neuromancer* (New York: Ace, 1984). 和 Steve Shaviro, *Doom Patrols: A Theoretical Fiction about Postmodernism* (London: Serpent's Tail, 1997), pp. 101-121。

② 这种反对正常化的身体和正常化的生命的意见。也许是瓜塔里治疗实践的中心原则。

莎说浸透爱的最高意识产生出强大的躯体，这些同我们所说的有异曲同工之效。野蛮人脚下无限的道路必须形成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改变仅仅在形式上和次序上发生，它总是软弱和含混的。杂交本身只是个空洞的姿态，而单纯拒绝秩序只会把我们带到虚无的边缘。情况甚至可能更糟：这样的姿态可能会加强帝国的权力，而不是向它发出挑战。只有当我们把注意从形式和次序问题转移到统治和生产实践上时，新政治学才会具有真实的内容。在生产领域，我们将认识到，这种流动和人为状态并不仅仅代表着少数特殊群体的个别经验，而是代表着大众的普通生产经验。早在 19 世纪，无产阶级就被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游民。[①] 即使他们的生活被固定在某一地理区域内（大多数情况如此），他们的创造性和生产能力为肉体的和本体的迁徙做了解释。正是凭借劳动者的普通经验，以及具有建设效应和本体含义的新技术，人类学意义上的变形才得以出现。一直以来，工具都起到了人造肢体的作用，它在生产实践中被融入我们的身体。不管是对个体而言，还是对集体性的社会生活而言，它都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变异。当代的出逃形式和新的野蛮生活则要求工具成为人体的一部分，把我们从现代人类存在状态中解放出来。再回到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内与外的辩证走到终点时，当使用价值的独立位置在帝国的疆界里消失时，新式的劳动力就要承担起重新创造人类（或者说是后人类）的重任。完成这一任务的重担将主要落在新的、越来越非物质化的情感和智力劳动力的肩上。在他们构起的社区中，在他们推出的人为状态计划中，这一任务将最终完成。

从海德格尔到阿多诺到德里达，批判思维的解构阶段为寻找冲出现代性的出口提供了一件强大的武器。但随着上述变迁的到来，解构主义

---

① 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558, note 61。

也失去了效力。[①] 括号两边的断口已经闭合，我们面临着全新的任务；构造，在虚无之中，一处新的领地；从本体上构造人类和生存的新特性，构造出一个强有力的人为存在。在唐娜·哈拉威的生化人故事中，生化人居住在人类、动物和机器三者之间的交叉地带，这样的故事比解构主义更有效地向我们介绍了新疆界中存在的种种可能。但不要忘记，那仅仅是故事。真正能够推动理论工作向前，真正能够实现潜在变形领域的，仍然是新生产实践产生的普通经验，仍然是新型的交往、生物、机械技术这样的强可塑，高流动领域里劳动力的集中。

如此说来，今天的共和主义者首先要在帝国之内斗争，在帝国的混杂、波动的领域里建设性地对抗帝国。我们还要加上一句：相较于一切道德说教，一切义愤填膺和一切思古怀旧，帝国的新领域为创造和解放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大众，怀着对立的意志和对解放的欲求，必须奋力穿过帝国，在另一头穿越而出。

---

① 见 Antonio Negri 关于 Jacques Derrida's *Specters of Marx* 的论文，"The Specter's Smile," in Michael Spinker, ed., *Ghostly Demarcations* (London: Verso, 1999) pp. 5－16。

第三部分

生产之道

第十章　帝国主义的局限

世界几乎已全被瓜分完毕，剩下来的也正在被分割、征服和殖民化。想想夜晚你看见的头顶上这些星星，这些我们从未到达过的广阔世界，可能的话我要吞并这些星球，我经常这样想。看到它们如此清晰却又如此遥远，令我感到悲伤。

——塞西尔·罗得斯

在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活跃与最紧迫的领域。[①] 许多这方面的观点如今当然已过时，而它们所涉及的情境现已完全改变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它们那里没有可学习的东西。这些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从帝国主义到帝国的历程，因为在某些方面这些观点预示了这一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思考传统中，中心论点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和扩张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而资本主义的扩张不可避免地采取

① 关于从考茨基到列宁对帝国主义进行辩论的出处，见 Hans-Ulrich Wehler 所提供的一篇优秀的参考文献。关于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发展起来并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对帝国主义的辩论，见 Dieter Senghaas 编，*Imperialismus und Strukturelle Gewalt*（Frankfurt：Suhrkamp，1972），关于这些辩论的有用的英文概要，见 Anthony Brewer，*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A Critical Surve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0）。

了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本人很少论及帝国主义,但他对资本主义扩张的分析却是整个批判传统的中心论点。马克思解释得最清楚的是资本的运营经常通过内在与外在边界的重构来进行。事实上,资本并不在有限的地域和人口的范围内运行,而是总会蔓延过其疆界,从而吸纳新的空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本来就直接包含在资本概念以内。每一种界限都表现为急待克服的限制。[①] 资本的不安分的特性构成了一个与资本自身的本质相关的始终存在的危机点:持续的扩张总是它不充分然而必要的尝试,以克服一种永不满足的饥渴。我们不想说这种危机和这些限制当然会将资本引向崩溃。相反,正如对现代性总体而言,危机对资本而言是一种正常的条件,并不标志着资本的终结,而是标志着资本的趋势与运行模式。资本对帝国主义的建构和超越二者都来源于界限与限制之间的复杂运动。

对外界的需求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对扩张的持续需求,他首先聚焦于"实现(扩张)"的过程,继而关注作为生产者的工人和作为商品消费者的工人之间不平等的数量关系。[②] "实现"的问题是驱使着资本越过自身的疆界和摆出走

---

① Karl Marx, *Grundrisse* (New York: Vintage, 1973)。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限制"的讨论,见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② 下列争论引出了消费不足主义的理论幽灵,这种理论主张不能消费生产的所有商品是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必将导致崩溃。许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已经令人信服地辩驳所有的观点:资本主义的过多生产或过少消费的趋势将导致毁灭。关于马克思与卢森堡对消费不足主义论点的评价,见 Michael Bleaney, *Under-Consumption Theori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and Ernest Mandel,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Capital*, vol. 2,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N.B. 在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ed. Kenneth Tarbuck (London: Allen Lane, 1972)中对罗莎·卢森堡的批判颇具影响力。我们应指出建立在数量计算基础上的经济必然性有时是形式,但从来不是马克思或卢森堡的论点的实质。任何必然性是真正历史的和社会的。马克思和卢森堡所识别的是一种经济限制,它有助于解释资本如何已被历史地驱赶或引导着去扩张,移到其自身以外并将新市场融入到它的范围之内。

向世界市场的趋势的要素之一。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须从剥削开始。“首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我们读到，“资本必须逼迫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做出剩余劳动。只有这样，资本才能自己增殖价值，创造剩余价值。”工人的工资（对应于必要劳动）必须小于工人生产的绝对价值。而这一剩余价值为了实现自身就必须找到足够的市场。既然每个工人须产出比他或她消费得更多的价值，对工人作为消费者的要求从不能满足剩余价值的需求。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过程就这样由一系列限制所定义：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当作活劳动能力交换价值的限制，把剩余劳动时间当作必要劳动时间的限制，因而把剩余价值当作剩余劳动时间的限制。所有这些限制都来源于一个单一的限制，它由作为生产者的工人和消费者的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所定义。

当然，资产阶级（连同分享其利润的其他阶层）将消费一部分这种剩余价值，但它从来不可能消费全部价值，因为如果它消费了全部就会没有剩余价值留以再投资。与消费所有的剩余价值相反，资本家必须实施节流，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积累。[①] 资本自身要求资本家摒弃享乐，尽可能节约，以免在他们自己的消费上“浪费”剩余价值。

这一对资本家的道德与节制的文化解释却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呈现出来的真正经济限制的一种表象。一方面，如果有利润的话，那么工人须生产比他们所消费的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如果存在积累，则资产阶级及其附属者不能消费所有的剩余价值。倘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附属者不能形成足够的市场并购买生产的所有商品，那么即使剥削产生了，剩余价值被榨取了，此种价值也不可能实现。[②]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限制随着劳动变得越来越多产而持续加

---

① 关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消费的节约理论，见 *Capital*, vol. 1 (New York: Vintage, 1976) and *Capital*, 3: 336。

② Marx, *Capital*, 3: 352.

深。随着生产力的增加和资本构成的持续增长,可变资本(也就是付给工人的工资)构成了全部商品价值的日益减少的一小部分。这意味着工人的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的商品来说愈来愈小: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① 资本的实现于是就被消费能力的"狭隘基础"这一问题所阻碍。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限制和人口生产的绝对能力或人口消费的绝对能力没有关系(无疑无产阶级可以而且需要更多的消费),它更多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中人口的相对消费能力。

为了实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并避免过度生产导致的贬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必须扩展它的领地:所以以资本为根据的生产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生产一个连续扩大的流通圈,不管这个圈是直接被扩大的或者在这个圈内有更多的地点作为生产地点被创造出来。扩展流通圈(即流通领域)可以通过用新的需求进一步强化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现有市场;但工人能得到消费的工资数量和资本家对积累的需求成为阻碍这一扩张的坚固限制。另一种可能则是,将新的人口带进资本主义关系可以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可这不能稳定供需间基本不平等的关系,即创造的价值与涉及到的无产者和资本家的人口所消费的价值之间的关系。② 相反,新的无产者总会是他们所创造价值的不充分的市场,这样他们总是仅仅在更大的规模上重新产生相同的问题。③ 惟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让资本向自身以外看,发现交换商品和实现它们价值的非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范围之外的流通领域的扩张代替了不稳定的不平等。

罗莎·卢森堡发展了马克思对"实现"问题的分析,但她改变了这一分析的推理过程。卢森堡得出了这样的事实:作为依赖其外在因素的标

---

① Marx, *Capital*, 3:352.

② 关于生产和市场的扩张,见 Marx, *Grundrisse*; *Capital*, 1:910 - 911; 2:470 - 471; 3:349 - 355。

③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Marx, *Capital*, 3:358。

志，为了资本实现剩余价值，非资本家的外来消费者是真正最基本的需求。资本主义是“第一种不能靠自身生存的经济模式，它需要其他经济体制作为一种中介和土壤”①。资本是这样一种机制，若不能持续越过疆界，接受外在环境的滋养，便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它的外界是基本因素。

也许，这种不断地扩张其控制领域的需求是欧洲资本的病态所在，但可能也就是这种动力驱使欧洲占据了现代世界的统治地位。“也许此后局限在狭隘的‘亚洲之角’的西方的优势，”费迪南德·布罗代尔推测说，“将需要世界，需要冒险走出自己的前门。”②资本从一开始就趋向于成为一个世界性力量，或者真正的这个世界的力量。

使外界内在化

资本扩张不仅要迎合实现的需求和找到新市场，而且要满足积累的循环中后继时刻的要求，即资本化的过程。在剩余价值以金钱形式得以实现后（通过在资本主义领域内强化市场，并依靠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实现了的剩余价值必须再投资于生产之上，即回归成资本。实现了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要求资本家为了生产的后继循环而被迫保证购买、供应更多的不变资本（原材料、机器等）和更多的可变资本（也就是劳动力）——最终，为了进一步的实现，这就需求更大的市场扩张。

追求更多的不变资本（尤其更多更新的材料）驱使资本走向帝国主义，特征就是抢劫和偷盗，罗莎·卢森堡坚持认为资本洗劫了整个世界，

---

①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分析、对马克思的评论及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自她的书首版以来受到了激烈的争论。关于这些无定论问题的很好的总结，见 Mandel's Introduction to *Capital*; Joan Robinson, Introduction to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Paul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② Fernand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攫取它的生产方式;"如有用武力的必要,就从各种程度的文明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中掠取它们……资本变得有必要循序渐进地、更加充分地耗尽整个星球,获取无界限的选择生产方式的机遇,从而在质量与数量两方面对已实现的剩余价值进行生产性的开发利用。"①在获取更多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资本的确与它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相关,并依赖于后者,可它没有将环境内在化——或者说它没必要使环境资本主义化。外界依旧是外界。例如,黄金和珠宝可从秘鲁与南非获得,上好的甘蔗则完全可从牙买加和爪哇得到,而这些社会与这种生产继续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关系运行着。

获取更多的可变资本、占据新的劳动力和创造出无产者,相比较之下,意味着一个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延长资本主义领域里的现有工人的工作时间当然能创造更多的劳动力,但这一增长有一个限度。就这种新劳动力的剩余力量而言,资本必须在非资本主义的群体和国家中不断创造和占据新的无产者力量。非资产阶级环境的逐步的无产阶级化不断地重新开始原始积累的进程——从而导致非资产阶级环境自身的资本化。卢森堡视之为资本主义征服的真正的历史开端:"所有的征服者都追求统治和剥削国家的目标,但没有人对抢夺人民的生产力和破坏他们的社会组织感兴趣。"②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外界就被内在化了。

因此资本不仅必须和非资本主义社会有公开的交流,或者只是掠取它们的财富;它也必须真正将它们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这是鲁道夫·希尔佛丁对资本输出定义的中心观点:"说'资本输出',我是指价值输出以培育国外的剩余价值。"③所输出的是一种关系、一种会培育或复制自身的社会形式。像传教士或高利贷者一样,资本接触到异域并使之

---

①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② 同上。

③ Rudolf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A Study of the Lates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Tom Bottomat 编(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归化。“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按经济学术语,这种文明和现代化意味着资本化,即在资产阶级的生产与积累的不断扩张的循环内的合并。非资产阶级的环境(地域、社会形式、文化、生产过程和劳动力等等)就这样被正式合并到资本之下。

我们应该在此注意到欧洲资本并没有真正“按自己的意象”重造非资本主义的地域,使一切都变得同质化。事实上,当评论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认可了资本外界的内在化进程之时,他们已经总体上低估了暗含在进程当中的不平衡的发展和地理差异的意义。② 非资本主义环境的每一个切分块受到了不同的转变,一切都被有机地整合到资本扩张的肌体内。换而言之,外界的不同切割块并不以类似的模式被内化,而是作为不同的器官在一个聚合体内一起运行。

在这一点上我们能认识到资本主义扩张的基本矛盾:资本为了满足实现剩余价值对其外界、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依赖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内化相冲突,后者满足了使实现了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说这两种进程经常相继发生。一片地域和人口首先作为交换与实现资本的一处外界相接触,随后就被带入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领域范围。然而,重要的一点在于,一旦环境中的一个分割块已被“文明化”,一旦它也被有机地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范畴的新扩展的边界里之后,它就不再可能是必然实现资本剩余价值的那种外界了。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化构成资本实现的一个限制,反之亦然。或者更明确地说,内在化同对

---

① Marx and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London: Verso, 1998).

② 关于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平衡发展和地理差异,见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and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84)。

外界的依赖相抵触。资本的饥渴必须由新鲜血液来平息,它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领地。

可以有逻辑地推测出,会有一天在积累、实现和资本化这一循环中这两种情况会直接碰撞,埋葬彼此。在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在原材料、劳动力与市场方面)的领域看上去在欧洲和以外的地方都是不确定地延伸着。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涉及到很少的全球性生产。只有几个国家有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生产(英国、法国和德国),甚至连这些国家仍有大片的非资本主义生产——如以农民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等等。但卢森堡论证道,既然地球是有限的,以下逻辑冲突会最终成为真正的矛盾:"帝国主义越是凶猛、无情和彻底地导致非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它就从资本主义积累的脚下更快地分割地皮。尽管帝国主义是延长资本主义生涯的历史方法,但也是将它带向快速终结的手段。"[①]这种对立的紧张自始至终出现在资本的发展中,但只在极限点得到全面展示,即在危机的那一刻——当资本面对人类与地球的极限时。在这里那位大帝国主义分子塞西尔·罗得斯便以典型的资本家面目出现。地球的空间即将封闭,而资本的帝国主义扩张面临着自身的极限。始终是冒险家的罗得斯怀着忧伤与渴望凝望着头上的星空,沮丧于那些新边疆的残酷的诱惑,如此地近却又如此地远。

即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的批评经常以严格数量化的经济学术语陈述出来,但他们所冒的风险基本上还是政治性的。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计算(以及计算的批评)不应被认真采纳;而是说经济关系的考察必须是当它们真正在历史和社会的语境中显示出来,并且作为统治和控制的政治关系的一部分的时候。[②] 对于这些作者

---

①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② "帝国主义是那种权力的最全球化的表现,像该权力一样,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可以形成任何源于经济概念的明确定义的客体。帝国主义只能在一个充分发展的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加以领会。"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30。

来说，在经济扩张问题上最重要的政治风险是要阐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从逻辑上说，如果二者本质上相关，那么任何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苦难、穷困和奴役）也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直接斗争。任何目标在于改良当代资本主义形象、使之非帝国主义化的政治策略都是徒劳与天真的，因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与积累的核心必然包含着帝国主义的扩张。资本别无他路——这就是它的本性。除非摧毁资本主义本身，否则不可能对抗帝国主义的邪恶。

均衡和吸纳

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书基本上被视为其他作者分析的一种综合，从而使他们接近于广泛的大众。[①] 然而，列宁的文章也有其自身的独特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从主观的立场批评帝国主义，并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危机中的革命潜力的观点相联系。他给了我们一个工具箱，一套生产反帝国主义的主体性的机器。

列宁经常以辩论的方式展示他的论点。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基本是通过挑战鲁道夫·希尔佛丁和卡尔·考茨基来提出的。可是为了发展他的批评，列宁仔细思索，有时则把两位作者的理论推测假定为他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列宁吸收了希尔佛丁的基本论点，认为当资本通过帝国主义的世界市场的建设方式进行扩张的时候，会涌现出更大的限制来阻止在生产的不同分支机构和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均衡化。但和平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依赖于走向均衡的经济条件的趋势：即同一商品有着同等的价格，同一资本有着同等的利润，同一工作有着同等的工资和同等的剥削，等等。希尔佛丁认定帝国主义——它以日益机械的方

---

① 见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和 *Notebooks on Imperialism*, 见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7) 第 39 卷。

式建构起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并将权力分散给各国的寡头——阻碍着一种均衡化利润率的形成，由此断送了资本主义成功调解世界发展的可能性。[①] 事实上，由众寡头统治与分割的世界市场已使得均衡化的进程其实不可能实现。只有各国中央银行打算介入，或者最好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国际银行介入，这种意味着贸易战和武力战争的矛盾才可能均衡化地得到平息。简而言之，列宁采用了希尔佛丁的如下假设：资本已进入由寡头控制的世界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点既导致了各种矛盾的增加，又导致了均衡化的危机。然而他不能接受真的建立一个联合的国际银行的乌托邦观点，而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对危机的吸纳也不可能产生。

列宁将考茨基的立场视作更加乌托邦化和更具破坏力，后者也以希尔佛丁的著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事实上，考茨基提出资本主义能够取得世界市场的真正的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帝国主义的剧烈冲突随后能产生一个新的和平的资本主义阶段，一个"超帝国主义"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巨头能够联合成一个单独的世界托拉斯，用一个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来代替以各国为基础的金融资本的竞争与争斗。他声称，由此我们想象在将来的一个阶段，资本取得了一个和平的吸纳与革命；在这种吸纳与革命中，不是一个联合的银行，而是由各国多少加以规范了的市场力量和寡头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功地决定利润率的全球均衡化。[②] 列宁赞同考茨基的一个基本论点，即资本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不同国家的金融资本走向国际合作，也可能趋向建立一个单独的世界托拉斯。他所强烈反对的事实则是考茨基用一个和平前景的这种阐释来否定目前现实的诸般动力。列宁由此谴责他的"极其反动的、企图缓和"现实情况下的各种

---

①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希尔佛丁的分析深深地依赖于马克思关于竞争收益的一般利率的均衡化理论。

② Karl Kautsky, "Zwei Schriften zum Umlernen," *Die Neue Zeit*, April 30, 1915, p. 144. 考茨基论帝国主义的著作选段包括在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London: Macmillan, 1983), pp. 74 - 96。

"矛盾的想法"。[①] 与其等待某种和平的超帝国主义在未来降临，革命者应该现在就对目前资本的帝国主义组织呈现出的矛盾采取行动。

这样，在大体上采纳了这些作者的分析方法的同时，列宁拒绝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尽管列宁基本上同意希尔佛丁对走向由众寡头统治的世界市场的趋势的分析，但他不同意那样一个体制事实上已经形成能够调解利润率，使之均衡的方法。他的否定政治成分多于理论成分。列宁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垄断阶段会被一系列的矛盾所困扰，而共产主义者不得不由此行动起来。工人运动的职责就是反对每一个要有效地将帝国主义利润率均衡化的资本主义企图；革命政党的任务则是干预并深化发展中的客观矛盾。最需要避免的是实现走向"超帝国主义"的趋势，它将极度地增强资本的力量，并在一段长时间内不让最大的矛盾产生斗争的可能性出现，由此弱化了统治链条上的诸环节。或者出于希望，或者出于预测，列宁写道："这种发展产生于那样的环境下，有那样的节奏，并且通过那样的矛盾、冲突和混乱——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全国性的，等等——以致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将崩溃，而资本主义将被转化成它的反面，这一切都远在一个世界性的托拉斯形成之前，远在'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范围内的各国金融资本的合并发生之前。"[②]

此处列宁在分析方法和政治立场之间的逻辑转化当然是曲折的。然而，他的推理主观上说是非常有效的。正如伊丽亚·贝博所说，列宁的思想沿着"直线的神秘弯道"运行，将工人阶级的现实分析带到了该政治组织的必然性之上。列宁认识到帝国主义特性中过早出现的因素，在工人阶级的主观实践中不仅抓住了阻碍线性地解决资本主义实现的危机的潜在限制(对此卢森堡也强调过)，而且抓住了这些实践——斗争，

---

① V. I. Lenin, "Preface to N. Bukharin's Pamphlet, Imper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4), quotation p. 106. See also Lenin, *Imperialism*.

② Lenin, "Preface to N. Bukharin's Pamphlet, Imper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暴乱与革命——能够摧毁帝国主义自身这一现存和具体的可能性。[①] 在这一意义上列宁从理论到实践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批判。

从帝国主义到帝国

列宁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他对帝国主义作为政治概念的批判。他将现代的主权的疑问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疑问一起放到一个统一批判的镜头下,并且通过把不同的批判路线交织在一处的方法,超越现代性进行观察。换而言之,以他对帝国主义概念的政治再阐释的方式,列宁比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更能够预见到通往超越帝国主义之上的一个资本新阶段的历程,从而指出帝国主权出现的地方(抑或事实上的不存在)。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的时候,关注的不仅是此前不久的不同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而且回溯到约翰·霍布森的著作及其批判帝国主义的布尔乔亚的民粹主义阐释。[②] 列宁从霍布森那里所学颇丰——这些他可能偶然地从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论帝国主义的民粹主义理论家身上同样学到。他尤其认识到,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利用帝国主义,将产生于单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矛盾转嫁到自己的疆界以外去。民族国家让帝国主义来解决或者真正地代替阶级斗争以及斗争造成的不稳定后果。塞西尔·罗得斯更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一帝国主义功能的本质:"我所抱的观点是要解决社会问题,例如,为了从一场血腥的内战中救护4000万英联邦的居民,我们殖民地的政治家们必须获取新土地来安置多余的人口,为他们在工厂和矿场所产的商品提供新市场。如我总是提到的,帝国是面包和黄油的问题。如果你想避免内战,你就必须成为帝国主义

① 见 Antonio Negri, *La fabbrica della strategia*: 33 *lezionisu Lenin* (Padua: CLEUP, 1976)。

② 关于列宁对霍布森的借鉴,见 Giovanni Arrighi, *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 The Limits of Hobson's Paradigm* (London: Verso, 1978)。

者。"①通过帝国主义，现代国家输出阶级斗争和内战，目的在于保持国内的秩序和主权。

列宁把帝国主义视为现代国家演化中的一个构成阶段。他想象出一个必然且线性的历史进程，从现代欧洲国家的起始形式到民族国家，再到帝国主义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国家不得不发明新方法来建构一致的民意，这样帝国主义国家被迫找到一种方式，将大众及其自发的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内化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结构中，它被迫将大众转化成民族。这一分析是后来成为格雷马斯思想的核心观点的霸权概念最初的政治表达。② 列宁由此将帝国主义的民粹主义理解为仅是主权提法的另一变体，而且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法。

在把帝国主义理解为主权的霸权要素的基础之上，列宁可以阐释帝国主义政治的结构性影响和集权主义的后果。他极为清楚地理解了帝国主义的向心的动力，它循序渐进地消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与"外部"的界线。卢森堡批判帝国主义的立场植根于"外部"，即在能认可大众的非资本主义利用价值的抵抗之中，而这些大众既来自宗主国，又来自附属国。然而，在列宁看来，这种立场和策略是站不住脚的。帝国主义政治所造成的结构转化趋向于消灭宗主国或附属国的任何成为外部的可能性。批判的立场不是被迫放在外部，而是在现代主权的危机内部。列宁相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间现代主权的帝国主义阶段业已直接导致民族国家间的致命冲突，危机点也已到来。

列宁充分认识到，尽管帝国主义和垄断阶段是资本的全球扩张的真

---

① Cecil Rhodes，转引自 Lenin，*Imperialism*。

② 当我们似乎面对着数不清的历史修正主义观点时，特别重要的是要在如今信贷到期的地方发放信贷。可怜的格雷马斯，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和斗士，被法西斯主义并最终被资助法西斯主义的老板们折磨至死——可怜的格雷马斯得到了这样的礼物，即被认为是与马克思的政治学毫无关系的一种奇特的霸权主义理念的创始人。(See, for example,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我们必须保护自己免受那样慷慨的礼物！

正表现,但帝国主义的实践以及经常追求这些实践的方式——殖民统治已经成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限制物。他强调的并为许多帝国主义的批评家所注意到的事实就是:作为资本运行和扩张所必备的竞争相对于垄断的发展必然在帝国主义阶段成比例地衰退。伴随着商业的专营权和保护性关税的出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区的出现,帝国主义正持续显示和加强它的有限的疆界,阻碍或引导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流。如我们在前面文化术语中(见第六章)所见以及卢森堡用经济术语所论述的,帝国主义极大地依赖着这些有限的疆界和内、外部的区分。帝国主义其实为资本创造了一个束缚——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一定程度上,帝国主义实践所造成的疆界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完全实现。资本必须最终克服帝国主义,将内、外部之间的限制摧毁。

在这些推理的基础上可以夸张地说,列宁对帝国主义及其危机的分析直接引出了帝国的理论。但是事实上他的革命立场显示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节点——或者更好地说是必须被切除的难解之结。即便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实践与政治上的论点被击败了(而且不久我们就会关注这一失败的原因),他所预见的有些像转化一类的说法却是必然的。列宁对帝国主义危机的分析与马基雅维利对中世纪秩序危机的分析具有同样的力量与必然性:反动因素就必须是革命因素。这就是暗含在他的作品中的选择:要么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革命,要么就是帝国,而且这两种选择之间有着深刻的类比。

《资本论》的缺失卷

为了理解从帝国主义向帝国的发展历程,除了观察资本自身的发展,我们也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视角理解谱系学。这种观点事实上很可能更是真正历史运动的核心。通往和超越帝国主义历程的理论倾向于优

先纯粹地批判资本的动力，冒着低估真正驱使资本主义从最深层的核心发展的有效动力的风险：无产阶级的运动和斗争。这一动力可能很难被认可，经常是因为它被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遮蔽，但即使它只是微弱或者散乱地体现出来，却仍然有效。只有在主观主义统治历史时，只有在（如尼采所说）主观主义的出现重新塑造了历史发展的有效起因和最终起因时，历史才有一个逻辑。无产阶级的力量准确地体现于此。

于是我们转到那个阶级斗争的主观性将帝国主义转变成帝国的微妙历程。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将追溯帝国经济秩序的谱系，以便揭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全球特性和预示、想象趋向实现世界市场的资本发展的阶级斗争的能力。然而我们仍须确定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支持我们的理论模式。这里对帝国主义的以往的分析不会足够，因为最终它们都停在主观性分析的门槛上，而且更专注于资本自身发展的矛盾。我们需要确定一个理论模式，将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主观性放到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秩序的构建进程的中心阶段。

马克思思想里有一个悖论，它对解决目前我们正面临的各种问题也许特别有启发。马克思在《资本论》草稿的大纲中所做的计划有三卷从未写成过：第一卷论工资，第二卷论国家，第三卷论世界市场。[①] 有人可能说论工资卷的内容——其实是关于工资收入者的一卷——部分地涵盖在马克思的政治、历史文献中，诸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及论巴黎公社的作品。[②] 论国家和世界市场的各卷内容却完全不同。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论述零星分散且不充分，甚至连

① 见 Roman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② 关于论工资的缺失卷，见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New York: Autonomedia, 1991); and Michael Lebowitz, *Beyond 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Macmillan, 1992)。关于马克思国家理论存在的问题，see the debate between Norberto Bobbio and Antonio Negri in Norberto Bobbio, *Which Soci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这些卷的大纲也不存在。就国家概念的评论，马克思更多地论及国家政治的具体分析，如论英国议会制政体，论法国波拿巴主义，论俄国专制等等，而很少涉及一个总体的理论探讨。这些国家的局限性使得普遍理论不可能出现。在马克思看来，每个民族国家的组成特征取决于随着剥削政体的不同在不同国家经济中的利润率的差异——简而言之，取决于个别国家在国家发展的不同地点对限价过程的过度控制。民族国家就是这种界限的惟一组织。在这些条件下一个关于国家的普遍理论只可能是偶然得到的，并且只可用最抽象的语言来理解。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关于国家与世界市场各卷时遇到的众多困难就这样本质上联系在一起：只有到世界市场那一卷业已完成后才可能去写关于国家的那一卷。

然而，马克思的思路趋向于认为，在某一时刻资本主义限价和需求的政治进程将在世界水平上会合和重叠。民族国家在他的作品中扮演的仅是一个短暂的角色。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决定了起着全球生产体系作用的限价与剥削，而出现在该领域内的每一个限制长远地看来都将被克服。“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他写道，“本来就直接包含在资本概念以内。每一种界限都表现为急待克服的限制。”①只有当所有有限的限制被克服以及当国家和资本有效地合成之时，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才可能写就。换而言之，民族国家的衰弱在深层次上乃是国家和资本间关系的充分实现。“资本主义获得胜利，”正如费迪南多·布罗代尔所说，“只有在它与国家取得认同，而且就是国家本身之时。”②如今也许要草拟出马克思的两个缺失卷最终是可能的(如果有人仍然觉得必要)；或者索性遵从他的方法的精神，将马克思论国家与世界市场的观点搜集在一处，有可能尝试着写出一篇批判帝国的革命性文章。

对国家和世界市场的分析也因为另一原因在帝国里成为可能，因为

---

① Marx, *Grundrisse*.

② Ferrand Braudel,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在发展的这一点上，阶级斗争没有局限地对权力的组成施加影响。已取得全球化层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面对着大众，毫无回旋的余地。于是这种辩证法，或者是关于界限及其组织的真正科学就此逝去。阶级斗争将民族国家推向废弃并进而超越它所造成的限制，由此使得帝国的构建成为分析和冲突的所在。在没有这一限制之后，斗争的形势完全打开了。资本与劳动以直接对抗的方式相对立。这就是每一个共产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条件。

循环

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市场的政治规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我们正在目睹的是现代史上的一段定性的历程。当我们不能够充分表达这段历程的高度重要性时，有时我们很难定义进入后现代性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认识到这种描述的肤浅，但有时却倾向于它，因为至少后现代性意味着当代史上的划时代的转变。[①] 然而其他作者似乎低估了我们形势的变化，并将分析引导回循环地理解历史进化的范畴。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在他们看来将只是有规则地重复循环的另一个阶段，循环的是经济发展的各种形式或者政府的形式。

我们熟悉无数关于历史循环的理论，从我们继承希腊—罗马遗产的政府形式的理论到 20 世纪作家论及的循环发展与文明衰落的理论，后者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何塞·奥特加·依珈塞。当然在柏拉图的政府形式的循环评价与波利尼奥斯的为罗马帝国的辩护之间，或者在斯宾格勒的纳粹意识形态和费迪南多·布罗代尔的强大的历史主义之

① "偶尔我和其他人一样对'后现代'口号开始厌倦，可是当我禁不住要后悔自己参与其中、哀叹它的误用和臭名昭著以及有些勉强地总结出它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更多之时，我发现自己停下来思考是否任何其他的概念可以以如此有效和经济的方式使这些问题戏剧化。"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间，都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我们发现了在推理上完全不充分的这一彻底的模式，因为每种循环理论看上去在嘲笑这样的事实，即历史是人类行为通过强行制订一部客观性的法律来统治各种意图与抵抗、失败与胜利、人类的欢乐与苦难的产物。更为糟糕的是，它使得人类的行为伴随循环结构的韵律共舞。

乔万尼·阿瑞吉采用了长期循环的方法论，写出了一种对"漫长的20世纪"的丰富而美妙的分析。[①] 这本书基本聚焦于理解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与积累的危机如何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然而，为了研究当代的历程，阿瑞吉认为我们需要回溯过去，将危机放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循环的漫长历史之中。遵从费迪南多·布罗代尔的方法论，阿瑞吉建构起一个巨大的历史和分析性的工具，它由四种宏大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系统循环构成，这是四个"漫长的世纪"，将美国置于同一条线上的热那亚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之后。

这种历史性视角引导阿瑞吉去论证诸事如何轮回，或者具体地说资本主义如何总在轮回。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的确并不新鲜。今天发生在美国领衔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事情一百多年前曾发生在英国人身上，在那之前则发生在荷兰人身上，更早的时候则发生在热那亚人身上。这种危机意味着作为每一个积累的系统循环中转折点的一段历程，从第一阶段的物质扩张（生产投资）到第二阶段的金融扩张（包括投机）。这一趋向于金融扩张的历程被阿瑞吉称为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特征，并总具有成熟的特性，象征着一个循环的结束。具体地说它意味着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霸权的结束，因为每个长循环的结束总意味着资本积累系统进程的中心有一个地理上的转移。"这种转移，"他写道，"已发生在所有的危机与金融扩张中，后者标志着从积累的一个系统循

①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n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环到另一个循环的转变。”[①]阿瑞吉宣称美国已将火炬传给了日本，让它去引领资本主义积累的下一个漫长的轮回。

我们无意讨论阿瑞吉提出美国衰退而日本崛起的假说是否正确。令我们更为关心是在阿瑞吉的循环理论的背景下，不可能认识到制度的一种断裂、一种样式的转变和一件大事件。相反，诸事必须总在轮回，而资本主义的历史由此成为与此相同的永恒的轮回。最终，那样一个循环的分析成为危机和重建过程的动力。即便阿瑞吉本人已对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状况与运动情况作了广泛的研究，但在该书的背景及其历史工具的作用下，似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客观而必然的一部分循环，而不是发生在宗主国与附属国的无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进攻的结果。这些斗争的积累是危机的原因，它们决定了资本主义重建的期限与特点。可是比关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的任何历史性辩证更重要的则是今天断裂的可能性。我们必然得在生产的跨国网络、世界市场的范围以及资本主义统治的全球结构中认识到存在断裂的潜力和未来的动力，这一未来并不简单而宿命地重复资本主义的旧循环。

①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n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对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民主，似乎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组织经费在必要的规模上进行一项宏大的试验来证明我的观点——除非在战争状况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40 年 7 月 29 日)

老帝国主义——外来利润的剥削——在我们的计划中没有地位。

——哈里·S.杜鲁门总统(1949 年 1 月 20 日)

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的第一次浪潮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时期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些深刻变化的开端。从 1917 年的苏维埃革命和第一次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发展显然不可能像从前一般进行下去。如我们所说存在一个清楚的选择：要么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要么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趋向帝国的转变。资本被迫应对这一挑战，但整个世界的条件并不有利。到 20 世纪 20 年代，帝国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调已达到顶峰。已被战争推到极致的工业生产的发展和集中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快速进行着，而泰勒主义的推广导致了不断增长的高水平的生产率。但理性的劳工组织并没有导向理性的市场组织，相反却只能增强了

它们的无政府状态。宗主国的工资制度在福特模式下愈加强化和僵化。有限的高工资体制的功能只是部分地回应了由十月革命建构起来的威胁，从而成为防止共产主义"疾病"蔓延的一剂预防针。同时，随着在"国联"的肮脏协定之下德、奥和土耳其劫掠过来的地区被战胜国所瓜分，殖民扩张依旧没有减弱。

这一系列的因素酝酿了 1929 年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过度投资与无产阶级的消费不足二者的危机。[①] 当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五"正式宣告了危机开始之时，统治者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问题，并尽可能地寻求解决方法。他们本应在凡尔赛和平谈判中所做的——研究帝国主义间战争的起因，而不是简单地惩罚失败者[②]——如今不得不在每个单个的国家中实现。资本主义不得不被极端地改造。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却不能完成这一点。在大不列颠与法兰西，改革从不会真正发生，而少数几次尝试在保守的反动势力面前遭到挫折。在意大利与德国，重建资本主义关系的工程最终演化成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③] 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采取了军国主义

---

① See James Devine, "Underconsumption, Over-investmen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5, no. 2 (Summer 1983)。论 1929 年经济危机，亦见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1929*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4)的经典分析，它集中在成为危机起因的投机上；以及最近的 Gérard Duménil and D. Lévy, *La dynamique du Capital : un siècle d' économie americaine* (Paris: PUF, 1996)。更普遍的关于 1929 年危机留给 20 世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见 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and Robert Boyer and Jacques Mistral, *Accumulation, Inflation, Crises* (Paris: PUF, 1978)。

②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许是马赛会议上最有深谋远虑的人。早在那次会议并且随后在其论文"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他摒弃了胜利者的政治自大，这种自大后来成为产生 20 世纪 20 年代经济危机的因素之一。

③ 这种对 1929 年经济与政治危机的解释应非常强烈地与体现在 FranÇois Furet, Ernst Nolte, and Renzo De Felice 风格中的"修正主义"的史学观相对。它证明了在 20 世纪政治选择的定义中，经济要素的高度重要性。相反，修正主义的历史将该世纪的发展解读为经济形成辩证对立的众多观点的线性进展，如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就处在定义的两极，例见 FranÇois Furet, *Le passé d' une illusion : essai sur l' idée communiste au XXe siècl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5)，尤其在该章中(p. 189 - 248)它讨论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

和帝国主义的形式。[①] 只有在美国,资本主义革命才被付诸实施,以民主党的"新政"方式被提出来。"新政"构成了对以往经济发展的布尔乔亚规范的各种形式的真正背离。在我们分析时,"新政"的重要性不仅应以它重构一个单个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生产及权力的关系的能力来衡量,而且最主要地应以它在全世界的效果来衡量——并不是直接或明确的效果,但却是深刻的影响。随着"新政"的施行,超越帝国主义的真正过程开始生根。

全世界的一次"新政"

在美国,对"新政"的支持来自平民力量与精英阶层中的强大的政治主观主义者们。从20世纪初开始的美国进步主义的自由与民粹的特征得以延续并会合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行动纲领之中。人们可以正确地认为罗斯福解决了美国进步主义的矛盾,手段是将美国帝国主义的使命和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熔铸为一体,后者的代表人物即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②] 这种主观主义正是改造美国资本主义和重塑这一过程中的美国社会的驱动力。国家的荣耀不仅在于是众多矛盾的调解者,也是社会运动的动力所在。国家司法结构的改造推动了允许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予和表达自己的程序机制的运行。国家也在经济规范中担任主角,因为凯恩斯思想被应用在劳动力与货币政策上。美国资本主义被这些变革刺激着前进,从而在高工资、高消费,也是高冲突的一种体制下发展起来。从这种发展中产生了将组成现代福利国家的三位一体:即劳工组织的泰勒主义、工资体制的福特主义和社会

① 见 Jon Hallida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ese* Capi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1975)。

② 首先像 A.M.S. 那样的"自由"的历史主义作家坚持主张美国进步主义的综合特性。*Political and Social Growth of the American People, 1865-1940*,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41)。See also Arthur Ekirch, Jr., *Progressivism in America: A Study of the Era from Theodore Roosevelt to Woodrow Wilson*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4)。

的宏观经济规范的凯恩斯主义的综合。[①] 作为经济与社会政策的一个产品的福利国家并未像欧洲那样混合公共补助与帝国主义的动机，而是全面投资到社会关系中去，伴随着积累过程中的更大规模的介入而施加一种规训性的制度。这是想要透明的一种资本主义，由一个实施自由计划的政府进行规范。

我们应该搞清楚，我们对罗斯福的福利国家的辩护在这里有所夸张，目的为证明我们的中心论点：即"新政"模式（应付一战后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危机）是第一例朝向帝国方向的强大的主观主义。"新政"产生了最高形式的规训性的政府。当我们谈到规训性政府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谈到组成它的法律和政治的形式。我们基本上所指的事实是：在一个规训性的社会中，随着所有生产与再生产的有机系统的发展，整个社会都处在资本与国家的规训之下；而且整个社会会逐渐和带着不可抑制的持续性被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准所单独规训。一个规训性的社会因而是一个工厂式的社会。[②] 规训随即是一种生产形式和政府形式，结果规训性生产和规训性社会趋向于完全合二为一。在这种新的工厂社会里，生产的主观主义被铸造成经济发展的单一维度的功能。社会劳力的分工的数字、结构和等级变得愈加广泛和被细致地定义，同时市民社会愈来愈被吸收进国家中去：隶属关系的新规则和统治的资本主

---

① 这是 Michel Aglietta 在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and Benjamin Coriat 在 *L'atelier et le chronomètre*（Paris：Christian Bourgois，1979）中所依据的核心论证线索。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and "Crisis of the Planner-State：Communism and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in *Revolution Retrieved*（London：Red Notes，1988）中有一篇对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很好的总结。

② 米歇尔·福柯发展的规训观当然与我们在此使用的焦点不同，但我们都指代同样的实践和同样的应用的全球性。福柯的基本理论兴趣点是：规训通过机构的建筑得以部署，规训的权力不是座落在某个中心源头，而在其实施点的细密分布，而且通过将规训内在化与制订实践措施来产生主体性。这一切对我们在这里的考虑同样有效。但我们的基本焦点是讨论源于工厂体制的规训性的实践和关系如何走向将整个社会构造成既是生产又是统治的一种机制，即作为社会生产的机制。

义体制在全社会环境中扩展开来。[①] 正当规训的体制被推向最高层次和最彻底的应用时，它就显示为一种社会组织的极端界限、一种处在被征服过程中的社会的极端界限。这当然大部分归功于过程背后的动力，即抵抗与反叛的主观动力。下一节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上来。

那时"新政"模式首先是专属于美国政治的一种发展，是对国内经济危机的一种回应，但它也成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军高举的一面旗帜。对美国为何参战曾有好几种解释。罗斯福总统宣称是被国际政治的动因不情愿地拉进了战争。而凯恩斯与经济学家们则认为"新政"的需要——1937 年面临着一种新型的危机，并受到来自工人施加的政治压力——迫使美国政府选择了战争之路。面对一场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国际斗争，美国不可能避开战争，尤其是因为实施"新政"后的美国经济已进入另一个扩展的阶段。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美国进入二战将"新政"牢靠地与欧洲帝国主义的危机联系在一处，并将"新政"作为一种可选择的后继模式搬到了世界政坛之上。从那时起，"新政"改革的效果在全球范围内就有了影响。

在战争的后果方面，许多人视"新政"模式为通往全球复兴的惟一路径（在美国霸权的太平洋势力的领导之下）。正如一位美国评论家所说，"只有一个全世界的'新政'能够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它将比我们步履蹒跚的'新政'更加影响深远、持续有力。"[②]二战后掀起的经济重建事实上影响到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战胜方同盟国和失败的一方，所

---

① 描述这种发展并预知其结果的基本文本见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2)，无数本其他的书跟着描述了规训社会和它作为一种"生态政治的社会"不可压制的发展，这些书来自不同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却又完全融会在对这种趋势的定义中。这一研究领域中论证最有力而又最机智的两极则是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for what we might call the Anglo-German pole; and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Pantheon, 1977)。

② Freda Kirchwey, "Program of Action", *Nation*, 1944 年 3 月 11 日发表；转引自 Serge Guilbaut,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Abstract Expression, Freedom and the Cold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影响的正是根据“新政”创建的模式对规训性社会的扩展范式的支持。此前的欧、日以国家为基础的公共补助形式和社团主义国家的发展(以其自由的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由此得到具体的改变。这种“社会国家”诞生了,或者说这是真正的全球的规训性国家,它更深更广地考虑到人口的生命轮回,将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置于受稳定的货币体制限定的集体性交涉的系统之内。随着美国霸权的延伸,美元开始称王。美元的兴起(通过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与日本的经济重建)是战后重建的必由之路,而美元的霸主地位的建立(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便与所有价值标准的稳定性捆在一起。美国军事力量决定着与每个宗主国和附属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关的主权最后的实现。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这种模式得到扩展和完善。这就是世界舞台上资本主义“新政”改革的黄金时代。①

反殖民化、反中心化和规训

作为美国霸权下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工程的后果,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治在战后得到改造。新的全球景象基本上围绕以下三个机制或工具形成和组织起来:(1) 沿着从美国衍生开来的等级关系,逐步解构世界市场的反殖民化进程;(2) 生产的逐步的反中心化;(3) 建构一个国际关系的框架,向全球推广规训的生产体制和持续演进的规训性社会。上述各方面都构成了帝国主义向帝国演化中的一个步骤。

第一个机制,反殖民化,当然是一个痛苦而激烈的过程。我们已在第六章中简要探讨过,并已从斗争中被殖民的角度观察了它的猛烈的运动过程。这里我们必须从统治势力的立场将这一历程历史化。当然,被打败的德、意、日的殖民地完全被其他势力所瓦解或吸纳。然而在此之前,胜利者

---

① 论新政模式在二战后其他宗主国家的传播,见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and 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Curren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ntheon, 1974)。

(英、法、比利时和荷兰)的殖民工程也陷入停顿。[①] 加上面对殖民地的发展中的自由运动,它们也发现自己在美苏两极之间进退两难。反殖民化运动也立即牢牢被冷战的"钳口"紧紧地钳住,已经集中于独立问题上的各种运动都被迫在两个阵营之间谈判。[②] 杜鲁门在希腊危机期间于 1947 年所说的话对冷战时期的反殖民化和后殖民的力量来说依旧真实:"此刻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③]

反殖民化的线性轨迹就此被必须选择全球的对手和在两种国际秩序模式的其一后面排队所中断。总体上倾向于反殖民化的美国迫于冷战与老帝国主义的失败,有必要担任资本主义的国际守护人的主要角色,从而成为老殖民者的含糊的继承人。从反殖民的主体和美国这两方面的立场看,反殖民化因此遭到扭曲,偏离了正轨。美国继承了一个全球的秩序,但这种秩序的统治形式与其自身的宪法大计、其主权的帝国形式相冲突。越南战争是美国含混地继承旧的帝国主义衣钵的最后篇章,它冒着堵塞任何开创一个帝国的"新边疆"的可能性的风险(见第八章)。这一阶段是通往成熟的新帝国设想的最后的限制,这一设想必将在老帝国主义的废墟上最终建立起来。越战之后的新世界市场一点点地组织了起来:一个打破有限的疆界和欧洲帝国主义的等级程序的世界市场。换句话说,反殖民化进程的完成标志了统治关系的一种新型世界等级化的到来——而且钥匙就牢牢地控制在美国手中。反殖民化第一时期的痛苦

---

① 论反殖民化一般进程的历史,见 Marc Ferro, *Histoire des colonisations: des conquêtes aux indépendences, XIII e - XXe siècle* (Paris: Seuil, 1994); Frank Anspreng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lonial Empir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and R. F. Holland, *European Decolonization, 1918-1981* (London: Macmillan, 1985)。

② 论美国霸权对反殖民化斗争的影响,见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1994), and FranÇois Chesnais, *La mondialisation du capital*, rev. ed. (Paris: Syros, 1997)。

③ Harry S. Truman, *Public Papers*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cited in Richard Freeland, *The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 (New York: Schocken, 1971), 论冷战造成的严格的两极意识形态分化,见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and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而激烈的历史进入到第二阶段，其间军队的控制所施展的力量更少通过军事硬件，更多地通过美元。这是迈向帝国建立的巨大一步。

第二种机制则由一个对生产的地点和流动予以反中心化的过程所决定。[①] 与反殖民化一样，在这里，战后也分为了两个阶段。首先一个新殖民阶段涉及到旧的帝国主义等级程序的延续和保持，前提为附属地区与宗主国民族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交换机制没有得到加深。可是这第一个时期是一个短暂的转折期；事实上在 20 年的曲折中，形势急剧变换。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或者实际上在越战结束前，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各个角落牢固地开展起种种活动。它们成为后殖民国家与附属地区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根本动力。首先，它们促使科技得以交流，这对构建附属国家的新的生产支柱至关重要。其次，它们动员了这些国家的劳力大军和当地的生产能量；最后，跨国公司收集到流动的财富，开始在更广大的全球基础上周转运行。这些多种多样的流动开始基本上汇聚到美国；在它没有直接要求的情况下，保证和协调了跨国公司的活动和运行。这是帝国的一个决定性的构成阶段，通过跨国公司的活动，利润率的调整和均衡化从宗主国民族国家和权力中分离了出来。进而，资本主义利益的构成，依附于新的后殖民民族国家，它没有反对跨国公司的介入，而是在那些跨国公司自身的范围内发展了起来，并在它们的控制之下得以形成。通过生产性流通的反中心化，新的地区敌人和一个新的全球的劳力分工开始形成。[②] 尚未存在全球的秩序，但一个秩序正在形成。

---

① 论商品生产和服务业生产（连同控制的中心化一起）的非中心化，见两本书：Saskia Sassen,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更普遍地论及资本的流动性和抵消的作用力或限制力，见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② 见 Wladimir Andreff, *Les multinationales globales*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5) 及 Kenichi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伴着反殖民化进程与流动的反中心化，另一个第三种机制涉及到推广全世界的生产和政府的规训性形式。这一进程高度地含混。在后殖民的国家中，规训首先需要将大众的对自由的普遍动员转换成一种生产的动员。全世界的农民从他们的田野与村庄里被赶走，被扔进世界大生产的炼炉之中。① 从宗主国(特别是美国)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模型由福特式的工资体制、泰勒制的劳力组织方式和一个将具有现代化、家长式统治和保护性特征的福利国家组成。从资本的立场看，这种模式的梦想便是最终世界上每一个受到充分规训的工人在全球的生产进程中将是可以相互交换的——一个全球的工厂社会和一个全球的福特主义。一种福特体制的高工资和伴随的国家补助成为工人们的奖赏，使他们接受规训性和进入全球的工厂。然而我们应该仔细指出，这些具体的生产关系在宗主国发展起来，而在全球经济的附属地区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实现。作为福特主义的特征的高薪体制和作为福利国家的特征的广泛的社会补助只以零碎的形式在附属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有限人口中实现。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真的必须实现；它的承诺只是作为保证对这个现代化工程有足够支持的意识形态的诱人的酬报。努力真正的所在、趋向现代性的真正腾飞，事实上已经取得的这一成就，就是在整个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范围内推广规训的体制。

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本质上认同这种规训性计划。众所周知的列宁对泰勒主义的热情后来被毛(泽东)的现代化计划所超越。② 社会主义反殖民化的正式的决策也遵从由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所专有的基本逻辑：每一个后殖民政府必须创造一批足够用于规训性体制的劳力大军。无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尤其那些处在要为刚从殖民主

① 论农民对资本主义规训的反抗，见 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论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的经济工程，见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2n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义解放出来的国家规划经济的位置的经济学家们)宣称工业化是发展的必经之路,[①]并且估算了"边缘福特主义"经济学所延伸出的利润。[②] 这些利润其实是一种设想,而它并没有持久,也不可能本质上改变这些后殖民国家沿着现代化和规训化的道路前进的方向。这似乎是通向它们的惟一的道路。[③] 规训在各地都是规则。

这三项机制——反殖民化、生产的反中心化和规训——是"新政"帝国权力的特征,显示出它超越了帝国主义的旧手段有多远。当然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政策的最初制订者从未想象过他们的主张有如此广泛的应用,但早在40年代战争中期,世界领导者们就开始认识到它在建立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中的作用与威力。在哈里·杜鲁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他最终懂得老的欧洲风格的帝国主义在他们的计划中不可能有位置了。当然,新时代已有了新东西。

---

① 如 Robert Sutcliffe 在 *Industry and Underdevelopment*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1)中写道:"没有哪个主要国家未先工业化却成富国……在任何政体下更大的财富和更好的生活标准都同工业化紧密联系。"

② 论全球及边缘的福特主义,见 Alain Lipietz,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 (London: Verso, 1987); and "Towards a Global Fordism?" *New Left Review*, no. 132(1982)。论 Lipietz 的作品在英美经济学家中的接纳情况,见 David Ruccio, "Fordism on a World Scal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Regul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1, no. 4(Winter 1989), and Bob Jessop, "Fordism and Post-Fordism: A Critical Reformulation," in Michael Storper and Allen Scott, eds., *Pathways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2)。

③ 例见 Giovanni Arrighi and John Saul, "Soci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 in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John Saul, "Planning for Socialism in Tanzania," in Uchumi Editorial Board, ed., *Towards Socialist Planning* (Dar Es Salaam: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1972), and Terence Hopkins, "On Economic Planning in Tropical Africa," *Co-existence*, 1, no. 1 (May 1964)。关于对非洲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失败的评价,见 Samir Amin, *Maldevelopment: Anatomy of a Global Failure* (London: Zed Books, 1990), and Claude Ak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6)。

进入现代性和摆脱现代性

在反殖民化和反中心化时期,冷战是全球景象中的主角,但在今天看来,我们的印象是它的角色其实是次要的。尽管冷战所放射的负面影响扼杀了美国的帝国大计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程,这些其实是整个进程中的小因素。影响也许超越了冷战历史的真正重要的因素则是在现代化和发展的掩盖之下第三世界巨大的后殖民转变。最后,这一计划相对独立于冷战的动力和束缚,而且事实上几乎可以说对于第三世界两大世界权力集团间的竞争只是加速了解放的进程。

当然,的确,在此期间引导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三世界精英与冷战划分的一边或另一边有着意识形态上的牵连,且在两种情况下他们以现代化与发展的名义定义了大规模的自由运动。然而对我们来说,尽管稳稳地处在现代性的远端,却不难发现悲剧性地缺少了从解放转到现代化所运用到的视角。现代性的神话——以及由此产生的主权、国家、规训模式等等的神话——其实是精英阶层排他的意识形态,可这并不是这里最重要的因素。

由大众决定的解放的革命进程事实上超越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而在此过程中体现了一种主观性的大规模新生产。这种主观性不可能包含在美苏两极关系中,也不在两个相互竞争的体制内;两者都只是再生了现代性的统治模式。当 1955 年万隆会议上尼赫鲁、苏哈托和周恩来走到一起时,或者当不结盟运动首先形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时,所要表达的并不是他们国家贫穷的严酷性,也不是重复现代性光荣的希望,而是所属的众多人口自身产生的巨大的解放潜力。[①] 这一不结盟观首先体

① 关于对万隆会议及其意义的有趣的个人记录,见 Richard Wright, *The Color Curtain: A Report o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New York: World, 1956)。会议主要演说词见 George McTurnan Kah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6)。

现了一种新的普遍的愿望。

解放之后如何行动才能不落到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的统治之下，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回答。相反，清楚且颇具潜力的则是超越现代性的主观性。当苏联革命不能再向前进或者当它们没能找到超越现代性之路时，这些革命作为发展的替代品的乌托邦意象就此消失了。美国发展的模式看上去同样结束了，因为整个战后时期美国将其自身更多地展现为老帝国主义的警察力量，而不是新希望的代表。被统治的人民为解放进行的斗争始终是一种爆炸性和不可抑制的混合物。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影响已经达到世界每一处空隙的解放斗争显示成一种力量，一种流动性，以及一种形式的弹性，后者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它的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外衣下）设想驱赶到宽阔的大海之上，并在那里失去了方位感。在美苏两极分化的幕后，它们能够分辨出一种单个的规训性模式，并且以大规模的运动方式与这种模式进行斗争，采取的形式多少有些含混，有些神圣化，但却很真实。这种宏大的新主观性间接指向一种范式的转换并使之成为必然。

现代主权的理论与实践的不足在这一点上显露无遗。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使规训的现代化模式已影响到全世界，即使宗主国启动的福利政策已变得不可阻挡且为附属国的领导者天真地拥护，而且甚至即使在这个相互交流的媒体和网络的新世界中，现代主权的机制不再足以统治这些新的主观性，我们应该在此指出，随着现代主权模式丧失了功效，经典的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理论同样也丧失了它们所有的一切解释性功能。总体上说，当这些理论考虑到超越帝国主义时，它们视之为一个将和现代化完美延续现代的主体性模式的一个进程。然而，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一体化的主体性、各国人民和被压迫阶级就在它们进入现代化进程中那一刻开始改造和超越它们。为解放进行的众多斗争则在它们处于世界市场的附属地位时认识到现代主权的不充足和可悲的基础。剥削和统治不可能再以它们的现代形式予以施加。当这些大

规模的新的主体力量从殖民化中涌现和达到现代性,它们认识到基本任务不是进入现代性而是要摆脱现代性。

趋向一个新的全球范式

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一种范式的转变正在出现。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市场作为一个等级和需求的结构变得在所有以前老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区域和地区愈加重要和具有决定性。世界市场开始呈现为能够规范全球流通网络工具的中心环节。这种统一仍然只在形式层面上出现。而在解放斗争与扩展资本主义流通的冲突范围内产生的这些过程并不与世界市场的新结构必然或即刻相容。整合进展得不均衡,速度各异。在不同的地区,而且经常在同一个地区内,不同形式的劳力与生产共存,不同的社会生产的体制也是如此。看上去像重构全球生产的一个具有凝聚性的中心支柱粉碎为上千个独特的碎片,而统一的进程分别在各处得到体验。这一对生产需求的重构和统一的进程远远不是单一维度的,事实上是数不清的不同的生产系统的一次大爆炸。世界市场统一的进程在矛盾的运行中透着多样性与多样化,但其趋向却是真实的。

几个重要的后果随着这个朝向世界市场统一化的趋势而产生。一方面,劳工与社会组织的规训模式从统治地区向外广泛传播,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近邻效应,同时将它拉得更近,却将其孤立在"贫民区"之中。亦即,解放的斗争发现自己"胜利"了,但却受制于世界市场的"贫民区"——一个有着不确定边界、一个棚户区、一个贫民窟的广阔的"贫民区"。另一方面,作为这些进程的一个结果,庞大的人口承担着所谓"工资的解放"。工资的解放意味着大规模的工人将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规训体制,无论是在工厂、在田野,或在社会生产的其他某个场所,而且由此这些人口将从帝国主义长期造成的半奴隶状态下解

放出来。进入工资系统可能是血淋淋的(而且业已如此);它可以重新产生残酷压迫的系统(而且业已如此);但甚至就在新的棚户屋和贫民窟的简陋棚屋里,工资关系的确决定着新的需要、欲望与要求的构成。例如,在众多情况下那些成为薪资工人和被新劳工组织所规训的农民经受着更差的生活条件,而且没有人可以说他们比传统的地区的劳动力更加自由,但他们的确充满着一种新的解放的欲望。当新的规训性体制建构起朝向一个全球劳力市场的趋向,它也建构起其对立面存在的可能性。它构建起躲避规训体制的欲望,并潜在的造就出一大群不受规训的向往自由的人。

全球大批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流动性是世界市场的潜在统一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在老的帝国主义体制当中,劳力流动的潮流基本上在殖民地与大都市之间纵向地受到规范,与之相反,现在的世界市场开拓出更广泛的水平途径。按规训模式组织起来的一个全球市场的形成处在向四周展开流动性的各种张力的交织之下,它是一个交织的流动性,是根状而非枝状的。这里我们的兴趣不仅在于对目前形势给一个现象学的描述,而且在于认识到这种形式中暗含的可能性。被规训的劳动力的新的交织的流动性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意味着真实而有力地追求自由和新的流浪愿望的形成,后者在规训的体制下,得不到容留和控制。[①] 的确,全世界许多工人在悲惨的境遇下被迫迁移,而这些境遇对他们自身来说不可能有解放性。同样正确的是,这种流动性很少增加劳动力的代价;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它使之贬值,相反增加了工人间的竞争。流动性为资本的确带来了一个高的价格,但它是对自由加深的向往。

在资本的全球规训性模式所产生的新流动性之后,一些有意义的宏观经济学的影响随之而来。人口的流动性使得单独管理国家市场(尤其

---

① 论流浪生活和主体性的构造,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是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地困难起来。资本主义需求应用的广阔空间不再被国家的边界或传统的国际疆界所限定。从第三世界逃向第一世界寻找工作或财富的工人们对消除两个世界间的疆界作出了贡献。第三世界在世界市场统一过程中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进入了第一世界,在其中心地带建立起贫民区、棚户屋和贫民窟,而且总是再一次进行生产与再生产。反之,第一世界则以由金钱与需求组成的股票、银行、跨国公司和冷冰冰的摩天大楼的形式转向第三世界。两者都不稳定起来,以至于不同区间的疆界自身也是不稳定和流动的。结果,整个世界市场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管理与需求进行有效应用的惟一有凝聚力的地区。

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体制不得不经受一个改革和重建的过程,目的是保证它们组织世界市场的能力。这种趋势只在 20 世纪 80 年代清楚地出现过(而且肯定是在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崩溃之后建立起来的),但在它刚刚出现的那一刻其主要特征就已被清晰地界定了。它须是一种对全球进程作统一控制的新机制,由此这种机制可以在政治上协调全球范围内参与者的资本与主观特点的新动力;它必须能够表达出帝国需求的特点与主体的交织的流动性。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这一过程如何历史地得以实现,然后我们将开始直接讨论一个全球的政府机制的构成过程。

真正的吸纳与世界市场

在我们进一步探讨之前,我们研究中的阐释性发展要求更密切地考察朝向世界市场实现的趋势与规训性生产和政府的模式之间的关系。全世界的规训性体制的传播如何代表了帝国的一个基本的谱系层面呢?我们可以给这一情况的原因作一个解释,方法是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吸纳各阶段和他对趋向世界市场的种种分析联系在一起。这两种运动其实在某一点巧合,或者说真正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吸纳倾向于在世

界市场的建构中完成。

前面我们看到帝国主义的实践涉及到资本对其外部的国际化，并由此成为在资本之下对劳动进行形式吸纳的各种过程。马克思使用“形式的吸纳”这一术语来命名这些过程，通过它们资本在其自身的生产关系下吸收了源于所属范围之外的劳动实践。[①] 形式的吸纳的过程由此内在地和资本主义生产及资本主义市场的范围之延伸相联系。在某一点上，当资本主义扩张达到极限，形式的吸纳的过程便不可能扮演中心角色。劳动在资本之下真正吸纳的过程并不依赖于外界，也不会涉及扩张的相同过程。经这种真正的吸纳，劳动融入资本的整合变得更加密集，而非广泛，社会甚至更彻底地具有资本的色彩。当然存在没有世界市场的真正吸纳的过程，但不可能没有真正吸纳的过程却存在一个完全实现了的世界市场。换句话说，世界市场和总体均衡化的实现，或者至少世界规模的利润率的管理不可能简单地源于金融或货币的因素，而必须通过社会与生产关系的改造得以产生。规训是这一改造的中心机制。当一个新的社会现实形成并将资本的发展与人口的无产阶级化二者整合为单一进程时，需求的政治形式自身便必须被改造，并以与此进程相匹配的方式与规模表达出来，这一进程也就是一个全球半国家式的规训体制。

马克思对真正的吸纳的进程的敏锐洞察没有提供给我们所需的答案。从形式的吸纳到真正的吸纳这一历程必须通过积极的主体力量的行为来解释。换句话，在全球劳动过程的泰勒制化的影响下，被推向极致的规训性其实不能决定一种新的需求方式的需要，除非通过积极的社会主观性的表达。市场的全球化远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可怕的成果，其实是全世界的泰勒主义者、福特主义者与规训下劳力的愿望和要求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形式的吸纳过程预示了真正的吸纳，并将它带到成熟的状态，而这并不是因为后者是前者的产物（如马克思本

① 马克思论形式上的真正吸纳，主要见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New York: Vintage, 1976)。

人似乎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在前者中建构起来的解放与斗争的条件只有后者才能加以控制。向往中的主观性的运动被迫使向前发展——并宣告没有退路。相应于这些出现在宗主国与附属国的运动,一种新的规训形式不得不出现,目的是为了实现对控制时期的不再可以监控的一切进行驾驭。

原始积累

就在无产阶级看上去将从世界舞台上消失时,它正在成为全球的劳动主角。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似非而是。已经消失的是大工业的工人阶级的霸主地位,而工人阶级尚未消失,甚至没有在数目上减少——它只是丧失了霸主地位,进行了地理上的转移。然而,我们理解"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并不仅仅指大工业化的工人阶级,而是指附属和产生于资本的统治并为其所剥削的所有人。因而从这个角度看,当资本更多地将其生产关系全球化时,所有的劳动形式趋向于无产阶级化。在每一个社会和全世界中,无产阶级越来越成为社会劳动的普遍角色。

马克思用"原始积累"这个词描述了无产阶级化的进程,这种首要或者超前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开始发生之前是必需的。所谓必要的不仅是财富或财产的一种积累,更是一种"社会"积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创造。因而,基本的历史过程首先包括将生产者与生产工具分离开来,对于马克思来说,描述这种社会转型以英国为例就足够了,因为英国代表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点"。马克思解释说,在英国,无产阶级化过程是通过公共土地的关闭和将农夫从土地上清除出去率先完成的,接着就对流浪和漂泊进行野蛮的惩罚。英国的农夫就此从此前所有的生存方式中"解放"了出来,被赶到新制造业的城镇,被迫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工资关系和控制作出准备。相反,创造资本家的中心动力来自于英国以外,来自于商业——或者真正地来自于征战、奴隶贸易

和殖民系统。“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马克思写道，“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①财富巨大的汇集超越了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能量。英国资产阶级纷纷接收能够剥削出新财富的这种新的需求体制。

然而，将英国无产阶级化与资本家化的经验作为所有其他国家的代表会是一个错误。最近300年来，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扩展到全世界，尽管原始积累总是涉及到将生产者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并进而创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层，每一个社会转化的过程却都是独特的。在每个例子中，先前存在的社会与生产关系是不同的，转变的过程是不同的，甚至连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尤其再生产的关系的形成也是不同的，这与具体的文化和历史的差异是一致的。

尽管存在这些重要的差异，将两种普遍模式下的原始积累的现代进程进行归类仍然有用，这两种模式阐明了财富与需求以及内、外部间的关系。在所有情况下，资本的原始积累需要一个财富与需求的崭新结合。马克思所描述的英国情况以及普遍应用于整个欧洲的情况便是第一种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资本所原始积累的新财富来自于外部（来自于殖民地区），需求则出自内部（经英国与欧洲生产关系的演化）。根据第二模式，即欧洲以外的原始积累的现代进程大多具有的特点，过程则颠倒过来，新财富出自内部而需求则来自外部（通常是欧洲资本）。这种两类模式中的财富/需求对应内部/外部的颠倒，导致全世界资本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组成的一整套不同。许多从这两个模式中衍生出来的差异已由发展经济学家们从中央与边缘的资本主义形成方面作了详尽的描述。②

---

① Karl Marx, *Capital*, 第一卷(New York: Vintage, 1976)。

② 见 Samir Amin,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及 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当我们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原始积累的过程真正地在继续。原始积累并不是发生一次然后就结束的一个过程；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阶层不得不持续地再生产。已经改变的是原始积累的模式或方式。首先，区分两个现代模式的内、外部之间的作用业已逐渐削弱。更重要的是，不断积累的劳动与财富的本质在于变化。在后现代中积累的社会财富正日益呈非物质形态；它包括社会关系、交往系统、信息以及情感的网络。相应来说，社会劳力就愈加地非物质化；它同时在直接地生产和再生产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当无产阶级正成为劳动的全球角色时，无产阶级劳动的对象正变得同样地全球化。社会劳动产生了生活本身。

我们应该强调信息积累在后现代的原始积累和日益壮大的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随着新的信息、经济的出现，某种信息的积累便在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之前成为必然。信息在其网络中贯穿了财富与生产需求二者，打乱了内外部以前的概念，而且减少了曾经决定了原始积累的短促的增长。换句话说，信息积累（像马克思分析的原始积累）破坏了或者至少解构了以前存在的生产过程，但（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不同）它旋即在其自身网络中整合了这些生产过程，而且跨越不同的生产领域孕育了最高水平的生产率。发展的短暂次序由此减少到瞬间，而整个社会趋向以某种方式被整合到信息生产的网络中去。信息网络则趋向于某种类似于一种社会生产的同步性。信息积累的革命因而需要在更大的生产社会化中向前跃进。这一增加了的社会化，随着社会空间与短暂性的削减，成为一个无疑用增加了的生产率使资本收益的过程，但也是一个超越资本时代朝向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过程。

第十二章　抵抗、危机与改革

斗争的延续是容易的：工人只需要他们自身以及面前的老板。但组织的延续则是件罕见而复杂的事物：一旦它被制度化，很快会被资本主义所利用，或者被为资本主义服务过程中的工人运动所利用。

——马里奥·托恩蒂

新左派跳了出来……从猫王扭动的臀部出发。

——杰瑞·鲁宾

先前我们摆出越南战争作为美国相对宪法大计和其朝向欧洲的趋势的一种背离。可战争也表达了越南人对自由的要求，表达了农民与无产者的主观性——一种同时反抗帝国主义和国际规训体制二者的基本例证。越南战争代表着当代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真正转折点，意义在于这场越南人的抵抗可视作全世界整个一系列斗争的象征性的中心，在此之前所有斗争互相之间保持着独立和距离。正处在多国资本吸纳之下的农民阶层、(后)殖民地的无产阶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的工人阶级和各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阶层都趋向于一种在全球化的控制体制的工厂——社会剥削下的共同状态。不同的斗争汇合起来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国际规训的秩序。一种对象的统一性建立了起来，有时斗争中的人们

是有意识的,有时则无意识。反抗规训体制的斗争漫长的循环已经达到成熟,强迫资本改造自己的结构,并且经受着一种模式的转变。

两个、三个和更多的越南人

20世纪60年代末,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系统正处在危机当中。[①] 资本主义危机,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作为无产阶级向下在利润率上施加压力的结果,需要资本经历一场普遍的贬值和生产关系深刻的重组。换而言之,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仅是资本自身的动力的一次运行,而是直接由无产阶级的冲突所造成的。[②] 这一马克思式的危机观有助于阐明20世纪60年代末危机的最重要的特点。这一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和需求关系的中断在被视为反对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无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的进攻汇合与积累的结果时,便可以被最好地理解。

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时期经历了基本上指向资本劳动的规训体制的最激烈的工人斗争。这种斗争首先表现为对工作的普遍拒绝,具体则是拒绝工厂劳动,旨在反对生产率和任何基于增加工厂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模式。拒绝规训体制和肯定非工作的范畴成为了一套新的集体实践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决定性特点。[③] 其次,这一斗争的目的是推翻劳动市场的资本主义的瓜分。劳动市场的这三个主要特征——社会群体的划分(按阶级层、种族、民族或性别),劳动市场的流动性(社会流动性,第三产业化,直接与间接生产性劳动的新关系,等等),以及抽象劳动市场的等级化——都受到了来自工人需求的不断增加的僵化与共

---

① 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的结构重组,见 Michae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② 见 Antonio Negri, "Marx on Cycle and Crisis", 见 *Revolution Retrieved* (London: Red Notes, 1988)。

③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中的历史论文集"你记得革命吗?"和 P. V. 所写的"你记得反革命活动吗!"。

性。不断增加的资本的社会化也导向了无产阶级的社会联合。这种增长的联合的声音呈现出对有保障的社会工资与高水平的福利的普遍需求。[①] 再次，亦是最后，工人斗争直指资本主义监控，罢工和无产者的社会联合在前线斗争中走到了一处，共同反对社会劳动的胁迫性组织与监控的规训结构。就工人斗争揭露与打击资本的经济组织的政治神经中枢的程度而言——即便大众的尤其年轻人的许多行动明显看上去是无政治意义的——这种工人的斗争也完全是政治性的。

发生在附属国内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同样对当地和国际上的政治体制施加变革。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从中国革命到越南，从古巴革命到席卷亚非拉世界的无数解放斗争——已经推进了无产阶级的工资需要，各种社会主义的和(或)民族改良主义的政体不得不满足它，而这种需求直接破坏了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即便不带来"发展"，也创造出超越生产与再生产的既定关系的新欲望。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原材料、能源和一些农产品的成本陡然上升，这便预兆着这些新欲望和国际无产阶级在工资上不断增加的压力。这些斗争的结果不仅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而且决定了充分反映着危机强度的一个质量上的新要素。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的活动努力吸纳了资本需求之下全世界的各种生产形式，而这种趋势只是在这一过渡期中得以强化。这一趋势也必然创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一种潜在或者说真正的统一性。这种真正的统一性从未作为一种全球的政治统一得到完全的实现，但它却有实际的效果。换而言之，事实和意识中的国际劳工组织的若干事例并不是这里显得最重要的，而是完全重合的各种斗争的客观上的巧合。因为即使它们非常不同，但都直指资本的国际规训体制。不断增长的巧合

① 论"20 世纪 60 年代的福利爆炸，"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 (New York: Pantheon, 1971), Piven and Cloward, *The New Class War: Reagan's Attack on the Welfare Stat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York: Pantheon, 1982)。

决定了我们称之为各种斗争的积累的情况。

斗争的这种积累埋葬了资本主义的战略,后者长期依赖于劳动力的国际分工形成的等级来阻止工人中全球性的统一。早在19世纪,在欧洲帝国主义充分发育之前,恩格斯正在哀叹英国的无产者置身于一种"劳动贵族"的境地,因为它的利益与不列颠的帝国主义,而不是殖民地的劳动力阶层联系在一起。在帝国主义衰退的时期,鲜明的国际劳力分工依然存在,但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遭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开始萎缩。附属国的无产阶级的共产斗争结束了老帝国主义企图把发达地区的危机转嫁到其附属地区的策略的可能性。将经济的压力转移到用具有野蛮效果的方法维持下来的被统治的帝国主义地区的依旧平静的秩序之下,从而平息欧洲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内部危险;依靠这种塞西尔·罗得斯的旧策略的做法已经不再可行了。在帝国主义地区里形成的无产阶级如今自发地组织、武装起来,具有了危险性。于是便有一种趋势,国际的或多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共同的斗争中抗击资本主义的规训体制。[①] 附属国的无产阶级的反抗与兴起,既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内部,又在其之上,作为一种象征和模式交相呼应。通过这种融合,整个国际资本区域内的工人斗争宣告了第一、三世界间的划分的终结和全球无产者潜在的政治整合。斗争的融合在一个国际的规模上呈现出的问题便是将劳力合作转化成革命组织以及实现真正的政治统一性。

随着这一客观的融合和斗争的积累,可能以前还起着有限的功用的第三世界观如今彻底无用了。我们理解的第三世界观是被这样的理念所定义: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矛盾与冲突正介于第一世界的资本和第三世界的劳力之间。[②] 革命的潜力于是坚定地专门在第三世界扎根。

---

① Luciano Ferrari Bravo, "Introduzione: Vecchie e nuove questioni nella teoria dell'imperialismo," 见 Luciano Ferrari Bravo 编 *Imperialismo e classe operaia multinazionale* (Milan: Feltrinell, 1975)。

② C.A.一直论证道,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种冲突,*Revolutionary Pressures i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1978)。

这一观念已在不同的依赖理论、发展中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中被内在或外在地予以再现。[①] 第三世界观的有限的优点在于它直接反击了第一世界观或欧洲中心论中认为创新和变革总是发端而且只能发端在欧美的观点。然而，这一错误观点的反射性的否定则只是导向同样错误的境地。我们发现这种第三世界观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第一、二世界中劳动的变革和对抗。进而，这里我们最重要的论点是：第三世界观无视全世界的各种斗争的真正融合，在宗主国与附属国都是如此。

资本主义对危机的反应

随着全球各种斗争的融合埋葬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规训能力，业已统治了全球近三十年，即美国霸权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经济秩序开始解体。战后资本主义管理国际发展的形式与实体在 1944 年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大会上被强行设立。[②]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三个基本要素为基础。第一个特征是包括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美国整体上的经济霸权。这一霸权通过战略地选择一种以相对自由的贸易为基础的自由发展予以加固，进而则通过维持黄金（美国拥有量约为全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作为美元价值的抵押物的方式来加固。美元便“等同于黄金”。其次，该体系要求美国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欧洲与日本）之间就以前为英国英镑与法国法郎所统治的欧洲帝国主义的传统领地达成货币稳定的共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由此能够在金

---

① 这种第三世界的视角与 Immanuel Wallerstein, Andre Gunder Frank and Samir Amin 的著作暗合。

② 关于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事件和主要人物的详细的历史记载，见 Armand Van Dormael, *Bretton Woods: Birth of a Monetary System* (London: Macmillan, 1978)。美国在战后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提出经济计划和丹巴顿奥克斯会议提出政治计划，进行全面的霸权准备，关于对此进行了更加广泛分析的历史论述，见 George Schild, *Bretton Woods and Dumbarton Oaks: Americ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stwar Planning in the Summer of 194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融上得到额外地出口美国的资助,并受美元货币体系的保护。最后,布雷顿森林大会还强行建立起美国对所有附属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准帝国主义的关系。美国的经济发展同欧日的稳定及改革均由美国保证,这取决于美国在同附属国的关系中积累起了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

美国货币霸权的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安排,因为在以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突出地是英国)的控制牢牢掌握在私人银行家与金融家手上时,布雷顿森林会议将控制权授予一系列的政府间的规范的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最终还有美联储。① 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也许可以被理解成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政模式的霸权所具有的财政和金融的一面。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凯恩斯和伪帝国主义的机制最终陷入危机,此时美、欧、日的工人斗争的持续进行提升了稳定与改革主义的成本,而附属国的反帝反资的斗争开始摧毁超额利润的榨取。② 当帝国主义的动力不再能够向前推进,而工人的斗争愈加激烈时,美国贸易平衡便开始向着欧日的方向重重地倾斜。危机的第一阶段——逐渐出现但没有蔓延——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直延伸到末期。因为布雷顿森林会议给出的控制使得美元事实上不可兑换,国际生产和贸易的货币调解经过了一个阶段的发展,这一阶段的特点有相对自由的资本循环、一个强大的欧元市场的构建以及在宗主国各地多多少少政治上平等关系的固定。③ 然而,欧美日在1968年的总爆发,加上越南对美军事上的胜利,彻底使这一暂时的稳定遭到解体。滞胀让位于到处蔓延的通货膨胀。危机的第二阶段可能被认为开始于1971年8月17日,当时尼克松总统将美元

---

①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1994)。

② 论20世纪70年代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发端的国际金融危机,见 *Peter Coffey, The World Monetary Crisi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4); and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③ 论作为一种危机要素的欧元财政,见 Jeffry Frieden, *Banking on the Worl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从金本位上分离开来，致使美元在法律上不可兑换，并给所有欧洲输入美国的进口产品加了10%的附加税。[①] 整个美国的债务被有效地推给了欧洲。这一动作只有通过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才得以实现；美国由此也使欧洲记起最初的协议条款以及它作为最高的剥削和资本主义控制的霸权。

20世纪70年代，危机变得正式和结构化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制造的政治与经济的平衡体系已完全陷入混乱局面，惟有美国霸权这一残酷的事实留存下来。布雷顿森林机制的不断削弱的有效性和宗主国的福特主义货币体系的解体清楚地显示出，一种国际资本体系的重建将不得不涉及到在世界控制的前提下综合地重新构建经济关系与一种范式的转移。然而，从资本的角度看，那样一种危机并不总是一种完全负面或者不受欢迎的事件。马克思宣称资本的确由于经济危机的转化能力而对它从根本上重视。相对整个系统而言，个体资本家是保守的。他们主要关注在短期内将他们的利润最大化，即便长期来看这会导向一条对集体资本来说毁灭性的道路。经济危机可以战胜这些抵抗，破坏不赢利的部分，重建生产的组织，以及更新技术。换而言之，经济危机可以推进重建一种高而普遍的利润率的改革，进而对工人斗争有效地做出回应。资本的普遍贬值和破坏工人组织的努力有助于改造危机的实质——流通和过度生产的不平衡——成为一种受认可的规训工具；它重新表达了发展与剥削的关系。

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式斗争的强度和凝聚力，两条道路向资本敞开，从而完成平息斗争和重建规训的任务，而资本则轮流尝试了这两条道路。只有有限的有效性的第一条道路是压制性的选择——一种根本上保守的措施。资本的压制性策略旨在完全倒退社会进程、分离和

---

① 论1971年美元的可兑换性和尼克松的策略，见 David Calleo and Benjamin Rowland, *America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tlantic Dreams and National Realit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and Coffey, *The World Monetary Crisis*。

分解劳动市场以及重建对整个生产循环的规训。由此资本给一些组织予以特权,它们代表着一部分有限劳动力拿到有保障的工资,资本将这部分人口归到自身结构之下,并加深这些工人同更加边缘化人口之间的距离。既在一个国家之内,又在国际上重建一个有着等级制细分的系统,这一点通过控制社会的流动性和不固定性加以实现。技术的压制性运用,包括生产的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则是在这一运作中炼铸的一个核心武器。资本主义生产史上以前根本的技术改造(即流水线与大众生产体制的引进)包含了对瞬间生产进程(泰勒主义)的关键性修正和迈向再生产的社会循环(福特主义)规范化的一大步。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的技术改造,伴随着急速冲向自动的理性化,将这些体制推向有效性的极致,推到了危机点。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的机制不再能控制生产与社会力量的动因。[①] 通过旧的规训体系施加的压制也许能够扼制一下危机和工人斗争的怒火所产生的破坏力,但它最终也是一种自我毁坏的反应,它将扼制资本主义生产自身。

同时,另一条道路随之不得不进入运行;它涉及到技术的改造,后者不再仅仅以压制为目标,而是要改变无产阶级的真正构成,进而对其新活动与新形式进行整合、统领和从中获利。然而,为了理解资本主义对危机回应的第二条道路的紧急性,即这条构成范式转移的道路,我们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策略与计划的瞬间逻辑去看。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历史必然总是一个反动的历史:资本一旦被交给自身的手段,将永不会放弃一种利润的制度。换而言之,资本主义只有当它被迫改革和其现时体制不再持久的时候才会承受系统的改革。为了从其积极因素的角度抓住这一过程,我们需要采纳对立一方的立场——即伴随着残留非资本主义世界立场的无产阶级立场,这种非资本主义世界正被循序渐进地吸收

① 论福特主义的局限和有必要为资本找到一种生产与积累的后福特主义模式,见 Benjamin Coriat, *L'atelier et le robot: essai sur le fordisme et la production de masse No. l'ge del'électronique*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1990)。

进资本主义关系。无产阶级的力量对资本施加界限，它不仅决定着危机，而且决定着这种改革的期限与性质。无产阶级事实上创造了将来资本将被迫采纳的社会和生产方式。

通过向自己提问美国如何能在危机中始终保持它的霸权，我们可以对无产阶级这一决定性角色有初步的理解。答案大部分，也许似是而非地并不在于美国政治家或资本家是天才，而在于美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创造性。早些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突出了越南抗战是各种斗争的象征中心，而今就国际资本主义控制的范式的转移，美国无产阶级显然是最为充分地表达出国际或多国工人的愿望和需求的主体角色。① 相对于欧洲和其他地方来说，美国无产阶级由于它较低的党团与联盟的代表性而势力弱小；与这种大众的共识相反，也许我们应该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视它为势力强壮。工人阶级力量并不体现在代表机构上，而是工人自身的对抗性与自主性。② 这就是美国大工业工人阶级真正力量的标志。而且，无产阶级的创造性和冲突也体现在，也许更为重要地体现在工厂之外的劳动人口上。③ 为了理解美国霸权的延续性，引用美国资本主义对他国资产阶级所实施控制的关系并不是足够的。美国霸权实际上由对抗的美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所支撑着。看上去掌握在美国手中的新霸权在这一点上仍是有限的，并被关闭在规训性重构的旧体制之内。需要有一个范式的转换来设计政治与技术转换上的重建过程。换而言之，资本

---

① Fredric Jameson 主张，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在第一世界尤其美法国家中的社会斗争延袭了（甚至源自）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强大的反殖民化和自由运动。Fredric Jameson，"Periodizing the 60s，"in *Ideologies of Theory：Essays，1971-1986*（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② Giovanni Arrighi，"Marxist Century，American Centuny：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 Labor Movement，"见 Samir Amin，Giovanni Arrighi，Andre Gunder Frank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Transforming the Revolution：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World Syste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③ R.K. 为无产阶级拒绝的动因以及在其奇妙的美国黑人工人阶级历史上交替的生活形成的创造提供了典型的记录，*Race Rebels：Culture，Politics，and the Black Working Class*（New York：Free Press，1994）。

必须面对和回应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新生。这种主体性的新生达到了(并超越了我们业已提及的福利斗争)可能被称为的一种生态斗争的状态,即一种关于生活模式的斗争,它最终体现在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之中。

资本的生态学

我们依然并不能去理解资本对危机回应的第二条道路的本质,即促使危机运动并超越于规训性现代化的逻辑与实践之上的范式转换。我们需要再一次退回来考察由国际无产阶级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施加于资本之上的界限,这两者都使得转换成为必然且决定了它的期限。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许多观察家,尤其是研究帝国主义的马克思理论家来说,似乎丧钟业已敲响,资本已到达致命灾难的门槛。资本主义已经追求了几十年之久的扩张运动,耗尽了全球相当多部分的资源用于它的积累,而且首次被迫面临疆域的极限。当这些界限来临之时,帝国主义力量终究发现它们置身于相互的致命的冲突之中。如罗莎·卢森堡所说,资本依赖于外部,依赖于其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目的是实现它的剩余价值并使之资本化,进而继续它的积累的循环。在20世纪初,似乎资本主义积累的帝国主义冒险不久将耗尽周边的非资本主义的自然环境。而资本将死于饥饿。资本主义关系之外的一切——无论是人类的、动物的、植物的还是矿物的——都是从资本及其向自然的扩张和视角来看的。[①] 于是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批判表现出一种生态的意识——就生态而言的程度恰恰在于自然环境的真正有限和自然遭到毁

① 同样在生态思想上,至少在其最为多产的模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讨论中的"自然"是既人性又非人性的;生态学并不简单涉及到事物的保存,更是关系的生产以及主体性的生产。Félix Guattari, *Les trois écologies* (Paris: Galilée, 1989); and Verena Andermatt Conley, *Ecopolitics: The Environment in 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1997)。F. P. 尽管用了不同的记录方式但延续了这种"生态"的思想脉络。*Elogio dello spirito pubblico meridionale* (Rome: Manifestolibri, 1997)。

灭的灾难性后果。①

那么，当我们写作这本书而20世纪走向结束之时，资本主义已是奇迹般地富有，而它的积累比以前更加强健。我们如何能够使这一事实和20世纪开始时无数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细致分析相一致呢？他们将帝国主义的冲突指认为是一场迫近的冲击自然极限的生态灾难。我们可以用三种方法来研究资本持续健康成长之谜。首先，一些人宣称资本不再是帝国主义的，认为它已经变革，退回到自由竞争的薪水时代，并同其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建立起一种保守主义的生态关系。即使从马克思到卢森堡这些理论家尚未证明那样一个进程与资本主义积累本身的基本特征相反，但只要对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粗略地一瞥就应该说服任何人从手中抛弃掉这种解释。显然清楚的是，在20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扩张以不断增长的节奏继续着，为资本主义市场开辟新领域，并将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进程吸纳到资本的统治之下。

第二个假设也许就是：不可预见的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只涉及到我们先前分析过的扩张和积累相同进程的一种延续，只是环境的完全耗尽尚未迫近，而面临极限和生态灾难的时刻正在到来。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全球资源其实是广泛的。尽管所谓的"绿色革命"已经在资本主义内部吸纳了一大部分世界的非资本主义农业，而且其他的现代化工程业已将新的地域和文明融入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循环中，但依然会有大面积（当然，可能是有限的）的劳力和物质资源有待被吸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潜在的扩张市场的基地。例如，随着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开始，苏联

① 在努力思考"外界"的重要性和真正的局限时，罗莎·卢森堡也许是20世纪第一个伟大的生态思想家。在如A.G.与J.O.等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最佳例证采取了一种近似于卢森堡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的论证形式（尽管他们的作品并不直接来源于她的）：资本主义生产必须意味着向自然扩张和毁灭自然，这不仅给星球上的生命带来悲惨的后果，而且埋葬了资本主义自身未来的活力。For André Gorz, see *Ecology as Politics*, trans. Patsy Vigderman and Jonathan Cloud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for James O'Connor, se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 no. 1 (1989)。

与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已经给全球资本提供了进入广阔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渠道——通过几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资本主义的吸纳预先作好了设计。即使在已经牢牢融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地区,依然存在着充足的扩张机遇。换而言之,根据这第二个假设,非资本主义环境继续被形式上吸纳进资本的领域,进而积累至少仍能部分地通过这一真正的吸纳得以实施:提出资本迫近宿命的预言家们并没错,只是说得太早。然而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局限性是真实的。迟早曾经丰富的自然资源终将耗尽。

第三个假设不妨可被视作第二条的补充,即现今资本继续通过在一轮扩张的再生产循环中吸纳来继续积累,但它不断增多地吸纳的不是非资本主义环境,而是它自身的资本主义范围——亦即,这种吸纳不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吸纳。资本不再向外部看而是着眼于内部,其扩张因此更加精深而不是广泛。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资本的技术组织的一步质的飞跃。以前的工业革命的各种阶段引入了机器制造的消费品,后来则是机器制造的机器,但现在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机器制造的原材料与食品——简而言之,机器制造的自然和机器制造的文化。[①] 然后,我们不妨说,依据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化是这样的经济历程:当它出现的时候,机械和工业技术已经扩张到全球的投资,现代化进程已完成,而对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形式上的吸纳也已达到极限。通过现代技术改造的进程,所有的自然已成为资本,或者至少已受制于资本。[②] 当现代的积累以对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形式的吸纳为基础时,后现代的积累则依赖于资本主义范围自身的真正吸纳。这似乎是对"生态灾难"威胁

① "由此后期资本主义作为所有经济部门首次被完全工业化的时期出现了;对这一时期人们能够进一步增加不断提高的上层建筑的机械化程度。"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78)。

② "我们所处时代的这种更加纯洁的资本主义由此消除了前资本主义组织的特区,对此它一直在纵容和以附属的方式进行着剥削。"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回应，一个瞄向未来的回应。[①] 社会与自然的工业化的完成，但也是现代化的完成，呈现出的只是通向后现代化进程的前提条件，抓住的只是如"后"之类的否定术语表达的转换。在下一节中我们会直接面对后现代化的真实进程，或者说是生产的信息化。

对规训性体制的攻击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进程，我们必须多少涉及到其决定性的根基，它存在于劳动力主体的转化中。在危机时期，即整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同在宗主国和附属国内的福利的扩张和控制的全球化为劳工大众创造了一种新的自由空间。换而言之，工人利用了规训性时代；最重要的是，为了扩张劳动的社会力量，其提出异议的时刻和造成政治不稳定的阶段（如越南危机时期）增长了劳动力的价值，重新设计了整套的需求与愿望，工资和福利则不得不作出反应。用马克思的术语，人们可以说必要劳动的价值已经大幅度地上升——当然从资本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随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的时间（进而利润）相应在下降。从资本家的立场看，必要劳动的价值作为一个客观的经济数量而出现——劳动力的价格，像谷物、油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可它真正地由社会来决定，并且是整个社会斗争系列的索引。整套社会需求的定义、非工作时间的质量、家庭关系的组织和既定的生活预期全都发生作用，并由重新创造工人的成本有效地表现出来。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危机期间，社会工资（就工作工资和福利二者而言）的巨大增长直接源于在再生产、非工作和生活的层面上社会斗争的积累。

社会斗争不仅提高了再生产和社会工资的成本（因而降低了利润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强加了劳动自身质量与本质的一种变化。尤其在

---

① 我们不想说资本能永久地通过技术进步在其具有破坏力的关系与其（人性和非人性的）环境之间进行协调。技术进步能做的是转移冲突的范围和延缓危机，但限制和对抗依旧存在。

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工人所承受和争取到的自由空间最大，通过重估整套生产活动的社会价值，实现了拒绝社会工厂的规训体制。规训体制显然不再成功地容纳年轻人的需求和愿望。得到一份保证规则与稳定的工作的前景，一周 8 小时，一年 55 周，甚至一生都工作；进入正常化的社会工厂体制之中的前景，这曾是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的一个梦想；如今这两种前景都以一种死亡的方式出现。有着不同形式的对规训体制的大众拒绝不仅是一种否定的表达，也是一个创造的时刻，尼采称之为一种价值上的重新评价。

不同形式的社会争议和实验均集中在拒绝珍视那种物质生产的特定方案之上，这种生产正是规训体制、其大众工厂及核心家庭结构的特色所在。① 这些运动相反重视一个更加富有弹性的创造性的动力和也许被认为是生产的更加非物质的形式。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各种运动的传统“政治”格局的立场看，那一时期与一种报复共同发展起来的不同形式的文化实验，一起以一种对“真正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偏离显现出来，但它们没有看到的则是“仅仅文化”的实验就已有着非常深远的政治与经济的影响。

“逃避”的确是发生在黑什伯里地区以及 60 年代整个美国的一个糟糕的概念。两个基本的行动便是拒绝规训的体制和实验新形式的生产率。拒绝显现在广泛变化的假象之中，并在数以千计的日常活动中流传开来。正是那些大学生体验着致幻剂（LSD）而不去找工作；正是年轻的女性拒绝结婚成家；也正是“得过且过的”非洲裔美国工人在“有色人种”的时代游移不定，拒绝任何可能的工作。② 年轻人拒绝工厂社会式的令人窒息的重复，发明了新形式的流动和弹性和新的生活方式。学生运动迫使一种较高的社会价值依据于知识和智力劳动。女权主义运动使“个

① S. A. 对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的阵势提出了一个有用的评估，*The Death and Rebirth of American Radicalism*（London：Routledge，1996）。

② 又见 Kelley，*Race Rebels* 中论隐性抵抗的历史。

人的"关系网的政治内容清晰起来并拒绝父系统治的控制，从而提升了传统上认为的妇女工作的社会价值，这种工作需要情感上细致的劳动达到一个高水平，并以对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服务为中心。[①] 运动的全副装备和涌现出的整个反文化澄明了合作和交流的社会价值。社会生产和新的主体生产的价值的大众再评估为一个有力的劳动力转化开辟了道路。下一节我们会具体讨论运动价值的索引——流动性、弹性、知识、交流、合作、情感上的——将如何界定随后几十年中资本主义生产的转化。

对"新的社会运动"的各种分析业已极大地帮助了坚持文化运动的政治重要性，文化运动反对的是使它们的意义最小化的狭隘的经济视角。[②] 然而，这些分析自身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就像它们所反对的视角一样，它们永久地保持着对经济和文化运动的狭隘理解。最为重要的是，它们没有认识到文化运动的深刻的经济威力，也未真正认识到经济与文化现象的不断增长的不可识别性。一方面，资本主义关系正在扩张，以吸纳各方面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即整个生活范畴。另一方面，文化关系正在对生产过程和价值的经济结构进行重新定义。一种生产体制，首先是主体性生产的体制正在遭到摧毁，而另一种则在巨大的斗争积累中产生。

以价值与劳动的戏剧化的修正为中心，这些主体性生产的新轮回在规训性的社会组织之内并以反对它的方式得以实现。这些运动预示着资产阶级意识到一种生产中范式转化的需求，并决定了它的形式和本质。如果越南战争尚未发生，20 世纪 60 年代还没有出现工人与学生的

---

① 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提出拒绝的历史，见 Alice Echols, *Daring to Be Bad: Radical Feminism in America, 1967-1975*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② 例 Judith Butler, "Merely Cultural," *New Left Review*, no. 227 (January-February 1998)。按这些线索对"新社会运动"的政治阐释的最具影响力的文本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暴乱，没有1968年及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并且没有整个一系列的反帝斗争，资本可能会满足于维持它自己的权力安排，欣喜于已经免除了转变生产范式的麻烦！它一定因为好几个理由感到满意：自然的发展极限很好地服务于它；它被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所威胁；它知道世界劳动力的颠倒的流动性和混合性为新的危机和为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秩序进行的阶级冲突可能性。生产的结构重组，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均源于一种新的主体性的上升。[①] 从完善规训性体制的阶段到随后的转变生产模式的阶段的这一历程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下层的构成已经变化了的无产阶级。资本并不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范式（即便它能够这样做），因为真正开创性的时刻业已产生。资本的问题恰恰在于要统治一种新的构成体，它已经在与自然和劳动的一种新关系、一种自主生产的关系中自主地生成和予以界定。

在这一点上规训体制已变得完全无用，必须被抛弃。资本必须完成一种对新的劳动力质量否定的反射和倒置；它必须调整自我以便能再次进行控制。我们怀疑，由于这一原因，已经最为倚重且最为聪明地依赖于规训生产模式的极端现代化（诸如日本和东亚资本主要成分）的大工业和政治力量正是那些在此进程中受苦最深重的。资本能够在新世界中发展的惟一模式就是去适应并管理新兴非物质的、具有合作性、交流性和情感特点的劳动构成。

苏联式规训的死亡的痛苦

既然我们对新范式的条件和形式已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想简洁地考察一个重大的主体性结果，这种范式转移在运动过程中决定的结果

① 见 Antonio Negri,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Polity Press, 1989)。

就是苏联体系。我们已同苏联世界的许多学者共有[①]的论点是：该系统由于其在结构上不能超越控制的可统治性的模式而陷入危机、分崩离析，与之相关的还有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的生产模式，以及其政治控制的形式，后者是凯恩斯—社会主义的方式，因而只是内在地现代化，外在则是帝国主义的。它在调整控制的部署和生产的工具以适应劳力变化方面缺乏弹性，这加重了转化的种种困难。由长期的高度的现代化承传下来的苏维埃国家的严重的官僚体制，使得苏维埃权力不可能在必要的时候对新需求和新愿望作出反应，它们由全球涌现的主体首先在现代化进程之内、继而在外围表达了出来。

后现代性的挑战基本上不是被敌对的力量，而是由新的劳动力主体及其新的智力与交流的构成物凸现出来。这种体制，尤其以它不自由的方面，是不能够对这些主体的需求作出充分反应的。这种体系本可以持续，而且有一段时间的确继续在规训的现代化基础之上工作，但它不可能将现代化同劳力的新的流动性和创造性联系在一起，后者正是给新的模式及其复杂的机制带来生命力的基本条件。在星球大战、核军备竞赛和空间探索的背景下，苏联也许从技术与军事的观点来看仍能跟上它的对手，但其制度不足以支撑在主体性战线的竞争冲突。换而言之，它不可能恰恰在真正的力量冲突快要结束的地方进行竞争，它也不可能面对经济体系的比较生产率的挑战，因为先进的交流和控制论技术只有在扎根于主体性时才有效，或者在它们被生产的主体性所激活的时候才更有效。对苏联体制而言，掌握住新的主体性的力量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那么，根据我们的论点，在斯大林统治的最终戏剧化的几年与赫鲁

---

① 例如，F.J.主张苏联的崩溃"不是因为它的失败，而是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就现代化而言"。"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 in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Karl, eds. *Marxism Beyond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1996)。更普遍地论及冷战宣传（从双方角度）如何使我们看不到苏维埃体制内社会历史的真实运动，见 Moshe Lewin,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 (New York: Pantheon, 1985)。

晓夫失败的革新之后，勃列日涅夫的体制对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成熟水平的生产性市民社会予以冻结，这一社会在战争和生产率带来巨大的流动性之后正要提出社会的和政治上的认可。在资本主义世界，大规模的冷战宣传和非同异常的生产谬论和错误信息的意识形态机器，阻止我们看到苏联社会真正的发展和掩盖于其中的政治辩证法。冷战意识称该社会为专制集权，可事实上它是一个混杂着极其强劲的创造力与自由的社会，如同经济发展和文化现代化的节律一样强劲。苏联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官僚的独裁国家，而不是一个集权专制的社会。① 而且只有当我们抛开这些扭曲了的定义之后，才能看到苏联的政治危机如何产生和再产生，直到最终埋葬了该体制的那一步。

对官僚的独裁制的抵制正是产生危机的动力。苏联的无产者拒绝工作实际上正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同一斗争方法，迫使他们的政府进入危机、变革和重构的轮回。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尽管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延误了，尽管有二战中的大规模的损失，尽管有相对的文化孤立、与世界市场的相对隔绝、残酷的禁闭政策、饥饿和对人口的杀戮，尽管有所有这一切，以及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异，但俄罗斯和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功地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制造出了同样的问题。② 即便在俄罗斯和苏联控制下的其他国家，对于更高工资和更大自由的需求也随着现代化的节奏继续增长。就如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一种新型的劳力角色在那里得

---

① 见 Leon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trans. Max Eastman (Garden City, N. Y.: Double day, 1937); and Cornelius Castoriadis, *Devant la guerre* (Paris: Fayard, 1981)。亦见 D. B. 论苏联崩溃的一系列文章 "Perestroïka: la révolution réellement existante?" *Futur antérieur*, no. 1 (1990), "Que reste-t-il de la perestroïka?" *Futur antérieur*, no. 6 (1991), and "L'Unione Soviétique No. l'heure du vide," *Futur antérieur*, no. 8 (1991)。

② 对我们来说似乎人们可以将中国无产阶级在毛泽东以后时代中的变革的社会实践和导致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运动作一个比较。见张旭东著，*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他详述了这一时期释放出的了不起的创造性。

到界定，在当时它基于一种智力生产能力的新发展表现出极大的生产能力。这种新的生产现实和生机勃勃的知识大众，正是苏联领导人试图关闭在一种规训性战时经济的牢笼之中（一场在口头上持续建立起来的战争）和围困在一种社会主义的劳动与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的东西，亦即不再有任何意义的资本的一种社会主义管理。苏联的官僚体制并不能构建一座为新兴劳动力的后现代流动性必备的宝库。该体制惧怕后者，受到规训性体制崩溃和以前激励过生产的泰勒化及福特主义的对象的转变的恐吓。这正是危机变得不可逆转的地方，而且由于勃列日涅夫冬眠式的不流动性，危机变得具有灾难性了。

我们发现重要的不是缺少或者违背了工人的个性与形式上的自由，而是浪费了一群大众的生产能量，他们已经耗尽了现代性的潜力，当时想从资本主义积累式的社会主义管理中解放出来，以表达一种更高水平的生产率。这种压制和能量正是从相对的方向促使苏维埃世界像一屋子纸牌一样坍塌下来的力量。公开和改革当然曾代表了苏联权力的一种自我批评，但上述二者实施得太迟和太小心，并不能阻挡危机。苏联的机器则自动放弃和停止运动，没有了惟有新的生产主体可以产生的动力。智力和非物质的劳动部门则在这种体制中放弃了舆论；它们的离去宣判了制度的死刑；死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胜利；死于一种最后的窒息，它扼杀了要求有一条通向后现代性途径的主观条件。

第十三章　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我们可以在一劳永逸地解决它之后心安理得地加以使用的某种东西。

如果有的话，这一概念不得不在我们对它的讨论结束之时产生，而不是在一开始。

——费里德里克·詹姆逊

来自华盛顿的好消息就是国会里每一个人都支持信息高速公路的提法。坏消息则是没有人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国会议员爱德华·马基

现在可以平常地观察自中世纪以来三个独特时期的经济范式的延续，每一个均受主要经济部门的界定：在第一个范式中，农业与原材料的开采是经济的主体；第二个范式中，工业与可持续商品的生产占据着优势地位，在第三个即目前的范式中，提供服务和掌控信息，则是经济生产的核心[①]。统治地位就这样由基础产业转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经济现代化含括了第一个范式转到第二个的过程，即从农业的统治到工业的统治。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我们不妨将从第二个范式到第三个范

① 对现代生产阶段的划分进行争辩的有一大批文章，为这些文章确立术语的有 Daniel Bell,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and Alain Touraine,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式的过程，即从工业的统治到服务和信息的统治过程称为一个经济后现代化过程，或者更恰当地称之为信息化。

这三个范式间的转化最明显的定义和标志，首先体现在数量方面，要么与这些生产领域中涉及到的人口的百分比相关，要么与不同生产部门生产的整体价值的百分比有关。过去的 100 年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数据的变化的确显示出戏剧性的转变。① 然而这种数量上的观察可以导向对这些经济范式的各种严重的误解。量化指标既不能扣住从一个范式转向另一个的过程中的质的转变，也不能表明各种范式背景下经济部门间的层次的划分。在现代化过程和向工业统治的范式转化的过程中，不仅农业生产在数量上下降（既在雇用工人的百分比上，又在整个生产价值的比例上），而且更重要地是，农业自身得到改造。当农业沦为工业的附属之后，甚至当农业仍在数量上占优时，它开始受制于工业的社会与经济上的压力，进而使农业生产自身被工业化。当然农业没有消失，它依旧是现代工业经济的一个基本构成，但它现在是一个改造后的工业化了的农业。

数量上的视角也未能认识到全球体系中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等级层次，它导致各种历史的误解，并无中生有地摆出种种分类。例如，从一个数量方面的视角，人们可能认定农业或矿业占据了大多数劳动力，并由这些部门生产了大多数价值（如印度或尼日利亚）的 20 世纪可以与过去曾出现过的社会相比，后者在这些部门的工人或所产价值的百分比上相同（如法国或英国）。历史的假象在一种动态的串联上形成类比，以至于一种经济体系在发展的序列中占据了另一种体系以前阶段拥有过的同一个位置或阶段，仿佛一切都以同一轨迹线状前行。然而从质量的视角出发，就它们在全球权力关系中的位置而言，情况则是：这些社会的经济完全占据着无法相比较的位置。在早期情况下（过去的法国或英

① Manuel Castells 和 Yuko Aoyama, "Paths towards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G-7 Countries, 1920－90,"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3, No.1(1994)。

国),农业生产是其经济领域内的主要部门,而在近期(20 世纪的印度或尼日利亚),它则附属于世界系统中的工业。两种经济并不在同一轨道上,而是处在极端地不同、甚至相反的形势之下——即统治与附属的关系。在这些不同的等级位置中,许多经济因素是完全不同的——交换关系,债权与债务关系等等[①]。后者的经济为了找到堪与前者相比的一个位置,如欧洲一样,例如地中海世界的中世纪经济,它将不得不颠倒这种权利关系,并在当代经济范围内取得一个统治地位。换而言之,历史变迁必须以贯穿经济范围的权力关系来得到认可。

发展的假象

经济发展的观点在战后美国霸权之下被强用来配合新政模式,它使用了那样错误的类比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这种论调将所有国家的经济史视为对单一发展模式的遵循,各自在不同的时代依据不同的速度。那些经济生产目前和宗主国的水平不一致的国家于是被看作发展中国家,因为如果它们继续走以前宗主国遵循过的道路,并且重复后者的经济政策与战略,它们终将享有一种类似的地位或阶段。然而,发展的观点未能认识到所谓发达国家的经济不仅为一定的数量因素或其内在的结构所决定,而且更重要地决定于它们在全球体系中的统治地位。

不发达理论和依附理论提出了发展主义的观点,这些理论主要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产生于拉美和非洲。对发展主义观点的批判是有用和重要的,恰恰因为它们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体系的进化

① 论造成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的错误的历史类比,Cheryl Payer, *Lent and Lost: Foreign Credit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1991)。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等级与权力结构下的位置①。统治的地区将继续发展，附属的将作为全球权力结构中相互扶持的支柱继续不发达下去。说附属经济不发展并不意味着不变化或不发展；而是指它们在全球体系内保持附属地位，因而从未取得期望中的一种统治的发达经济形式。有些情况下单个的国家或地区可能改变了其在等级中的地位，但关键在于，无论谁填补了哪个位置，等级依旧是决定性因素②。

然而，不发达理论家他们自己也在重复一种相似的经济发展的虚假论调③。我们可以用三段论话来说，他们的逻辑开始于两种有效的历史观点，但从中推出了一条错误的结论。首先，他们认定，通过殖民体制和(或)其他帝国主义统治形式的强制施行，附属经济的欠发达被创造出来，并通过融入全球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的网络之中得以维系，进而对那些主要的经济有了真正的持续依赖。其次，他们宣称主要经济自身当初已经在相对孤立中发展了充分表达的独立结构，只与其他经济及全球网络进行有限的互动④。

可是，他们从这两个多少可接受的观点然后就推导出一个无效的结论：如果发达经济在相对孤立中取得了充分的表达，而不发达经济变得失语和在融入全球网络后形成依赖，那么让不发达经济相对孤立的计划则将导向它们的发展和充分表达。换而言之，作为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所误导出来的“错误发展”的替换，不发达方面的理论家则倡

---

① 不发达和依赖理论的经典解说见 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and Fernando 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关于对发展阶段的各种观点的非常精辟的批评，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② 发展的分析是一种幻觉，它是一种真实有效的幻觉，通过“发展”世界建立了它自身的结构和权力机构。论发展的制度化，见 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 关于对依赖理论的发展主义思想意识的批判，同上。

④ 例见 Claude Ake, *A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Harlow, Essex: Longman, 1981)。

导"真正的发展"包括一种经济与其依靠的关系摆脱联系,并在相对孤立中体现一种自足的经济结构。既然这就是主要经济发展的方式,它必然应是躲避不发达循环的真正道路。然而,这种推理让我们相信经济发展的规律会以某种方式超越历史变迁的种种差异。

另一种发展的理念似是而非地以同一个历史假象为基础,后者是与之相对的发展的主要形式的中心。世界市场的潜在实现应该摧毁任何这样的理念:如今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再创造过去的条件并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过去所做的那样发展,从而从全球权力网络中孤立出来或摆脱与之的关联。甚至宗主国如今都依赖于全球体系;世界市场的互动已导致所有经济的普遍失语。不断增加的是,任何对孤立或分离的企图将只意味着一种全球体系下更加野蛮的统治,一种对无权和贫穷的削减。

信息化

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改造了与重新定义了所有社会层面上的要素。当农业被现代化成了工业时,农场逐渐变成工厂,随之而来的有所有工厂的纪律、技术、工资关系等等。农业就此被现代化成了工业。更普遍的是,社会自身缓缓地受到工业化,直到改变人际关系和人性本质的程度。社会成了工厂。在 20 世纪初期,罗伯特·穆齐尔美好地追忆从田园农业世界转向社会工厂过程中的人性的转化:"曾经人们自然地适应了所发现的正等待着自己的条件,而且那是一种成为自我的非常安全的方法。而如今,随着诸事瓦解,当每一样东西正与其生长的土壤分离开时,甚至在与灵魂产生相关的地方,人们可以说真的应该用随着机器和工厂而来的某种智能来取代传统的手工艺。"①人性化的过程与人性自身在现代化定义的进程中遭到彻底改造。

---

① Robert Musil,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New York: Knopf, 1995)。

可是，在我们的时代，现代化已走向终结。换而言之，工业生产不再扩展它对其他经济形式与社会现象的统治。这种转化的一个征兆在就业的数量变化中是明显的。当现代化进程在从农业与矿业（基础部门）到工业（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迁移上显现出来时，后现代化或信息化的进程则已通过从工业向服务工业（第三产业）的迁移表现出来，这种迁移自20世纪70年代初已发生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在美国。服务业覆盖了从健康教育、金融到交通、娱乐与广告等广泛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大多数工作是高度流动的，涉及到各种灵活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普遍特点在于以知识、信息、感情和交际为主角。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称后工业经济为一种信息化的经济。

认为现代化已结束而全球经济正经历一个朝向信息化经济的后现代化过程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工业生产会被抛弃，或者甚至说它将停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即便在全球最主要的地区也是如此。恰如工业化进程改造了农业并使之更加多产一样，信息革命也将通过全新界定与激活生产过程来改造工业。这里新的迫切的管理技巧在于："视生产为一种服务。"[①]结果，随着工业的改造，生产与服务间的区分正变得模糊起来。[②]就像经过现代化过程所有生产趋向工业化，通过后现代化过程所有的生产也趋向服务化的生产、趋向信息化。

当然，甚至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已开始沿着同一道路进行后现代化建设。以1970年以来的七国集团的就业数据的变化为基础，玛努卡斯特和清山汤子已经区分了两种信息化的基本模式或道路。两种模式都涉及到后工业服务业就业的增加，但它们强调服务和

---

① François Bar，"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见William Drake编 *The New Information Infrastracture: Strategies for U. S. Policy*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 1995)。

② Robert Chase和David Garvin，"The Service Factory，"见Gary Pisano和Robert Hayes编，*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5)。

生产之间的不同类别的服务和不同的关系。[①] 第一条道路趋向于服务经济的模式，并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所领头。这一模式包括工业行业的急剧削减和服务部门工作的相应增加。尤其是管理资本的金融服务业开始统治其他服务部门。在第二种模式，即以日本与德国为代表的信息—工业模式中，工业雇工比在第一个模式中削减得更加缓慢。更重要的是，信息化进程被紧密融入而且服务于巩固现存的工业生产的强度。与工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各种服务业依旧在这种模式中比其他服务更重要。这两种模式代表着操纵和赢得经济转变中优势的两种战略，但应该清楚的是：它们二者都坚定地朝着经济的信息化方向和突出生产流通与网络的重要性运动。

尽管世界的附属国家和地区无力实施这样的战略，后现代化进程却对它们施加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信息化与向服务业的转化已基本上完全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非其他地方就此出现了，就发展的线性阶段而言，这一事实不应该将我们带回到对当代全球经济形势的一种理解。当然随着工业生产已在宗主国没落，它已被有效地输送到附属国，如从美国与日本到墨西哥和马来西亚。那样的地理转移和换位可能导致某些人相信存在一种新的全球组织，其经济等级为：宗主国是信息服务的经济，它们的直接附属国是工业经济，那些进一步附属的则是农业经济。例如，从发展的阶段来看，可以认为通过工业生产的当代输出，福特在20世纪90年代于巴西建立的一个汽车工厂可与30年代底特律的一个福特汽车厂相比，因为两种生产属于同一种工业阶段。

然而，当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我们能发现两个工厂不可相比，差异则极度重要。首先，两个工厂在技术与生产实践上相差甚远。当一定的资本输出之后，它通常以生产率的最高水平被输出。那么，90年代巴西的福特工厂不会用30年代底特律的福特工厂的技术建造，但将建立在可

① Castells 和 Aoyama，"Paths towards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能的最先进和生产力最强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之上。工厂自身的技术基础建设将明确地把它放在信息经济之内。其次，也许更重要地，两个工厂处在与全球经济整体相关的不同的统治关系上。20 世纪 30 年代，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处在全球经济顶点的统治地位，产出的是最高价值；20 世纪 90 年代的汽车工厂，无论在圣保罗、肯塔基或符拉迪沃斯托克，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着一个附属地位——从属于高价值的服务业的生产。如今所有的经济活动均趋向于受到信息经济的统治，并在质量上被其转化。全球经济的地域差异不是不同阶段发展的共存的迹象，而是新的全球生产等级的类别。

越来越明确的是，从附属地区的角度看，现代化不再是经济发展和竞争的关键。最附属的地区，如下撒哈拉非洲地区就有效地被排除在资本流通和新技术之外；它们由此发现自己处在饥饿的边缘。[①] 对全球等级中层位置的竞争不是通过工业化来实施，而是通过生产的信息化。有着不同经济形式的大国，如印度和巴西，可以同时支持所有层次的生产过程：信息为基础的服务业生产，商品的现代的工业生产，以及传统的手工业、农业和矿业的生产。这些形式中不需要一个有序的历史进程，相反它们融合和共存。所有生产的形式在世界市场的网络中出现，并受制于服务业的信息化生产。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意大利经济的转化清楚地表明，相对落后的经济并不简单地遵循统治的地区经历过的相同阶段，而是以可替换的和混合的模式发展起来的。二战后，意大利仍是一个主要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但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它经过激烈却可能是不彻底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这是一个首要的经济奇迹。但后来在七八十年代，当工业化

---

① M.C. 将全球经济最附属的地区描述成“第四世界”。“The Informational Econom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Martin Carnoy, Manuel Castells, Stephen Cohen, and Fernando Enrique Cardoso, *The New Global Econo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的过程仍未完成时，意大利经济又开始了另一种转变，一个后现代化的过程，并取得了第二次经济奇迹。这些意大利奇迹不是真正地允许它赶上主要经济形式的大跃进；相反，它们代表了不同的不完全经济形式的混合。这里最有意义的和可能实际地将意大利案例作为所有其他落后经济普遍模式的地方在于：意大利经济在转向另一阶段（信息化）之前并没有完成前一个阶段（工业化）。据两个当代的经济学家认为，最近意大利的转变揭示了“从原始工业主义向原始信息主义的一种有趣的转化”。① 不同地区将逐步发展到使农业因素混合有部分的工业化和部分的信息化。各经济阶段于是当即同时出现，汇合成一种杂交、复合的经济，这种经济在全世界没有种类而有程度上的变化。

正如现代化发生在前一个时代，今天的后现代化或信息化则标志着人类活动的一种新模式。如穆齐尔所说的那样，在关乎精神生产的地方，人们的确应该用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控制论智能来代替工业机器的传统技术。② 我们必须发明皮埃尔·列维称作的一种网络空间的人类学。这种众多比喻的转换让我们首先看到了这种转变，但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看清楚我们关于人类与人性自身的理念上的变化，它们在朝向一种信息经济的进程中汇合。

非物质劳动的社会学

朝向信息经济的进程必然涉及到劳动力质量和本质的一种变迁。这是经济范式进程的最直接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内涵。如今信息和通讯开始在生产过程中担任基础的角色。

就工厂劳动力变化而言，这种转变的首先一个方面被许多人所认

---

① Castells 和 Aoyana，“Paths towards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② Pierre Levy,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7)。

同——用汽车工厂作为一个中心参照点——即从福特模式到丰田模式。[①] 这些模式间的主要的结构变化包括了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交流体系，即工厂和市场间信息的传递。福特模式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一个相对"沉默"的关系。福特时代标准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可以依靠充足的需求，因而很少需要"倾听"市场。从消费到生产的反馈周期允许市场上的变化刺激生产和行业的变化，但这种交流的周期既受限定（由于规划和设计结构上的有限而细分了的各种渠道），又很缓慢（由于大众生产的技术和程序上的僵化）。

丰田主义则基于一种对生产和消费间交流的福特制结构的颠覆。根据这种模式，在理想的情况下生产计划将频繁且迅速地同市场进行交流。工厂将保持零库存，而商品将根据现存市场的目前的需求及时生产出来。于是这一模式不仅仅包括一种更快的反馈周期，也是这种关系的一种颠倒，因为至少在理论上生产决策实际上跟在市场决策之后，随之变化。在大多数极端的案例中，商品只到消费者已经选择和购买后才生产出来。但是一般而言，将模式看作努力迈向生产与消费间的持续互动性或快速的交流，这将更为准确。这一工业背景首先提供的感觉即是通讯和信息已开始在生产中担任一个新型中心角色。人们可能说工具行业和交际行为已在信息化的工业过程中紧密交织在一处，但应该很快地补充一句：这是把交流单纯作为市场数据的转换的一种贫瘠的观念。[②]

经济的服务部门展现了一个生产交流的更加丰富的模式。大多数

---

① 论福特主义与本田主义模式之比较，见 Benjamin Coriat, *Penser No. l'envers: travail et organisation dans l'entreprise japonaise*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1994)。关于本田生产方式的早期发展的简史，见 Kazuo Wada, "The Emergence of the 'Flow Production' Method in Japan," in Haruhito Shiomi and Kazuo Wada, eds. *Fordism Transform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Methods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我们基本上正思考着尤根·哈贝马斯在诸如《交际行为理论》之类作品中提出的交际行为和工具行为间的概念区分。关于对哈贝马斯的这种区分的较好的批判，见 Christian Marazzi, *Il posto dei calzini: la svolta linguistica dell'economia e i suoi effetti nella politica* (Bellinzona, Switzerland: Casagrande, 1995)。

服务的确以信息和各种知识的持续交换为基础。既然服务的生产导致缺失物质的和耐用的物品,我们将这一生产所涉及的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① 非物质劳动的一面可以在与计算机的功用的类比中被发现。不断地广泛应用计算机已逐步趋于对劳动实践和关系以及所有的社会实践和关系进行重新定义。熟练而灵巧地掌握计算机技术正变成一种在国家中不断普及的基本工作素质。即使未涉及直接接触计算机,对计算机操作模式方面的符号和信息的掌握也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在以前的时代,工人们知道如何在工厂内外像机器一般活动。我们甚至知道(例如在姆贝基照片的帮助下)去发现整体上机械化的人类活动。如今我们日益像计算机一样思考,而通讯技术和它们的互动模式越来越成为劳动活动的中心。计算机的一个新方面在于它能够持续地通过应用来修改其自身的操作。即使人工智能的最原始的形式也允许计算机在其和用户及环境的互动的基础上扩展与完善操作。同样的持续互动性成为广泛的当代生产活动的特点,无论直接涉及到计算机硬件与否。生产的计算机和通讯革命已经改造了劳动实践,以至于它们都趋向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模式。② 互动的和控制论的机器融入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眼球晶体,从而成为了一种新的修补术,通过它们对我们的身体和思想本身进行了再定义。计算机空间的人类学实际是对新的人类境况的一种认可。

罗伯特·里奇将计算机和通讯工作中的非物质劳动称之为"系统分

---

① 关于对非物质劳动的定义与分析,见 Maurizio Lazzarato,"Immaterial Labor,"in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亦见同一本文集末尾论非物质劳动的词条。

② P.D.以偏激的语言来理解走向非物质生产的进程:"基本的经济资源——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即'生产方式'——不再是资本和自然资源(经济学家的'土地'),也不是'劳动'。它是知识,将来还是。"Peter Drucker,*Post-capitalist Society*(New York:Harper,1993),P.D.不理解的则是,知识不仅是给予的,也是生产出来的,它的生产涉及到各种新的生产和劳动方式。

析的服务业”——涉及“解决问题、认证问题和战略上中间性活动”[①]的各种任务。这种劳动具有最高的价值，因此里奇认为它是新的全球经济竞争的关键。但他认识到发展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创造性和象征性的操作工作意味着要相应发展平常的象征操作的低价值和低技术的工作，诸如数据记载和文字处理。这里开始出现在非物质生产范围内的一种基本的劳动分工。

我们应该注意到信息化生产和非物质劳动的出现有一个后果，这一后果已成为劳动过程的一种真正的均质化。从19世纪马克思的角度出发，不同劳动活动的具体实践极度地不平均：裁剪和纺织需要无可比拟的具体行动。不同的劳动活动只有从它的具体的活动中抽象出来才能被聚集在一起和以均质的方式进行观察，不再被看作裁剪和纺织，而是普遍的人类劳动的支出，即抽象劳动。[②] 然而，随着今天计算机化的生产，具体劳动的异质性已趋于减少，而工人正不断地远离她或他的劳动目标。计算机化裁剪和计算机化纺织的劳动可能完全涉及到同样具体的活动——即控制符号和信息。当然，工具总是将劳动力从劳动目标上在一定程度上抽象出来。可是在以前，工具普遍以一种相当弹性的方式和某些任务或某些团体的任务相关。不同的工具对应于不同的活动——裁缝的工具、织工的工具，或是后来的一个缝纫机和动力织机。相反，计算机将其自身推为万能工具，或者就是核心工具，通过它所有的活动得以进行。然后通过生产的计算化，劳动向着抽象劳动的位置发展。

然而，计算机的模式只能解释服务性生产中交流和非物质劳动的一面。非物质劳动的另一面则是人类交际和互动的情感性劳动。比如健

---

① Robert 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Knopf, 1991)。对里奇来说最重要的是事实上那种优势——最终即民族的统治——将按这些新分工的方式并通过这些高一低一价值任务的地理分布在全球经济中获得。

② Karl Marx, *Capital*. 第一卷(New York: Vintage, 1976)。

康服务主要依赖于关怀和感情劳动;娱乐工业也类似地聚焦于情感的创造和控制上。这种劳动是非物质的,即使它是群体的和感情性的,因为它的产品是不可触摸的,是一种包含放松、幸福、满意、兴奋或激动的感觉。诸如"亲自服务"或"就近服务"等范畴经常被用来鉴别这种劳动,但它真正根本的在于感情的创造和控制。这种情感的生产、交换和交流大体上和人类交际相联系,而这种交际像娱乐工业那样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非物质劳动的第二个表征,即其情感性表征很好地延伸并超越了由计算机所定义的智能与通讯的模式。对情感性劳动更好的理解开始于被"女人工作"的女权主义分析称为"身体模式的劳动"的东西。[①] 关怀的劳动当然完全浸润在物质和肉体之中,可它生产的感情却是非物质的。感情的劳动所产生的是社会网络、群体的形式和生物能量。此处人们也许再一次认识到经济生产的工具行业已与人类关系的交际行为相结合起来。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没有被削弱,而生产已被丰富到人类互动的复杂性水平。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区分三种类型的非物质劳动,它们驱使服务部门处在信息经济的顶端。第一种出现在已被信息化和已经融汇了通讯技术的一种大工业生产中,这种融汇的方式改造了生产过程自身。生产被视为一种服务,生产耐用物品的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相混合并趋向非物质劳动。第二种非物质劳动带有分析的创造性和象征的任务,它一方面自身分解成为创造性和智能的控制,另一方面成为日常的象征性任务。最后,第三种非物质劳动涉及感情的生产与控制,并要求(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即身体模式上的劳动。这些就是成为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动力的三种劳动。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应该指出,在这些形式的每一种非物质劳动

---

① Dorothy Smith,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中，合作完全内含于劳动本身。非物质劳动立即涉及到社会的互动和合作。换而言之，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方面并非像以前各种劳动形式那样由外界强加或组织起来；相反，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自身。[①] 这一事实对旧观念予以质疑（和古典的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相等同）；在这种观念中，劳动力被视为“可变资本”，即只受资本激发与聚合的一种力量，因为劳动力的合作力量（尤其非物质劳动力）赋予劳动维持其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大脑与身体仍需要他者产生价值，但它们所需的他者并不必然由资本及其协调生产的能力来提供。如今，生产率、财富和社会剩余价值的创造通过语言的、交际的与情感的网络采取了合作的互动性的方式。于是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

网络生产

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的过程的第一个地理上的结果是生产的一种具有戏剧性的非中心化。现代化的进程和通向工业方式的过程激起了生产力的猛烈增加和劳动力向如曼彻斯特、大阪与底特律等成为工厂城市的地方集体迁移。大工业生产的效率依赖于众要素的集中和近邻性，目的在于创立工厂和促进交通与通讯。然而工业的信息化和服务生产的不断上升的统治已使得那种产品的集中变得不再必需。规模与效率不再呈线性地关联；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大规模成为一种限制。电讯和信息技术的进展已使得生产的非区域化成为可能，后者有效地分散了大众工厂，撤走了工厂城市；通讯与控制可在相当距离内有效地实施，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非物质生产在全球运输上可以用最少的延误和花费。

---

① 马克思在他的时代将合作理解成资产阶级行为的结果。资产阶级的作用像乐团指挥或战场上的将军一样，负责部署和协调共同劳作中的生产力量——关于对社会与生产合作的当代动因的分析，见 Antonio Negri,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Polity Press, 1989)。

几种不同的生产工具能在一个单一商品的同步生产中得以协调，以便工厂可以被分散到不同地方。在某些部门工厂厂址本身甚至可以被放弃，因为它的工人们单独通过新信息技术进行交流。①

在通往信息经济的道路上，流水线已被作为生产的组织模式的网络所代替，在每一个生产地点和众多生产地点之中改造了合作和通讯的方式。大工业工厂对劳动合作圈的界定主要通过商场里工人的物理分布。单个的工人和他的近邻工人进行交流，而交流普遍局限于物理上的邻近。生产地点中的合作也需要物理上的邻近，既协调生产的循环，又将正在生产的商品的运输费用与成本最小化。例如，煤矿与钢铁厂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之间运输与通讯线路的效率，都是钢铁生产的整体效率中的重要因素。相类似地，对于汽车生产，所涉及的分销商体系中的通讯与交通的效率是系统中整体效率的关键所在。相反，通向信息生产和组织的网络结构的过程使得生产合作和效率不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近邻和中心化，信息技术倾向于使得距离愈加不重要。在单一过程中的工人可以有效地从遥远的地方进行交流和合作，不必考虑近邻原则。事实上，劳动合作的网络不需要地区的或物理的中心。

向着生产的非地域化的趋势更加显现在包括控制知识与信息在内的非物质劳动的种种过程。劳动过程可以以一种几乎完全与通讯网络相协调的方式进行，对网络来说，所处的位置和距离的重要性很有限。工人们甚至可以在家里上网。信息生产的劳动(包括服务和耐用商品两者)依靠我们可以称为抽象合作的东西。这样的劳动使得工人中知识和信息的交流承担更加中心的角色，但这些合作的工人不需要在场，甚至可以相互间相对不熟悉，或者仅仅通过交换生产信息了解对方。合作的流程在网络和商品的抽象水平上得到巩固。生产地址由此可以被非地

① 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区化并趋向于一种虚拟的存在，这在通讯网络中起到了协调的作用。与旧的垂直的工业和群体模式相反，生产如今趋向于组织成为水平网络的企业。①

信息网络也将生产从地域局限中释放出来，根据在于，无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距离怎样，网络趋于使他们直接接触。微软公司的合作创始人，比尔·盖茨将这种趋势推向极致，并预测未来网络将彻底征服实现流通的限制，允许一个理想的、"非摩擦"的资本主义出现："信息高速将使电子市场得以延伸，使之成为最终的媒介、全球的中间人。"②如果盖茨的阐释得以实现，网络将趋于减少所有的距离，令交易迅捷。无论地理位置如何，生产场所和消费场所终将彼此相通。

这些向着生产的非地域化和增长了的资本流动性的趋势不是绝对的，而且有着重大的抵消的趋向，但就它们的进展程度而言，它们将劳动置于一个被削弱的交易位置。在工业化大生产的福特组织时代，资本受制于一个具体的区域，并进而必须按合同与一个有限的劳动人口打交道。生产的信息化与非物质生产的增长的重要性已倾向于将资本从地域与交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通过将场所移到全球网络的另一点，资本可以退出和一个有限的本地人口的谈判——或者仅仅通过使用迁移的潜力作为谈判的一种武器。已享受过相当稳定性和合约权力的全体劳工人口由此发现自己处于日益动荡的就业形势中。一旦劳动的交易地位遭到削弱，网络生产可以容纳各种旧形式的不保险的劳动，诸如自由职业、家庭工、兼职工和计件工。③

作为后现代化或经济信息化的特征，生产过程和场所的非中心化与全球的分散引起了相应的控制生产的中心化。生产的这种离心运动受

---

① 论网络企业，见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96)。

② Bill Gates, *The Road Ahead* (New York: Viking, 1995)。

③ 一些意大利学者将意大利北部中小型规模的网络生产的反中心化视作创造自主劳动新范围。Sergio Bologna and Andrea Fumagalli, eds. *Il lavoro autonomo di seconda generazione: scenari del postfordismo in Italia* (Milan: Feltrinelli, 1997)。

到需求的向心潮流的平衡。从本地的角度来看,内在于生产体系中的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允许工人们从中心的远距离所在进行更加广泛的监控。对劳动活动的控制可以潜在地个性化。并在网络生产的虚拟监控中继续下去。然而,控制的中心化从全球的角度看甚至更加清晰。生产在地理上的分散已开创了对日益中心化的管理与计划的一种需求,也对一种新的专门化生产者的服务,尤其金融服务产生需求。① 几个主要城市(诸如纽约、伦敦和东京)的金融与贸易类的服务管理并指导着全球的生产网络。于是,作为一种大规模人口的变化,大工业城市的衰落与撤消对应着全球性城市,或者说真正的控制性城市的崛起。

信息公路

通讯网络的结构与管理是信息经济生产中的基本条件。这些全球网络必须在构建与监控之下,以保证秩序和收益。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美国政府突出建立与规范一个全球的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其最优先发展对象之一,而通讯网络对最强大的跨国公司来说已成为最活跃的兼并与竞争的区域。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一名顾问彼得·考黑就这些网络在新的生产与权力的范式中承担的角色作过一个有趣的对比。他说,新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全球生产与政府的条件和期限,如同当初道路建设对罗马帝国那样。② 大范围推广罗马的工程和技术其实既是帝国领域最长久的特色,又是对它们实施控制的基本条件。然而,罗马之路在帝国的生产过程中并未承担中心角色,只是促进了货物与技术的流通。也许对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更好的对比应是促进了 19 和 20 世纪帝国主义

① 论在控制的集中背里"生产者服务"的发展,见 Sassen, *The Global City*。

② Peter Cowhey, "Building the Global Information Highway: Toll Booths, Construction Contracts, and Rules of the Road",见 William Drake 编 *The New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 1995)。

经济利益发展的铁路的建设。宗主国的铁路巩固了其国家的工业经济，而在殖民地及经济上受统治的地区建造铁路，使那些地区向资本主义企业腹地洞开，允许它们融入帝国主义经济系统。可是，像罗马之路一样，铁路在帝国主义和工业生产中只起着外在的作用，将其通讯与交通线路延伸到新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新的信息基础设施的独特之处在于事实上它完全包含和内在于新的生产过程之中。在当代生产的顶端，信息和通讯是生产的真正商品；网络自身则是生产和流通二者的场所。

从政治上说，全球的信息基础设施也许被刻画为一种民主的机制与一种寡头卖主垄断的机制的结合，这两种机制以不同的网络系统的模式在运行。民主的网络是一个完全水平和非地区化的模式。开始作为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司)的一个项目的因特网现如今已扩展到世界各地，它是这一民主网络结构的主要例证。一批不确定和潜在地无限的节点相互连接，通讯中没有中心的控制点；所有的节点不论区域、位置场，均通过无数潜在的路径和中转方式与所有其他节点相联系。因特网因此相似于电话网络的构造，而且它的确将后者融合为其自身的通讯路径，如同它依靠计算机技术建设其通讯点。移动电话的发展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启动了网络中的各种通讯点，已经强化了非地域化的进程。因特网的原始设计旨在抵挡军事进攻。既然它没有中心，而且几乎任何部分都能作为一个自发的整体进行运作，网络甚至可以在部分受损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确保运行的同一个设计因素——非中心化——也是令网络控制起来如此困难的原因所在。既然网络之中没有一点对其他点之间的交流是必需的，对网络来说去规范或禁止它们的交流就很困难。这种民主模式寡头卖主垄断下的网络则以广播体系为特征。依据这种模式，例如在电视或无线广播的系统中存在一种独特的和相对限定的发射，但接收点则具有潜在的无限性和区域上的不确定性，尽管有线电视网络之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这些路径。广播网络由其中心化的生产、整个文化产业——从报纸和书籍的传播到电影和录像

带——传统上按这种模式在运行。一批相对小规模的公司(或某些地区单个的企业家如鲁比特·默多克、西尔维奥·伯鲁斯科尼或泰达·特纳)可以有效地控制所有这些网络。这种寡头卖主垄断的模式不是根状的,而是将所有分枝从属于中心根部的一种树状结构。①

新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则是这两种模式的混合。就像在一个时代列宁和其他论帝国主义的批评家们认识到国际公司的联合成为准垄断(对铁路、银行、电子等等)一样,如今我们正目睹着跨国公司间为了建立和巩固对新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准垄断的一场竞争。各种电讯公司、电脑硬、软件生产商及信息与娱乐公司正在兼并和扩张它们的业务,抢着瓜分和控制生产网络的新大陆。当然这个合并起来的网络中,民主的部分或成分会保留下来,它将在网络的互动与非中心化的结构的基础上抵抗控制。但已然存在一种大规模的控制的中心化,它通过信息与通讯力结构中的主要因素的(事实上或者法律上)联合发展起来:好莱坞、微软、国际商用机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等等。新的通讯技术提出了新民主与新社会平等的承诺,事实上却已创造出不平等与排外的新路线,既在宗主国内部,特别也发生在宗主国之外。②

公共财产

整个现代时期一直有一个将公共财产私有化的持续运动。在欧洲随着罗马帝国与基督教崛起而产生的伟大的公用土地最终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转到了私人手中。全世界广大公共空间剩下的如今只

① 论根状与枝状的结构,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② 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错误的平等承诺,见 Herbert Schiller, *Information Inequality: 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New York: Routledge, 1996)。关于对信息与技术的不平等分布的更加全球化的分析见 William Wresch, *Disconnected: Haves and Have-Nots in the Information Age*(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有传奇之类的东西：罗宾汉的森林，美洲印第安人的大平原，游牧部落的干草原等等。在巩固大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公共空间的建构与解体按一种愈来愈强大的螺旋状发展。的确，当它受积累的必需所控制时（为了培养发展中的上升或飞跃，为了集中和动员生产方式，为了挑起战争等等），公共财产通过侵占大片的文明社会和将财富、财产转到集体手中的方式得以扩张。然而公共财产不久就被私人重新侵占。在每一个过程中，被认为是自然事物的集体财产以公共的代价被转化为第二和第三自然，从而最终为私人的利益经营着。例如，可以通过筑坝拦截北美西部的大河和灌溉干涸的山谷来创建一个第二自然，然后这一新财富便移交给了农产业巨头。资本主义运行的是一种私人占有公共物品的持续的循环圈：侵占公共财产。

20世纪福利国家的兴衰是公共和私人占有的螺旋中的另一个循环。福利国家的危机根本上意味着通过公共基金建立起来的公共救助与分配的结构正在被私有化和为私人侵占所得。目前趋向能源和通讯服务业私有化的新自由化潮流是螺旋上的另一个转折。这体现在许可能源和通讯由私人经营，而它们都是用公共财政的巨大支出建立起来的。市场体制和新自由主义便依靠这些私人侵占的第二、三乃至n个自然而存活下来。曾经被视为公众概念之基础的公共财产现被侵占为私人所用，却无人能管此事。由此，即使在概念上，公众也遭到解体和私有化。或者真正的情况是，公众与公共财产之间的内在关系被私有财产的超常的力量所取代。

这里我们并不想对资本主义在全球不断施行的破坏和侵占哀叹，即使抵抗其威力（尤其是抵抗对福利国家的侵占）在相当程度上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伦理任务。我们更想问：如今在后现代、信息革命和生产模式的不断改造中，公共财产的关键概念是什么？事实上，如今对我们来说，似乎更多地参予了一种激进和深刻的共性，而不是曾经经历了资本主义历史。事实是我们参予其中的生产世界由通讯和社会网络、互动服务和

共同语言所组织。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很少由制造和消费的物质产品所界定,更多的受到合作生产的服务业与各种关系的界定。不断增加生产意味着构建合作与交流的共性。

私有财产的概念自身被理解成使用一件物品和处理所有财富的专有权,这些财富来自于占有它;在这种新形势下,私人财产的概念日益变得荒谬。越来越少的商品能在此框架内被占有和专有使用;集体在生产,并在生产的同时受到再生产和再界定。对私人财产的经典的现代概念的基础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在后现代的生产模式中被解体。

但人们该反对说,这种生产的新的社会条件根本没有削弱司法和政治上的私有财产体制。私有财产的概念危机在实践中并未成为一种危机,相反,私有侵占的体制已趋向于被广泛应用。如果没有如下事实,这种反对意见将是有效的:在语言的和合作的生产这一背景下,劳动与公共财产趋向于重叠。尽管具有自身的司法权力,私有财产必然成为一个更加抽象和超验的概念,因而更加脱离了现实。"公有财产"的一个新理念不得不在这个层次上出现。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哲学是什么》中宣称在当今时代、在交流和互动的生产语境下,各种概念的建构不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操作,同样也是一项本体论的工程。建构概念和他们称为"公共名称"的事物真正地是一项将大众的智力与行动结合起来、使二者一齐起作用的活动。建构概念意味着使代表集体的工程在现实中存在。除了以共有的方式施行,建构概念别无它路。从生产的现象学、概念的认识论和实践的立场看,这种共性就是在一项工程中,大众全部得到投资。公共财产乃是大众的化身、生产和解放。卢梭说想将自然的一块据为他或她自己的专有物,并将它转化成私有财产的超验形式的第一人就是发明了邪恶的人。相反,善即公共的所有。

第十四章　混合的政体

与信息公路相关的美妙的事情之一是实现虚拟的公平比现实世界的公平要容易得多……

我们在虚拟世界中生而平等。

——比尔·盖茨

生产趋向网络模式的范式转移业已培养了超越于民族国家传统疆界之上的跨国公司的不断增长的力量。就资本家和国家间长久的权力斗争而言，这一关系的新颖之处必将得到认可。这种冲突的历史易于理解。人们应该理解，最有意义的是，尽管资本家和国家之间有着不断的对抗，这种关系只有在资本家被单个地考察时才真正地具有冲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国家刻画为管理资本家利益的执行董事会；他们意指，尽管国家的行为时常与个体资本家眼下的利益相抵触，但它将总是代表资本家集体的长期利益，亦即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资本的集团主体。[①] 道理在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无论怎么自由，并不保证资本家集体

① 关于对马恩著作中讨论国家理论的篇章的分析，见 Antonio Negri, "Communist State Theory," in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的共同利益,因为他们眼前的利己的利益的动机本质上是目光短浅的。政府必须谨慎地思量个体资本家们的利益。提升他们资本的集体利益。由此资本家都将争夺国家的权力,即便国家正在代表着他们自己的集体利益。这种冲突从整个社会资本的角度看真正地是欢乐而公正的辩证法。

当巨人们统治地球时

国家与资本间的辩证法已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征。迅速而粗略的历史划分将帮助我们至少突出了这种动态发展的最基本特点。在 18 和 19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全面立足,国家控制着整个社会资本的事务,但需要有相对不显眼的介入权。这一时期在反思之下(带着一定的扭曲度)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以相对小规模的资本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为特征。在这一时期欧洲民族国家之外,在强大的殖民统治充分展开之前,欧洲资本带着更少的束缚运行着。相当大程度上,资本家的公司在殖民或前殖民地区运行和建立它们自己的权力垄断、自己的警察及法院之时,是至高无上的。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其自身的独立结构统治了所剥削的爪哇地区,一直到 18 世纪末。甚至在该公司于 1800 年解体之后,资本的统治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协调或控制之外。① 对在英国的南亚和非洲殖民地经营的资本家来说形势非常相同。东印度公司的独立的权力一直持续到 1858 年的东印度法案置公司于女王统治下之时,而在南非,资本家冒险者和企业家的自由统治至少持续到那个世纪末。因此这一时期特点在于对国内外的政府介

① M. C. Ricklef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1993)。关于对荷兰统治、传统的爪哇政府和 20 世纪初的经济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美妙的描述,见 Pramoedya Ananta Toer's great four-volume historical novel, *The Buru Quartet*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2-1992)。

入相对少有需求。[①] 在欧洲民族国家内部，个体资本家所受的统治（在其集体利益上）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而在殖民地区它们则有效地保持了独立性。

国家和资本的关系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逐渐改变，此时危机不断威胁着资本的发展。在欧洲和美国，公司、托拉斯和卡特尔逐渐形成对具体的工业和遍及全国边疆的工业群的准垄断。垄断阶段对资本主义的健康构成一个直接威胁。因为它腐蚀了作为系统生命血液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②] 垄断和准垄断的形成也埋葬了国家的管理能力，因而大公司赢得了将它们个别的利益强加给资本家集体的利益。结果爆发了一系列的斗争，藉此国家寻求建立对公司的控制，同时制定反托拉斯法令、征收税款，并对工业由国家进行规范。同样也在殖民地区，独立的公司和冒险的资本家施加控制的活动不断导致危机。例如，1857年反抗东印度公司权力的印度叛乱使英国政府警觉出如果不加控制资本家所要蒙受的灾难。第二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东印度法案是对危机前景的一个正面回应。欧洲诸强逐渐建立起对殖民地区全方面的和充分职能上的统治，有效地在民族国家的安全管辖范围内恢复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从而保证整体社会资本反危机的利益。从内在和外在来说，民族国家被迫更强地介入来保护整体社会资本反对个别资本家的利益。

如今这一关系的第三阶段已完全成熟，其中大的跨国公司已经有效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管辖和权限。于是似乎这个长达几个世纪的辩证法已走向尽头：国家已被击败而公司现在正统治着地球！近年来出现了无数来自于左派的研究；用预言性的语言将此现象看作是对掌握在不加约束的资本主义公司手中的人类的威胁，而且渴望着民族国家过去的保

---

① Brian Gardne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71)和 Geoffrey Wheatcroft, *The Randlords* (New York: Atheneum, 1986)。

② 马克思主张，资本更大的集中和中心化与竞争的力量相对抗，由此成为资本的一个毁灭性进程。Karl Marx, *Capital*, vol.3 (London: Penguin, 1981)。列宁在他分析资本垄断阶段时同样采纳了这一主张：垄断摧毁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竞争。

护力量。[①] 相应地,资本的支持者则庆祝有一个没有限定却有自由贸易的新时代。但倘若的确如此,倘若国家真的停止管理集体资本的事务,而且国家和资本间冲突的良性辩证关系真的结束,那么资本家应该是最惧怕未来的人。没有了国家,社会资本无法规划和实施其集体利益。

当前这个阶段事实上并没有被资本主义公司对国家的胜利完全刻画出来。尽管跨国公司和生产与流通的全球网络业已摧毁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国家的功能和组成因素已经有效地被转移到其他层次和领域。我们需要对国家和资本间的关系如何发生变化加以更加细致的考察。我们需要首先在国家的情境下认识政治关系的危机。随着国家主权的概念正失去有效性,所谓政治的自主性也是如此。[②] 如今作为决定公众意见的一个独立范畴和在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间调停的范畴,政治学理念极少有生存的空间。公众意见更重要地决定于经济要素,如贸易收支的平衡和对货币价值的投机。对这些活动的控制并不掌握在传统上被认为拥有自主权的政治势力的手中;公众意见则不由传统的政治体制,

---

① 例如,Richard Barnet and John Cavanagh,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② 属于政治神学传统的"政治事务的自主权"的概念由政治神学家托马斯·霍布斯首先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定义。该概念甚至被 C.S. 提升到更高的高度,主要见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6); and *Verfassungslehre*, 8th ed. (Berlin: Duncker&Humblot, 1993)。政治事务在此被理解为各种社会关系和初始评价或"决定"的基础,后者构建起权力的空间从而保证了生命的空间。可以有趣地注意到,施密特关于政治事务的概念与民族国家及其范围以外的不可知外界的法学定义必然相联。他本人在目睹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灾难后似乎认同了这一事实。Carl Schmitt, *Der Nomos der Erde im Vølkerrecht des jus publicum europaeum* (Cologne: Greven Verlag, 1950)。我们所知的施密特关于政治事务的概念中最广泛的思考包含在 Carlo Galli, *Genealogia della politica: C. Schmitt e la crisi del pensiero politico moderno* (Bologna: Il Mulino, 1996) 一书中。对其"政治事务的自主权"的概念的批判也应当应用于多少来源于他思想的不同立场。作为两个极端,我们可以引用 Leo Strauss 和 Mario Tronti,前者试图在他自己关于自然权利的自由观之下盗用施密特的概念,后者在政治事物的自主权上寻求发现可以用自由政治力量在一段时期内支持妥协的场所;在这一时期,西欧的共产主义政党正处在高度危机之中。Heinrich Meier, *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The Hidden Dialog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For Tronti, see *L'autonomia del politico* (Milan: Feltrinelli, 1977)。

而由其他方式决定。政府和政治进而完全融入到跨国公司的控制体系中。通过一系列国际实体和功能，控制体现出来。对于政治调停的机制，这也同样真实，它真正地通过官僚调停和管理社会学的范畴真实地起作用，而不是传统政治中冲突调解和阶级冲突的妥协的范畴。政治学没有消失；消失的是任何关于政治自主性的理念。

任何自主政治范围的削弱也标志着任何独立空间的削弱，其中革命能在全国政治体制中涌现，或者社会空间能利用国家的各种工具达到改造。对抗力的传统观和普遍反对现代主体性的抵抗的观念由此变得可能性愈来愈小了。这种形势在某些方面和马基雅维利在另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形势相似：由神圣公国或真正的早期现代国家权利所掌握的“人文主义”革命或抵抗运动走向可怜的、灾难性的“失败”。马基雅维利认识到个体英雄（以鲁塔克的英雄风格）的行为甚至再也不能接触到新的公国的主权。必须发现新型的抵抗势力以充分适应新的自主权的构成。而今我们也能看到，传统的抵抗形式，诸如贯穿 19 和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发展起来的机构化的工人组织，已经开始失去权力。需要再一次发现一种新型的抵抗。最后，传统的政治和抵抗范围的削弱由改造民主国家来进行弥补，这样它的功能已被整合进跨国公司全球水平上的控制机制。国家控制剥削的全国民主模式在资本主义宗主国家发生着作用，只要它能够以一种运动的方式规范不断增长的冲突性——换而言之，只要它能够保持国家计划的发展与乌托邦的前景生机勃勃；首先只要单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决定了一种权力的二元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能够置身于这种权力之上。就这些条件已经消失的程度而言，用真实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语言来说，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已然自我毁灭。单个政府的统一性已被分散和体现在一系列的单个实体（除了传统的单个实体之外，还有银行、国际规划组织等等）上，它们都不断地寻求权力的跨国层次的合法性。

对超越民族国家的宪法控制之上的跨国公司崛起的认可却不应该

引导我们去思考如此的宪法机制和控制已经削弱，而相对独立于民族国家之外的跨国公司倾向于自由地竞争和管理自身。相反，宪法的功用已移位到另一层次上。一旦我们认识到传统的国家的宪法系统受到削弱，我们不得不探索权力是如何在一个超国家的层面上得以宪法化——换而言之，帝国的体制是如何开始形成的。

全球体制的金字塔

初看上去，在纯粹经验观察的层面上，新世界的体制框架显得是一套无序甚至混乱的控制和代表组织，这些全球的体制要素分布在一个广泛的实体范围内（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联合体和各种国际组织之中）；它们按功用和内容分类（如政治、货币、健康和教育的组织等）；而且被各种不同的生产活动所阻碍。然而如果我们看得仔细些，这种无序的局面却含有一些参照点。除了序列化的因素外，这些是正在全球司法与政治生活的混乱中对相对紧密的范围加以界限的模式。当我们分析全球权力在其不同实体和组织的构成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金字塔结构能由三个不断演进的更加广泛的层次构成，其中每一个都包含好几个水平。

在金字塔狭窄的顶端有一个超强权，即拥有在全球使用武力的霸权——一个可以独自行动，但倾向于在联合国保护伞之下与其他人联合行动的超霸。这一单独的地位随着冷战的结束最终凸现出来，并首先在海湾战争中确立。在第二个水平上，仍然在第一个层次内，随着金字塔些微地扩大，一群民族国家控制着全球的基本货币工具，由此具备了规范国际交换的能力。这些民族国家在一系列的机构中捆绑在一起——七国集团，巴黎和伦敦俱乐部，“达沃”等等。最后，在这第一个层次的第三个水平上，一批参差不齐的联合体（包括在军事和货币水平上实施霸权的多少相似的势力）展示出全球水平上的文化和生态

政治的权力。

在首要和最高的统一的全球控制的层次之下存在第二个层次，其中控制在全球广泛推广，而对统一的强调不如对联合那么多。这一层次基本由跨国的资本主义公司在世界市场上扩展的网络所建构——资本流通网络、技术流通网络和人口流动的网络等。这些形成和提供市场的生产组织在构成全球权力第一层次的中心势力的覆盖与保护下横向延伸。如果我们采纳旧的启蒙理念，通过“在塑像面前晃过一束玫瑰”来建构意识，我们可以说跨国公司给中央权力的僵硬结构带来了生命力。事实上，通过资本、技术、商品和人口的推广，跨国公司建构成广泛的交流网络并提供需求的满足。世界控制的单一和纯粹的顶端由跨国公司和市场组织由此表现出来。世界市场使得各地区平均差异，改写了全球的地理分布。仍然在第二个层次上，在一个经常附属于跨国公司的权力水平上，存在着自主的民族国家的普遍形式，现在基本上体现在地方的、地区化的组织上。民族国家起着不同的功用；在全球霸权方面的政治调解，跨国公司方面的谈判以及在它们自己限定的区域内根据生态政治的需要重新分配收入。民族国家是全球流通的过滤器和体现全球控制的规范者。换而言之，它们掌握并推广趋向和来自于全球权力的财富流通，而且只要可能它们就控制自己的人口。

最后，第三个而且是最广泛的金字塔的层次由代表全球权力安排的普遍利益的团体构成。民众不可能直接融入到全球权力结构之中，而必须通过代表机制被过滤出来。哪些团体和组织实现了全球权力结构中有争议的和(或)合法的代表大众的功能呢？谁代表了全球体制内的“人民”？抑或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和过程将民众改造成为随后可以在全球体系中表现出来的“人民”？许多情况下，民族国家被赋予此种角色，尤其是附属的或小国家的集体。例如在联合国大会内部，全体附属民族国家在数目上是主体，但在权力上是少数，它们作为一个至少象征性的约束和对主要权力的合法化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整个

世界被视作在联合国大会与其他全球论坛上得以表现。这里,既然民族国家自己在代表其"人民"意愿时得以表现(既在多少民主化的国家又在专制政体下),那么民族国家在全球规模上的表现只能分两个阶段、通过两个水平上的表现对大众意愿负责。民族国家代表"人民","人民"代表民众。

然而,民族国家当然并不是在新的全球框架中建构和代表"人民"的惟一组织。也就在金字塔的第三个层次上,"全球的人民"更加清楚和直接地由政府实体而不是一系列至少相对独立于民族国家和资本的组织来代表。这些组织经常被理解成作为一个全球市民社会的结构在起作用,将民众的需求和欲望疏散为可以在全球权力结构的运行中得以体现的形式。在这个新的全球形式下,我们仍能发现传统市民社会组成部分的例子,如媒体与宗教机构。媒体长期以来将它们自己定位为"人民"的声音或者甚至是良心,相对于国家的权力与资本私人利益。它们被选来对政府行为作进一步的制衡,并对所有"人民"想要或需要知道的方面进行客观独立的观察。然而,媒体事实上一方面相对于资本,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来说经常并不非常独立①,这一点长期以来很清楚。宗教的组织是代表人民的甚至更长久的非政府的机构部分。就它们代表"人民"反抗国家而言,宗教原教旨主义(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兴起或许应该被理解为新的全球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可是当那样的宗教组织起来反抗国家时,它们经常倾向于自己成为国家。

全球市民社会中最新,也许最重要的力量来自于非政府组织(NGO)的名下。NGO这个术语并未被给予一个非常严格的界定,但我们愿意把它定义为旨在代表"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运作并从国家的结构中分

① 有无数对媒体和它们所宣扬的客观性的优秀批判,其中两个较好的例子 Edward Said, *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1981); and Edward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1988)。

离出来(而且经济对抗于它)的任何组织。事实上许多人将 NGO 看作"人民的组织"的同义语。因为"人民"的利益在界定时区别于国家利益。[①] 这些组织在地方、国家和超国家的层面上运行着。NGO 术语由此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组织体系:20 世纪 90 年代初,据报道全世界有 18 个以上的 NGO 组织。这些组织中一部分实践着类似传统的工团主义的工会职能(如印度阿姆达巴德的自我就业的妇女联盟);另一些继续其宗教派别的传教工作(如天主教救济会),还有一些则寻求代表那些没有被民族国家予以代表的人口(如世界土著民族委员会)。试图在单一定义之下来描述这个广泛而又复杂的组织体系的功能将是徒劳的。[②]

某些批评家坚持认为,因为 NGO 组织处在外围且常与国家权力相冲突,因而与全球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相容且服务于后者。他们认为,当全球资本从上层攻击民族国家的权力时,NGO 组织则起着一个"'来自下层'的平行战略"的作用,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的"群体性的一面"。[③] 许多 NGO 组织的活动旨在推进全球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计划,这也许是事实,但我们应该仔细地指出,这不能充分地从范畴上定义所有的 NGO 组织的活动。具有非政府特性甚至对抗于民族国家权力的事实本身并没有将这些组织和资本的利益连在一起。有许多方式去处在国

---

① 例见 Elise Boulding, "IGOs, the UN, and International NGOs: The Evolving Ec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见 Richard Falk, Robert Johansen 和 Samuel Kim 编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World Peace* (Albany: SUNY Press, 1993)。

② 关于各种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特征,见 John Clark, *Democratizing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West Hartford, Conn.: Kumarian Press, 1990); Lowell Liveze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deas of Human Rights* (Princeton: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8); and Andrew Natsios, "NGOs and the UN System in Complex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in Peter Diehl, e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n Independent World* (Boulder: Lynne Reiner, 1997)。

③ James Petras, "Imperialism and NGOs in Latin America", *Monthly Review*, 49(1997 年 12 月号)。

家之外且与之相对抗，新自由主义计划只是其中之一。

至于我们的观点，在欧洲背景之下，我们最感兴趣于NGO组织的下属机构，它们努力代表我们当中的最少数，即那些无法代表它们自身的人们。这些NGO组织有时被广泛地描述成人道主义组织，事实上它们已进入当代全球秩序中最强大和最重要的组织行列。它们的任务并不是真的要推进任何有限群体的特定利益，相反将直接代表全球和普遍的人类利益。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和美洲观察组织）、和平团体（如和平监督组织）以及卫生和饥荒救灾机构（如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和无国界卫生组织）全都保卫人类的生命免受折磨、饥饿、屠杀、监禁和政治暗杀。它们的政治行动依赖于一种普遍的道德召唤——关键在于生命本身。在这方面，说这些NGO组织代表那些不能代表他们自己的人们（战争人口，饥饿群体等等）或者甚至说它们代表全体世界人民，也许是不确切的。它们不止如此。它们真正代表的是构成"民众"基础的生命力，由此它们将政治转变成一个一般生命的问题，即所有普遍性的生命。这些NGO组织在生态力量的土壤中广泛扩展，它们是当代权力网络的毛细血管，或者（回到我们广义的比喻）说它们是全球权力三角关系的广泛基础。这里在这个最广泛和最普遍的层次上，这些NGO组织的活动和"超越政治"以外的帝国的活动在生态力量的层面上巧合，并满足了生命自身的需求。

波利比奥斯和帝国政府

如果我们从经验描述的水平后退一步，我们可以很快认识到业已涌现出来的功能和要素的一分为三，允许我们直接进入帝国的问题所在。换而言之，当代经验的形式类似于帝国权力的理论描述，后者则是波利比奥斯为罗马建构的最高形式的政府和传承给我们的欧洲传统。[①] 对波

① Polybius,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利比奥斯而言，罗马帝国代表了政治发展的顶点，因为它将权力的三种“好”形式归到一起——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包含在帝王、议会和大众的“平民会议”的成员之中。帝国阻止了这些好形式降级成为腐败的邪恶循环，其中君主成为暴政，贵族成为寡头，而民主成为暴民统治或无政府主义。

根据波利比奥斯的分析，君主制加固了权力的统一和延续，它是帝国统治的基石和终极点。贵族制定义了正义、标准与道德并且表达出其贯穿社会空间的网络，它监管着帝国统治的再生产与流通。最后，民主根据一个表征模式组织起大众，以至于“人民”可被归于政体的统治下，而后者则可以在管束之下满足“人民”的需求。民主保证了规训和再分配。我们发现如今我们自己面对的帝国也由——经适当的修改——这三种形式的权力间一种功能上的平衡建构：君主制权力的统一性和它在全球的垄断力量；通过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表现出来的贵族制；还有民主—代表制的“平民会议”，再一次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体现出来，连同各种各样的 NGO 组织、媒体组织和其他“大众”的机构。人们也许说即将到来的帝国政体将三种好的传统的政府分类合成为一种形式上与波利比奥斯的模式相容的关系，即便其内容当然很不同于罗马帝国的社会与政治力量。

我们能够通过将我们自己置身于欧洲政治思想史里波利比奥斯所诠释的谱系之中，从而来发现我们接近和远离波利比奥斯或帝国权力模式的种种方式。诠释的主线沿马基雅维利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以降传给了我们。它在英国大革命前后的辩论中激活了马基雅维利的传统，并最终在美国国父们的思想和美国宪法的草拟中找到了最充分的应用。[①] 在这一诠释性传统的过程中产生的关键转变是波利比奥斯经典一分为三

①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的模式转化成了一个宪法构建下的三种功能的模式。在诸如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或者甚至是革命前的英格兰那样的依然中古的和资产阶级初期的社会中,波利比奥斯式的综合体被视为三种不同的阶层实体合而为一的统一体;联盟和权力归于君主,土地和军队归于贵族,而城市和金钱归于资产阶级。如果国家运行正常,这些实体间各种可能的冲突就必须在整体利益中得以解决。然而在现代政治科学中,从孟德斯鸠到联邦主义者,这一综合体被改造成不是实体而是功能的一个规范模式。[①] 社会团体和阶层自身被认为拥有以下功能:行政的、司法的和代表性的。这些功能从产生它们的集体与社会的国民或阶层中被抽象出来,并代之作为纯粹司法要素展现出来。这三个功能随后组成一种平衡,形式上与以前支持解决过阶层间冲突方案的平衡相同。它是一种制衡的平衡,权重与反权重的平衡,不断成功地再生产国家的统一和各部分的凝聚力。[②]

对我们来说,似乎在某些方面最初古老的波利比奥斯的帝国政体模式比现代自由主义传统对它的改造更接近于我们的现实。如今我们再一次处在权力及其积累的衍生阶段,其中对功能的考察基本来自于权力的各种关系及物质性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可能的平衡和整体权威性安排的形式化视角出发。在这个帝国形成的阶段中,立宪主义的现代发展所表达的需求(如权力的瓜分和程序的形式的合法性)并未受到极高的重视(参见第一章)。

人们甚至可以辩解说我们构建帝国(在形式上)的经验真的是政府

---

① 论从身体的模式到美国宪法的功能模式的转化,见 Antonio Negri, *Il potere costituente: saggio sulle alternative del moderno* (Milan: Sugarco, 1992)。

② 在此可以有趣地发现,至少从魏玛共和国的宪政开始,欧洲大陆的宪政思想的传统也已经采纳了这些被认为只属于盎格鲁—萨克森世界的原则。这方面德国传统的基本文献见 Max Weber, *Parlament und Regierung im neugeordneten Deutschland* (Munich: Duncker&Humblot, 1918); Hugo Preuss, *Staat, Recht und Freiheit* (Tübingen: Mohr, 1926); and Hermann Heller, *Die Souveranität* (Berlin: W. de Gruyter, 1927)。

“糟糕”形式的发展与共存，而不像传统所掩盖的“好”形式的假象。混合构建的所有因素事实上第一眼看就显得像一个哈哈镜。君主政体没有落实权力统一性的合法化和超越的条件，而是呈现为一个全球的警察力量，继而成为一种暴政形式。跨国的贵族制似乎更倾向于金融投机而不是企业的道德，因而表现为一种寄生性的寡头政治。最后在这个框架内，应该构成帝国机器的积极和公开的要素的民主力量显得更像集体的力量，像一整套迷信和原教旨主义，在尚未完全反动的时候背叛了一种保守的精神。[①] 在单个国家内和国际水平上，这种有限的帝国“民主”的空间被塑造为“人民”（一个组织起来的捍卫既定特权和财产的个性），而不是“民众”（自由和生产实践的普遍性）。

混杂的政体

然而，如今正在出现的帝国没有真正地回归到古老的波利比奥斯式的模式，即便在其否定的和“坏”的形式上也是如此。当代的组织可以更好地用后现代术语来理解，即超越现代、自由的混合政体的模式之上的一种演进。司法的形式化框架、政体的保障机制和平衡的模式全都沿着从现代到后现代层面的两个基本轴线得以改造。

第一个改造的轴线涉及到政体中混合的本质——从古代和现代的单个实体或功能的混合模式到当代形势下政府职能杂交化进程的一段历程。真正归化的进程和将劳动归属到资本、将全球社会吸纳到帝国之内的进程迫使权力的角色破坏业已定义了它们关系的空间标准和距离，将各种角色融合为混杂的形式。这种空间关系的变异转变了权力自身的实施。首先，后现代的帝国的君主制包括对世界市场的统一性的统

① 一般来说来自左派的分析是那些最强烈地坚持认为帝国的产生激活了政府的“坏”形式的分析。例 Étienne Balibar, *La crainte des masses* (Paris: Galilée, 1997)；该书在其他方面极其乐于分析（大众）主体性生产的新进程。

治,由此它被用来保证商品、技术和劳动力的流通——保证事实上整体的市场维度。但是君主权力的全球化进程只可能在我们从君主制同其他权力形式一起运行的系列杂交化方面考虑它们时才有意义。帝国的君主制并不位于一个单独的可以孤立起来的地方——我们的后现代欧洲没有罗马。君主政体自身是多形式和空间分散的。这种混杂化的进程在贵族职能的发展方面甚至更加清楚,具体地说是生产网络和市场的发展与表现。事实上,贵族制的职能倾向于和君主制的职能不可摆脱地融合在一处。在后现代的贵族制下,问题不仅是要在产销商品的一个中心与边缘之间创造一个垂直的通道,而且是要持续地将范围广阔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放在市场之内和市场之间的关联之中。生产和消费间的单边关系随着商品生产倾向于主要由含在网络结构中的非物质服务业决定而变得愈加重要。在此,混杂化变成生产与流通的周期形成的一个核心的决定性因素。① 最后,帝国的民主职能在这些相同的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杂交中得到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它们的关系,引入了新的力量关系。在所有这三个水平上,以前被认为是一种混合的东西在过去的确是保持独立和各自差异的各种功能的有机互动,而今则是超越功能自身的一种杂交。由此我们可以将改造的这第一条轴线凸显为一段从混合政体到杂交政体的历程。

政体改造的第二条轴线既体现了政体理论的一次置换,又体现了政体自身的一种新特征;这条线体现在这样的事实之中;在现阶段必须以更大的程度对社会的现世维度施加控制,进而对主观性的维度施加控制。我们不得不考虑君主制的功能如何既作为对商品流通进行控制的

① 关于这些进程的分析和对相关文献的较好讨论,见 Yann Moulier Boutang,"La revanche des externalités: globalisation des économies, externalités, mobilité, transformation de l'économie et de l'intervention publique,"*Futur antérieur*,no.39-40(Fall 1997)。

统一的世界政府，又作为决定其再生产条件的集体与社会劳动的组织机制。[①] 贵族制阶段必须布置它的等级控制及其对生产与流通的跨国体现的指令职能，不仅通过传统的货币工具，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社会角色的自身合作的工具和动力。社会合作的过程必须在政体上形成为一种贵族制的功能。最后，尽管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功能都指向新杂交政体的主观和生产的维度，这些改造的关键体现在民主阶段，而民主阶段的现世维度必须最终指向大众。但我们永不应忘记，这里我们正面对的是帝国对民主的过分决定，其中大众由具有弹性和调适能力的控制工具所掌握。这就是最重要的质的飞跃必须被发现的精确所在：从控制的模式到政府的规训模式。[②] 统治直接被施加于生产的和合作的主体性运动之上；制度根据这些运动的节律不断地得以形成和再定义，而权力的地形学不再与空间的关系基本相关，相反却被刻在主体性的时间置换上。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非空间的权力，对此我们在前面分析主权时揭示过。这种非空间便是帝国杂交控制的功能予以实施的地方。

在这种帝国的非空间和政体进程所构建的混杂空间，我们仍发现主观运动的持续和不可抑制的存在。我们的疑问依旧像混合政体的问题那样，但现在它充满了通向后现代性过程中涉及到的置换，调适和杂交化的全部强度。这里，总是定义着政体进程的从社会的到政治和司法的运动开始成形；这里，在政体进程中要求一个形式认可的社会与政治力量间的相互关系开始出现。最后，这里各种职能（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衡量着主体性的力量，后者构成前者并试图掌握构建过程的各个

---

① 就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说的而言应该清楚的是，作为我们假设基础的这种理论条件不得不涉及到对再生产进行偏激的修正的一种分析。换句话说，任何将再生产看作只是部分资本循环（如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理论所为）的理论概念不可能批判地对待我们新形势的条件，尤其那些来自于后现代性世界市场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条件。我们在第二章中对生态力量的描述是那样一个再生产的修正性分析的开端。关于对一些与劳动情感和生态力量的整合相关的基本因素的定义，见 Antonio Negri, "Value and Affect" and Michael Hardt, "Affective Labor," *boundary*2, 26, no. 2 (Summer 1999)。

② 我们又一次所指的是 Michel Foucault and Gilles Deleuze 对它的阐释，见第二章的讨论。

部分。

政体上的斗争

在这个政体进程和帝国角色的分析上，我们最终的目标在于发现争端与选择可能出现的层面，在帝国中，其实也与现代和古代的体制中的情况一样，政体自身是斗争的一个场所，而现今该场所和斗争的本质根本不清楚。如今帝国体制的大致轮廓可在广泛分布的全球通讯网络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在这种网络中，各种关系的建立均来源于和指向其所有的节点。那样一个网络随即看上去似是而非地对斗争和介入予以完全的开放和关闭。一方面，网络形式上允许关系网中的所有可能的主体同时出现，但另一方面，网络自身是一个真正专门的"非空间"。政体上的斗争将在这一含混和变迁的层面上展开。

有三个关键的变量会界定这场斗争，即活跃在共性与个性之间的领域内的变量、在监控的公理和主体自我认同之间的变量及在权力的主体性生产和主体们自身的自主抗拒之间的变量。第一个变量涉及网络及其一般控制的保证，因此（积极地说）网络总在运行，但（消极地说）它不可能反抗权力的所有者。[①] 第二个变量关系到网络的服务推广者和这些服务受到公平付酬的假象，以便网络可以支持和再生产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时生产有专属它的社会与政治的区域。[②] 最后，第三个变量出现在网络自身之内。它所涉及的各种机制产生了主体间的差异，而且通过这些机制中的方法，这些差异可在该系统内

① 这种首要的变量和对构成关系上网络功能的分析在某些方面同各种自动形成的网络理论相关。例 the work of Humberto Maturana and Francisco Varela。关于对后现代理论背景下系统理论的优秀分析，见 Cary Wolfe, *Critical Environment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② 系统理论上的各种进展也对我们理解这第二种变量起作用，N. L. 的作品对用法律与社会的哲学来分析自动形成的系统已是最有影响力的。

发生作用。

根据这三种变量，每个主体必须成为受统治于控制网络的一个对象（在现代早期的意义上，该对象受制于一种主体权力），同时每一个应该也是网络中生产和消费的一个独立代理人。这种双重身份真实可行吗？这个系统可能会要保持政治控制和生产者或消费者的主体性吗？似乎并不真的可能。事实上，普遍网络存在的基本条件在于它必须是杂交的，也是这个体制框架的中心设想，即为了我们的目的，政治对象应是短暂的和被动的，而生产与消费的代理者则是现有的和主动的。这意味着远不是传统平衡的一种简单的重复，新的混合体制的形成导致既定角色间的一种根本失衡，从而导致将生产与消费主体从政治控制的机制中解放出来（或至少使其在里面的地位含混）的一种新的社会动力。这里就是斗争的基本点看上去要涌现的地方，就在生产和主体性规范的层面之上。

这真的就是生产模式的资本主义转化、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发展和帝国政体进程将要导致的形势吗？我们当然不宜下这种结论。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新形势下，自由的和帝国的混合政体一直在遵循的策略，即平衡和规范的参与，面临着新的困难，并且面对着这一进程涉及到的个体与集体的生产主体要求自治的强烈愿望。在生产和规范主体性的层面上，在政治对象和经济对象之间的分裂上，似乎我们可以确定一个真正的斗争的区域，藉此所有政体的策略和力量间的平衡可以被重新展开——一个真实而完全的危机境况，也许最终是革命的形势。

政体的景观

但是，似乎从这一分析中显现出来的公开的斗争领域在我们考虑新的机制时很快消失了；通过新机制，这些参与的混杂网络从上面便得到

控制。[①] 事实上,将混杂政体的各种功能和实体聚合在一起的黏合剂正是盖伊·德博所说的"景观",一种意象和观点的整合后分散开的工具,它产生并规范了公众的语言和舆论。[②] 在这种景观的社会中,曾被想象成公共空间以及政治交换和参与的公开层面的东西彻底消失了。这一景观毁坏了任何社交的集体形式——将它们在各自汽车里以及录像机前的社会角色个性化——同时强加了一种新的大众社交、一种新的行动与思想的统一性,在这个景观的层面上,政体上传统的斗争形式变得难以想象。

认为媒体(尤其电视)已经毁坏了政治的大众的概念,只是在这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它似乎建立在一种理想化的意念之上,即在媒体时代之前的那个时代组成民主政治的话题、交流和参与的事物。媒体对政治的当代控制的区别并不真的是一种本质的区别,而是程度上的不同。换而言之,以前当然已存在过无数塑造公共舆论与社会公共视角的机制,但当代媒体为这些任务提供了强大得多的工具。如德博所说,在这种景观的社会中,只有表象的东西存在下来,而主要的媒介则逐渐趋向于对大众表征的一种垄断。这种景观的规则清楚地统治着媒体鞭策下的选举政治;一种控制的艺术可能首先在美国发展起来而今遍布世界。选举季节的语言几乎无一例外地聚焦于候选人如何表现以及为各种形象选定时间和广泛宣传。主要的媒体网络展现了一种第二等级的景观,它反映了(无疑部分地塑造了)各候选人及其政党所制造的景观。即便不太久以前我们听到的老式呼吁如今也显示出无望的天真,这种呼吁要求更少关注形象、更多关注政治选举运动中的时事与具体事务。类似的有,政客们像名人一样地活动以及政治选举运动以广告逻辑来运作的这些观

---

① Jameson 提出了一个对"作为纯粹控制的大众文化的概念"的优秀批判。他主张尽管大众文化受到"管理"却含有乌托邦的可能性。见 Fredric Jameson, "Reification and Utopia in Mass Culture," in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②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4)和 *Comment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London: Verso, 1990)。

念——30年前显得激进和名声不好的设想——如今已显得习以为常。政治话语是一种表达出来的推销广告，而政治参与被削减成对可消费的形象进行选择。

当我们说景观涉及到公共舆论和政治行动的媒体操纵时，我们并不想说幕后有一个小人物，一个伟大的"幻境里的巫师"在控制着所见所思所为。没有单个的控制点统治着整个场景。然而，一般情况下景观的运行仿佛有那么一个中心控制点，如德博所说，景观既分散又整合。政府与超政府策划的全球控制的密谋理论在近几十年中当然激增了许多，因此应被视为既是正确又是错误的。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当代电影的情境下所作的精彩解释，密谋理论是接近整体性功用的一种粗糙而有效的机制。[①] 政治景观的作用宛如媒体、军队、政府、跨国公司和全球的金融机构等，全都受到某个单一权力有意和明显的指引，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

景观的社会依靠挥动一件悠久的武器维护着秩序。霍布斯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对于有效的统治来说"所能指望的热情便是畏惧"[②]。对他来说，畏惧乃约束和保障社会秩序之物，而今畏惧仍是基本的控制机制，充斥着景观的社会。[③] 虽然景观似乎通过欲望和快乐(对消费品的欲望和消费时的快乐)起作用，它其实真正通过畏惧的交流发生作用——抑或可以说，景观创造了欲望和快乐的方式，后者与畏惧密切地结合在一处。在早期现代欧洲哲学的术语中，畏惧的交流被称为"迷信"。而且畏惧的政治学的确总是通过一种迷信得以传播。所变化的是交流着畏惧的形式和机制。

畏惧的景观将后现代、杂交的政体与媒体对大众和政治的控制聚集

---

① Fredric Jameson, "Totality as Conspiracy," 见 *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Cinema and Space in the World Syst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 B. Macpherson 编(London: Penguin, 1968)。

③ Brian Massumi 编;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Fea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在一起。这种景观当然使得一场针对帝国体制的斗争没有了根基。看上去仿佛没有地方可供立足,没有作任何可能抵抗的力量,而只是一架不可平息的权力机器。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景观的威力和传统斗争方式的不可能性,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随着旧的场所和斗争方式的衰退,更加强大的新场所和斗争方式涌现出来。帝国秩序的景观不是一个铁板不变的世界,其实却展现出其颠覆的真实可能性以及革命的新前景。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只要社会以金钱为基础，我们便不会充分拥有它。

——选自 1995 年 12 月巴黎罢工中的传单

资本和主权也许看上去是一个矛盾的联合体，现代主权本质上依赖于对社会层面之上的主权的超越——无论是君王、国家民族，甚至人民。霍布斯为其中央集权的“利维坦”国家的所有现代政治思想建立起主权的空间譬喻，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凌驾于社会和民众之上，并成为二者的中心。主权是权力的剩余，旨在解决或延缓现代性危机。进而如我们具体所见，现代的主权通过创造和维护区域、人口和社会功能间的固定疆界进行运作。主权从而也是一种法规的剩余物，一种社会流动和功能的超法规化现象。换而言之，主权通过社会领域的细分发生作用。相反，资本通过各种统治关系的中转系统和网络在“内在化”的层面上运作，不依靠一个超越的权力中心。它历史性地倾向于破坏传统的社会疆界，跨区域扩张，并且总是将新的人群囊括入其进程之中。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术语，资本的功能作用经过各种流程动量的一个广泛的解码化过程，一个大规模的非区域化过程，然后将这些非区域化和解码后的流量

连接在一起。[①] 我们能够将资本的功用理解为是非区域化的，并内在于马克思自己分析过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中。首先，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资本将人口从特别规范化的区域中分离开去，使它们处于运动之中。它清除了"产业"，从而创造了一个"自由"的无产阶级。资本向全世界不知疲倦地进军，去创造生产和流通的单一文化与经济制度的网络和路径；此间各种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遭到破坏。其次，资本将各种形式的价值带到一个共同的层面上，通过它们的普遍等价物金钱将它们全部联结在一起。资本倾向于将以前所有的既得的地位、名衔与特权削减至现金交易关系的水平，即量化的与相应的经济程度。再次，资本运作所依靠的规则并不是凌驾于资本之上且从高处指导资本运作的独立和固定的规则，而是内在于资本自身运作的具有历史性变化的规则：利润率的规则，剥削率的规则，实现剩余价值的规则等等。

因此，资本需求的不是一种超越的权力，而是建立在内在化层面上的控制机制。经过资本的社会发展，现代主权的机制——法规化、超法规化和再法规化的进程，对一个有限而又分隔开的社会领域施加了一个超常的秩序——逐步由一个公理所代替，即在跨越与以前固有的定义或术语无关的不同领域的情况下，一套等式与关系快捷又平等地决定着各种变量和系数，并将它们结合。[②] 这样一个公理的基本特征是关系重于项值。换而言之，在一个公理系统中，假设"并不是可对可错的命题，因为它们含有相对不确定的变量。只有当我们赋予变量特定的值时，或换句话说，当我们以常量代替变量时，假设才成为命题，根据所选的常量来确定其对错"。[③] 资本就是通过那样一个命题功能式的公理来运作。金钱的普遍对应物将所有因素一起带到可量化、可对应的关系中来，然后

---

① Gilles Deleuze 和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② 论 Deleuze and Guattari 的资本原理的概念，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③ Robert Blanché, *Axioma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2)。

资本内在的法则或等式便根据用以代替等式变量的特定常量来决定它们的部署和关系。正如一个公理使任何比逻辑演绎更重要的值和定义变得不稳定一样，资本也席卷清除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限制——甚至民族国家的边界也随着资本自身在世界市场的实现而逐渐变得不再重要。资本朝着一片平稳的空间发展，该空间的特点在于无法规化的流动，富有弹性、持续的调节性和具有倾向性的均衡化。①

现代主权的超越于是同资本的内在化发生冲突。就历史而言，资本依赖于主权及其权利与权力结构的支撑，但这些相同的结构不断地在原则上相矛盾，在实践中阻滞资本的运作，最终阻碍了资本的发展。我们业已追溯至此的整个现代性历史不妨被看作尝试着协商和调解这种矛盾的进化过程。调解的历史进程已不是一个平等的交换过程，而更是一个从主权的超越的位置向资本的内在化层面的单边运动。福柯在分析17至18世纪间欧洲统治进程时描绘了这场运动中的“君权”（一种集中在君王的意志和个人上的绝对主权形式）和“政府权”（一种经统治与管理货物和人的非集权化的经济形式表达出来的主权形式）。② 重要的是，这种主权形式间的演进历程同资本的早期发展与扩张相巧合。每种主权的现代范式的确支持着某一特定时期的资本运作，可同时它们又对资本的发展构成限制，后者最终必然被予以克服，这一演进的关系也许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理论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所在。

市民社会在一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在于充当资本的内在力量和现代主权的超越力量间的调解者。黑格尔通过阅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采用了“市民社会”这一术语，而且将它理解为介乎于一种经济个体的多元性为自身利益所作的努力和统一的国家利益间的一种调节。市民社会

---

① 当然存在一种超验和隔离的要素，它是资本功能的基本需求，而且是阶级的剥削。这是资本必须通过社会来维持的一个疆界，无论它有时多么富有弹性或难以分辨。阶级划分在新的隔离中继续起着核心效果，这种新隔离我们在本章后面的内容里将进行研究。

② 见 Michel Foucault, “La ‘gouvernementalité’”, 见 *Ditsetécrits* (Paris: Gallimard, 1994)和 *Il faut defendre la Société* (Paris: Seuil/Gallimard, 1997)。

在(内在的)"许多"和(超越的)"一个"间进行调节。组成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作为引导社会和经济力量流动的通道发生作用,将这些力量提升到一个有凝聚力的统一性的高度,然后像一个灌溉的网络产生回流,将统一性的监控在内在的社会领域内分散开来。换句话说,这些非政府的机构在国家的秩序下组织资本主义社会,反过来将国家的统治在社会中传播;就我们的概念框架而言,我们不妨说市民社会是现代国家主权(下到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内在化的场所,同时反过来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到国家)走向超越的场所。

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市民社会不再成为资本和主权之间的充分的调节点。组成它的结构和机构而今正在逐步地消亡。我们已在其他地方论证过,这种消亡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和劳动力辩证关系的衰落方面得到清楚的理解,即劳工联盟的有效性和角色的衰落与劳方集体性的谈判的衰落以及体制中劳方代表的衰落。市民社会的消亡也可以被理解成从规训型社会到控制型社会发展历程的伴随物(见第九章)。[①] 如今构成规训型社会的社会机构(学校、家庭、医院、工厂)到处都陷入危机,这些机构和那些被看作市民社会的机构大部分相同或紧密联系。随着这些机构围墙的坍塌,以前在它们有限的空间内发生作用的主观化的逻辑如今在社会范围内得以普遍推广。机构的倒闭、市民社会的消亡和规训型社会的衰落全都涉及到消除对现代化社会空间的约束。由此出现控制型社会的网络。[②]

与规训型社会以及市民社会相关的是,控制型社会标志着向内在化层面迈出了一步。规训型机构的逻辑有效性的区域和它们的社会空间的细分全都构成了在社会层面以上的垂直状态或超越其上的各种实例。然而我们应该仔细地确定规训型社会各种超越究竟存在于何处。福柯

---

① 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② Michael Hardt,"The Withering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Text*, no.45(1995 冬)。

坚持这一事实，而这正是其分析的精彩核心，即规训的实施绝对内在于监控之下的主体性。换句话说，规训并不像霍布斯所想的那样是一个从高处控制我们的活动、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一个外在的声音，却更像一种内心的动力，和我们的意志难以区分，内在于我们的主体性自身之中且不可分离。然而，作为可能性的条件并在空间上决定了实施规训的有效性区域的机构确实与所产生及组织的社会力量保持一定的分离。事实上它们是主权的一个例子，或者可以说是主权的一个调节点。监狱的牢墙既造就又限定了卡瑟罗(Carceral)逻辑的实践，它们分化了社会空间。

福柯以极强的敏锐力通过他的体制(dispositif)和范式的理论探讨了机构的超验的围墙和规训的内在实施间的距离；他的理论表达了一系列抽象的阶段。[①] 用更加简化的语言，我们可以说这种体制(可译为机制、机构或部署)是处在规训的内在的与实际实施后面的普遍战略。例如，卡瑟罗逻辑便是统一的体制，它忽略或掩盖着——由此，予以抽象，并且不同于——监狱实践的多元性。在抽象的另一个层面上，该范式造就了规训性体制的部署。例如，圆形监狱的卡瑟罗建筑使得室内犯人持续地受到一个权力中心点的监督，成为在不同的规训性体制中得以实现的范式或虚拟设计。最后，机构自身用具体例子说明了特别的范式和具体的社会形式。监狱(围墙、管理者、看守和法规等等)并不以主权控制其主体的方式来统治其犯人。它创造一个空间，置身其间的犯人通过卡瑟罗体制策略和实际操作来监控他们自己。那么可以更加确切地说，规训性的机构本身并不具有主权，但它从主体性生产的社会领域的抽象或超越则构成了规训型社会中主权实施的关键要素。主权已变得虚拟化了(但此方面并非不真实)，它总是到处通过实施规训予以实现。

而今曾界定了各种机构的围墙的坍塌和社会约束的克服便是压平

① 关于对福柯的范式概念的一个优秀的解释，见 Gilles Deleuze, *Foucau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这些垂直状态的实例、使之趋向于控制线路的水平化的迹象。通往控制型社会的路程一点也不意味着规训的终结。事实上,规训的内在操作——即主体的自我规训以及规训逻辑在主体性自身内的源源不断的私语——在控制型社会中甚至更加普遍地得以扩展,业已变化的则是,随着机构的崩溃,规训性的体制已在社会范围内愈加在空间上受到限定和局限。卡瑟罗规训、学校的规训和工厂的规训等等在一种杂交的主体性生产中交织在一处。实际上,在通往控制型社会的历程中,超越规训型社会的因素走向衰退,而内在化方面则被激活并普遍化。

主体性在控制型社会中的内在生产与资本的公理性逻辑相对应。它们的相似性表明了主权和资本间的一种新型的更加彻底的互容性。市民社会和规训社会的主体性的生产的确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统治,推动了资本的扩张。现代社会机构生产出各种社会身份,比以前的主体角色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得多。现代机构中产生的主体性如同大工厂所生产的标准机件:囚犯、母亲、工人和学生等等。每个部件在组装的机器中起着一个特定的作用,但经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后便可被该类型的任何部件所代替。但在某一点上,这些标准化部件的稳定性与这些机构产生的身份的稳定性开始对趋向流动性和弹性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限制。朝向控制型社会的道路涉及到主体性的生产,该主体性并不固定在身份上,而是杂交和具有调节性的。随着决定着现代机构并使其效果孤立起来的围墙逐步坍塌,主体性趋于被无数的机构以不同的结合方式和份量同时生产出来。当然在规训型社会中每个个体具有众多身份,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的身份由生命的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所决定;一个人是家中的母亲或父亲,工厂里的工人,学校里的学生,监狱里的囚犯和疯人院里的疯子。在控制型社会中,恰恰是这些地方、这些具有适应性的场所趋向于失去定义和界限。在控制型社会中生产出的一种杂交主体性也许不带有一名监狱囚犯、精神病人或工厂工人的身份特征,但可能仍同时由他们所有的逻辑所构成。它是工厂外的工人、学校外的学生、监狱外

的囚犯和疯人院外的疯子——同时具有所有这些特征，它不属于任何身份，却又具有所有特征——外在于这些机构，却更加强烈地受到它们的规训逻辑的统治。[①] 就像帝国的主权一样，控制型社会的主体性具有混合的特质。

一个平稳的世界

在主权走向内化层面的道路上，疆界的崩溃既在每个国家的范围内，又在一个全球规模上出现。市民社会的萎缩和规训性机构的普遍危机与作为标记和组成全球统治下的分区界限的民族国家的衰落同步。建立一个克服国家国界约束的控制型的全球社会与实现世界市场以及将全球社会吸纳到资本统治下联手走到一起。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帝国主义为资本的生产与扩张做出了贡献(见第十章)。统治的民族国家间对世界的瓜分、殖民统治的建立、行业专有权和关税的征收、垄断与卡特尔的创立以及分区进行原材料开采和工业生产等等，全都帮助资本在全球扩张。帝国主义作为一个体系用来满足各种需求和促进资本的利益在其全球征服阶段的发展。然而，诚如大多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评家论帝国主义时评论到的，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与资本发生冲突。正是药品本身威胁到病人的生命。尽管帝国主义为资本渗入新区域和传播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提供了各种路径和机制，它也创造和加强了不同的全球空间的僵硬的分界及有效地阻碍着资本劳力与货物的自由流通的严格的内外部观念——由此必然妨碍了全球市场的充分实现。

帝国主义是一台进行全球性划分的机器，引导资本的流通，使资本的流通法规化和区域化，阻塞了一部分流通，但促使了其他的流通。相

---

① 论身份与归属间的关系以及论一种"无论什么"的主体性的构建，见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反,世界市场需要有一片平稳的空间,存在尚未法规化的和非区域化的流通。帝国主义的细分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平稳空间之间的冲突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促使我们重新考察罗莎·卢森堡就资本主义崩溃提出的预言:"尽管帝国主义是延长资本主义生涯的历史阶段,但它也是将资本主义带到一个迅捷终结点的当然手段。"①国际秩序和帝国主义细分的空间的确帮助推动了资本主义,但它最终成为对非地域化流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平稳空间的束缚,而且最后不得不被抛弃到一边。罗莎·卢森堡基本上是正确的;帝国主义倘没有被征服就会意味着资本的死亡。世界市场的充分实现必然是帝国主义的终结。

众多民族国家权力的衰落和国际秩序的解体给它们带来了术语"第三世界"有效性的明确的终结。人们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叙事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该术语被创造出来作为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两极冷战分化的补充,结果"第三世界"被理解为处在这一基本冲突之外的自由空间或疆域,而前两个世界将为此竞争。既然冷战现已结束,这一分化的逻辑不再有效。这是事实,但这种简单叙事的干脆的结尾未能从该术语重要的运用和效果的角度来陈述它的真正历史。

至少早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人就提出"第三世界"从未真正存在过,因为这一概念试图使一批本质不同的国家组成一个同一性质的单元,从而未能抓住、甚至否定了巴拉圭与巴基斯坦、摩洛哥与莫桑比克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重大差异。然而认识到这种真实的多元性不应该使我们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从资本进行全球征服的进程方面看,这样一个单一和同质化的概念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例如,当罗莎·卢森堡将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领域和非资本主义环境时,她清楚地采纳了资本的观点。该环境的不同区域无疑彼此间极不相同,但从资本的角

①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度说全在局外：即为其扩张的积累和将来的征服所服务的潜在领域。冷战期间，当“第三世界”的地区实际被封闭后，对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意味着保留下来的开放空间，即存在可能性的场所。不同的文化、社会与经济形式全都可以在形式上被潜在地吸纳到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动态发展之下。从这种潜在的吸纳观点看，尽管国家间存在真正的和潜在的差异，“第三世界”的确达到了一体化。

具有相似的逻辑性的是，撒米尔·阿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和其他人分化在处于中心的、边缘的和半边缘的国家间的资本主义领域之内。[①] 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由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官僚形式、不同的生产过程和不同的积累形式加以区分。（最后南北之间的概念划分在这方面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如同“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概念，资本主义范围在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三方面的划分同质化并且遮盖了国家和文化间的真正的不同，但这样做是为了凸现一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式的潜在的统一，这些形式在漫长的帝国主义的形式吸纳的过程中涌现出来。换句话说，“第三世界”、南方和边缘均使真正的差异得以同质化，从而彰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进程，但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它们命名了一种国际对抗的潜在统一性，即反资本主义国家和力量的潜在汇合。

民族国家间、甚至在中心与边缘、民族国家的南北集团之间的地理划分不再足以反映生产、积累和社会形式的全球划分与分配。通过生产的非中心化和世界市场的巩固，劳动与资本的国际分工与流通业已断裂和剧增，以致不再可能标划出大的地理区域作为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在如拉美南部锥形地区或东南亚这样的地理区域，所有层次的生产可以同时一起存在，从最高水平的技术、生产率和积累，到最低水平的包含差异与交叉而复杂的社会机制。在大都市中也一样，劳动跨越了从资

① 这方面经典著作是 Samir Amin's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到深度的广阔领域:纽约和巴黎的血汗工厂可以与香港和马尼拉的相匹敌。如果"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曾经真正沿国境线区分开来,而今它们清楚地互相融合,将不平等和限制散布在众多断裂的界线上。这并不是说美国与巴西、英国与印度现在就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而言是相同的区域,但不妨说它们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程度的区别。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含有被认为是第一与第三世界、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所属的不同部分。不平衡发展的地理分布以及划分与等级的界线将不再出现在稳固的国界线或国际分界线上,而是出现在流动的国以下的和超国家的边界。

有些人可能带着一定的理由断言,全球秩序的统治声音正在宣告民族国家的死亡,恰恰此时"民族"已涌现为附属者和地球上的苦难者的一种革命武器。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和具有潜在不稳定性的国际联盟出现之后(后者在班敦会议之后数十年间成熟起来),除了将作为中心和引导的支撑力量——民族国家——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力量中剥离出去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消除后者呢!换而言之,这种观点为这个复杂的历史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叙述方式,根据这种观点,已成为国际秩序的保障者以及帝国主义的征服与主权之基石的民族国家通过反帝国主义势力的崛起和组织成为对国际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因素。由此帝国主义在退却之中被迫抛弃并摧毁了自己的王牌武器,以防被利用来攻击到它自身。

然而,我们相信对民族国家的权力留有任何怀旧的情绪或复活赞颂民族方式的政治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首先,这些努力是徒劳的,因为民族国家的衰落并不简单地源于可能被政治意志的行为所逆转过来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地位:它是一种结构性的和不可逆转的过程。民族不仅是一种文化组成,一种归属感和共享的传统,而且也可能基本上是一种法律—经济的结构。结构的衰落的结果可以清楚地按一整套全球的法律—经济实体演进过程予以追溯,这些实体诸如关贸总协定组织、世界

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生产与流通的全球化在这一超国家的司法支架的支撑下废弃了民族司法结构的效果。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即便民族仍将是一种有效武器，它自身会带有一整套压制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而且任何依靠它的策略应该在此基础上遭到拒绝。

新型的分化

然而，市民社会的萎缩和国家疆界的衰落两方面的社会空间所经受的普遍的均衡化和平稳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平等和分化已经消失。相反，它们在很多方面变得愈加严重，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妨更加准确地说，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不再决定着某种国际秩序，却相互间走得更近了。帝国的特征在于极端不平等的人群的紧密接触，从而创造出一个永久的社会危险局面，并要求有控制社会的强大机制来确保分化和保证社会空间的新型管理。

世界超大都市的城区建筑的趋势表明这些新分化的一个方面。在贫富两极业已增长而富人、穷人间的物质距离在全球如洛杉矶、圣保罗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业已削减的场所，详尽措施也被用来维持它们的分化。洛杉矶或许是这种朝向迈克·戴维斯称为“堡垒建筑”的趋势的领导者；在这种建筑中，不仅私人居家，而且连商业中心和政府建筑都通过创造一个封闭和坚固的外观来营造一个广阔而自由的内部环境。[①] 城区规划和建设的这一趋势已用具体的物质方式建立起我们早期称为外部的终结物，或可称为的公共空间的衰落，这一空间允许存在开放和未规划的社会互动。

然而，建筑的分析仅能对新型的区别和分化的问题所在给予一个初

① Mike Davis,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London: Verso, 1990).

步的介绍。新的划分线更清楚地由劳动政治所决定。计算机与信息革命使得全世界真实存在的不同群体的劳动力有可能联系在一起,而这种革命已导致工人间激烈和不受节制的竞争。就死板的工资结构和文化与地理差异两方面来说,信息技术已被用来削弱劳动力的结构性抵制。资本由此既能够施加时间的弹性,又能施加空间的流动性。显然这种削弱劳动力的抵制和僵硬性的过程已成为朝向最大化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形式的完全政治化的进程。这是帝国治理行为理论中心化的所在。

帝国的劳动政治基本上设制来降低劳动价格。事实上,这有些类似于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一个重新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工作日的规范作为过去两个世纪中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真实要旨已完全被推翻。工作日经常是12、14、16小时长,没有周末和假日。男人、女人与儿童的工作彼此类似,老人和残疾人亦然。帝国为每个人都安排工作!剥削体制愈不规范,工作就愈多。这是开创工作的新型划分的基础。它们受(用经济学家的语言)不同水平的生产率的决定,但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说有更多的工作和更低的工资来总结变化。像上帝的扫帚清扫社会一样(这是黑格尔描述原始人法则,主要在匈奴阿提那手中实施的方式),新的生产率的标准区分和分化了工人。世界上仍然有些地方,贫穷容忍劳动力以较低的代价进行再生产,还有些大都市的地方消费的差异迫使一个较低阶级廉价出卖自身,或者实际地将它自己交给一个更加残暴的资本主义剥削体制。

金融和货币的流动多少和劳动力有弹性的组织遵从一致的全球模式。一方面,在劳动力价格最低与保障剥削的管理力量最强大的地方,投机资本和金融资本就会到来。另一方面,依旧维持僵硬的劳动并反对劳动充分的弹性与流动性的国家将受到惩罚、折磨并最终为全球的货币机制所摧毁。当失业率下降或当那些并不立即富于弹性与流动性的工人的百分比上升时,股票市场下跌。当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没有完全容纳帝国对弹性与流动性的控制时——或者更理想地是,福利国家的某些

要素作为坚持民族国家的一种标志被保存下来时，同样的事情便会发生。货币政策加固了由劳动政策所控制的分化。

惧怕暴力、贫穷和失业最终是造就与维持这些新型分化的基本而快捷的力量。处在新型分化的不同政治后面的是一种通讯的政治。如我们先前所讨论的，大型通讯公司所呈现的基本信息内容便是惧怕。对贫穷的持续的惧怕和对未来的焦虑成为造成穷人为工作而斗争以及保持帝国的无产者之间冲突的关键。惧怕是新型分化的最终保证。

帝国的治理

在我们看到传统的社会限制如何在帝国的形成中降低和同时新的分化如何创造出来之后，也必须要调查这些不同的发展得以进行的治理模式。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进程充满矛盾。当权力被内在化而主权转化成政府权时，统治的功能和控制体制不得不在一个持续的水平上发展，这一水平将差异展平到一个共同的层面。然而我们已看到差异在此过程中相反被强调，以致帝国的整合决定了人群的不同阶层的区别及分化的新型机制。帝国治理的问题由此在于掌握整合的这个过程，从而抚慰、动员和控制住分裂且分化后的社会力量。

但从这些方面说，问题尚未清晰地摆出来。民众的分化事实上已是历史上政治治理的条件。如今的差异在于这一事实：国家主权的现代体制中的治理走向一种冲突的线性整合，走向一个能够压制它们的工具，即就均衡的治理目标和治理改革的发展二者而言，走向社会生活的理性正常化，而在帝国的框架下，治理变得分散了，旨在不通过施加一个统一的社会机制而是通过控制差异来整合冲突。不再可能按黑格尔式的治理定义来理解帝国的治理，这种观念建立在布尔乔亚社会的调解之上，后者构成社会生活的空间的中心。可同样不可能按韦伯式的定义去理解它，即建立在持续的时间性调解和一种合法性的显现原则基础之上的

理性定义。

第一个定义了帝国的治理的原则便是，在治理当中，政治目标的管理趋向同官僚手段的运作分离开来。新模式于是不仅不同于而且对立于现代国家的旧的公共管理模式，它不断地致力于使其官僚手段的系统同政治目标相协调。在帝国的体制中，考察官僚政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治理手段）并不根据它们的功能性之于目标的线性逻辑，而是根据不同和多元的工具性逻辑。治理的问题不是一个统一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工具的功能性问题。对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和治理来说，治理行为的普及和平等是首要的；而在帝国的体制中，基本原则是通向具体目标的行为的单一性和充足性。

然而，从这第一个原则引出了看上去是个悖论的东西。准确地说，当治理达到独特化的程度，不再简单地作为集权政治和审议的机关的实施者时，它变得愈加自主，更加紧密地牵涉到不同的社会集团、经济和劳工集团、伦理和宗教集团、法律和犯罪集团等等。帝国的治理没有对社会整合作出贡献，相反起到一个分散和分化的机制作用。这是帝国治理的第二条原则。治理由此将趋于出台具体的程序，使得该体制直接具有各种社会独特性，而且它与社会现实的不同要素的接触愈直接，治理便愈有效。于是治理行为变得日益以自身为中心，并由此只对其不得不解决的具体问题起作用。要在帝国体制的整套中转系统和网络之中发现一条持续的治理行为的线索，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总之，一视同仁的普及性的旧治理原则被区别对待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程序所代替。

即便现在难以追寻一个紧凑而又普遍的程序线索，比如那种作为现代主权体系特征的程序，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的机制不是统一的。治理行为的自主性和统一性由其他方式建构而成，既不通过欧洲大陆法系的标准推理的方式，也不通过盎格鲁—萨克逊体系的程序化的形式主义方式。相反，它的产生是通过遵循在帝国建设中活跃的结构性逻辑，比如警察和军事逻辑（或者真正的对帝国和平的环境下潜在的颠覆力量的压

制），经济逻辑（市场的控制，反过来市场被金融体制的控制），以及意识形态和交流的逻辑。治理行为在帝国体制下获得自主性和合法权威的惟一方法就是遵循这些逻辑的分界线所决定的如下情况。但这一授权并非直接的。治理在战略上没有指向帝国逻辑的实现。在这些逻辑激活使治理自身合法化的重大的军事、金融和通讯手段的范围内，资本服从于逻辑。治理行为已基本上变得非战略性，并由此经各式各样的间接手段得以合法化。这是帝国体制下治理行为的第三条原则。

一旦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三种"否定性"的帝国治理行为原则——它的工具性特点，它的程序性的自主以及它的异质性——我们必须探求是什么允许它在没有持续地揭开激烈的社会对抗力量的情况下发生作用。什么功效赋予这种尚未体现出来的控制、不平等及分化的系统一种满意与合法的充足措施？这导出了第四条原则，即帝国治理的"积极"特征。帝国治理的统一性的本原和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它在本土的有效性。

要理解这第四条原则如何能在整体上支持治理系统，需要考察一下在封建的地区性组织和欧洲中世纪君主制的权力结构间或在现代时期的黑手党组织和国家结构间所形成的那种治理关系。在两种情况下程序化的自主性、区别的适应性和同人群的各种分化之间地区化的联系，连同合法化暴力的有限实施，一般和一种紧凑而统一的有序化不相矛盾。治理权力的这些分布系统由军事金融和思想权力的一系列具体部署的本土有效性结合在一起。在欧洲中世纪的体系中，诸侯在君主需要他们的时候（而思想和交流大部分被教堂所控制）需要交纳军队和钱物。在黑手党的体系中，扩展家庭的治理的自主性和贯穿社会范围内的警察一类暴力设施保证了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坚持，支撑了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如同这些中世纪和黑手党的例子，本土化的治理实体的自主性和帝国的统治不相矛盾——相反，它增强并扩展了其全球化的效果。

本土的自主性是一个根本的条件,是帝国体制发展的根本条件。事实上,假使存在帝国人口的流动性,如果治理的自主性也未使各种人口踏上一条流浪的征程,那么要拥有一条合法治理的原则将不可能。类似地,倘若这种治理不具有平等的弹性,不善于具体而持续的程序上的修正与区分,那么通过以杂交的文化形式在各式各样的贫民窟中迫使民众变得更加有流动性和弹性的过程来要求分化民众将是不可能的。对帝国体制的认同并不是某种从曾在现代法权国家中定形了的成功治理的超常之处遗传下来的轴。认同更是经该体制的本土有效性形成的。这里我们已经勾勒出的只是帝国治理的最一般的轮廓。帝国治理仅仅聚焦在治理行为的自主的本土有效性之上,确立这样的治理靠自身不能保障该体系免于最终的威胁、骚乱、反叛和暴动,或者甚至免于本土的治理部门间正常的冲突。然而,这种论点的确将讨论转化成关于帝国政府的"皇家特权"的讨论——一旦我们确立起这样的原则:冲突的规范和来自合法暴力手段的援助必须以(生产、金钱和交际的)自我规范的方式和帝国内在的警察力量来加以解决。这就是治理的问题转化成监控问题的所在。

帝国的监控

现代体制趋向于不断地使治理和监控相一致,直到二者难以区分,相反帝国的监控则和治理保持着距离。在现代和帝国的两种体制下,和非中心化治理的风险与可能的偏差一起,内在的矛盾要求保证有一个至上的监控。现代国家的法制基础的早期理论家们视此为对一种至上权力的最初的呼唤,但帝国监控的理论无需为其体系编造出那样的传说。既不是不断陷入战争中的民众的呼吁需要一种抚慰性的至上权力(如霍布斯的书中所说),也不是一个商业阶层的呼吁需要合同的保障(如洛克和休谟的书中所说)。帝国的监控其实是一种社会爆发物的结果,它推

翻了构成主权的所有的旧关系。

帝国的控制不再通过现代国家的规训性模式得以实施，而是通过生态政治的控制模式进行的。这些模式以一群具有生产性的民众作为基础与目标，这些民众不可能进行组编和规范化，而必须加以统治，即便以其自治的方法，“人民”的概念不再作为监控系统的有组织的主体起作用，结果“人民”身份便被流动性、弹性和民众的永久分化所代替。这种转变除去了权力合法性的循环现代观的神秘性并摧毁它；通过这种观念，权力从民众中建立起一种单一主体，该主体随后转过来使同一种权力合法化。那种诡辩式的重复不再起作用。

民众由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手段在真正吸纳的社会关系内进行统治。民众只能按生产、交换和文化上的方式接受统治——换句话说，在其存在的生态政治的情境之下。然而，在民众的非地域化的自治中，民众的这种生态政治的存在具有转化成有智性生产率的一个自治群体的潜力，按斯宾诺莎的观念，是转化成一种绝对的民主权力。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生产、交换和交际的资本主义统治将会被推翻。阻止它的发生则是帝国政府的首要和基本任务。但我们应牢记，帝国的政体自身的存在要依靠构成这种威胁的诸种力量，即生产性合作的自治力量。它们的权力必须被控制但不被破坏。

帝国提供给全球化资本的保障并不涉及到一种微观政治的和(或)微观治理上对人群的管理。监控的机制无法进入本土的空间和有限时间的生命序列，在后者那里治理产生作用；治理没有成功地对独特性和它们的活动加以控制。帝国监控所具体投资和保护的以及它的资本主义发展所保障的，正是全球体系的普遍均衡。

帝国控制通过三种全球的专制手段来运作：炸弹、金钱和无线电。热核武器的全套装备有效地聚集在帝国的顶端，代表了摧毁生命自身的持续的可能性。这是专制暴力的一种运作，一种超常规的新水平，它彻底改变了这方面的一个概念，即主权国家对合法的物质武力拥有

垄断。一度在现代性时期,这种垄断或者被合法化为从无政府主义的暴徒手中夺取武器,这些暴徒是由趋向于互相残杀的个体组成的乌合之众;或者被合法化为抗击敌人的防卫工具,即反对其他组成国家的人民。这两种合法化手段都最终指向人群的生存。而今,它们不再有效。从一个可能自我毁灭的人群手中夺取暴力手段,这趋向于变成旨在维持分化生产区域的、仅仅是治理性和警察的作用。随着国家权力间的核战争变得愈加的不可思议,这第二条理由也变得更加没有效力了。核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帝国范围内的集结业已限定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主权,因为核技术使它们远离对战争和和平的决定权,而这正是传统的主权定义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且,帝国炸弹的最终的危胁已将每场战争降到一场有限的冲突、一场内战、一场肮脏的战争等等。它使得每场战争成为治理的与警察力量的专属领地。除了从炸弹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其他角度使得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以及从现代的主权到帝国的历程更加显著。这里帝国最终被定义成生命的"禁区",换句话即具有毁灭的绝对能力。帝国是生态力量的终结形式,因为它是生命力量的绝对颠覆。

金钱是专制控制的第二种全球方式。世界市场的建构首先由国家市场的金融崩溃、国家的和(或)地区性的金融规范体制的消亡以及那些市场对金融力量需求的依附所组成。当国家的金融结构趋于丧失主权特性时,我们可以看到从它们中涌现出一种新的单边金融的再区域化的阴影,这种再区域化集中在帝国的政治和金融中心,即全球的城市之中。这并不是在新的生产性场所、新的本土的流通区域继而在新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普遍的金融体制;相反它是纯粹在帝国之政治必需物基础之上的一个金融构建。钱是帝国的仲裁者,而恰似帝国核威胁的情况,这个仲裁者既没有一个明确的位置,又没有一个超越的地位。如同核威胁使普遍化的警察权合法化一样,金融的仲裁者也不断地在与生产功能、价值标准与财富分配的关系中得以体现,正是这三者构成了世界

市场。金融机制是控制市场的基本手段。①

无线电是帝国控制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基本媒介。管理通讯、建构教育系统和规范文化如今显得比以往更像主权的特权。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无线电中解体。当代通讯并不从属于主权；相反，主权似乎从属于通讯——或者确切地说，主权通过通讯系统表现出来。在通讯的领域，这种导致了地区和(或)国家的主权消亡的悖论比以往更加清晰。通讯的非区域化的能力是独特的：它并非通过限定或削弱现代地区性主权而达到要求；它要抨击的正是向一个地区联结一种秩序的可能性。它赋予一种持续和完全的表征的流通。非区域化是最基本的力量，而流通则是社会交往展示自身的形式。用这种方法和在这种无线网络中，各种语言变得对流通有了实用价值，从而使各种主权关系解体。教育与文化也不得不服从于这种景观下的流通社会。这里我们达到了秩序与空间之间关系被消解的整个过程的一种局限。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在另一空间中理解这种关系，即在原则上不可能被主权行为的表现所包含的一个另外的所在。

通讯空间被彻底非区域化了。它绝对区别于我们一直从物质力量的垄断和金融标准的确立等方面进行分析的残留的空间。这里不是一个残留的问题，而是变质的问题：政治的经济和国家理论的所有要素的一种变质。通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资本通过它成功地使整个全球社会服从于其统治之下，压抑了所有其他的道路。即便真的要设计一条其他道路，它须从真正具有吸纳性的社会中涌现出来并展示其核心的所有矛盾。

这三种控制手段使我们又想到帝国的权力金字塔的三个层次。炸弹是一种君主权，金钱是贵族权，而无线电则是民主权。在以上各种情

---

① M.A.已用结构的语言清楚地论证了金钱体制的暴力和专制的权力。见 *La violence de la monnaie*(Paris:PUF,1982)，亦见论文集 Werner Bonefeld and John Holloway, eds. *Global Capital, National State, and the Politics of Money*(London:Macmillan,1995)。

况下,也许看上去好像这些机制的脉络被美国所控制。也许看上去好像美国是新罗马,或是一群新罗马:华盛顿(炸弹)、纽约(金钱)和洛杉矶(无线电)。然而,任何那种关于帝国空间的地域概念不断地被处在帝国机制核心的本质的弹性、流动性和非区域化所动荡。可能垄断武力和规范金钱能获得部分的区域决定权,但通讯则不能。通讯已成为确立生产关系的中心要素,引导着资本主义发展,也转变着各种生产力。这种动力创造出一种极度开放的形势:此处中心化的权力点不得不面对生产主体的权力,即所有那些有助于通讯的互动生产的权力。这里在生产的新形式受帝国统治的这种流通领域内,通讯以毛细血管的形式得以最广泛地传播。

大政府完蛋了!

"大政府完蛋了"是整个帝国的保守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战斗口号。纽特·金里奇率领的美国共和党国会通过将大政府称为"极权主义的"与"法西斯主义的"(在一次本想帝国化的国会会议上,结果却陷入狂欢)。力争要将对大政府的迷恋去魅。看上去好像我们已回到亨利·福特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之间伟大的互斥时代!抑或回到更少些辉煌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次执政的年代,当时,带着只有英国人才能聚集起来的幽默感,她疯狂地寻求低价出售国家的公物,从通讯系统到供水设施,从铁路系统和石油到大学与医院。但是在美国,大多数急切的保守人士的代表最终走得太远,结果大家都认识到了这点。既是一个底线又是残忍的讽刺则是就在他们向大政府发起进攻的时候,后现代信息革命的发展最需要大政府支持它的努力——目标是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在投机产生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控制股票交易的均衡,坚决稳定货币价值,在军工系统中进行公共投资以帮助转化生产模式,以及改革教育体系以适应这些新的生产性网络等等。恰在此时,苏联已经解体之后,美

国政府面临的帝国任务最为迫切，而且最需要大政府。

当资本全球化的拥护者们叫喊着反对大政府时，他们不仅虚伪而且忘恩负义。倘若资本没有控制过大政府并使之为其专门的利益效力数世纪，它会怎样呢？而今倘若大政府没有大到足以发挥左右整个全球民众生杀大权的话，那么帝国的资本又会如何呢？倘若没有一个大政府能够印制钱币来生产与再生产一个保证资本主义权力和财富的全球秩序，资本又会怎样？抑或没有了争取生产性民众的合作的通讯网络呢？每天早晨，当全世界的资本家及其代表醒过来之后，他们不应去读《华尔街时报》上反对大政府的骂词，而应该跪下来颂扬它！

既然大多数反对大政府的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已在其所处地位的悖论压力之下土崩瓦解了，我们想要将旗帜从他们在泥沼里丢弃的地方拾起来。现在该我们叫喊“大政府完蛋了！”。那条标语为何应该是保守主义者们的专有物呢？当然，我们已在阶级斗争中受到教育，很清楚大政府也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门工具，而且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压力下它已服务于争取平等与民主的斗争之中。但如今那些时代均告结束。在帝国的后现代性中，大政府已仅仅成为暴君的统治手段和极权主义的主体性生产。大政府指挥着降低成商品主体性的大乐团。结果它决定着欲望的极限：这些事实上正是那些界线，它们在生态政治的帝国内，为了再生产出剥削和奴役的权力，确立了跨越全球地平线的新的劳动分工。相反，我们斗争是因为欲望无限，而且（既然存在的欲望与生产的欲望是一种同样的事物）因为生命可以被不断地、自由和平等地享受和再生产着。

有人也许反驳说，生产的生态政治的普遍性仍要求对其有某种形式的监控，而且现实地说，我们的目标应该不在于摧毁大政府，而是对其施加控制。相反，从民众及其追求自主的自我治理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结束一直重复的150年前马克思的哀叹，当时他说所有的革命都已完善了国家而没有摧毁它。该种重复在我们的世纪才变得清晰多了，此时，大政府、大企业和大行业之间的伟大的妥协（以其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和

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已迫使国家产生出可怕的新成果:集中营、劳改营、贫民窟等等。

你们只是一伙无政府主权者,街上的新"柏拉图"最终将向我们吼道。那不对,如果我们不从在生产性合作网络中构建起的一种物质性角度来说(如同柏拉图的不朽的对话者特拉思马科斯(Thrasymacus)和卡利克斯(Callicles)所为),换句话说不从以生产方式构建起来的和以自由的"共同名称"构建起来的一种人性的视角来说的话,我们将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共产主义者,见到了自由主义的大政府已制造出多少人性的压抑和毁灭的共产主义者。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如何正在帝国统治下被重新创造出来,就在此时生产合作的轮回已使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在统治下构建其自身。

第四部分

帝国的衰落

第十六章　虚拟性

人民不再存在，或者尚未存在……人民缺失着。

——格里泽·德勒兹

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以一种是什么和存在什么的评论方式进而以本体论的方式大体上论述了帝国。然而，为了加强论证，我们有时用一种伦理政治学的语言来讨论帝国的难题，并估算感情与利益的各种构成——例如，在较早的论述中，我们从民众的立场判断帝国比以前的权力模式少些缺陷，或者说优于以前。从霍布斯到休谟时期的英国政治理论也许呈现出那样一种伦理政治学语言的模式例证，它始于对前社会的人性的悲观描述，试图通过依赖一种超验的权力观来确立国家的合法性。（更多或更少自由主义的）"利维坦"在全面对抗的战争方面少些缺陷，并因为确立和保护和平而更优良。[①] 但这种政治理论化风格不再有用了。假像在于主体可以被"前社会"地理解为在群体之外，然后对其施

① 论这种政治理论化的风格，见 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and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加一种超验的社会化。在帝国内,没有主体性是局外的,所有的地方已被吸纳进一个普遍的"禁区"。政治学的超验假想不再经得住考验,没有了论争的实用性,因为我们都完全存在于社会的和政治的范围之中。当我们认识到后现代性这种极端的结论,政治哲学便迫使我们进入本体论的层次。

标准之外(不可测量的)

当我们说政治理论必须说明本体论时,我们首先指政治学不可能从外部来构建。政治学是迅速造就的,它是一个纯粹内在化的领域。帝国形成于这种粗浅的水平面上,我们的身体与思想在此扎根。没有组成它的外界逻辑性机器。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便是世界看上去以政治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市场是全球的,而权力则被组织起来,贯穿在这种普遍性当中。帝国的政治体现在其全球的扩张之中——只有风和气流可以吹动的一片瀚海。超验想象的中性化于是成为首要的感觉,即帝国范围内的政治问题是本体论的。①

价值和标准的所有超验的结论过去常常管理着权力的部署(或者真正决定着它的价格、分支和等级),现已失去它们的一致性。鉴于这一事实,政治的问题也必须理解为本体论的。从历史人类学家如鲁道夫·奥托和乔治斯·杜梅泽尔所运用的神圣的权力神话到《联邦党人》的作者们描绘的新政治科学的规则;从"人权"到国际公法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随着通向帝国的进程而逝去。根据一种后现代的权利和后现代法律的模式并通过灵活流动的和本土化的程序,帝国支配着法律,维护和

① 论政治与本体论之间的内在关系,见 Antonio Negri, *The Savage Anoma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and Baruch Spinoz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in *The Chief Works of Spinoza*, vol. 1 (New York: Dover Press, 1951)。

平。[①] 帝国建立起本体论的网络，权力的所有关系在其间交织一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有社会的与个人的关系。跨越这个杂交领域存在物的生态政治结构便是帝国政体的内在结构被展现的所在，因为在生态权力的全球性方面，每种有限的价值标准趋向于解体，而帝国权力的水平线将最终展现为处在标准之外的水平。不仅政治的超验，而且连超验本身都已不再决定标准。

西方伟大的形而上学传统总是厌恶不可测量之物。从亚里士多德的以道德为标准[②]的理论到黑格尔理论中以标准作为从存在到本质过程的关键[③]，标准问题已严格地和超常秩序问题相联系。即便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从这一超验传统中取得经验：他的价值理论实际是价值标准的理论。[④] 然而，只有在帝国的本体论水平线上，世界才最终在标准之外，此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形而上学对不可测量之物的深深的憎恨。它源自于赋予秩序以先验的本体论基础的思想的必要性。正如上帝对于古典的权力的超越是必需的，标准对于现代国家的价值观的先验基础也是必需的。如果没有标准，形而上学者说就没有宇宙；而没有宇宙就没有国家。在这种框架内人不可能想象不可测量之物，或者干脆说人绝对想象不到它。贯穿现代性，不可测量之物是一种绝对禁止的事物，一种认识论上的禁区。然而这种形而上的想法如今消失了，因为在生物政治本体论及其转化过程的背景下，超验者是不可想象的。当今天仍有人主

---

① 论后现代权利和法律，见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② Rémi Brague, *Du temps chez Platon et Aristote* (Paris: PUF, 1982)。

③ G. W. F. Hegel, *Science of Logic*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9)。

④ 价值手段的标准，意指其有序的剥削、社会分工的标准及其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当然马克思超越了他自己，而且人们从不应该假装他对劳动和价值的讨论只是一篇论标准的文章：在价值之上，劳动总是存在的生命力。Antonio Negri, "Twenty Theses on Marx," in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Karl, eds. *Marxism Beyond Marx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张政治超验时，它随即堕入暴政和野蛮状态。

我们说不可测量，是指帝国存在的政治发展外在于每个预先构成的标准，是指介于存在的模式和权力部门之中的关系总是被重新构建，且无限地变异。监控的指标（像经济价值的指标一样）被定义在总是意外和纯粹传统的要素之上。当然有处在顶峰和最高点的帝国权力保证着意外性不成为颠覆性的，保证它不和产生在“存在之海”上的风暴结合起来——顶峰的权力诸如核武器的垄断、金钱的控制和通讯的殖民化。帝国的这些至上的部署保证了意外性成为一种必然性，没有陷入混乱。但这些高级权力不代表一种秩序的形象或者宇宙的标准；相反它们的有效性建立在（炸弹的）破坏、（金钱的）评判和（通讯造成的）畏惧之上。

有人或许就此会提问：这个不可测量性的观点是否含有对正义概念的绝对否定。正义观的历史实际上已普遍涉及到某种标准理念，不论它是平等的标准或均衡性的标准。继而，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正义中所有的美德得以概括”。[①] 那么当我们坚持认为在帝国的本体论中价值在标准之外时，我们只是在做一个愚蠢的虚无主义的主张吗？我们在宣称没有价值、正义而且的确没有道德可以存在吗？不，与那些长久以来宣称价值只能在标准和秩序的形象中得到肯定的人相反，我们认为价值与正义可以存在于一个不可测量的世界中并得到培养。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革命的重要性。没有上帝，没有主人，也没有人——没有超越的权力或标准将决定我们世界的价值观。价值将只决定于人类自身的不断的革新和创造。

标准之上（虚拟之物）

即便政治已成为标准以外的领域，价值依旧存在。即便在后现代的

①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5).

资本主义中不再有衡量价值的特定标准，价值依旧仍是强大和无处不在的。这个事实首先体现为对剥削的坚持，其次是事实上生产的革新和财富的创造不知疲倦地继续着——它们实际上动员了世界每个空隙中的劳动。在帝国中，价值的构建发生在标准之上。在帝国全球化不可测量的过分发展和标准之上的生产活动之间的对比体现在总体上创造和再创造这个世界的主体性活动的立场之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有些东西比某种简单的主张更加具体，这种主张认为当资本转向后现代阶段时，劳动始终是社会的最核心的构成基石。当"在标准之外"指的是权力不可能在全球水平上计算和控制生产时，"标准之上"则指生产环境的机能、劳动作为欲望的体现以及从下面构建帝国的生态政治网络的能力。标准之上指禁区中的新地方，由在任何外在的标准体制之外的自主的生产活动所定义的地方。标准之外指覆盖了帝国全球化的整个生态政治网络的一种虚拟性。

通过虚拟之物，我们理解了植根于民众之中的整套权力的运行（存在，爱，转变和创造）。我们业已看到民众这套虚拟的权力是如何在斗争中建构，并在欲望中巩固。现在我们不得不调查虚拟之物如何可以对可能事物的边界施加压力，进而触及真实事物。从虚拟经过可能然后到达真实的历程是创造的基本行为。[①] 活生生的劳动建构了从虚拟到真实的

---

① 论虚拟物，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and Gilles Deleuze, *Bergsonism* (New York: Zone, 1988)。我们关于虚拟性及其与现实关系的概念多少不同于德勒兹从柏格森那里继续来的概念，后者对从虚拟到现实的历程和从可能到真实的历程二者进行了区分。柏格森基本关注着这种区别及其对虚拟—现实而不是可能—真实二元模式的肯定，旨在强调存在的创造力，并澄清存在不只是将无数可能的世界削减到一个以类似为基础的单个的真实世界，相反，存在总是创造的行为和不可预知的创新的行为。Henri Bergson, "The Possible and the Real," in *The Creative Mind*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6)。我们当然的确认可坚持虚拟性的创造力的需要，但这种柏格森式的论调对我们并不充分，因为我们也需要坚持被创造的事实、其本体论的重量和构成世界的机构，从偶然性中创造出必然性。论从虚拟到真实的过程，见 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 (Paris: PUF, 1964); and Brian Massumi, "The Autonomy of Affect," *Cultural Critique*, no. 31 (Fall 1995)。

历程;它是可能性的手段。劳动业已打破经济、社会和政治控制的牢笼并超越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国家形式的每一个规范的特征,如今显现为普遍的社会活动。① 劳动是和现存秩序及其再生产的规律相关的生产性超越。这种生产性超越既是一种集体的解放力量的产物,又是劳动在生产与解放的能力上的新型社会虚拟实体。

在通向后现代性的道路上,劳动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它在标准之上起作用。对劳动和所有其他的已经施加于劳动之上的经济及(或)政治标准的时间上的监控突然断开。而今劳动随即成为由知识、情感,科学和语言的力量激活的一种社会力量。的确,劳动是标准之上的一种普遍心智和普通肉体的生产性活动。劳动简单地显现为行动的力量,既是单一的,又是普适的:单一是因为劳动已成为民众的智力和身体的专有领域;普适是因为民众在从虚拟到可能的运动中所表达的欲望经常构成为一种共同的事物。只有当共同之物形成时生产才能出现,普遍的生产率才上升。任何阻止这种力量行动的事物只是有待克服的一个限制——最终被劳动的批判力和日常激烈的情感智慧所超越、弱化和毁灭。行动的力量由劳动、心智、激情和情感在同一地方组成。

作为共同的行动权力这一概念的劳动相对于群体的构建处在同时发生,有共同时空范围和动态的关系上。这种关系是相互的;由此一方面单一的劳动权力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共同构建,另一方面,共同之物变得单一化了。② 于是我们可以将劳动的虚拟力量定义为一种超越其自身的自我定价的权力,它流动到另一方,并通过这种投资构成一种扩张的

---

① 马克思对抽象性的讨论与这种虚拟性和可能性的讨论有双重关系,事实上人们不妨很好地区分一下两种马克思式的抽象性理念。一方面,从资本的方面看,抽象性意味着从我们的行动力量中的分离,由此它是对虚拟物的否定。然而另一方面,从劳动的方面看,抽象物是我们行动力量的普遍规则,即虚拟自身。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New York: Autonomedia, 1991); and Karl Marx, *Grundrisse* (New York: Vintage, 1973)。

② 论独特与共性的关系,见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共性。劳动、心智、激情和情感的共同行为形成为一种组合而成的权力。

我们正在描述的过程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它是物质的，并在生态政治的层面上得以实现。行动的虚拟性和物质条件的转化有时会被侵夺来增强这种行动的权力，并由标准之上的本体的机制或机构组成。这种标准之外的本体的机构是一种扩张的权力、自由的权力、本体的构建和全方位的传播。

最后的这个定义可能是多余的。如果行动的权力从下层建构起价值，如果它根据共性的节奏转化了价值，而且如果它在构成上侵夺了其自身实现的物质条件，那么显然它身上具有一种标准之上的扩张力。然而这种定义并非多余，却更给这种概念增添了一个新维度，因为它展现了禁区的积极特色和标准之上的共同行为的不可压制性。这种扩张的定义起到一个反辩证的作用，体现了标准之上事物的创造性。根据历史哲学，为了确定这种扩张权力的意识，我们可以补充说，当对行动的权力的定义就单一和共性而言是斯宾诺莎主义的，这一最后的定义却真的是一种尼采的概念。行动权力的全方位的扩张体现出重新评估的本体论基础，即它的能力不仅将摧毁来自标准的超验领域的价值观，还将创造新的价值观。①

欧洲的本体论层面完全由一种强大的，自我定价和组合成的劳动所开垦和灌溉，继而培植了一种寻求成为现实的虚拟性。可能性的关键，或者真正属于将虚拟转化为现实的存在方式的可能性，处在标准以上的这个领域。

寄生物

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反对道，除去民众的力量，这个帝国仍会存在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New York: Vintage, 1967).

和有控制力。我们自己已经充分描述了它的功用并阐释了它的极端暴力。然而,考虑到民众的虚拟性,帝国政府显现为一个空壳或一种寄生物。[①] 这是否意味着,为了维持帝国秩序和民众的无能,帝国所不断进行的权力投资的确毫无效果呢?果真如此,那么当我们走到这一步时,就民众的本体发展而言,关于帝国政府的外在特征的讨论将是矛盾的。在我们看来从民众的行为角度可以弥合的虚拟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分歧被帝国的统治有效地拉开了。两种力量似乎矛盾地对峙着。

但我们不认为这真的是一种矛盾。仅仅在形式逻辑上存在静止的矛盾;但矛盾从来在物质逻辑(即政治的、历史的和本体论逻辑)上不是静止的,后者将其放在可能性继而权力的层面上。其实,帝国政府强加在民众虚拟性上的关系,只是一种压迫的静止关系。帝国政府的投入基本上是否定性的,按步展开,意在强制地安排冒有沦入混乱的风险的行为和事件。在所有情况下帝国政府的有效性是规范化的,而非组成性的,即便效果长久亦是如此。帝国的过分控制至多形成了记录政治生活的周期,或者真正记录了决定存在的最软弱和重复的意象。

帝国政府的至高的特权,它对炸弹、金钱和通讯的垄断,只是具有破坏的能力,继而成为否定的力量。帝国政府的行为干预到民众的规划中去,仅仅以使之解体和缓慢的方式来把虚拟性与可能性合拢到一起。在这方面帝国的确触及到历史运动的进程,但它不可能因此被定义为一种积极的能量——相反,其控制的合法性只在不断增加地为这些运动所颠覆。

当帝国的行为有效时,这并不源于它自身的力量,而是因为事实上它迫于来自民众抵抗帝国力量的反弹。有人可能说在这个意义上抵抗

---

① Bernard Aspe 和 Muriel Combes, "Du vampire au parasite,"见 *Futur antérieur*, no. 35 - 36 (1996)。

实际上先于权力。[①] 当帝国政府介入时，它选择了民众的解放动力，目的在于破坏它们，反过来它受抵抗的驱动。帝国的至高投入及其所有的政治主动权依据组成民众存在的抵抗行为的节奏建构起来。换句话说，帝国规范的和压制的程序的有效性最终必须追溯到虚拟与组合成的民众行为。帝国自身不是一个积极的现实。它在崛起的瞬间倒塌。每个帝国的行为是对民众抵抗的反弹，并且形成民众需要克服的一个新限制。[②]

帝国的控制未产生富有生命力和本体论的事物。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帝国的控制是纯粹否定和被动的。当然权力无处不在，但这一点源于到处都是虚拟性和可能性之间的联系在发生作用，一种作为民众的惟一领域的联系。帝国的权力是否定性的残余和管理民众的可依靠力量。它是一种寄生物，从民众创造能量和价值新源泉的能力中获取活力。但一种汲取其寄主力量的寄生物可能危及它自身的生存。帝国权力的功用势必与其衰落相连。

流浪与混种

帝国的本体网络由超越民众及其虚拟力量的标准之上的活动所构建。这些虚拟的组合力量与帝国的组成力量无尽地相冲突。它们完全是积极的，因为其"反对体"就是"支持体"；换句话说，是成为爱与群体的一种抵抗力。我们恰恰处在无穷的有限性的中心，它将虚拟物和可能物

① 论对权力的抵抗的优先性，见 Gilles Deleuze, *Foucau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关于权力的结束语是抵抗首先到来。"

② 这种限制与界限的辩证法一方面与思想的力量而另一方面与政治权力有关。它被那种主体性的现象学的潮流所正确理解，该潮流（与海德格尔的潮流相反）将纳粹主义并继而将资本主义国家认可为历史进程的真正的局限。从胡塞尔到萨特，我们找到了将局限转化为起点的核心目标，而在许多方面福柯延续了这一脉络，Edmund Husserl,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London: Verso, 1990); and Deleuze, *Foucault*。

连接到一起,并处在从欲望到正在到来的前景的历程之中。①

这种本体论的关系首先作用于空间。世界空间的虚拟性组成了对民众运动的第一决定性——一种必须成为现实的虚拟性。仅仅可以穿越的空间必须转化成一个生活的空间;流通必须成为自由。换而言之,流动的民众必须获得一个全球的公民身份。民众对约束的反抗——对归属于一个国家、一种身份和一个民族的奴役进行反抗的斗争,进而抛弃它置于主体性之上的主权和界限——是完全积极的。流浪和混种在此显现为道德的角色和帝国范围内最先的伦理实践。从这个角度说,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客观空间崩溃了。只有一个被主观流通所激活的空间和一个由个体与群体的不可压制的运动(合法的或秘密的)所定义的空间才可能是真实的。当今天对本土化的庆祝反对流通和混合,并继而巩固国家、种族、人种和民族等等时,有可能变为退步的或者甚至是法西斯的。但是,本土化的概念不需要被孤独和纯粹所定义。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打破了环绕着本土的墙(因此将概念与人种、宗教、种族、国家和民族隔离),他能够直接将它联系到普适的层面。具体的普适性在于允许民众从一处流动到另一处,并使得该地方属于自己。这是流浪和混种的共同之处。经过流通,共同的人类物种得以形成,即有着无限权力的一个多种肤色的奥菲士通过流通人类群体得以构成。在每一片启蒙的云朵或康德的沉思之外,民众的欲望不是世界主义的状态,而是一个共同的物种。② 仿佛在一个神圣的圣灵降临节,身体混合了起来,流浪者讲着一种共同的语言。

在这种情境下,本体不是一种抽象的科学。它涉及到对存在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概念性认可,继而认识到政治现实由欲望的运动和现实地实现作为价值的劳动所构成。如今本体论的空间维度通过民众的全球化

---

① Jacques Rancière, *La mesentant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Paris: Galilée, 1945).

② 那样一种康德式的沉思例证见 Lucien Goldmann, *Mensch, Gemeinschaft und Welt in der Philosophie Immanuel Kants* (Zurich: Europa Verlag, 1945)。

的具体进程得以体现，或者真正地通过将人类群体的欲望共性化过程来体现。

这种空间维度功用的一个重要例证由终结第三世界的各种进程体现出来，连同其往日斗争的所有荣耀和耻辱、贯穿其解放进程的欲望的力量以及伴随其成功所产生的贫困。如今解放第三世界的真正的英雄们也许真的已成为外迁和流动的人口，他们已经破坏了新旧界线。其实，后殖民地的英雄就是不断地越过地域和种族疆界的人，即破坏专一主义和朝向一种共同的文明的要点。相反，帝国控制孤立了贫穷人口，并允许他们只在附属的后殖民国家的身份约束下活动。从本土主义中逃离、对习惯和界线的越界以及对主权的抛弃都是解放第三世界的实际作用力。这里我们比以前更能清晰地认识到“解放”(emancipation)与“自由”(liberation)之间马克思所定义的区别。[①] “解放”是新的国家与民族进入到帝国的控制社会之中，带着新的等级与隔离。相反“自由”则意味着强迫迁移的疆界与模式的毁灭，空间再占领，以及决定着个体和人群的全球流动与混合的民众的力量。第三世界曾由民族国家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构建并陷入冷战，现在随着现代国家的政治规训的旧统治(及其对人口在地理与种族上的规范的伴随机制)遭到粉碎而受到毁灭。在它毁灭之时，贯穿全球化的本体论层面的地球上最悲惨者变成了最强大的存在，因为它的新型流浪的单一性是最具创造性的力量，而其欲望的全方位运动在其自身是一种未来的自由。

流动的力量最基本地决定了民众的虚拟性，而流动是一种反帝国本体论的首要的伦理行为。生态政治的流动与混合的这种本体论方面体现更多的就是当属于后现代流动的其他意义与之相对比的时候，比如市场交换或交换的速度。速度和流动的这些方面更属于帝国监控的暴

① Karl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见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75)。

力。[①] 资本所统治的交换和交流被整合进它的逻辑;而且只有一种极端的抵抗行为可以重新抓住主体新的流动性与杂交性的生产意识,从而实现他们的"自由"。这一决裂,也只有这一决裂将我们带到民众的本体论层面以及流动与杂交化具有生态政治性的层面。生态政治的流动聚焦和赞美的对象是对生产、自我定价和自由活动的实质性决定。流动是一种全球的出逃,或者真正的流浪,而且它是一种集体的出逃,或者真正的混种。

一般才智和生态力量

前面我们坚持认为马克思的"一般才智"(见第二章)理念有着重要性和局限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点上,马克思只瞥见为未来而劳动的种种力量充满了科学、交流和语言的力量。一般的才智是由累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所创造出的一种集体、社会的智力。劳动的价值由此被一种新的普遍而具体的劳动力经过占用及自由使用新型生产力加以实现。马克思所视为未来的正是我们的时代。劳动力的这种激烈的转换和将科学、交流与语言融入生产力的行为业已重新定义了整个劳动的现象学和全世界的生产景象。

一般才智论述的危险在于它冒险完全停留在思想层面上,仿佛新的劳动力只是智力上的,而并不同时是集体的(见第十三章)。正如先前我们所见的,情感劳动的新力量与新位置和智力劳动一样多地成为劳动力的特征。生态力量对这些同样是智力和集体的生命的生产能力加以命名。生产的力量事实上如今全是生态政治的;换而言之,它们不仅遍布在生产中而且在整个再生产领域,并直接由二者组成。生态力量成为一种生产的中介,这正当整个再生产的情境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统治之下,

---

① Paul Virilio, *L'in securité duterritoire* (Paris: Stock, 1976).

即当再生产与自身组成它的根本性关系直接变成生产性的时候。生态力量是资本之下社会的真正吸纳的另一个名称，二者与全球化的生产秩序相同义。生产充斥着帝国的表层；它是一架充满生机的机器，一种智能的生机通过在生产与再生产，同样也在（劳动、情感与语言的）流动当中表现其自身的方式，赋予社会一种新的集体意义，并认可了合作之中的道德与文明。

科学、知识、情感和交流的力量是组成我们人类学的虚拟性的基本力量，并在帝国的表面上展开。这一展开延伸到一般语言学领域，后者标志着生产与生活间的交叉。劳动愈加变得非物质化，并通过一种单一而延续的生产创新过程实现其价值；它日益精于以一种更加高级而互动的方式消费或使用社会生产的服务。智力与情感（或者真正的与身体共同延伸的大脑）就在它们成为基本生产力之时，使得生产与生活在它们运作的层面上巧合，因为生活就是整套身体与大脑的生产和再生产。

生产与生活间的关系由此已被改变，以至于考虑到政治经济的规训如何理解它时，现在这种关系被彻底颠倒过来。生活不再产生在从属于工作日的再生产的周期中；相反，生活是充满和统治了所有生产的事物。事实上，劳动与生产的价值深深地决定在生活内部。工业没有生产剩余物——除了社会活动的产物——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埋藏在伟大生活中的价值超越于标准之上的原因。如果生产没有完全被社会智力、一般才智同时也没有被情感表达所激活，将不会有剩余物，而情感表达决定着社会关系并统治着社会存在的体现。如今决定价值过量的因素有情感、知识交叉的身体、大脑的智力和纯粹的行为能力。商品生产趋于完全通过语言取得成功，这里所说的语言，我们指的是不断由情感与主观的激情加以更新的智能机器。①

---

① 论语言在当代经济中的重要性，见 Karl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75)。

这一点应该弄清楚:是什么组成了帝国社会层面上的社会合作:生活的增效作用,或者真正地说是生活原貌(naked life)的生产性表现。乔吉奥·阿甘本使用"生活原貌"这一术语指涉人性的否定性局限,揭示出在政治深渊的背后,现代极权主义已经构建起(或多或少英雄式的)人类消极状态的条件。① 我们愿意说,相反,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通过可怕地将人类降到一种最低水平的生活原貌,妄想摧毁生活原貌可能成为的巨大力量,试图取消民众新的生产合作的力量得以聚集的形式。顺着这一观点,有人可能说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反动的狂热释放之时,正是资本发现社会合作不再产生于资本的投资,而是一种自主的权力,是每一种生产行为的可能结果的时候。当人类的力量立刻显现为一种自主合作的集体力量时,资本主义的史前历史走向终结。换句话说,当资本主义的史前史走向终结之时,社会和主体的合作不再是一种产品而是一种假定,生活原貌被提升到生产力的高度,或者就在它显现为虚拟性财富之时。

民众的科学、情感和语言的力量强烈地改变着社会生产的条件。民众再占用生产力的领域是一个激烈巨变后的领域——一个造物主般运作后的场景。这首先由对合作主体性的生产进行的一次彻底修正所组成;它形成于一种行为,即与民众业已再占用和再创造的机器相融合、相杂交的行为。因而它形成于一种出逃;就主体被转化成(而且发现构成它的合作在)这种机器(中倍增)而言,出逃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机械性的。这是出逃的一种新形式,一种趋向(或连同)机器的出逃——一种机器的出逃。② 现代工人的历史和现代主权主体的历史已经包含了机器巨变的一段漫长的历程,但人与机器的杂交化不再由整个现代阶段内它所

---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il potere sovrano e la nuda vita* (Turin: Einaudi, 1995).

② 论这种机械化概念,见 Félix Guattari, *L'inconscient machinique: essais de schizo-analyse* (Fontenay-sous-Bois: Encres/Recherches, 1979); and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遵从的线性道路来确定。我们业已来到这一时刻：已控制了杂交化和机器巨变的力量的关系如今可以被推翻。马克思认识到工人与机器间的冲突是一种错误的冲突："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①如今，新的虚拟性和现实的生活原貌有能力控制机器巨变的进程。帝国内对机器虚拟性的政治斗争，或者真正地对虚拟与真实之间的不同道路的选择的斗争则是斗争的一个中心区域。生产与生活的这个新区域为劳动打开了一个巨变的前景：主体的合作能够而且必须进行伦理、政治和生产性的控制。

过去的行为/机器

近年来有不少关于历史终结的谈论，也提出了许多有道理的反对意见，针对那些庆祝历史终结的反动说法，后者将现有的统治状态视作永恒。然而，当然的真相在于在现代性中，资本的力量及其主权的机构牢牢控制了历史，并对历史进程实施它们的统治。民众在后现代性中的虚拟力量标志着统治和那些机构的终结。那段历史业已终结。资本主义统治显示成为一个过渡时期。然而，如果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的超验目的论正在走向终结，民众如何能反过来定义一种唯物主义的终极目的呢？②

我们将只有在对虚拟性和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种现象学和历

---

① Karl Marx, *Capital*, 第一卷(New York: Vintage, 1976)。

② 显然，当我们谈论一种唯物主义的目标时，我们在谈论一种由主体构建、由民众用行动组成的目标。这涉及到一种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读，它认可了社会机制通过社会力量自身的遭遇与冲突而形成。此种情况下的目标并没有预先决定，而是在过程中构建起来。诸如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这样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与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和斯宾诺莎之类的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从未否定过由人类行为所建构的目标。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介绍中所写的，不是类人猿身体结构解释了人类的身体结构，而是相反，人类的身体结构解释了类人猿。目标只在后来才出现，成为历史行为的结果。

史学的分析之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亦即在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是否、怎样以及何时民众的虚拟性通过可能性而成为现实。可能物的本体论在此意义上是分析的中心领域。这一难题已被作家们提了出来，从卢卡契到本雅明，从阿多诺到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从福柯到德勒兹，而且的确被所有那些已经认识到现代性曙光的人所提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该问题的提出面对了如此众多的形而上学的限制！而且我们现今可以看到，相对于问题的庞大，他们的回答是怎样的苍白。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难题没有冒险重复形而上学传统的旧模式，即便是最有力的模式。事实上，每一个形而上学的传统现在都彻底过时。如果能有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它很可能是物质的和爆炸性的。当我们的注意力过去首先被吸引到组成民众的虚拟性要素的强度上时，如今它必须集中在这样的假说上：那些虚拟性聚集达到实现它们足够的力量的起始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到一般才智及其在知识、情感与合作中的体现。相似的意义在于我们谈到不同形式的来自民众的那些流浪运动的集体出逃，这些民众占用了空间，并加以更新。

这里我们正在讨论两条道路。第一条来自于虚拟性总结了“过去的行为”领域这一事实。虚拟性迈步向前，体现出“记叙物理现象模式”的能力统治着活跃的虚拟单一性，但业已最终失效。这就是走向终结的“历史”，而新的虚拟性此时涌现成强大的力量，并将其自身从一种由资本及其机构进行霸权式投资的存在中解放出来。今天只有过去的行为同历史能量一起遭到指控，或者干脆说，如今没有了历史，只有历史性。第二条道路来自于这一事实：这些单一的虚拟性随着获得自主权而走向自我定价。它们将自身表达成革新的机器，不仅拒绝受旧的价值和剥削体系的统治，而且还实际上创造了自己的不可缩减的可能性。这正是一个物质主义的终极目的被定义的所在，它建立在多种单一性行为之上；这样一种目的论是过去的行为的合成产物和一个民众的机器逻辑的角色。

过去的行为，即控制着可能物与真实物之间关联的单一的虚拟性，在第一条道路上处在标准以外，而在第二条道路上则在标准之上。在可能与真实间起链接作用的单一的虚拟性同时打出这两种王牌：作为一种毁灭性武器（在理论上毁灭，在实践上颠覆）处在标准之外，而作为合成的力量则处在标准之上。虚拟与真实作为不可缩减的革新和革命性的机器合二为一。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你不可能流了一滴美国血却没有流全世界的血……我们的血液如同亚马逊洪流一样由上千道高贵的血脉合成倾注为一体。我们不是一个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世界；因为除非我们可能像麦基洗德一样将整个世界称作我们的祖先，否则我们无父无母……我们的祖先迷失在普遍的来源中……我们是所有时间的后代，而且根据所有的国家来划分我们的遗产。

——赫尔曼·梅尔维尔

命运业已这样计划：美国从现在起将处在西方文明的中心而非边缘。

——沃尔特·李普曼

不可能逃避同美国打交道。

——路易-费迪南德·塞琳娜

帝国建构的理论也是其衰落的理论，如同帝国的欧洲理论家们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所认识到的那样。早在希腊—罗马的古代，修昔底德、塔西佗和波利尼奥斯都像后来的教会的神父和早期基督教的理论家所做

的一样，详尽记叙了崛起与衰落的经过，谈及帝国时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件对他们只是简单地重复在“积极”与“消极”的政府形式间交替的古典理论，因为定义后的帝国超越于这一交替之上。但帝国概念的内在危机只在启蒙时期和建构帝国的现代性时期彻底清楚起来，当时诸如孟德斯鸠和吉朋这样的作者将罗马帝国的衰落问题作为分析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形式的一个中心而普遍的主题。①

（马基雅维利的）兴与衰

在古典时代，帝国的概念已然预示出危机。帝国在一种自然主义的政府形式的理论框架内孕育而成，而且即便它打破了好坏形式的周期交替，却不能从城市与文明作为一体的腐败的命运中得以豁免。历史由“赛齐”（Thyche）（即运气或命运）所统治，后者必然不时地毁灭着帝国所取得的完善。从修昔底德到塔西佗，从雅典到罗马，普通生活和监控的形式之间的必要平衡就处在这种线性的命运之中。波利尼奥斯对罗马帝国的分析背弃了历史发展的周期特性这一概念，借此人类对政治的建构不断地从好的形式转化到城市与权力的糟糕形式：从君主制到暴政，从贵族制到寡头制，从民主制到无政府主义，然后最终开始了一轮新周期。波利尼奥斯宣称罗马帝国通过创造权力的好形式的一种综合而背弃了这一循环（见第十四章）。由此，与其将帝国理解成对普遍的时空的统治，不如更多地理解为通过社会力量的权力将空间与短暂时间聚集在一起的一场运动；这些社会力量力求将其自身从历史时间的自然循环特性中解放出来。然而，超越命运的界限是要碰运气的。好的政府形式的综合，即具有市民美德的政府，能够对抗命运，但不可能代替它。危机与

① 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Considerations of the Causes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Romans and Their Desi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和 Edward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New York: Knopf, 1993)。

衰落决定着每天都必须被征服。

在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诸如孟德斯鸠和吉朋之类的作家拒绝了这种进程的自然主义概念。帝国的衰落用社会科学术语被解释为一种结果,来自于使民众与其英雄美德的历史、社会的构建得以永久的不可能性。帝国的腐败和衰落由此不是一个由循环的历史命运决定的自然的假定,而是统治一种无限时空的人类不可能性(或者至少是极端艰巨性)的产物。帝国的无限性埋葬了促使好机构运行并持续下去的能量。然而,帝国是一种终结,民众的欲望与市民美德及其创造历史的能力全都趋于这种终结。它是一个不确定的形势,不可能支持无限的时空,但相反却无限地将政府的普遍的目标限定在有限的政治与社会维度内。启蒙作家们告诉我们接近完善的政府将跨越有限时空,被温和地构建起来。因而在帝国和控制的现实之间,理论上存在一种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危机的矛盾。

回顾古人的观念并展望现代人的观念,马基雅维利的确就是提供给我们帝国悖论最充分论证的人。[①] 通过将问题从古人的自然化的层面和现代人社会学的层面二者中分离开来,他澄清了这一难题,相反将它放到内在性和纯粹政治学的领域。在他看来,扩张的政府被共和政体的社会与政治力量的辩证法向前推进。惟有在社会阶层与它们的政治表达呈现在对抗力的一种公开而持续的活动之中的地方,自由与扩张才连在一处,因而只有在那里帝国才成为可能。马基雅维利说,没有一个帝国的概念不是一种决定性地扩张的自由概念。然后,恰恰在这种自由的辩证法中存在着腐败和毁灭的因素。他在讨论罗马帝国的衰落时,首当其冲地强调了民间宗教的危机,或者真正地在于社会关系的衰落,后者已将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力量统一起来,允许它们一起参与到对抗力量的

① Machiavelli, *Discours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和 Antonio Negri, *Il Potere Costituente* (Milan: Sugarco, 1992)。

公开互动中。基督教便是罗马帝国的摧毁者，手段是破坏了异教社会所支持的市民的激情，即市民虽有冲突，但忠诚地参与到对政体的不断完善和自由的进程之中。

认为好的政府形式会必然和自然地腐败的古老观念由此遭到激烈的废弃，因为它们只能从与组织政体的社会及政治关系方面加以评估。现代的启蒙观念关于无限和难以控制的时空危机的观念遭到类似的废弃，因为它也被带回到市民权力的范围：正是在这个而不是其他的基础上时空才能被评估。于是交替不在政府和腐败或帝国与衰落之间，而介乎于一方面是扎根于社会的扩张的政府，即“市民的”和“民主的”政府，另一方面是置其权力于超验和压迫之上的政府的每一种实践。这里我们应该清楚，当谈到作为共和政体扩张活动的基础，处在引号之中的“市民”或“民主”之时，而且是作为一个长久存在的帝国惟一可能性之时，我们正在引入一个参与的概念，它关系到一类人的生命力及其产生一种对抗力的辩证法的能力——因而是一个和古典的或现代的民主概念少有关联的概念。从这一角度看甚至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都有点“民主”了，类似于恺撒的军团，拿破仑的军队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因为他们各自都成就了一类人的参与，支持其扩张行为。在所有这些例子和普遍的帝国概况的中心应是一种内在化层面得到肯定。内在性被定义为任何对民众行为轨迹的外在界限的缺失。而内在性在其肯定性和毁灭性方面只受制于构成其组成与发展的可能性的政体。

这里我们发现自己回到了悖论的中心，通过这个悖论，每个帝国的理论都孕育着其自身衰落的可能性——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解释它。如果帝国总是一种绝对的肯定，是一个民众政府的实现和一个绝对内在的机构，那么它就完全在这个定义的层面上面临危机，并不因为其他任何与之相对的必需或超越。危机是内在性层次上的一种可选择的可能性的标志——一种并不必然但总是可能的危机。

马基雅维利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内在的、组合成的、本体论的危机感。

然而只有在目前形势下,这种危机与内在性领域的共存变得完全清楚了。既然政治行为的时空维度不再是界限而是帝国政府的建构的机制,内在性层面上积极与消极方面的共存如今成为一种公开的选择。而今同样的运动与趋势既构成了帝国的兴起,又构成了它的衰落。

欧洲的疆界(维特根斯坦)

帝国精神和危机与衰落迹象的共存在欧洲过去两个世纪的话语中显现出众多不同的表象,经常反映了欧洲霸权的终结或者民主的危机与大众社会的胜利。我们已在整本书中详尽地强调了现代欧洲政府发展的不是帝国的而是帝国主义的形式,然而帝国的概念在欧洲得以存活下来。其现实的缺失则不断地令人感到哀伤。欧洲的关于帝国和衰落的辩论使我们感兴趣有两个基本原因:首先,因为帝国的欧洲的理想危机是这些辩论的核心;其次,因为这种危机准确地击中欧洲定义的隐秘之处,即民主的概念归属之地。另一个我们必须在此牢记的因素是实施辩论的立场:一个在集体经历过的经验方面采纳了帝国衰落的历史性戏剧效果的立场。欧洲危机的主题被转化成帝国衰落的一种话语,并连同这种危机所隐含的意识及抵抗的形式一起与民主的危机联系起来。

阿莱克斯·德·托克维尔也许是用这些术语展现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他对美国的大众民主及其主动性和扩张精神的分析引导他痛苦而预言性地认识到,欧洲精英不可能一直维持对世界文明的一种控制地位。[①] 黑格尔业已察觉到非常相似的某些东西:"美国是……未来的国度,而它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尚未在即将到来的时代中体现出来……对

①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于所有那些厌倦了旧欧洲的历史武库的人来说，它是一片欲望的土地。”[①]然而托克维尔以一种深刻得多的方式理解了这段话。造成欧洲文明的危机及其帝国实践的原因存在于这个事实：欧洲美德——或者真正地指在现代主权机构中组织起来的它的贵族道德——不可能成功地与大众文明的生命力合拍。

许多欧洲人开始发觉的上帝之死的确是他们丧失自己的全球中心地位的标志，对此他们只能理解成一种现代的神秘主义。从尼采到柏克哈特，从托马斯·曼到马克斯·韦伯，从斯宾格勒、海德格尔到奥特加·依珈斯，以及在其他无数跨越了 19 和 20 世纪的作家看来，这种直觉成为一种被人带着那种苦痛歌唱的经常重弹的老调![②] 社会与政治景观中大众的表象、文化与生产的现代性模式的耗竭、欧洲帝国主义计划的削减以及在萧条、贫困与阶级斗争等问题上国家间的冲突：所有这些作为不可逆转的衰落迹象涌现出来。虚无主义统治着时代，因为时代没有了希望。尼采提出了确定的诊断：“欧洲病了。”[③]即将毁灭这一地带的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以及重新出现的最可怕的民族主义与不相容忍的幽灵全都站出来成为证据，确认这些直觉事实上正确。

但从我们的立场看，与旧的欧洲权力相反，一个新欧洲已形成的这一事实只是个好消息。谁想见到更多的那种毫无生气和寄生性的欧洲统治阶级？后者曾经直接引导旧秩序进入民族主义、从民粹主义到法西斯主义，而今则推行一种普遍化的新自由主义。谁想更多地见到那些已经滋养和支持了腐烂的欧洲精英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的机构？谁又仍能容忍那些劳工组织系统以及那些业已剥离了一切生命精神的合作？

这里我们的任务不是哀悼欧洲的危机；相反是在对它的分析中认识

---

① 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② M.C.以他通常的博学对欧洲观念的盛衰提出了一番令人兴奋的分析，见 *Geo-filosofia dell' Europa* (Milan: Adelphi, 1994)。

③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到诸种因素,它们在肯定危机趋势的同时,依然暗示出可能的抵抗、积极回应的余地和命运的他种选择。这些因素已经经常出现,几乎与关于他们自身时代危机的理论家的意志相反:它是一种跃向将来一个时代的反抗——一个真实而正确的未来的过去,一种未来的完成时态。在此意义上,通过对其原因的痛苦的分析,欧洲意识形态的危机能够揭示出对新的公开资源的定义。这就是为何跟随欧洲危机发展是重要的,因为不仅像尼采和韦伯那样的作家,而且连该时代的公共舆论都认为对危机的谴责揭示了一个极端强大的积极方面,它含有今天我们正在进入的新世界帝国的基本特征。旧的帝国世界危机的力量成为新帝国的基础。无差别的大众以其简单的表现曾经能够摧毁现代传统及其超越力,而今显现成为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和不可抑制的维持价值的源头。一种新的生命力,近乎于埋葬了罗马的野蛮力量重新激活了欧洲上帝死去后留给我们作为视野的内在性领域。每一种关于欧洲人危机和欧洲帝国观念的衰落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新的生命力的表征,或者如我们所愿,成为大众欲望的表征。尼采从山顶上这样宣告道:"我自身已经吸纳了欧洲的精神——现在我想反击了!"[①]超越了现代性意味着超越限制、超越欧洲中心论,并导向将内在性领域确定地接受成政治理论与实践的专有范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数年之后,那些已经参与到大屠杀之中的人绝望地试图理解和控制这一危机。考虑一下弗兰茨·罗森瓦格(Franz Rosenzweig)和沃尔特·本雅明的证词。对他们二位来说,一种世俗的末世论是借助来释放危机经验的机制。[②] 在历史地经历了战争与悲惨之后,也许还伴随着一种对即将到来的浩劫的直觉,他们试图发现希望和救赎之光。然而这种尝试没有成功地逃避开强大的辩证法的回流。当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vol.8., p t.1, 转引自 Cacciari, *Geofilosofia dell'Europa*。

② Franz Rosenzweig, *The Star of Redemp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然这种已经聚拢和选定了欧洲价值观的被诅咒的辩证法，已从内部被掏空，如今由完全否定的术语所定义。然而，这种神秘论赖以寻求解放和救赎的启示景象也仍然隐含在危机之中。本雅明这样痛苦地认识道："过去随之带来一种时间的指引，借以指向救赎。在过去的几代人与现代人之间有一个秘密的约定。我们被期待着降临到世间。像之前的每一代人，我们已被赋予一种软弱的弥赛亚力量，一种由过去进行支配的力量。"①

这种理论的经验产生在现代性危机以最大的强度所出现的地方。在同一范围内，其他作者寻求与辩证法的残余及其吸纳的权力相决裂。然而，对我们来说，似乎连当今最强大的思想家都不能和辩证法与危机分裂。马克斯·韦伯认为主权和合法化的危机只能通过求助于具有领袖气质的非理性的人物得以解决。卡尔·施密特认为主权实践的范围只能通过求助于"决定"来清除。但一种非理性的辩证法不可能解决甚至缓解现实的危机。② 一种美学化的辩证法的强大阴影甚至不知不觉地溜进了海德格尔关于对四散分裂的存在的精神指导功能的概念之中。

为了真正澄清这一景象，我们向一系列的法国哲学家们表示最大的感激，他们在几十年后，即 20 世纪 60 年代重读了尼采。③ 他们的重读涉及到批判立场的重新定向，它产生于他们开始认识到辩证法作用的结束之时；此时，这种认识在新的以主体性生产为中心的政治经验中得到肯定。这是一种作为权力的主体制生产，而且构成一种自主权，不能被削减成任何抽象或超验的综合。④ 现在不是辩证法而是拒绝、抵制、暴力和对存在的积极肯定标示着现实中危机的定位和足够的反应之间的关系。

---

①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见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1968)。

② 论欧洲非理性主义的命运，见 Georg Lukács, *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 (London: Merlin, 1980)。

③ 我们基本上在是指格里泽·德勒兹，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

④ Hans Jürgen Krahl, *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 (Frankfurt: Neue Kritik, 1971).

在20世纪20年代危机之中显示为反历史的超越、反腐败的救赎以及反虚无主义的弥赛亚主义如今被构建成一种本体论上明确的位置,在任何可能的辩证法残余之外,与之相对,从而超越于其上。这是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否定了每个超验的因素,并组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激进的重新定向。

为了理解这种道路的深刻性,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人们愿意努力集中在对它的意识与期待之上。维氏的早期作品赋予20世纪早期的欧洲思想的主要题旨以一种新生命:身处感知的荒漠和搜寻意义的条件,整体性神秘主义和朝向主体性生产的本体论趋势的共存。已从任何辩证法身上剥离开的当代历史及其戏剧性于是被维氏从偶然性那里移开。历史与经验展现了对绝望地试图在危机中发现连贯性的主体重新安置一种唯物主义与同义反复的基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特根斯坦写道:"事物如何展现出来即上帝。上帝即事物如何展现出来。只有从我的生命的独特性的意识中才出现了宗教——科学——和艺术。"继而说:"这种意识即生命自身。即便在我自己之外没有生物存在,它能是一种伦理吗?如果除我自己之外没有生物存在,能有伦理吗?如果伦理应是基本之物,可以有(伦理)。如果我正确,那么一个世界被给予伦理的判断并不足够。世界自身非善非恶……善恶只通过主体进入。而主体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的一个疆界。"维特根斯坦摒弃了战争的上帝和事物的荒漠,在荒漠当中,通过将世界置于同义反复的主体性的限定之上,善恶如今难以分辨了:"在此人们可以看到唯我论和纯粹的现实主义巧合在一起,倘若它被严格地思考出来。"[①]然而这一界限是具有创造性的。另一种选择则当且仅当主体性被摆在世界之外时才可能完全出现:"我的建议以下列方式发挥阐释的作用:任何理解我的人最终认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Notebooks, 1914-16*, G. H. von Wright和G. E. M. Anscombeznd编(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识到它们是荒谬的，这时他已用过它们——作为台阶——从而爬上去超越它们。（不妨说，他必须在已经爬到它上面之后扔掉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建议，而后他将看到正确的世界。"[①]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任何可能的辩证法的终结和意义的终结，后者处在世界的逻辑之中而非其边缘上的主体超越之中。

这种哲学的经验的悲剧的发展轨迹允许我们抓住这些要素：它们使对现代性危机和帝国观念衰落的认识成为定义了未来的欧洲的一种（否定但必要的）条件。这些作家是在荒漠中大声呼叫的人。这代人的一部分将被扣押在惨绝人寰的集中营里。其他人则通过一种对苏联现代化不切实际的信仰使危机长存。还有一些人，一群相当数量的这些作家，逃往美国。他们真正是在荒漠中叫喊的声音，但他们在荒漠中稀少而单一的生活期待给了我们一种手段去思考在后现代帝国的新现实中民众的多种可能性。那些作家率先对未来帝国的完全非地域化的条件加以定义；他们置身于其间，就像民众今天置身在其中一样。否定性、拒绝参与和发现空虚笼罩了万物：这种手段将人自身断然放在一种帝国的现实之中，现实自身由危机所决定。在这一点上，帝国既是荒漠又是危机，同历史的趋向不可区分。在古代的世界中，帝国的危机被视作一种自然循环的历史产物，在现代世界危机由一系列时空的困境所决定，而现在危机的数字和帝国的实践已变得难以区分。然而 20 世纪的危机理论家教导我们，在新帝国建立的这片非地域化了的不合时宜的空间以及在这片意义的荒漠中，危机的证词可以向实现单一而集体的主体、向着民众的权力传递过去。民众已将地方与限定的时间的缺失予以内在化。它是流动和富有弹性的，它将未来只看作在各个方向上分枝出来的可能性的总体。未来的帝国世界，不了解意义，完全被主体性生产的五花八门的总数所填充。衰落不再是未来的命运，而是帝国的当下现实。

---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Routledge, 1961).

美国,美国

逃往美国的欧洲知识分子是对一个失去的地方进行再发现的一种尝试。美国的民主事实上不是建立在出逃的民主、肯定但非辩证性的价值观和多元主义及自由之上的吗?这些价值观连同新疆界的观念不是永久地再创造了其民主基础的扩张并超越了国家、种族和宗教的每个抽象限制吗?这种音乐有时在自由主义领袖所宣称的"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计划中被高调演奏,有时则低调,由每个诚实的人享有社会流动与争取财富与自由的平等机会的美国梦所代表——简而言之,即"美国的生活方式"。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危机的"新政"计划支持了美国理想的这一概念,该计划与欧洲对应危机的政治和文化计划如此地不同且比后者自由得多。汉娜·阿伦特宣称美国革命优于法国革命,因为美国革命是对政治自由的无限追求,而法国革命是对贫困和不平等的有限斗争;此时她不仅颂扬了欧洲人不再了解的一种自由的理想,而且在美国对其进行了重新地域化。[①] 随之在一定意义上,看上去似乎已经存在于美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之间的连续性被打破,美国已经踏上不同的道路,但实际上美国为这些欧洲人代表了一种欧洲已经丧失的自由观的复活。

从危机中的欧洲立场看,美国即杰斐逊的"自由的帝国"代表了帝国主义观点的更新。伟大的19世纪美国作家们已在歌唱新大陆自由的史诗特性。在惠特曼的作品中,民族主义得到肯定,而梅尔维尔的作品中的现实主义令人渴望。一个美国的地方以自由政体的名义被地方化,同时通过开放的边疆和出走被不断地非地域化。伟大的美国哲学家,从爱默生、怀特海直到皮尔斯,从黑格尔主义(或者其实是帝国主义欧洲的自

①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1963)。

辩)中揭示出精神上的洪流,后者来自于一个全新、巨大、决定性的且不受限定的进程。①

危机的欧洲人为一个新欧洲的这些曼妙的歌声所着迷。20 世纪欧洲的美国主义和反美主义同样是危机中的欧洲与美国帝国计划之间艰难关系的体现。美国的乌托邦以众多不同的方式被接受,但它在 20 世纪欧洲各地被用来作为一个中心参照点。这种持续的着迷既显现在危机的消沉又显现在先锋派的精神之中,换句话说,即通过现代性的自我毁灭和不确定但不可抑制的创新意志显现,后者驱使着伟大的欧洲文化运动的最后浪潮(从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到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

美国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两次救助欧洲的军事史堪与政治与文化上的救助相媲美。建立在金融、经济和军事结构上的美国对欧洲的霸权经过一系列文化和思想意识上的操作显得很自然。例如,考虑一下二战结束前后的几年,艺术生产的中心和现代艺术的观点是如何从巴黎转移到纽约的。瑟基·吉尔博详尽描述了那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即当巴黎艺术圈已因战争和纳粹的占领乱作一团时,就在一场促进美国在战后世界的领导角色的意识形态的运动过程中,由诸如杰克森·波洛克和罗伯特·玛泽韦尔的纽约艺术家组成的抽象表现主义是如何确立成为欧洲特别是巴黎的现代主义的当然延续和继承人。纽约窃取了现代艺术的观念:

> 美国艺术由此被描述成一种向抽象发展的长期存在和不可阻挡的趋势的逻辑巅峰。美国的文化曾被抬到一种国际范例的地位,特别美国化事物的意义不得不变化:已经典型美国化的事物当时变成了整体上"西方文化"的代表。如此美国艺术被转变成从地区的到国

① 格里泽·德勒兹经常歌颂美国文学的流浪特性和非地域化的力量。似乎对德勒兹来说,美国代表着欧洲意识封闭的禁锢之下的一种解放。例见"惠特曼"与《巴特比》,"Whitman"and "Bartleby,ou la formule," in *Critique et clinique*(Paris:Minuit,1993)。

> 际艺术再到全球艺术……在这方面，战后美国文化同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一样被放在同一立足点上；要求它对"自由"世界中民主自由的复兴负起责任。①

关于艺术生产，更重要的关于艺术批评的历史的这段文字只是五花八门的思想意识活动的一个方面，这种活动将美国的全球霸权选定为欧洲危机自然的和必然的后果。

自相矛盾的是，即便气势汹汹的欧洲民族主义各派，虽已经导致世纪前半叶那样激烈的冲突，最后却被一场看谁能更好地表达一种强大的美国特性的竞争所取代。列宁的苏维埃联盟其实或许已经最为清晰地听到了美国特性的诱人歌声。挑战在于要复制在美国已达到顶点的资本主义的结果。苏联人反驳美国使用的手段，相反宣称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艰苦的劳动与牺牲自由更加有效地取得同样结果。这种可怕的模糊性也融会在格雷马斯论美国方式与福特主义的作品之中，它们是从欧洲角度理解美国问题的基本文本之一。② 随着美国将新的泰勒制的劳动组织形式与其强大的资本主义统治意志结合在一起，格雷马斯将美国视为未来必须的参照点：它是惟一的发展道路。对他来说，它继而关系到理解革命是否积极（如苏联）或消极（如意大利法西斯）。美国特性与国家社会主义间的协调应是明显的，伴随着整个冷战中大西洋两岸它们平行的发展道路，最终导致在空间探寻和核武器上的危险竞争。这些平行道路简单地阐明了这样的事实：一定的美国特性已经刺入即使是其最强大的对立面的心脏。俄罗斯 20 世纪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欧洲发展的一个缩影。

欧洲意识拒绝承认其衰落，经常将其危机投射到美国的乌托邦之

---

① Serge Guilbaut,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Abstract Expressionism, Freedom, and the Cold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② Antonio Gramsci, "Americanism and Forolism," 见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上。这种投射持续了很长时间，和重新发现一个自由地方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同样长，这一自由之地能够继续着目的论思想，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也许是它的最高表现形式。这种投射的悖论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欧洲意识面对其不可否定和不可逆转的衰落以走向另一极端作出了反应：业已肯定和重复了美国乌托邦的形式上力量的基本的竞争之地如今代表了其彻底的颠覆。索尔仁尼琴的俄罗斯成为假借阿诺德·汤因比的外衣对最笨拙而又辩解式的美国乌托邦意象绝对的否定。应该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同时具有后现代性和演进特点的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看上去完结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混乱。美利坚帝国将终结历史。但我们知道作为乌托邦式救赎的这种美利坚帝国的观点完全是虚幻的。首先，未来的帝国不是美国的，美国不在其中心。我们在整本书中所描述的帝国的基本原则便是其力量没有实际的和可确定的范围或中心。帝国的权力通过流动和体现出来的控制机制分散在网络之中。这不是说美国政府和美国地区和其他的没有区别：美国当然在帝国的全球分隔和分级中占据了一个特权的地位。然而随着民族国家的权力和领域的衰退，国家地域间的区别变得愈加相关。它们如今不是本质的区分（例如宗主国区域同殖民地区域间的区分），而是程度上的区分。

进而，美国不能修正或修补危机和欧洲的衰落。美国不是一个欧洲的或者甚至是现代的主体可以逃去解决其不安和不快乐问题的地方，那样的地方根本不存在。超越危机的方式在于对主体进行本体论的置换。最重要的变化因而发生在人性内部，因为随着现代性的结束也结束了一种希望：发现能够在群体、合作和批评的、矛盾关系之外识别自我的某些事物，而每个人都在禁区，即在世界与民众之中发现那种批评与矛盾的关系。这就是欧洲观念重新出现的所在，不是作为一个区域，不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不从一个民族及其历史的立场出发，而只是简单地作为一种趋于普遍化的本体论人类特征的构成。

危机

后现代性和通往帝国的道路涉及到过去常被指认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领域的一种真正的汇合。当语言与交际、或者真正地当非物质劳动和合作变成主要生产力(见第十三章)时,帝国开始成形。上层建筑投入运行,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生产性语言性网络的世界。生产与再现的线路交错混合在同样的语言性与生产性的范围内。在这一情境下决定着政治经济学中心范围的差别趋向模糊。生产与再生产变得难以分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融合于一处;不变资本趋于在可变资本内部:在生产性主体的大脑、身体及合作之中组成与再现。社会主体同时是这种单一机器的生产者和产品。在这种新的历史结构中,由此不再可能会认可一种标志、一个主体、一种价值或者属于"外在的"一个实践。

然而,这种整体的形成没有消除剥削。它更多地对它进行了再定义,基本上与交际和合作相关。剥削是合作的侵占和语言性生产的意义的废弃。结果,对监控的抵制不断地在帝国内涌现。与剥削的对抗在全球的生产网络中体现出来,并决定着各个节点上的危机。危机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后现代的整体共同扩张,这是帝国控制所独有的。在这方面,帝国的衰落没有定义为一个历时性运动,而是一个共时性现实。危机在发展及整体上重组的每个时刻都在运行着。

随着社会被真正吸纳到资本之下,社会的对抗力量可以在每一时刻、在交际性生产与交换的每个阶段作为冲突爆发出来。资本已成为一个世界。使用价值和被认为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外的价值及定价过程的其他所有参照物已逐步消失。主体性完全陷入交换与语言当中,但那并不意味着它是温和的。以生产的交换关系普遍化为基础的技术发展是危机的一个原动力,而生产的一般智能则是一伙对抗力量。危机与衰落不是指帝国外在的某些东西,而是指最内在的东西。它们从属于

主体性自身的生产，由此它们既独属于帝国再生产的过程，又与之相反。危机和衰落不是一种隐藏的基础，也不是一个不祥预兆的未来，却是清楚而明显的现状，一个总被期待的事件，一个总是出现的潜伏因素。

正值夜半，鬼影幢幢。帝国的新统治和民众的新的非物质和合作性活动两者都在阴影中移动，没有东西可以照亮我们前面的命运。然而，我们已取得了一个新的参照点（而明天或许是一种新意识），它其实体现在帝国由危机所决定，它的衰落总是已经开始，结果每个对抗力量的线索都导向事变和异常。实际上，危机内在于并且与帝国难以区分，这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在漆黑的夜晚对该事变的实践进行积极的理论化并加以定义吗？

生育

两个中心的限制阻止我们立即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个由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专制权力展现出来，具体地说是一种广泛传播的幻想；即生产的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政体是永恒的和不可战胜的。奇特的资本主义自然特性是一种单纯而简单的神秘事物，而我们必须立即将它从自己身上去除掉。第二个限制由无数的理论立场所代表，这些立场除了一种盲目的无政府主义的他者外看不到现存统治秩序的替换物，并由此参与到一种有限的神秘主义之中。从这种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存在的煎熬不可能成功地得到表达，变得有意识并且建立起一种反叛的立场。这种理论立场只导向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和遁世的实践。资本主义自然特性的幻像和局限的极端性其实处在一种互补性的关系中。它们的同谋关系在一种精疲力竭的无权状态中得以表达。事实上，这些立场中没有一个，包括辩护的立场和神秘的立场，能成功地抓住生态政治秩序的基本方面：它的生产率。它们不能解释民众的虚拟权力，而民众不断趋向成为可能和真实。换而言之，它们已经失去存在的基本生产率的轨迹。

我们惟有将自身降到生态政治的虚拟性中才能回答如何脱离危机的问题,这种虚拟性受到主体性生产的单一而有创造性的过程的丰富和充实。然而,在我们陷入其中的绝对的视野中,在一个价值观似已被意义的真空及标准的缺失加以否定的世界里,断裂与革新怎么才可能呢?这里我们不需要又回去描述欲望及其本体论的超越,或者再次强调超越"以上"的维度。指出欲望的发育的决定性继而指出其生产性就足够了。结果在目前的政体中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完全混合揭示出一片生态政治的空间——比汉娜·阿伦特的政治空间的怀旧的乌托邦好得多——它解释了欲望直面危机的能力。① 完全概念上的视野由此被彻底再定义了。从欲望的立场看,生态政治只是具体的生产、行动中的人类集体性。欲望在这里显现为生产性空间,即在历史构建中人类合作的现实性。这种生产纯粹的只是人类再生产,即生育的能力。欲望的生产即生育,或者更是劳动的过度和一种力量的积累,这种力量被融入到单一本质的集体运动之中,既有它的起因,又有它的终结。

当我们的分析最终坚实地立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生产与再生产巧合的生态政治世界中时,本体论的视角与人类学的视角趋于重合。帝国自称为这个世界的主人,因为它能摧毁世界。多少可怕的幻想!事实上我们是世界的主人,因为我们的欲望和劳动不断地再生它。生态政治的世界是各种生育行动无穷无尽的相互交织,集体(作为单一性的交汇点)则是发动机。除去发疯,没有哪种形而上学可以自称将人性定义为孤立和无力的。除去超验,没有哪种本体论可以将人性归为个性。除去病态,没有哪种人类学可以将人性定义为一种否定的力量。生育,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和人类学的第一事实,是一种集体的机制或欲望的工

① 汉娜·阿伦特已成为那些想重新认识政治的欧美政治理论家所宠爱的作家。例见文集 the essays in Bonnie Honig, ed.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Hannah Arendt*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 Craig Calhoun and John McGowan, eds. *Hannah Arendt and the Meaning of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具。生物政治的变迁用绝对的语言赞颂了这个“第一”特征。

这种新的现实迫使政治理论对自身从根本上进行再定义。例如，在生态政治的社会中，按托马斯·霍布斯的提法，恐惧不能被用作协议的政治政体惟一的原动力，进而否定了民众的爱。或者不如说，在生态政治的社会中，主权的决定永不能否定民众的欲望。如果那些奠基作用的现代主权策略今天和它们决定的对抗一起使用，世界将走向终结，因为生育将不再可能。为了实现生育，政治不得不让位于爱情和欲望，目的是为了生态政治生产的基本力量。政治不是如今由愤世嫉俗的政客们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所教给我们的东西。如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所告诉我们的，它更是生育、欲望和爱情的权力。政治理论须沿着这些线索对其自身重新定位，并采用生育的语言。

生育是生态政治的帝国世界的原动力。生态政治——一种杂交化的范围，包括自然的与人造的、需求和机器、欲望和经济、社会的集体组织——必须为生存而不断地再生育自身。在所有其他要素之前，生育在那里成为生产与再生产的基础与动力。生育的联系赋予交际以意义，任何对这种首要性不作回应的（日常、哲学或政治的）交际模式都是错误的。帝国的这些社会与政治上的关系记录下生产发展的这一阶段，解释了生育与生产的生态空间。由此我们已达到生产性社会被真正吸纳到资本之下的一种虚拟性的局限——但恰恰在这种局限性上生育的可能性和欲望的集体力量在其全部权力中显示出来。

腐败

与生育相对的是腐败。腐败远不像各种柏拉图式哲学思潮所希望的那样是生育的必要补充，而只是对其简单的否定，[①]腐败打破了欲望之

① 论生育与腐败的哲学概念，见 Reiner Schürmann, *Des hégémonies brisées* (Mouvezin: T. E. R., 1996)。

链,中断了其在生产的生态政治的水平上的延伸。它建构了民众生活中的黑洞与本体论真空,这些连最反常的政治科学都不能加以掩饰。与欲望相对的腐败不是一种本体论的原动力,而只是缺少存在的生态政治实践的本体论基础。

帝国中腐败无处不在。它是统治的基石与基本原则,存在于不同的形态之中:帝国至高的政府与其附庸的统治,最精良与最腐烂的警察统治力量,统治阶级的说客们,崛起的社会集团的秘密势力,教会与宗派,谣言的始作俑者与迫害者,大的金融集团以及日常经济交往。通过腐败,帝国权力在全世界架起烟幕,而对民众的监控便在这堕落的烟云中,在缺少光阴和真理的情况下得以实施。

我们如何认识到腐败以及如何识别出帝国权力在全世界扩张开的冷漠的迷雾中强大的空虚,这点并不神秘。实际上,这种认识腐败的能力用笛卡尔的一个词组说即是"全世界最广泛共享的权力"。腐败很容易理解,因为它随即显现为一种暴力形式,一种伤害。它的确是一种伤害:其实腐败是不可能将权力同价值连结起来的标志,而对它的谴责由此成为一种对存在缺失的直接的洞察。腐败是将身体与思想同它们的功能相分离的事物。既然生态政治世界中的知识与生存总是体现在价值的生产中,这种存在的缺乏显现为一处伤口,社会的一种死亡愿望,一种将存在从世间的剥离。

腐败表现的形式是如此众多,以至于将它们列举出来的尝试就像将大海倾入茶杯。然而让我们试着举几个例子,即便它们无法用来代表整体。首先,存在作为个体选择的腐败,这种个体选择反对并冒犯了生态政治的生产所决定的基本的共通性与凝聚力。日常而小型的权力暴力是黑社会风格的腐败。其次,存在生产秩序的腐败,或者是真正的剥削。这概括了这样的事实:源自劳动的集体合作的价值观被剥夺,而处在生态政治的最初公共领域的事物则被私有化。如圣·奥古斯丁所说,大规模统治只是小窃贼们放大了的投影。然而,希波的奥古斯丁虽然如此现

实地持有这种悲观的权力观，却将被今日具有财政与金融权力的小窃贼们惊得瞠目结舌。的确，当资本主义失去它同价值（既作为个体剥削的标准也作为集体进步的标准）的关系时，它立即显现成腐败。其功用的日益抽象的次序（从剩余价值的积累到财政和金融的投机）表现为一种向普遍化腐败的强势发展。如果资本主义被定义成一个腐败的系统，但在曼德维尔的寓言中由其合作的精明凝聚在一起，并根据其左右两翼的所有意识形态由其进步的功能加以弥补，那么当标准解体，进步的目标崩溃时，除了腐败之外没有其他的基本特征属于资本主义。再次，腐败显现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中，或者更显现在对语言交际的意识的曲解上。这里腐败涉及到生态政治的领域，攻击它的生产节点，阻滞它的衍生进程。另外，当恐怖的威胁在帝国统治的实践中成为解决有限或地区冲突的武器和帝国发展的工具时，攻击便得以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监控被掩饰起来，而且可以间隔地显现成腐败或破坏，仿佛几乎要揭示出前者对后者和后者对前者的深切的召唤。二者在地狱中共舞，在帝国缺乏存在的状态下共舞。

这种腐败的例子可以被无限繁殖，但在所有这些腐败形式的基部有一种本体论失效的活动，它作为对民众单一本质的破坏得以定义和实施。民众必须被统一或分割成不同的结合体：这就是民众为何不得不遭受腐败。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与现代的腐败概念不可能被直接翻译成后现代概念。古代与现代的腐败在与价值的范式和（或）关系的关联中被定义和体现为对它们的一种歪曲，如此一来，它能够不时地在政府形式的变化和价值的复归中扮演一个角色；而今正相反，腐败不可能在政府形式的任何转化中扮演角色，因为腐败自身是帝国的实体和总和。腐败是监控的纯粹的操作，没有与生活世界相称或足够的参照。它是通过其强制的统一和（或）残酷的分隔成为导向毁灭民众特性的监控。这就是帝国在其崛起的时刻必然衰落的原因。

从物质性的角度看，对生产性生态力量的这种否定的监控角色甚至

更加的似是而非。生态政治的一代直接改造了民众的主体。如我们所见,这就是受到智力和合作性权力滋养的主体,是业已混杂起来的主体。生育在后现代性中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便是"标准之上"的主体。在这种情境下腐败简单地显现为疾病、挫折和残缺。这就是权力如何总是对抗受到滋养的主体。腐败也显现为精神病、麻醉剂、焦虑和无聊,但这也已经总是发生在整个现代性和规训性社会之中。如今腐败的特殊性相反成为单一主体组成的群体的分裂和对其生命的阻碍。这里我们由此而对着一个悖论。帝国对主体在合作中生产更多并在群体中享受更多的这一事实予以认可且从中谋利,但它为了不被其破坏,不得不阻挡与控制这种合作的自主。腐败在活动中阻止群体中的主体出现这种超越"标准之上"的情况,即威胁到帝国生存大业的新的主体权力单一普遍化。这一悖论是不可化解的;世界愈富有,以此种富裕为基础的帝国就必须愈加否定财富生产的条件。我们的任务是要调查出腐败如何能最终被迫停止其对生育的控制。

第十八章　反对帝国的民众

伟大的民众需要一种意识的物质宗教。不仅伟大的民众，而且哲学家也需要它。理智与心灵的一神教，想象与艺术的多神教，这便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必须有一种新的神话，但这种神话必须服务于观念。它必须是一种理智的神话。

——《德意志唯心主义的旧体系》
（黑格尔、荷尔德林或谢林作）

我们不缺少交流，相反我们拥有太多。我们缺少创造，缺少对现在的反抗。

——格里泽·德勒兹与费里克斯·瓜塔里

帝国的权力不再能通过替代了冲突方式的调解性模式来解决社会力量的冲突。构成政治的社会冲突直接地互相对立，没有任何调解。这是帝国形式的基本的新奇之处。帝国比现代权力体制为革命创造了一个更大的潜力，因为它除了监控的机器之外，展现给我们另一种选择：所有的被剥削者和被征服者的阶层，即彼此间没有调解的与帝国直接相对的民众。那么，在这点上，如奥古斯丁所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尽我们的能力来商讨“我们所发现的……交织……且互相混合在一处的那两个城市

的兴趣、发展和注定的终结"。[①] 既然我们已经与帝国打过广泛的交道，我们应该直接聚焦在民众及其潜在的政治权力上。

那两个城市

我们需要具体地调查民众如何能在帝国的情境下成为一个政治性主体。我们当然能从帝国政体的立场认识到民众的存在，但从那个角度，民众也许显现出是由帝国的监控所产生和维持。在新的后现代帝国，不存在将公民权授予他所有的臣民，从而将民众组织成一个政治主体的卡拉卡拉皇帝。被剥削和压迫的生产者民众的组成在20世纪革命史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1917、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和20世纪60年代的无数自由的斗争之间，民众公民权的条件产生、传播并得到巩固。20世纪的革命远未被打败，而是每次都推进和转变了阶级冲突的条件，突出了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条件，即反抗帝国权力的反叛的民众。革命运动已经建立起来的节奏是一个新时代的脉搏，时代的一种新式的成熟和巨变。

帝国的政体不是这些新力量兴起的起因，而是后果。进而不足为怪的是，帝国尽管竭力要构建一个足够应付社会与经济关系全球化的新现实的权利体系，却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它在第一章中作为我们论证的出发点）并不源于规则范围的广泛延伸；也并不简单地是从国际公法的旧体系到新的帝国体系的艰难历程的结果。相反，这种不可能性由民众的革命本质加以解释，民众的斗争已产生出作为自身形象颠倒过来的帝国，而今民众在这种新形势下代表着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以及与各种形式的权利、法律相关的价值的超越。

为了确认这种假说，看看民众的当代发展，讨论一下其目前表达方

---

① Saint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式的生命力就足够了。当民众活动时，它自动地生产和再生产整个生活的世界。自动地生产与再生产意味着构建一个新的本体论的实现。事实上，民众在活动中产生独特性的自身。正是独特性在帝国的禁区建立起一个新地方；这种独特性是合作产生的一种现实，这里的合作由语言的群体所代表，由杂交化的运动加以发展。民众肯定其独特性的方式在于颠倒了这样一个意识上的幻想：即世界市场的全球层面上的所有人类是可以互相交替的。在树立起市场的意识形态后，民众通过劳动促进了人类的群体与阶层的生态政治上的单一化，跨越了全球交替的每一个节点。

过去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历程埋葬了国家与民族的政治权力。从19世纪到20世纪写就的革命篇章已为在今天得以实现的劳动的新的主观形态作好准备。贯穿生态政治生产空间的合作与交流决定了一种新的生产单一性。民众并非通过把各国家与民族随便地凑在一起、加以混合来简单地组成；它是一个新城市的独特的力量。

有人可能在这一点上很有道理地反对道，所有这些仍不足以把民众建立成一个专门的政治主体，甚至更不足以成为一个具有控制自己命运潜质的主体。然而，这种异议没有体现不可逾越的限制，因为革命的历史和当代合作生产的能量难免揭示出一种目标、一种解放的物质肯定，而通过革命历史与当代的能量，民众的人类学特征被不断地记录和再阐释。在古代，普罗提诺就面对过类似的形势：

> “那么让我们逃往心爱的天国（Fatherland）”：那是最安全的建议……对于我们天国即我们所来自的彼处，那里有上帝（Father）。那么我们的道路是什么，我们逃离的方式是什么？这不是脚的旅程，脚只将我们从陆地带到陆地；也不需要你想要一辆车或船将你带走。你必须将所有这类事物放到一旁，拒绝去看：你必须闭上眼睛反过去召唤另一种幻象在你内部被唤醒，一种所有人与生俱来的

权力的幻象，却很少有人使用这种权力。①

这就是古老的神秘主义如何表达新目标的方法。然而，今天的民众生存在没有上帝圣父和没有超越的帝国表层。相反，那里有我们的内在劳动。民众的目的论是具有魔力的，它体现在将技术与生产导向其自身快乐与力量增长的可能性。民众没有理由在其自身的历史和现有的生产力之外去寻找导向它作为政治主体的政体所必需的手段。

一个唯物的理性神话由此开始形成，它建构在语言、技术和所有组成生活世界的方式之中。它是一种意识的唯物宗教，这些意识将民众从主权各种残余和帝国每一种"控制"中分离开来。理性的神话是象征和想象的表达，这种表达允许民众的本体论将自身表现为活动与意识。民众各种语言的神话阐释了俗世之城市的目标，城市自身的命运力量将其与任何归属或受制于上帝之城的行为隔裂开，而上帝之城已失去了所有的荣耀和合法性，由此与形而上的超验的调解以及暴力和腐败相对的是劳动与合作的完全组合，即民众的俗世之城。

漫漫长路(全球公民权)

民众的体制首先显现为在无限空间中组成民众的一场空间运动。商品的流动，继而作为劳动力的特殊商品的流动，已被资本主义从诞生以来表现为积累的基本条件。然而，如今我们在帝国内发现的个体、群体和人口的运动种类不可能完全受制于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则——每一刻它们都淹没并摧毁标准的疆界。民众的运动指认新地方，并在它的旅程中建立新的处所。自治运动便是将该地方定义为专属民众。通行证或合法文书将愈来愈不能规范跨越边界的运动。随着主体的生产性流动产生了新的河流和港口，民众建立起一种新的地理。俗世的城市将成

① Plotinus, *Ennead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6).

为合作的人类的大仓库，以及促成现世的广泛分布的人类的流动、短期驻扎和网络形成的机车。

通过流动，民众重新夺取了空间，将其自身组成一个积极的主体。当我们更仔细地了解这种主体性的组成过程如何运作时，可以看到新的空间由不寻常的构造和地下的不可抑制的“根茎”所描述——即由标记着命运新道路的地理上的神话所描述。这些运动经常要付出可怕、苦痛的代价，但它们当中也有一种解放的欲望，只有通过重新夺取新空间才能满足这种欲望，而在新空间周围，新的自由得以构建。这些运动所到各处，沿着它们所有的道路决定着新的生命和合作形式——它们到处创造财富，而寄生的后现代资本主义则并不知道以另外的方式如何从无产阶级血液中吸取这种财富，因为如今生产愈加出现在运动与合作、出走与群体之中。有可能想象出没有墨西哥移民劳力参与的美国的农业和服务业，或者没有巴勒斯坦人和巴基斯坦人参与的阿拉伯石油业吗？而且，倘没有向着炫目的资本主义财富与自由领域动员起来的广大民众的“非法劳动”，欧洲、美国和亚洲的非物质生产的伟大革新部门——从设计到时尚，从电子学到科学——又会在哪里呢？大众的移民已成为生产的必须。每条道路经打造、规划后供人行走。看上去每条路走的人越集中，在那里积淀的苦难就越多，每条路就变得更加富饶。正是这些路将“俗世的城市”带出所施加的阴霾和混乱。这就是民众如何获得权力确定它的自治，从而经过一种对区域进行广泛和横向的再占领的机制，一边长途旅行，一边表现了它自己。

然而，认识到流动民众的潜在的自治，只是指向了问题所在。我们需要把握的是，民众如何被组织起来，重新确定为积极的政治力量。至此，我们已经能够以纯粹形式的方式来描述这种政治力量的潜在的存在。就此止步而不去继续调查民众的意识和政治组织的成熟形式，以及认识不到在帝国劳力的这些地区运动中有多少业已强大起来，那将是一个错误。我们如何能够在民众运动的自发性内部及超越之上认识（并揭

示出)组成的政治趋向?

这个问题最初可以从另一方面着手,通过考虑压制这些运动的帝国的策略来解决。帝国没有真正了解如何控制这些道路,只能试图将实践它们的人列为罪犯,即便在运动为资本主义生产自身所需要的时候。从南美洲到北美洲,经典范围内的移民线路被新的毒品巨头们坚持称为"可卡因小道";或者另外地,来自北非和下撒哈拉非洲的迁徙举动被欧洲领导者们作为"恐怖主义的道路"对待;或者更有甚者,各类移民被迫逃过印度洋,屈身于"富饶的阿拉伯"的奴隶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人口仍在继续流动。帝国必须限定和孤立民众的空间运动,以阻止他们获得政治合法性。从这个角度说,极其重要的是,帝国利用其权力管理和协调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不同力量(见第五章与第七章)。同样重要的是,帝国通过部署它的军事警察力量,将难以控制的反叛者引向秩序。[①] 但它们自身的这些帝国措施仍未触及贯穿民众的自发运动中的政治张力。所有这些压制行为依旧本质上外在于民众及其运动。帝国只能孤立、分化和隔离。帝国资本的确以不倦的决心攻击着民众的运动:它巡逻在海上和边界上;在每个国家内部,它进行分化与隔离;而在劳工世界,它加固了种族、性别、语言、文化等等的区分与界线。然而即便这样,它必须小心地不去过分地限定民众的生产率,因为帝国也得依靠这股力量。民众的运动不得不被许可总是更加广泛地在全世界延伸,而压制民众的尝试的确是其力量矛盾和颠倒的体现。

这引导我们回到基本问题:民众的行动如何能变成政治的?民众怎样可以组织和集中其能量来反抗压制和帝国不断的地区隔离?对这些问题,我们能给出的惟一答案则是,基本上当民众开始怀着足够的意识直接面对帝国的中心压制行动时,民众的行动才成为政治的。它

① 论帝国的军事力量,见 Manuel De Landa, *War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New York: Zone, 1991)。

关系到认识和应付帝国的主动权，而又不让它们不断地再建秩序；关系到穿越与冲破施加于新的集体劳动力之上的限定和隔离；关系到将这些抵抗的经验聚集在一处，并一齐运用它们反抗帝国控制的神经中枢。

但这项任务对民众来说依旧相当抽象，尽管在概念水平上是清楚的。什么样的具体而细致的实践将激活这一政治工程呢？目前我们不能说什么。然而我们能看到的是全球民众的政治程序的最初要素：即全球的公民权。在1996年居留在法国的没有登记的外籍人口，即无证者举行的示威期间，标语要求“给所有人证件！”。每个人都有居留证，首先意味着所有人都应在居住和工作的国家拥有完全的公民权。这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或者不现实的要求。这一要求只是在于移民的法律地位应配合近年来真正的经济变革得以改革。资本本身已经要求有跨越边界的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流动和持续的迁移。资本主义的生产在更加垄断的地区（在欧洲、美国、日本，也在新加坡、沙特及其他地区）则完全依赖于来自世界附属地区的工人的汇集。于是政治上要求资本主义生产的既定事实应被合法地予以承认，所有工人应被予以完全的公民权。结果，这种政治要求以后现代性的方式坚持着将权利与劳动相结合的现代基本的宪法原则，并由此对创造资本的工人予以公民权的回报。

这种要求也可以在与后现代的帝国条件相关的更加普遍和激进的方式中形成。如果在第一时间民众要求各国在法律上认可资本所必需的移民，在第二时间它一定要求控制运动本身。民众必须能决定它是否、何时及向何地运动。它也必须有权留下来，在一个地方享受生活，而不必受迫持续奔波。控制其自身运动的一般权利乃民众对全球公民权的终极要求。就它挑战了帝国对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加以控制的基本机制而言，这种要求是彻底的。全球公民权是民众重夺空间控制，进而设计新的制图学的权力。

时间与身体(要求社会报酬的权利)

至此,在我们已考察的空间维度之外,许多因素出现在流动的民众的漫漫长路上。尤其是民众掌握了时间并建构了新的时间性,我们可以通过聚焦劳动改革来发现它。理解这种新时间性的建构,将帮助我们看到民众如何有潜力使其行动作为真正的政治趋势连贯起来。

生态政治生产的新时间性不可能在传统的时间概念的框架下理解。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以"之前"与"之后"间的运动标准来定义时间。他的定义有个突出的优点,即将时间的定义从个体经验和灵性中分离开来。时间是一个集体的经验,包含着民众的运动,并生存在其中。然而,亚里士多德继续将这种由民众经验决定的集体的时间削减为一个测量的超验标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历程中,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和海德格尔,时间已不断地被定位在这种超验的生存地。在现代性中,现实除非作为标准才可以被理解,反过来标准只有作为将存在限定在超验秩序内的一种(真正的或形式上的)假设时才可被理解。只有在后现代性中才存在与这一传统的真正决裂——不是与亚里士多德的作为集体构成的时间定义中的第一要素决裂,而是与第二种超验的构成决裂。在现代性中,取而代之的是,时间不再由任何超验的标准、任何假设所决定:时间直接从属于存在。这便是亚里士多德的标准传统断裂的地方。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时间性的超验主义被这一事实所重创,即现在以习惯或计量的方式都不可能测量劳动。时间完全回归到集体存在之下,进而在民众的合作内部存留下来。

经过在民众中形成和改造后的合作、集体存在和交流网络,时间在内在化的层次上被重新占领。它没有被先验地给定,相反却具有集体行为的印记。民众劳动的新现象学将劳动揭示成基本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活动通过合作超越了强加于其上的任何限制,并不断地对世界进行再创

造。民众的活动组成了超越标准之上的时间，由此，时间可能被定义成在“之前”和“之后”间的运动，即构成的一种内在过程的不可测量性①。本体论的构成过程在合作的集体运动过程中展开，贯穿主体性生产交织成的新组织。这种本体论的构成的位置正是新的无产阶级显现为一种组成力量的地方。

这是一种新的无产阶级，而不是新的大工业工人阶级。这种区分是根本性的。如我们前面所解释的那样，“无产阶级”是对所有那些受资本剥削其劳动的全体合作的民众加以定义的一般概念（见第三章）。在资本能将价值降低为标准的期间，大工业的工人阶级只代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历史中的部分阶段。在那个期间，似乎只有带薪工人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因而所有其他的劳动分工看上去只是再生产的或者甚至不生产的。然而在帝国的生态政治情境下，资本的生产甚至更多地和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汇合起来。由此要保持生产的、再生产的和不生产的劳动间的区分变得更加困难。劳动——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智力的或者肉体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生活，并在此过程中受资本的剥削。生态政治生产的广阔图景让我们最终认识到无产阶级概念的完全的普遍性。生态政治的情境下的生产和再生产之间在发展中难以区分，这也再一次阐释了时间与价值的不可测量性。随着劳动移到工厂围墙之外，要保持计算工作日的假说，并进而将生产的时间与再生产的时间，或者工作的时间和业余时间分离开来就愈加地困难了。在生成政治生产的层次上没有考勤的计时钟在敲击；无产阶级整日到处以其所有的普遍性进行着生产。

生态政治生产的这种普遍性澄清了民众次要的有计划的政治要求：

---

① 论时间的构成，见 Antonio Negri, *La costituzione del tempo* (Rome: Castelvecchi, 1997); and Michael Hardt, "Prison Time," *Genet: In the Language of the Enemy*, *Yale French Studies*, no. 91 (1997)。亦见 Eric Alliez, *Capital Ti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一种社会的酬劳和对所有人来说有保障的收入。社会的酬劳首先与家庭酬劳即劳动按性别分工的基本手段相对立;借助这种斗争手段,付给男性工人的生产劳动的报酬也被要求付给在家的工人妻子和受赡养者的无报酬的再生产劳动。家庭的报酬使家庭的控制牢固地保持在男性报酬获得者手中,而且使关于什么样的劳动是生产性的、什么不是的错误概念长期存在。随着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间区分慢慢淡去,家庭报酬的合法性也在淡化。社会报酬完全超越于家庭之上,扩展到整个民众,甚至失业的人群,因为全体民众在生产着,而它的生产从整个社会资本的角度说是必要的。在到后现代性和生态政治生产的进程中,劳动力已愈加地成为集体的和社会的。当劳动不可能被个性化和测量时,要支持"同工同酬"这样的老式口号甚至都不可能。对社会报酬的要求将以下要求扩展到全体人民:所有为资本的生产所必需的活动应以平等的补偿来加以认可,以便社会报酬成为真正受保障的收入。一旦公民权扩展到所有人身上,我们可以将这种受保障的收入称为公民权的收入,即社会每个成员所应有的。

目标(再占有的权利)

既然在生态力量的帝国范围内生产与生命趋于重合,阶级斗争有潜力在所有的生命领域中爆发出来。如今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具体事例如何能现实地涌现出来,而且它们如何能组成一个连贯的斗争计划,即足以毁灭敌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组成的力量。问题是究竟民众的主体如何能将其自身形成一种目标。

民众目标的首要方面与语言和交际的意识相关。如果交际已不断成为生产的组织,如果语言的合作已不断成为生产的物质存在的结构,那么对语言的意识、意义和交际网络的控制就成为政治斗争的更加中心的事件。尤根·哈贝马斯似乎已经理解了这一事实,但他将语言与交际

的解放了的功能只授予个体和社会中孤立的部门。[①] 通往后现代性和帝国的进程禁止那种对生活世界的划分，随即将交际、生产和生活展现为一个复杂的整体，一个公开的冲突场所。科学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已经长久地占据了这些争议的场所，但如今所有的劳动力（无论它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脑力的或体力的）都参加到在语言意识上的斗争和反抗资本将交际社会性殖民化的斗争当中。腐败与剥削的所有要素被语言和交际的生产体制强加到我们之上：以言语来破坏它们就如在行动上这样做一样紧迫。倘若通过思想意识我们仍然理解到一个上层建筑上的、外在于生产的观念与语言的领域，这其实就不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事情了。或者不如说，在帝国的体制意识形态中，批判直接成为对政治经济学和体验过的经验二者的批准。意识和意义如何能以交替、连贯的交际机制实现有差异的转向和组织起来呢？我们如何能发现和引导创造着生活与生产组织的语言准则和交际网络的表述行为的方式？知识不得不变成语言行为，而哲学则被迫变成真正的对知识的再占有[②]。换句话说，语言和交际不得不以斗争组成生活。当将交际联结到生活模式上的机制在民众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时，目标的首要方面便凸现出来。对应着每种语言和交际网络的是机器的系统和机器的问题，而它们的应用让我们认识到民众的目标的第二个方面，它整合了首要方面，并带着后者走向更远。我们深知机器与技术不是中性和独立的实体。它们是部署在具体的生产体制中的生态政治的工具。它促进了一定的实践又禁止了其他的实践。我们一直跟在后面讨论的建构新无产阶级的进程在此超越了一个基本的起点，此时民众将其自身认识成机械化，并构想出对机器和技术进行新应用的可能性；在这种应用中，无产阶级没有被吸纳成“可变资本”，即资本生产的内在部分，而应是一种生产的自主力量。从在语言意

---

①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A. G. 类似地认识到一小部分无产阶级与生产的新型交际方法相关。

② 在此我们正仿效着使用 B. C. 为“哲学”一词找出的令人感兴趣的词源。

识上的斗争到构建一种机器的新体系的过程中，目标获得了更大的连贯性。目标的第二方面作用在于使得已在语言中建构起来的东西对自由的渴望来说成为一种长期的物质进程。人与机器的杂交化不再是单纯发生在社会边缘的过程；相反，它是处在民众及其力量构成的中心的一个基本阶段。

既然大规模的集体手段必须为这种突变所调动，目标就必须形成为集体的目标。它不得不真正成为主体间遭遇的场所和组成民众的机制。[①] 这就是新无产阶级的唯物的目的论形成所经历的系列道路的第三个方面。这里意识和意志、语言和机器被用来支撑历史的集体性创造。这一变化过程的展现只能由民众的经验和实验所构成。因而，想象着集体通过调解而不是组合形成的辩证法的力量已被明确地消解。历史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是民众生活的组成。

第四个方面与生态政治学相关。现存劳动的主体性在对语言与技术的意识的斗争中简单而又直接地揭示出，当一个人说到构成新世界的集体手段时，他是在说生命的权力及其与政治组织间的联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生命的一切都在此相聚。它们完全互相关联并且彻底地可互相交换。民众的实践决定了这种复杂的和单一的视野——一个既是本体论的又是历史性的视野。这里便是生态政治的组织向基本的组成权力敞开的所在。

由此第五个，也是最后的方面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组成力量——或者真正关系到形成其自身政体的民众经过创造性想象后的产物。这一组成的力量使得不断地朝向一种激进和发展的转变过程成为可能。它使得平等与牢固变得可以想象，这二者正是那些基本的脆弱的需求，却在整个现代政体的历史过程中保持抽象。应该毫不惊奇的是，后现代民众

---

① 论遭遇的组成概念，见路易斯·阿尔杜塞在其20世纪80年代受监禁后晚年的著作，尤其是"Le courant souterrain du matérialisme de la rencontre," in *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vol. 1 (Paris: STOCK/IMEC, 1994)。

从美国宪法上取走了允许它对抗并处在所有其他宪法之上，成为帝国宪法的那些因素：即它的无疆界的自由边疆的理念和它对在组成力量中得到赞美的开放的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定义。这一可能性的新范围无法保障未来。但尽管有那样的保留，仍有某些真实的东西预示着不久的未来我们可以感受到动向的目标，即我们在欲望之内建构起来的民众。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民众的第三个政治要求：再占有的权力。它首先是再占有生产方式的权利。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长久以来要求无产者可以自由地接近和控制它用来生产的机器和材料。然而，在非物质和生态政治生产的情境下，这种传统的要求穿上新外衣。民众不仅使用机器来生产，而且自身变得愈加地机械化，同时生产方式不断地被融入民众的大脑与身体之中。在此情境下，再占有意味着自由地接近和控制知识、信息、交际和情感——因为这些是生态政治生产的一些基本方式。这些生产机器已被融入民众之中的情况并不意味着民众控制着它们。相反，它造成机器的异化更加邪恶有害。再占有的权利真正地是民众自我控制和自主的自我生产的权利。

占有力

民众的目标必须生存下去且组织其政治空间来反对帝国，但须在“时代的成熟度”及帝国体现的本体论条件之内。我们已看到民众如何运行在漫漫长路上并通过再占有时间和对新的机器系统进行杂交化方式来实现物质形式。我们也已看到民众的力量是如何在真空状态中物质化的，这种真空状态有必要保存在欧洲的中心。如今它关系到在这些维度下民众的转变主体的问题。换句话说，虚拟条件必须现在真实地变成具体的角色。与神圣城市相对，俗世的城市必须展现其作为一种理性神话的机制的权力，这一机制将民众的生态政治的现实组织起来。

我们想用来指称在政治自主性和生产活动之中的民众的那个名字

是拉丁词“占有”(posse)——作为一个动词、作为活动的力量。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中,三位一体的 esse-nosse-posse(存在—认知—占有力)代表了基本哲学范式的形而上学的核心,这样的范式将随着现代性逐步成形而产生危机。现代欧洲哲学在其源头和未受制于超验主义的创造性要素方面不断地趋向在本体论的动力中心提出占有力:占有力是将知识与存在交织在扩展的组成过程之中的机器。当文艺复兴成熟并达到与反革命力量的冲突点时,人文主义的占有力在培根的发现(inventio)或实验的理念,康帕尼拉的爱的概念及斯宾诺莎的权力(potentia)的用法中变成一种抵抗的力量和象征。占有力是身体与大脑可以做的事情。恰恰因为它不断地生存在抵抗中,形而上的术语成为一种政治术语。占有力指民众的力量及其目标,一种包含于其中的总是趋向可能的知识与存在的力量。

当代美国的说唱小组已经将术语“占有力”作为名词重新发掘拿来标记在音乐与文字上,定义该小组的力量,即后现代民众的独特差异。当然,说唱者的近邻指代可能就是“狂野西部”的传统信仰的伴随占有力,即那群粗鲁的、时常准备着由县治安官授权追捕歹徒的武装分子。这种警戒会与歹徒式的美国幻想却不太令我们感兴趣。更加有趣的是追溯到该术语更深和暗含的词源。似乎对我们来说,也许一个奇特的命运已经更新了文艺复兴的理念,而且带着一点疯癫,使得该术语再一次值得拥有其高度的政治传统。

从这个角度我们想提出占有力而非“公共客体”,因为组成它的公共事物和单个活动超越了任何客体并且在构成上没有能力被聚拢在一起。相反,单个活动是生产者。类似于被知识所阻碍,进而在存在的形而上的基部扎根的文艺复兴的“占有力”,单个活动也将处在政治的新现实的源头,而民众正在帝国本体论的真空状态里对政治事务进行定义。占有力成为让我们将民众理解为单个主体性的最佳立场;占有力构成了生产的模式及其存在。如同在所有的创新过程中一样,兴起的生产模式形成

与它被迫从中解放出来的条件相反的姿态。民众的生产模式则形成与劳动名义下的剥削、合作名义下的财产以及自由名义下的腐败相对的姿态。它对劳动中的身体进行了自我定价，通过合作再占有了生产的智力，并转变了自由状态中的存在。阶级组成的历史和劳动战斗性的历史体现出这些全新然而明确的再构造的模式，这些再构造包括自我定价、合作和作为有效的社会工程的政治上的自我组织。

完全属于资本主义的工人战斗性的第一阶段，即在福特主义与泰勒主义体制得以充分部署之前的大工业生产阶段，由专业工人的角色所定义，专业工人即在工业生产中按等级组织起来的高度熟练的工人。这一战斗性，涉及到将工人自身的劳动和生产合作的自我定价的具体权力转化成将在再占有的工程中应用的武器，在再占有的工程中，工人自身生产力的单个角色将被提升。工人委员会的团体是其口号；生产者的苏维埃是其目标；现代化表达中的自主权是其议程。现代工会的诞生和先锋队政党的建立二者均开始于工人斗争的这个时期，并且有效地对后者进行了过度的限定。

资本主义工人战斗性的第二阶段与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体制的部署相呼应，并由大众工人的角色来定义。大众工人的战斗性将其自身的自我定价结合成对工厂工作的拒绝，并将其权力扩展到社会再生产的所有机制上。它计划要创造一个对资本主义权力系统的真正的替换。大众工会的组织、福利国家的构建以及社会民主的改良主义是大众工人决定的力量所形成的关系和它对资本主义发展所施加的过度限定产生的所有结果。在这一阶段，共产主义的选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之中充当了反作用力。

如今，在与后福特主义的信息的生产体制相对应的工人战斗性的这个阶段，社会工人的角色显现出来。在社会工人这个角色上，不同方面的非物质劳动力被交织在一起。在弹性的和流浪式生产的社会合作的所有领域，将大众智性和自我定价联结起来的组合力便是当时的秩序。

换句话说,社会工人的计划是一个组合的工程。在今天的生产模式中,劳动组合力可以被表达成人(遍布世界市场各个地方的平等的公民权)的自我定价,合作(交际、构建语言和控制通讯网络的权力)和政治权力,或真正表达成一个社会的构成,在这一构成中,权力的基础由所有人需求的表达所决定。这是社会工人和非物质劳动的组织,一个作为由民众管理的生态政治统一体的生产的和政治权力的组织,它由民众组织,受民众指引——行动中绝对的民主。占有力产生出其未来组织的染色体。身体在战斗的前线,身体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巩固了昔日斗争的成果,并包含了在本体论上获得的权力。剥削不仅必须从实践的角度被否定,而且应在其前提条件和基础中被废弃,以及从现实的起源上剥离掉。剥削应从非物质劳动力的身体上排除掉,就像从社会知识和在同一权力下带来价值与情感的再生产的情感(生育、爱、亲情与集体关系的延续,等等)上排除掉一样。在剥削以外的新身体的构成是新的生产模式的根本性基础。

民众的生产模式从资本那里再占有了财富,也构建起一种新财富,并通过合作同科学及社会知识的力量一起表达出来。合作废弃了财产的头衔。在现代性中,私有财产经常被劳动合法化,但这一平衡如果的确曾经有过意义的话,而今却趋于完全遭到毁灭。如今生产方式的私有财产在合作的非物质劳动的霸权时代,仅仅是一种腐朽和专制的没落。生产的工具趋于在集体的主体性、工人的集体的智力和情感中得到重组;企业身份趋于由一般智力的主体的合作所组织起来,进而作为政治主体和占有力的民众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民众是生态政治的自我组织。

当然,一定有一个时刻,再占有和自我组织到达一个临界点并形成真正的气势。这就是当政治的方面真正得以确定——当开始阶段结束之后而自我定价、主体的合作性汇合以及无产阶级的生产管理成为一种组合力之时。就在这时,现代的团体停止存在,而后现代的占有力出现。

这就是一个俗世的城市创立的时刻，它强大且与神圣的城市截然不同。构建地点的时间性迁移和新主体的能量通过民众反抗帝国的行为已然确立了它的霸权。帝国的腐败已被主体的生产率、合作和民众对生产率的设计所埋葬。我们仍在等待的惟一事件便是一个强大的组织的构建，或者不如说叛乱。遗传的链条在本体论中形成和建立起来，支架由新的合作生产率不断地建造和更新，于是我们仅仅等候着占有力的政治发展的成熟。对这一事件，我们没有先例可以提供。只有经过实践的试验的民众将提出范例，并决定可能性何时和怎样变为现实。

斗士

在后现代时代，随着人民角色的消解，斗士成为表现民众生活的最佳角色：生态政治和反抗帝国的代表。当我们说到斗士时，我们没有在想任何类似第三世界的悲伤和苦行者的代表，他的精神深深地渗透着苏维埃国家的理性，如同教皇的意志印在耶稣社会的骑士心中一样。我们并没有想到像那样的情况，也没有想到一个人在义务和纪律基础上行动却假装他或她的行动源自一个理想的计划。相反，我们指的是某些方面更像共产主义者和20世纪革命的解放的斗士们，即在反法西斯斗争过程中被迫害和流放的知识分子，西班牙内战和欧洲抵抗运动的共和主义者，以及所有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自由战士。这种革命角色的一个模范典型就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激进的鼓动者。该组织成员通过不断地鼓动从下层工人中构建起联盟，同时在工人中进行的组织活动引发了乌托邦思想和革命知识。斗士是19到20世纪劳动解放的“长征”的基本参与者，这种“长征”是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巨人的集体运动的创造性特点。

在这一漫长的时期，斗士的活动首先体现为工厂和社会中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践。它也以通过并超越反抗的方式体现在一种反作用力

的集体构建和操作中，这种反作用力能够破坏资本主义的力量和用一种交替的统治方式来反对它。在与布尔乔亚的愤世嫉俗、金钱上的异化、对生命所有权的剥夺、劳动的剥削和情感的殖民化等等的对抗中，斗争组织起斗争。反叛是斗士的光荣标志。这种斗士反复地在悲壮的共产主义斗争史中献身。时而但非经常地，权利国家的正常结构对于被召来破坏反作用力的压制性任务是足够的。然而，当它们不充足时，国家恐怖的法西斯分子和白衣卫士，或者可以说是为"民主"资本主义服务的黑社会集团，都应邀来帮助强化合法的压制结构。

如今，在这么多资本主义的胜利之后，在资本主义对抗劳动的暴力已在超自由主义的名义上得以强化后，究竟为什么战斗精神的事例仍在出现？为什么反抗业已加深？而斗争不断地带着新的气势重新涌现出来？我们应该随即说，这种新的战斗精神没有简单地重复旧的革命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而今斗士甚至不可能假装成一个代表，连受剥削者基本的人类需求都无法代表。相反，如今革命的政治斗争必须重新发现早已成为其正确形式的东西：不是表征的而是构成的活动。如今战斗精神是一种积极、建设性的创新活动。这是一种形式，其中，我们和所有那些反叛资本统治的人如今将我们自身认可为斗士。斗士们以创造的方式抵抗帝国的控制。换句话说，抵抗随即与生态政治领域内的一种基本的投入相关联，并连接到生产与集体的合作机制的形成之中。这里便是如今战斗精神的强大的新颖之处：它重复了200年颠覆经验的反叛行动的优点，但同时与一个对外界一无所知的新世界相连。它只知道内在地、生机勃勃和必然地参与到社会结构的系统中来，毫无超越它们的可能。这种内在是大众智性与情感网络的生产性合作，是后现代生态政治学的生产率。战斗精神对反作用力予以抵抗，使反叛成为一项爱的工程。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也许有助于照亮共产主义战斗精神的前景，即阿思西的圣弗朗西斯的传说。想想他的工作。为了摒弃民众的贫困，他接

纳了一般状况，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社会的本体论力量。共产主义斗士做了同样的工作，在民众的一般状况中识别出它的巨大财富。在与尚未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弗朗西斯拒绝了每种工具的规训，在反抗肉体的禁欲中（在贫困和既有秩序中）他提出了要欢乐地生活，包括所有的存在和自然、动物、月亮妹妹、太阳哥哥、田野里的鸟儿以及穷人和受剥削的人们，这些一起反抗权力意志和腐败。又一次在后现代性中，我们发现自己处在弗朗西斯的境况之中，以存在的欢乐来反抗权力下的苦难。这是一场没有力量可以控制的革命——因为生态力量和共产主义、合作和革命一起在爱、单纯和天真当中保存下来。这是身为共产主义者的不可抑制的轻松和快乐。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作者=（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
页数=395
出版项=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4
ISBN号=978-7-214-04910-0 / D521
参考文献格式=（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SS号=12005172
DX号=000006557975
简介=就在我们眼前、帝国正在生长、成形。无边无垠，永无止境，这就是全球化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从后现代到现代，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人类在新世纪将迎来大同安康还是压制束缚？未来的关键、在于帝国及其抑制力量的互动结果。进一步地说，帝国只是一个概念，它主要是要求一种理论研究。帝国的概念的基本特征是没有边境，它的规则是没有限定。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帝国的概念假定了一个体制，这一体制成功地包括了空间的整一性，或者说真正地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没有国界限定它的统治权。其次，帝国的概念表示它自身与其是一个发源于征服的历史的政权，不如说它是一个成功地终止历史并因此永远固定正在存在的事态的秩序。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部分 今日世界的政治构造
第一章 世界秩序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第二部分 主权的转变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第六章 殖民主权和辩证法
第七章 转变的迹象
第八章 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第九章 帝国主权
间奏——反帝国
第三部分 生产之道
第十章 帝国主义的局限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第十二章 抵抗、危机与改革
第十三章 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
第十四章 混合的政体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第四部分 帝国的衰落
第十六章 虚拟性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第十八章 反对帝国的民众